

审 定 高志超 王允仙 王其春
李印逵 常立庭
主 编 李印元

抢救文史资料
服务文明建设

吕绍勤

中共阳谷县委书记吕绍勤题词

廣征博采
存真求實
周曉德

中共陽谷縣委副書記、縣長周曉德題詞

振奋民族精神

弘扬革命传统

柳汝华

阳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柳汝华题词

高舉愛國主義旗幟
努力做好文史工作

王允仙

政协阳谷县委员会主席王允仙题词

前 言

阳谷文史资料工作是在1980年县政协恢复工作之后开展起来的。8年来，在县委、县政府重视关怀下，历经三届政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共征集史料440篇，110万字，编印《阳谷文史资料》20辑，收录86篇，22.6万字。《阳谷文史资料》成了熟悉阳谷历史的丛书，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在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由于过去印发数量少，远不适应政协委员和广大文史爱好者的需要。为进一步发挥文史资料的社会效益，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县政协在前20辑的基础上，选择具有地方特色和影响面较大的稿件，并吸收了党史、县志资料的3篇文章，共62篇，汇集成册，现经省新闻出版局批准，由省出版总社聊城分社编辑出版。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同志1959年倡导的。它是当代人写当代事，是历史见证人来历、亲见、亲闻的实录，具有翔实的资料性和可读性，同时还具有为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服务的鲜明的政治性。文史资料工作在新时期的方针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更充分地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在经济建设已成为全国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科学、教育已提到战略重点的今天，征集史料的重点应放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

面来。同时对建国后的资料和港、澳、台及海外资料征集工作，也要积极探索。

征集是文史工作的基础。阳谷县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有着众多的历史人物和革命先烈，存在大量有待继续挖掘和整理的史料资源。诚恳希望各界人士和文史爱好者、工作者开阔视野，广征博采，提供更多更好的稿件，继续办好《阳谷文史资料》，为宣传阳谷、振兴阳谷作出贡献。

李即達

（阳谷县政协副主席、县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主任）

目 录

前言..... 李印逢 (1)

我的回忆..... 王筱湖 (1)

党领导的山东最早的一次农民暴动

——阳谷坡里暴动

..... 县党史办公室 孟昭军执笔 (22)

阳谷县抗日武装与敌伪的部分战斗

..... 县政协文史组 县党史办公室 (31)

为抗日救国而斗争..... 李旭东 (41)

忆抗日战争时期阿城地下工作情况..... 李 景 (54)

忆颜华..... 颜世端 周金铸 (64)

追忆余文伟烈士..... 段延世 (71)

对张冠军烈士的回忆..... 陈赞臣 (75)

回忆李鸿甲烈士..... 田明远整理 (82)

古城岭上埋忠骨

——忆李皖民烈士..... 郭炳庆整理 (86)

濮县战役..... 周云章 (90)

阳谷忠孝团叛乱始末..... 申仲铭 (104)

日寇在阳谷罪行录.....	政协文史组整理 (120)	53年
日寇在阳谷的暴行三例.....	政协文史组整理 (125)	53年
阿城惨案追忆.....	陈赞臣 (129)	
我所目睹的阿城二月二惨案.....	时敏民 (135)	
我在西安事变中参加捉蒋的一段经历.....	郭庆林 (138)	
附：擒蒋五志士 重逢在杭州.....	许寅 (152)	
西安事变时韩复榘通电前后.....	李玉法 (154)	
我所耳闻目睹的南京请愿情况.....	王社光 (156)	
熊观民先生事略.....	熊玮光 (160)	
附：上海《新民报》1949年4月10日报道 熊观民等西北军旧属参加冯玉祥将军 追悼会消息.....	(162)	
先父申集贤行略.....	申仲铭 (164)	
杨兰亭先生传略.....	杨宗震 (170)	
追记张穆臣先生.....	高振康 (173)	
冀鲁豫建国学院述略	县教育志编写组 郑芷华执笔 (179)	
冀鲁豫边区卫生学校简介	县教育志编写组 县卫生志编写组 (185)	
冀鲁豫边区抗日第四中学一分校.....	崔铁双整理 (188)	
1964年前的阳谷师范.....	赵明 (194)	
八乡师建校.....	张景颢口述 [刘子长]整理 (203)	
四职始末.....	李玉法 [高澄波] (207)	

关于四职的回忆

- 顾寿祥 王福来口述 李印元整理 (209)
安乐镇小学的创办与发展..... 李玉法 **高澄波** (211)

- 阳谷医林名录(古代)..... 李印元 (213)
孟西园的医学著作..... 孙亚先 武金池 (217)
孟西园先生妇女科及医疗简介..... 李玉法 (219)
狄大光先生传..... 孙亚先 武金池 (222)
毛登岭..... 县卫生志编写组 (224)
魏殿卿老中医传略及其医疗经验..... 魏洪远 魏仲远 (225)
一门祖孙三中医..... 田金聚 孙亚先 (229)
正骨医师赵传忠..... 孙亚先 (233)

- 张秋镇年画调查..... 谢昌一 (234)
张秋和朝城的蓝印花布..... 民 艺 (241)
张秋的草编苇编.....  于培章 (243)
民间艺人李保正和他的阳谷哨..... 李士钊 (246)
附: 阳谷哨——一种民间乐器..... 曹尔润 (259)
关于坝的资料..... 李印元 (261)
鲁庄的造纸和传说..... 政协文史办整理 (264)
蔡伦造纸(小资料)..... 政协文史办 (268)
鲁庄造纸情况见闻..... 李玉法 (270)

- 阳谷溯源..... 县志办公室 张万知执笔 (272)
阿城海会寺考略..... 李印元 (279)
阳谷文庙..... 李印元 **刘子长** (293)

博济桥·····	县文化志编写组	李道达执笔	(298)
石牛拉石车 清官千古传			
——明朝阳谷县丞笪一顺的传说			
·····	段延平	段延世	(300)
迷魂阵和孙膑阁			
——阳谷有关孙膑的传说及其他			
·····	刘子长	李印元	(303)
战国中期的杰出军事家孙膑·····		李印元	(309)
春秋战国时期有关治阿的三则故事·····		李印元	(315)
古典文学名著与阳谷·····		李印元	(319)
婚姻旧习俗·····	卢新文	李印元	(324)
重游鲁西北有怀旧事及范筑先将军(九首)			
·····	孙思白		(333)
阿邑怀古·····		李培现	(335)
附录 阳谷县文史资料征集提纲·····	县政协文史科		(336)
编者的话·····			(343)

我的回忆

王 筱 湖

缅怀王寅生、杨耕心两位先烈

1925年10月，寅生同志正在聊城省立二中求学，差一季还不毕业，他为了响应国共合作进行大革命的号召，即南下广东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于当年冬在黄埔军校加入了共产党。寅生同志为人正派，在聊中时深孚众望，被推为阳谷同乡会的会长。其时，我刚考进聊中不久，因而得能参与了同乡为他举行的送行会。

1926年秋，寅生同志奉黄埔军校党组织指示，曾返山东济南，并到安乐镇家乡进行过短时间发展党员的工作。在济南，他介绍当时在山天附中高中班求学的杨耕心加入了共产党（后据耕心同志告我，他的入党介绍人还有关向应同志）。在安乐镇，介绍他的表嫂朱华亭（又名朱庆荣）加入了共产党。次年，朱随寅生同志到武汉，考进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后经党组织介绍到宋庆龄同志主持的妇女运动讲习所工作。1927年夏，朱被派去苏联学习，1933年回国后脱党。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寅生同志离开黄埔军校到

武汉工作。同年“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寅生同志又奉党中央的委派返回山东，协同邓恩铭同志重建山东省委和组织地区党委。

1927年7月下旬某天，正值我在聊中求学的假日，寅生同志偕同耕心同志突然来到我家（这时，我已由耕心同志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因那天天气较热，我们3人即到梨园村外树行里畅谈了整个下午。寅生同志首先说明了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已经叛变革命，变成反动派新军阀，中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只有靠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工农大众才能完成。这对我是一次极重要的党课，使我深受教育、启发和鼓舞。9月开学后，我回到聊中。寅生同志为了筹备中共鲁西县委的成立，住在聊城东关姚家园子赵以政同志家中，后又迁到傅家大院。每逢星期天，我即到寅生同志的住处去倾听他的教导，他给我的言教、身教是极为深刻动人的，尤其是他坚定顽强的斗志和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高尚品质，使我终生难忘。1927年11月，他离开聊城南去上海参加党中央的扩大会议，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面。不幸的是，他竟于1928年“五·三”惨案前几天，在济南被军阀张宗昌部捕去杀害于千佛山下，时年仅24岁。

耕心同志向以“读书迷”著称，他能背诵英文小字典。1926年秋他加入共产党后，把那种读书的迷劲变为进行革命工作的干劲了。当年的冬假，他由济南回到家乡，不久即在九都杨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冬假过后，他又回到山大附中一边读书，一边继续为党工作，1927年春，因其工作积极，引起学校当局对他的监视，在他毕业前两个月，终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开除。为了避免他父亲的怀疑和监视，他没敢

立即回家，多次往返于济南和聊城中学，继续为党工作，待毕业期过后，才回到家中。从此，他更积极地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并先后在九都杨和宋堤口组织建立了农民协会。开始，他父亲误认为他是加入了国民党，没有严加限制他的活动。

1927年7月上旬，耕心同志为了配合农民暴动，写了很多“立即行动起来，反对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的标语，让我随他跑遍了城北不少大村，暗暗地将标语贴在村外的树上。没几天的时间，即聚集了数万扛着红缨枪的群众，将阳谷县城围困起来。后来，我也带领着我村几个青壮年，扛着红缨枪赶到了城北范家林活动了两天。群众有来有走，一直将阳谷城围困了10多天，给阳谷的贪官污吏一个很大的威胁和打击。事后，耕心同志告诉我，没有料想到，只用标语口号进行宣传鼓动，却发挥出这样大的作用，从而使他认识到了发动群众方式方法的多样性。

1927年10月间，耕心同志在我们邻村发现了一股以韩建德、曹万年为首的潜伏武装。他通过亲戚关系和韩、曹进行了一次接触，了解他们的动态、表现和企图。他认为，这股潜伏武装，可以争取团结为我党发动武装暴动的骨干力量。耕心同志向中共鲁西县委汇报了他和韩、曹接触的经过后，鲁西县委书记张干民立即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并派聂子政同志协助耕心做争取工作。

1927年11月底，耕心同志通过鲁西县委将我从聊中调回家，作为他发动组织坡里暴动的通讯联络助手。同时，他介绍我转了党。为了躲避他父亲的监视，我俩多在夜间进行活动。不久，他父亲又严加制止在他家招待各地来的活动分

子，从此即在我家设立了中共鲁西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我担任通讯联络工作。另外，还有他家的几位长工也是他的有力助手。在此之前，耕心同志介绍宋励华同志加入了共产党，安排他主要做会道门的工作，使其同情我们的暴动。当韩建德、曹万年那股武装占据了坡里教堂以后，为了扩大武装力量，耕心同志和韩建德约定腊月三十晚上，乘其不备首先收缴他村地富的枪支，并由他预先布置好了内应。届时，韩建德率队很顺利地攻进了九都杨，将全村地富家的所有枪支（包括耕心同志家的两支火枪）都收缴走了。

发动和组织这次暴动，实际上是耕心同志搞起来的，及至我们武装占据了坡里教堂以后，中共鲁西县委才派去了4人进行具体指导。在早设想，我们占据教堂以后，一面扩大武装，一面大力发动群众，巩固坡里根据地，这时，耕心同志和我即可随时投入到暴动的行列中去。但客观没有允许我们做到这一步。占据坡里教堂仅15天的时间，即遭到军阀张宗昌部邢旅的围困，从此内外断绝了联系。1928年旧历正月十六日夜間，暴动队伍突围奔向了冠县一带。

1928年春，坡里暴动失败后，耕心同志在当地已无法存身，又为其父所不容，即被党派到东北工作去了。我的身份在当时没明显暴露，开学后便又回到聊中。1928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的队伍占据了聊城，继而鲁西、华北都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我在聊中还差半月没毕业，即被迫走向了流亡的道路。

1932年冬，耕心同志和我重聚在家乡，都当了小学教员以作掩护，我又作为耕心同志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后来耕心同志告诉我，他刚到东北时，没有公开的职务，无法存身

生活下去，幸因他英语较好，考进哈尔滨邮局当了邮佐，从此生活满好。因受职务的限制，没有时间接近群众，也就没法开展党的工作，只可起个联络点的作用，因而使他苦闷不安，不如返回老家便于开展党的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以为返回家乡为党开展工作的机会来了。为此，他曾多次给父亲写信，陈述他再在东北干事，即使自己不甘心当亡国奴，别人也会以为他在东北当了汉奸，务望允许他回家当个小学教员以了终身。终于取得了他父亲的同意，返回家乡。他父亲的把兄弟焦光普正在阿城担任县立三高校长，当即把他安排在三高当了国语教员。在此，需说明一下。耕心同志的父亲杨竹泉先生虽较顽固，但自民初以来他即从事教育工作，当地的国民党员，多系他的学生，这对耕心同志回县工作却起了保护作用。例如1928年冬，博平县袁楼村党支部书记郭印九因参加坡里暴动被捕，曾供出耕心同志是暴动负责人之一，国民党山东省高等法院1928年12月19日发出第2997号训令，缉拿杨一斋（耕心同志字）、申兰生（即申仲铭）等4人。由于杨竹泉和申集磐先生通过私人关系从中为力，这个通缉安然无事地罢休了（通缉令原文，“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存原法院旧址院中）。

这时，我刚回家不久，接到在北平做地下党活动的韩子栋同志的回信，不同意我去北平，更不同意我去东北参加义勇军，要我留下在我县建立一个联络点，并推荐我到县民众教育馆附设平民小学当教员。当我和耕心同志会见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和子栋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他认为，鲁西的党虽然早和上级党委失掉了联系，但不能等待找到了上级党委的关系再去为党工作，而应先为党工作起来，同时找上级

党委的关系。耕心同志是我的老领导，对我来说，找到了耕心同志就是找到了上级党委的关系，因而我对耕心同志的主张是衷心拥护的。我俩曾几次交换意见。他指出，为了开展党的工作，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必须抓以下三项：一是主动地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共同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谬论和对日寇侵略的不抵抗主义，揭露他们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寇，而对工农红军却一再进行军事围剿，对进步的文化活动进行文化围剿的卖国反共罪行，我们所要抓的这项工作，正符合党中央1935年12月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要求，实即统战工作；二是培养青年一代；三是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社会活动。耕心同志因处境特殊，让我注意去抓一、三两项。过了1932年旧历年关，他先到阿城县立三高，担任了五、六年级的国语教员，随后我也到城里平民小学任教。我作为耕心同志的助手，又积极为党工作起来。

耕心同志从到阿城县立三高开始，就重视用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培养新一代。为了自编教材，他订了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杂志。并准备大伙集股，由杨鼎同志负责，在阿城成立一个“晨光书店”，也是从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着想的。筹备半年后，因书的来源和销售都有问题，也就作罢了。1933年冬假，韩子栋同志回家，主动向耕心同志和我提出，由他把我俩的组织关系作为单线领导转到中央北方局去。不久，北方局通过子栋同志转告耕心同志，能否到苏区党校学习。因耕心同志那时脚疾严重，没有去成。不久，子栋同志在北平被捕，直到1947年夏，才从重庆监狱逃出。

1934年秋，以耕心同志为首，另有盛北光、申云浦、翟

子超(鱼台人)等同志和我，倡导发起组成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在安乐镇县立二高最后的一次会议上宣告成立。为了大力发展“中坚社”，1934年秋末，耕心同志介绍与他一块任教的王伯谨同志加入了共产党，没待几天，他即偕同王伯谨到寿张和省立第八乡师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久，盛北光、翟子超、申云浦等同志都先后离开了阳谷，“中坚社”的领导就只有耕心同志一人了。

1935年春，耕心同志又调到安乐镇县立二高任六年级班主任。当年秋，我被国民党反动派从县民众教育馆撵出（由武子升同志介绍，我曾担任民众教育馆讲演主任1年多）。又由耕心同志介绍，安排我在二高当教员，我作为他的助手，仍担任原来的工作。当年冬，宋励华同志也返回家乡，耕心同志又添了一位抓会道门工作的助手。耕心同志一直重视培养新一代的成长。尤其是他在安乐镇县立二高工作期间，呕心沥血，经过2年半的努力，竟使二高变成了培养革命战士的红色小学。从1935年春起，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二高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革命工作。现在在全国各地担任军、师、团级和省、地、县级领导干部的大有人在。

“七·七”事变以后，耕心同志和我都辞掉了安乐镇二高教员的职务，专做抗敌后援会的宣传工作。申云浦同志也辞掉了博平小学教员职务，返回家乡。这时，新的鲁西特委负责人是刘晏春同志，刘原系中共直南特委交通，与阳谷的老党员早有联系。他的乡亲刘兰斋在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当团长，是地下党员。为了支持刘兰斋开展策反工作，鉴于1933年赵博生同志在孙连仲部率近2万士兵起义的经验，需要动员

一批进步青年前去。后刘晏春到阳谷，与申云浦同志研究，要在阳谷动员一批力量参与这项工作。经申云浦同志推荐，认为耕心同志在阳谷教育界和进步青年中很有号召力，这个任务交给他比较合适。耕心同志接到这项任务后，当然需要认真地对待上级党委的指示并坚决完成。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在聊、阳两县动员了近百名进步青年和小学教师，有他早期发展的“中坚社”员和党员，在行军途中他又发展了一些党员。1937年11月底，由耕心同志带队，刘兰斋引导，南下直奔鄂西孙连仲部。哪知到达孙部后，才发觉是受了刘兰斋这个叛徒的骗。原来，刘兰斋1937年7月那次回家，是为了完成孙连仲交给他的扩军任务。他骗取了刘晏春同志的支持。当耕心同志带队到达孙部后，刘兰斋把这批骨干分散补充到孙部的连队当了普通兵，却把耕心同志安置在孙部招待所，再也不准他与其他同志接触了。从此，耕心同志再没有见到刘兰斋这个家伙。据了解，当时由耕心同志带队南下的近百名青年壮士中，杨景相、杨桃林和李超3位同志后来从孙部逃出，奔向延安党校学习，其余大多数都下落不明。令人想来悲伤，思之痛心。耕心同志被迫离开孙部，辗转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要求去延安学习，党决定仍留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做军运工作。因此，他在西安参加了胡宗南办的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暂编三十六师任简报主任。在为党工作的过程中，1942年曾先后两次遭敌禁闭。1943年秋在鄂西会战中，为日寇所俘，惨遭杀害，时年43岁。

王寅生、杨耕心两位烈士，都是革命的先驱，都是鲁西尤其是阳谷县我党的奠基人。王寅生同志系历届中共山东省委

委员中首先遭敌人杀害、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的先烈。当先后听到两位先烈牺牲的噩耗后，我万分痛心。两位先烈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不仅令我终生崇敬，也值得阳谷新老党员永远崇敬和怀念。

回顾阳谷县抗战时期党的统战工作

1933年春，我一到平民小学就按照耕心同志的指示，注意抓统战工作。不久，赵凤升同志也到该校任教员。我俩于春冬两季还兼办平民夜校。从此，我在开展统战工作方面有了得力助手。我们首先从了解情况着手：哪些人是进步的，需要作为我们团结的对象；哪些是中间派，可以作为争取的对象；哪些人是必须注意警惕的反动派。后来，我们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同国民党县党部对着干的进步人士，如县立乡师校长李鸣陆、县民众教育馆讲演部主任武子升、图书部主任高澄波、县立乡师总务处主任岳舜卿都结为朋友。这时，我的自幼同学魏宗尧（后改名魏则先）刚从聊中毕业，正在城里南街他父亲经营的“云锦斋”商店休闲，也成了我们开展统战工作的有力助手。后来，他家那个商店即成为我们召开秘密会议的最好场所。还有在聊城和我同时加入共青团、当时在县建设局任打井专员的申怡之，虽然又披上了国民党员的外衣，但仍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奋斗。1934年秋，“中坚社”的建立，对开展统战工作和发展党的组织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爱国民主人士申集磐（即申鸿渐）先生和申伯锦、申仲铭父子3人，早就同情支持我们的行动，对我们开展工作起了没有预料到的保护作用。申集磐先生原系同

盟会员，辛亥革命时他就带头反封建。他热爱教育，安乐镇县立二高的创办，安乐镇省立第四职业学校的兴建，都是由他提倡并筹建起来的。大革命时期，仅安乐镇就有王寅生、顾时清、申伯锦、申仲铭、朱华亭、申鸿序等6人，先后南下考进了广州黄埔军校和武汉分校，其中就有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媳（朱华亭）。他的家庭即是一个国共合作的家庭。他的堂叔伯侄申春生（申怡之的大哥），也很早就成为国民党左派。申集磐父子3人，后来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七·七”事变后还未撤销。当时还有安乐镇县立二高校长杨元瓚、阿城县立三高校长荣祥云、王营县立五高校长高儒藩（王伯谨的姑夫），都成了同情支持我们的朋友。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虽然接受了共产党关于恢复国共合作的建议，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但蒋介石对华北敌后抗日战争，仍千方百计进行干扰破坏，阳谷县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就是这样。在抗战开始不久，他们就同我们争夺阳谷的抗日领导权，由于统战关系的大力支持，我们才能及早取得胜利。

1937年日寇占据德州后，鲁西各县的国民党反动派，都弃城南窜过了黄河，只有聊城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举起“守土有责，誓不南逃”的抗日大旗。为了大力支持范筑先守土抗战的义举，山东省我党负责人张霖之同志，很快集结了由北平流亡济南的一批党员骨干，立即赶赴聊城，支持范筑先抗日。范筑先司令部直属的政训处，就是由张霖之同志组建的。在筹备建立阳谷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时，政训处向范筑先推荐的领导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县长徐茂里、公安局长熊易五、政训处主任徐明、副主任黄主一（黄居易）、特务大队长赵小

涛、金库主任王润怀，范立表同意。及至范筑先率队到达阳谷县城以后，以申云浦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征得政训处的同意，推荐宋励华为阳谷抗日游击队总队长兼第一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兼总队部供给股长，武子升同志任总队部军需股长，郭安仁任第二大队长（郭部原系民团队伍，因和布永言部有矛盾，被我们收编组成第二大队。后来郭变成了极为反动的坏蛋），岳舜卿同志任第三大队长，魏宗尧任第三大队军需负责人，顾寿祯任特务大队副大队长，李鸣陆任县财政科长，李沛之任财科助理，申怡之任电话局长。这时，申云浦和赵凤升同志主办政治干部训练班，未参与军政组织领导。我们正在健全机构、充实武装（一、三大队和特务大队的枪支都是按枪支的存册指名征来的），1938年旧历二月二日夜，土匪布永言部配合二十九军一股溃兵王绍堂部攻陷了阳谷。我们抗日初期建立的政权，仅3个月的时间又失掉了。不久，布永言部又被范筑先司令收编为十九支队。这时，以刘建高、熊纪明、张大成、翟仲范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又乘机返回阳谷，他们向范筑先提出了许多攻击我们的意见和要求。范筑先司令虽然动摇了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但也没有完全接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建议，却以张维庠等中间派顶替了我们推荐的徐茂里县长和科局长，并将抗日游击总队缩编为县保安大队，只有以贵主一为主任的政训处保留下来了。从此我们的骨干力量都分散到各区去做发动群众和发展党员的工作，和刘建高等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国只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介石）”的反动宣传对着干。这时，宋励华同志调到鲁西南去做开辟工作，成为开辟鲁西南工作的功臣。在此期间，对我

们的统战工作倒是一次考验。所有统战对象和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起来共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行动完全一致起来了。这时，中共阳谷县工委正式成立，申云浦同志任书记，赵凤升同志任副书记，王伯谨同志任组织部长，姚修文同志任宣传部长，我任人民武装动员部长兼统战部长。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早为阳谷县广大群众所鄙视、仇恨，当然无法发动群众向我们进攻，他们只拉拢了一些与他们同伙的子弟加入了三青团，暗中进行敌对活动，同我们争夺青年，破坏我们的统战工作。后来他们竟潜入伪军、伪组织，进行“曲线救国”的宣传，城北徐庄的徐学黉以及朱梅，即是他们的代表。朱梅从1943年就企图任阳谷县长，但始终没能在阳谷站住脚。济南解放后，被我们活捉，解回阳谷枪决了。当时，枪杆子也不在他们手里，他们也无力组成反动武装。及至1939年秋，郝师温勾引日军占据了阳谷城，与郝作死对头的丁钦铎为了自卫拉起了民团武装，号称“丁团”。1940年我们把这股地主武装收编了，不久又都跑掉了。1942年冬，丁钦铎带着少数护卫，企图重新拉起他的地主武装。当他隐避在靠莘县边界化庄时，他的敌对者从莘县勾引来一股伪军，将其击毙在村外了。

在早却没有预料到，抗战开始，以刘清泉、刘清岚兄弟为首，以沈鸿烈为后台的这起新生的反动派和我们作对。1938年春，他们就以反动会道门作为倒范（范筑先）反共的武装力量，并在薛庄一带抗拒我们的征收任务。当年冬，他们又拉起了极为反动的“忠孝团”，先是采取四处进攻的凶势，曾一度进攻阳谷城，却未得逞。刘清泉当场被击毙在阳谷北关。但这却起到了配合日伪占据聊城的作用，致使范筑先殉

国。后来，刘清岚为首的“忠孝团”盘踞在朱庄李守正家的高墙大院和我们顽固地对峙着，1940年3月才被我军彻底消灭。

1938年11月中旬范筑先殉国后，王金祥当上了聊城专员。阳谷的县长换成了李鸣陆的学生吕仁道，吕拉李鸣陆当了她的秘书。不久，李鸣陆推荐我担任第三区抗日区长，吕当表同意，1939年2月，我从国民党反动派邵汉卿的任内夺到了第三区抗日区长的职务。这时，三区区委书记是蒲吉五同志。从此，阳谷第三区（辖沙土集、草寺、定水镇、石佛、郭店屯、四甲李、杨集7个行政乡）即成了鲁西少有的红色区政权。

1939年秋，日寇占据了阳谷县城，吕仁道的县政府首先遭到敌人的袭击。吕系外地人，又缺乏抗战的决心，他主张县保安队暂时插枪解散，几次和我、李鸣陆、武子升商讨这个问题，并取得申集馨先生的支持，找到了储存两条轻机枪和百多条大枪的保险地点，就把保安队解散了。吕仁道也离开了阳谷，再也不知去向。不久，李鸣陆、岳舜卿、武子升积极向工委建议，利用储存的那些武器，拉起一支抗日武装。李鸣陆主张由岳舜卿担任队长。经工委研究，认为他们的建议确实可行，就立即动员全县党的活动分子，大力支持这支由工委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的建立。以岳舜卿为队长，武子升为助手的“谷山抗日游击队”宣告成立。又隔了两个月，肖永智政委率领129师骑兵团和东进纵队一个营到达阳谷，在阿城刘楼召集全县有代表性的士绅到场，通过宣言，成立了以东纵政工干部齐南峰为县长的抗日政府。成立抗日政府，当然早向申集馨父子、李鸣陆、武子升、岳舜卿等紧跟共产党走的爱国进步民主人士打了招呼，并得到他们同

情和拥护才举行的仪式。李鸣陆任抗日政府秘书（相当副县长）。县设5个科，不久又建立了粮食、交通两科，一科科长蒲吉五，二科科长武子升，三科科长胥光，四科科长陈香坡，交通科科长申怡之，粮食科科长魏则先。公安局和动委会也组织起来了，公安局副局长李亚东，动委会主任李旭东。二、三、四、五区政府也成立了，二区区长杨鼎，三区区长王筱湖，四区区长王子恒，五区区长张某。一区即城关区和黄河南的六区，因我们当时力所不及，未成立区政府。同时，谷山游击队改编为阳谷县抗日基干大队，后李程九任大队副，张新吾任政委。由于统战关系的大力支持协作，共同对敌，我们才取得了阳谷的党政军领导权，并从此巩固起来。在此前后，武子升、李鸣陆、岳舜卿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申集磐先生待鲁西行政公署成立时，被选为行政委员，并兼冀鲁豫边区政府参议。其子申伯锦提任鲁西行政公署教育处副处长。事实说明，以上这些爱国进步民主人士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还有我县李氏三春——春鹏（即李程九）、春鸷（又名李伦）、春鸿三兄弟，抗战一开始就在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先后参加了抗日工作。那时，阳谷广大群众谁人不知李程九有胆有识，英勇善战。1939年秋，日寇占据了阳谷城后，他们兄弟3人即和张清彬拉起了抗日游击队，由李程九同志率领，向占据县城的敌人发动了一次进攻。1940年春，敌人在城北青杨李安了个大据点，仅凭李氏三春之力，即拔掉了这个据点。李程九和李春鸷两同志，都担任过阳谷县抗日基干大队副。后来，李春鸷带队升级当了团长，在保卫延安战役中牺牲。李氏三春在距阳谷城仅10华里的大迷阵高举抗日大

旗，阳谷城里的数千由伪军，又奈李氏三春何！1944年间，我军攻打孟宪章据守的朱庄伪据点，围困数天，无力攻下，伤亡很大。后来，李程九同志通过政治争取，拔掉了这个据点。李氏三春在抗战期间对敌斗争的卓越贡献也是不可泯灭的。

阳谷三区等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抗日战争开始，我们一度取得了阳谷的抗日领导权，但不到4个月的时间即失掉了。直到1938年底，我们主要是支援范筑先的扩军。当时，阳谷境内经常住有范司令所属的两三个支队，因而我们对抓自己的抗日武装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1939年秋，我们才支持徐翼同志在聊、阳、阿三边拉起东进纵队第四大队。日寇占据阳谷城后，我们既掌握了吕仁道离开阳谷时储藏起来的枪支，又进一步认识到抓抗日武装的重要，即大力支持了谷山游击队的成立。当年冬，我们的抗日三区队也拉起来了。这时，我们遇到的劲敌倒不是日寇，而是顽军十军团。石友三部莫旅南下窜到运河两岸聊、阳、阿3县的边际，并企图占据阳谷全县，还委派了陈庆元为阳谷县长，和我军敌对起来。三区抗日武装在聊阳公路以西发展起来。1940年春，脱产的抗日区队逐步壮大，以杨集乡和四甲李乡杨福庭、陈正义为首的地方民团，以沙土集乡王本昭为首的王团也拉起来了。全区的地方武装都归我领导，李贯一同志是我的助手。我们首先突破大地主集中的封建堡垒四甲李，得到长短枪30多支，其他村的地富也自动把枪支交给了我们。我们向徐翼同志学到了怎样抓钱款和子弹供应来源。凡是遇到来往济南或其他地区的大粮食贩子，把粮食、车马都折价没收。

这样，我们的子弹和其他物资供应都有了着落。不幸的是，1940年春区队在王堤口首次伏击大股日军时，区队副李贯一受了重伤，只我一人带队作战了。战士们的斗志不仅没有低落，反而更加振奋和顽强。我们三区队虽多次升级，但始终保持3个排的编制。1941年春，我们区队还有了1个骑兵排。1940年春，以杨福庭、陈正义为正副团长的那个地方民团，直接升级到冀鲁豫军区八团。1940年秋，以王本昭为团长的王团改编为县大队的1个中队，后来多数又跑掉了。1940年夏初，齐南峰县长调走，由英勇善战的徐翼同志接任。此后，我们三区队时常随同徐翼县长率领的1个连到处游击，几乎走遍了阳谷所有工作开展不起来的死角。

因为这时贯穿我区的聊阳公路已成为敌人的交通要道，首先主动向敌人进攻的是我三区队。1940年春到1941年秋期间，每隔两三天我们即主动向敌人进攻一次，甚至有时一天即和敌人两次交锋。1940年秋，敌人集中十几个县的伪军，把我兄弟5家、堂叔兄弟3家的祖居70多间砖瓦楼房先烧后拆，夷为平地。当时，我的哥哥们曾向我诉说老少几十口人无家可归之苦，我满怀信心地向他们解释说明，“现在无家可归总是暂时的，只要有国就有家”，以安慰鼓励他们。因我时常率队伏击来往于聊阳公路上的敌人，敌人就在我区中心郭店屯（也是聊阳公路中点）集结了大股伪军和1个排的日军作护卫，动工修筑碉堡，搞大据点里边套小据点的勾当。因距我村梨园仅2里路，敌人强迫数百民工和数十辆大车，去拆运我家被烧光后的砖墙，用来修筑小据点的碉堡。在此期间，我曾多次率队冲击敌人的护卫，敌人听到枪声就跑掉了，俘获受伤的尽是一些民工，因而我即停止了这种对敌斗争

的战术。敌人只能每天强迫拆运一次，一直持续了3个月，才把我家的墙根拆光运完。当郭店屯北街小据点已筑起，大据点的土墙也修有半人多高时，敌人在小据点附近搭起戏台庆祝。唱戏那天，我率队冲进了大据点。开始我们并未放枪，准备活捉几个鬼子。伪军发现后，枪声就乱响起来了。大据点内的伪军和穿着龙衣蟒袍的演员到处乱窜。这时，有个带枪的鬼子正向小据点奔去，被我战士击毙在小据点门口了。

1941年初，敌人在阳谷筑起的据点逐渐增多。为便于开展对敌斗争，经县委研究，上级批准，将三区从邓楼、李家南北划开，成为三、八两个区，郭店屯以东四区所属的孟堂乡合并到三区，我仍任三区区长，由我区郭店屯乡乡长杨继坤担任了八区区长。从此，我的工作重点就向紧邻聊城的我区北端开展。由于一些老同志的家都在三区（例如九都杨的杨耕心、王营的王伯谨、邵楼的宋励华、蒲吉五），原有的群众基础好，抗日开始发动群众起来得早，参军的也较多，所以，我区虽然安了几个敌据点，仍然不失为阳谷较好的一个抗日根据地，即所谓有敌人不是敌区。郭店屯这个敌人的大据点内设有一整套伪区政权建制，但丝毫不能影响我们的群众工作和征粮任务。我区据点的顽固敌人都是外地派去的，这些家伙一到我区就恐慌不安，不敢主动向我们进攻。本区的群众没有肯主动参加伪军、伪组织的，更没有一个敢于在本区当汉奸的。

1941年秋末，阳谷县委抽调我到冀鲁豫区党委轮训队学习，由我区助理员李志深同志代理区长。不久，北洋军阀余孽、会道门头头赵二虎（名长街）聚集了千多人公开投敌，

在七级至张秋运河两岸安了大小据点15个。这时，阳谷境内敌据点将近百个，还沿朱老庄至石佛段聊阳公路两侧，挖了宽深各4米的封锁沟，这对我们开展对敌斗争是一个很大威胁。这时，二、四、六区队和十一区队先后投奔了赵二虎部。我区区队副也换为高毅同志。1942年2月，我返回阳谷三区时，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1942年春，赵二虎赴济参加敌伪会议，却被扣押在济南。赵所属15个据点都乱腾了起来。4月的一天夜间，这15个据点的伪军经赵二虎部团长陈广新（我的族家外甥）从中串连，都自动放弃据点，奔向我们三区。名曰“改邪归正，坚决参加抗战”，拥我作他们的领导，实际上，他们都是为下一步的出路着想的。有什么陈团（团长陈广新）、田团（团长田庆海）、洪团（团长洪五申）、杨团（团长杨存德、外号杨麻子）、混成团（团长刘老头、副团长刘二铁头）、独立营（营长王丕谦），他们有千多人，浩浩荡荡的我们的区队一块行动。有20多天的时间，阳谷的敌伪军据点都闭门不敢出动。我们请示军分区刘志远司令，刘说：这些人跟着你走到哪里算哪里，不能改编成我们的抗日军队，只能作我们抗日同盟军，也不让我当他们的司令，让他们自选司令，我可作他们的参谋长。不多天，杨麻子首先带着他那个团跑掉了。接着，洪五申也带着洪团投了阳谷城里的汉奸队。后来，陈团、田团和混成团的团长们都主动向我提出，愿将他们的那些破枪交给我们，将他们带领的那些人解散回家为民，但要求保证今后不再追究他们的责任。我请他们吃了一顿好饭，答复了他们的要求，就此各自走开了。只剩下那个独立营，因其中人员成份较好，营长王某也较老实

可靠，当即改编为县基干大队直属的1个中队。就在这时，由我率队，王清洙作内应，将我区王营的伪据点拔掉了。我区苑店的伪据点多系我们打入的关系，也主动拉了出来。这两个据点拉出来的人员也编成了县基干大队的1个直属中队，这时我已调任县基干大队副了。

从此，阳谷县的对敌斗争形势又逐渐好转起来。

1942年8月，我调离阳谷，担任光杆一人的聊西办事处主任，带着8位战士组成的武工队，钻进聊西、聊南敌伪顽统治区开辟工作。但仍需凭仗着阳谷的老三区作我的后方根据地。1943年秋，聊西、堂邑南部合并，改为聊堂办事处，县一级的科局室也健全起来。我仍然时常带着五六人的短枪组，在聊城县城附近的村庄开展对敌斗争，既牵制聊西的顽军不致再侵犯、扰乱阳谷老三区，又起到阳谷抗日武装的前哨作用。直到阳谷解放，我始终在配合阳谷的抗日武装开展对敌斗争。1943年间，朱老庄、毛营、老槐荫的伪军碉堡，以及占据侯海的伪军陈广新部，都是我说服他们自动交了枪。1941年和1943年间，阳谷和聊城的敌人曾先后在阳谷和聊城县城四门贴出布告，用数万伪钞悬赏活捉我。当时我即一笑置之，今天说起来，也只是作为谈笑资料。

在抗日战争开始，与老三区同时建立的还有以阿城为中心的老二区根据地，以及老四区北部和七级一带的根据地（冯子肃同志对老四区北部和七级一带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是有特殊贡献的），都是党的领导强群众基础好的根据地。它们同老三区相比属于不同类型，因为这两个根据地虽然也被敌人占据过但为时不长，并和聊东南及阿西的根据地长期连成一片，因而成了阳谷县党政军机关人员长住地区，也是

我们三区队打游击、迂回休整的好地方。那时(主要是1940、1941两年)，如果没有二、四两区根据地存在，我们三区队的壮大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二、四两区不足之处，是始终没有建立起强大的脱产的区抗日武装。

其次，还有八区抗日根据地的重新开辟。在开始建立八区的时候，由于配备的领导干部弱，又缺乏强有力的抗日区队，致使两年多的时间对敌斗争和各项工作没有开展起来。直到1943年下半年，继我任老三区区长李志深同志调任八区区长，并带去了3个班战士，由智勇兼备的青年战士杨泽民同志(现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担任区队副，这时崔才同志也由六区区长调到八区担任区委书记。从此八区的抗日区队很快地壮大起来，八区的整个局面打开了。至阳谷解放前夕，八区队是阳谷抗日区队中最强的一支武装。

阳谷的抗日武装虽然多次升级，但始终是强大的，战士们英勇顽强，多次打败敌人，战果是辉煌的。在1941、1942两年，阳谷县的老同志大部分离开后，如果在干部政策上无偏，阳谷会涌现出更多的革命干部，培养出更多的后起之秀，如果在军事上部署无偏，少打被动仗，阳谷的武装会更为壮大。从1942年起，邻近有的县再没有发动组织起强有力的抗日武装来，只有住在阳谷的敌人时常受到存在不下去的威胁。敌人为了久据鲁西大据点聊城，便不断增强住在阳谷的兵力。1944年初，大汉奸齐燮元组织的较有训练的汪精卫“国防治安军”1个团，进驻阳谷县城，并企图坚守下去，1945年夏，被我军全部消灭在阳谷城里。从此，阳谷得到解放。

从抗日战争开始直到取得阳谷县的最后解放，每次战斗，我抗日战士英勇顽强，冲锋陷阵，前仆后继，不知有多

少人光荣地牺牲了。尤其是敌人几次大扫荡和铁壁合围，又有多少战士牺牲在战场上，或被敌人俘去惨遭杀害，为抗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据说，仅1942年“九·二七”大扫荡就把阳谷县大部的两个连给扫光了）。回忆和我一起开辟阳谷抗日根据地的一些亲密战友，如最先惨遭敌人杀害的李鸿甲、王长瑞、李贯一3位同志，和后来牺牲在战场上的武子升、张冠军两位同志，还有和我共同坚持阳谷三区抗日根据地、英勇牺牲的高毅同志等，每当想起他们，我便悲痛难忍。阳谷的解放，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烈士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原载1981年10月《阳谷文史资料》第一辑，1982年7月《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转载）

本文作者 王陵湖，1910年生，阳谷县郭店屯乡后梨园村人。1927年6月在聊城省立二中求学期间加入共青团，同年底转党，并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阳谷县抗日游击总队第一大队副兼总队供应股长、中共阳谷工委会人民武装动员部长兼统战部长、三区抗日区长、县抗日基干大队副、聊西办事处（聊堂办事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南聊堂县县长、临清冀南邮政第一分局局长、筑先县副县长、东阿县副县长、齐禹县县长；建国后历任山东黄河河务局清济修防处主任、水利部副处长、副局长、内蒙水利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水电部水利建设局、农水局副局长、中国水利老战士协会筹委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82年后退至二线工作。

党领导的山东最早的一次 农民暴动——阳谷坡里暴动

县党史办公室 孟昭军执笔

发生在1928年初的阳谷坡里农民暴动，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在山东领导的最早的一次农民暴动。这次农民暴动，在鲁西以至整个山东都有很大影响，是我省党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

一

阳谷县地处鲁西，是山东、河南、河北3省交界处，地理位置在军事上十分重要。张宗昌统治山东时，在东昌（今聊城）设“东临道尹公署”和“东昌道警备司令部”，常派1个旅或1个师的兵力驻守，阳谷属东临道管辖。1927年底蒋、冯合作后，冯玉祥一部进驻山东。这样，在山东、河北两省便形成了蒋冯的军队和奉系军阀张宗昌、褚玉璞直鲁联军对峙的局面。

由于军阀统治，政治腐败，拉兵派款，无恶不作；贪官污吏勾结地主，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加之水、旱、蝗、瘟连年为害，使劳动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勤劳勇敢、性情直悍、富有反抗精神的鲁西人民反抗军阀统治、苛

捐杂税的斗争不断发生。1925年冬，阳谷城北各乡农民就自动组织起来，劫富济贫，抗粮抗捐。1926年春，聊城发生了以农民领袖李太黑为首的聊、阳、莘、堂4县边境农民抗粮抗捐的围城（聊城）事件。1927年6月，共产党员杨耕心采取张贴标语的方式，发动了有万余农民参加的围困阳谷城的运动。

当时，我党在鲁西一带也有了较快发展。1925年大革命时期，聊城省立第二中学和第三师范就有些进步青年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技术。1926年冬，阳谷第一个党支部——九都杨支部建立，在农村开始了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的王寅生、赵以政、孙大安、聂子政（秉贞）和在黄埔军校任教的申仲铭（兰生）等同志，奉党的指示，回山东家乡开展党的工作。1927年秋，省委派省团委秘书长张干民（现名赵文栋，任吉林省粮食厅副处长）和省执委委员王寅生等，到鲁西组建县委。1927年10月，中共鲁西县委（即东昌县委）正式成立，张干民任书记，委员有赵以政、聂子政、王寅生等。当时省委对鲁西县委的指示是，大力发展群众工农组织，领导群众举行暴动，扩大武装斗争，建立工农政权，迎接全国革命高潮。鲁西县委在聊城的二中、三师，阳谷的郭店屯、安乐镇和博平、莘县等处开展党的工作，发展了四五十名党团员；并在阳谷郭店屯、九都杨、宋堤口、邵楼一带组织了农民协会，发展了五六十名会员。阳谷郭店屯、九都杨一带，既是大地主集中的地方，也是熬硝盐的贫苦农民最多的地方，生活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尖锐，农民迫切要求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就在这种形势下，党发动了阳谷城里暴动。

二

坡里庄位于聊城、阳谷、莘县3县交界处。德帝国主义侵略者早在1882年就在这里盖起了教堂。到1909年其规模已包括9个院落、5座3层碉堡楼、109间2层群楼，面积四五十亩之多。教堂有德国主教、神甫和修女多人，总管寿张、阳谷、朝城等处的天主教事务。他们勾结官府，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强占民田，挑词架讼，无恶不作。坡里共有土地3000亩左右，而教堂就占有1600多亩，并雇有几十名长工，有几十头大牲口。还拥有几十支枪和大批弹药，豢养着打手保卫教堂。当时群众饥寒交迫，而教堂却囤粮如山，以高利贷盘剥人民。附近的豪绅地主投靠洋人，为虎作伥，横行霸道，敲诈勒索农民。当地农民对教堂早已深恶痛绝。随着我党在坡里一带工作和农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对军阀统治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农民觉悟日益提高，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分子、拆毁教堂、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要求。

当时坡里一带活动着一支由韩建德领导的几十人的绿林武装。韩建德中农出身，因欠地主的债而遭受欺凌，被“逼上梁山”。他疾恶如仇，富有正义感。当时韩正在徐登朝门下。徐原是北洋军阀周荫人部的旅长，他在家利用旧军官的招牌，招兵买马，想拉起一支队伍投靠张宗昌。韩建德对徐登朝的霸道深为不满，便联系徐的参谋长程宗岳准备自立，另谋出路。

阳谷党支部的领导人杨耕心（阳谷县九都杨人）通过家

中工杨善保（党员，与韩建德表亲关系）了解到这些情况，便及时与韩联系，对其进行教育，动员他跟共产党走，为劳苦大众谋福利。韩建德为洗去“匪”名，欣然接受了我党的主张，表示愿跟共产党闹革命。杨耕心立即向县委汇报了韩建德的情况，并提出了把韩部争取为发动暴动的主要力量的建议，还多次带韩建德等头领与鲁西县委负责人张干民、聂子政等同志会面。县委委员赵以政还把韩找到县委进行动员教育。县委两次召开扩大会议，研究争取韩建德进行暴动的问题，决定在坡里举行暴动，占领教堂，夺取枪支，建立工农政权，时间定于旧历腊月三十，同时发动博平暴动，联合进攻聊城。为加强对韩部的工作，县委派聂子政、孙大安到韩部，分别负责政治、军事工作。杨耕心、聂子政、郭庆江还在郭店屯召集那些受徐登朝欺骗的群众，动员教育他们跟共产党闹革命。

鲁西县委向省委汇报了暴动计划。省委于1927年12月13日致信鲁西县委，同意暴动，指示如下：“一、宣传工作。公开出C P，宣传以群众暴动实行土地革命与夺取政权之主张……二、组织煽动工作。煽动群众直接行动（不必受首领的指挥），去杀土豪劣绅，分配粮食等。在群众起来之后，我们应插入群众中去，作群众的组织工作，以防首领之妥协。”（引自《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192页）山东省委委员丁君羊专程到聊城了解暴动的准备情况，并亲赴阳谷与韩建德会晤。

根据省委指示，我党加紧了暴动的准备工作。在梨园设立了鲁西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王筱湖任联络员，12月，鲁西县委委员袁果到九都杨听取了杨耕心关于暴动准备

的汇报。在杨耕心、聂子政的具体领导下，由50多名农会会员和韩建德的武装组成了近百人的暴动骨干队伍。杨耕心、聂子政经常和韩建德、曹万年等开会，研究暴动计划，确定于旧历腊月三十下午诵经时刻发动起义，占领教堂。后为预防泄密，加之韩建德执意提前行动，暴动时间又改为腊月二十二日。

这天，韩建德、聂子政率领农会会员和韩部骨干30余人，携带18支长短枪和腰刀、标枪、木棍等武器，在杨庙集合，黄昏时刻埋伏于徒骇河湾里。诵经时刻一到，韩建德、聂子政指挥暴动人员闯进教堂，占领了位于教堂中心、便于控制整个教堂的二门楼。在一片喊杀声中，教堂全部被暴动队伍控制，缴获40多支步枪，10多支手枪和10余箱弹药。曾在中国人面前耀武扬威的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不堪，束手就缚。

暴动发生后，山东省委委员兼鲁西县委委员王寅生和鲁西县委书记张干民立即赶到教堂，参加军事会议，研究讨论发布“告民众书”。为支援暴动，加强党的领导，县委立即调博平袁楼党支部的郭庆江、林梦白、袁敦臣等同志赶赴教堂。聂子政也在聊城周家店组织党员和农民协会成员奔赴教堂，原计划参加暴动的武装，也都很快到教堂集合。不几天就汇集了五六百人。为了加强对暴动队伍的领导，进一步团结巩固起义队伍，杨耕心、聂子政在起义军中秘密建立了党的组织，并和韩建德一起组建了起义军的领导机构：总司令韩建德，副总司令王朝聚，总参谋长程宗岳，聂子政作为党代表全面掌握司令部的工作，以执行党的决议。起义部队共分8个大队，大队长分别是：一大队杨万奎，二大队王德

五，三大队曹万年，四大队崔存厚，五大队杨××，六大队×××，七大队霍然，八大队孙大安（党员，后因病退出教堂，由周家店农民协会的同志继任）。司令部下设5个科：宣传科，负责人宋占一（党员）、申仲铭（党员，兼韩建德的机要秘书）；谍报科，由郭庆江、林梦白负责；还有民政科、总务科、财务科。执法处处长是任据高。

为扩大政治影响，暴动队伍到处张贴《告民众书》，揭露反动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罪恶，号召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开放民权，鼓舞人民斗争。王寅生、张干民回到聊城后印发了同样内容的《东临地区工农革命委员会告人民书》。

暴动队伍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打开教堂的粮仓分粮。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肩扛车推，仅3天就分粮数百石。同时还组织周围各村群众同地主豪绅作斗争，分粮免租，并派武装协助进行。起义军借放粮之机宣传党的政策，鼓舞人民起来斗争。这一措施扩大了我党和暴动队伍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影响，群众笑逐颜开，一些青年参加了暴动队伍。

为扩大武装，壮大力量，起义军收缴了地富的枪支。他们利用除夕过年之际，首先袭击了枪支最多的九都杨。按照杨耕心提供的情况，逐家清查，缴钢枪30余支，子弹数百发。这一胜利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势。其他村庄的地富也惊慌失措，乖乖地交出了枪支弹药。

东昌道尹陆春元对坡里暴动深为恐慌，惊呼是“赤党倡乱”，命令阳谷县知事王家贞速作处理。王惊恐至极，从马上跌下摔死了。陆春元于腊月二十六日调集所辖12县的警备队四五千入包围坡里，驻扎在离坡里10里有牢固围墙的青杨

李。经陆春元一再督战，警备队才向坡里发起进攻。但一遭反击便四处溃散，窜回青杨李。暴动队伍摸准了敌人的规律，便在徐庄设伏，先后俘敌民团团长1名，连长两名，缴枪30余支。暴动队伍还组织了七八人的突击队，主动出击，多路进攻。为锻炼部队，起义军向坡里北面焦集民团局子发起进攻，缴步枪8支，弹药一部。几次战斗共缴枪百余支，沉重打击了敌人，壮大了暴动队伍的力量。

因暴动队伍拘押着洋人，使陆春元顾虑重重，便玩弄起议和收编的伎俩。他先派地痞盛思本讲和，结果盛被韩建德枪毙。继又派警兰斋出面谈判。在谈判桌上，暴动队伍的代表历陈阳谷县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罪恶，阐述了暴动队伍的政治主张，并将准备好的抨击豪绅污吏的书信交警带回。警回去后对人说：“坡里这杆人不简单，非同小可！”

陆春元见收编不成，便向张宗昌求援。张宗昌派装备有迫击炮、重机枪的邢旅2千多人，于1928年1月31日包围坡里。面对强敌，暴动队伍以教堂为中心，凭借周围的民房，沉着应战，英勇反击。暴动队伍派出40多人的突击队，避开敌人的正面进攻，隐蔽于一侧，当敌人迫近时，突然发起冲锋，敌人措手不及，仓皇溃逃。敌人又在一座土窑上构筑炮兵阵地，集结部队，准备发起进攻。暴动队伍立即派出突击队占领了土窑，将敌击溃。战斗中，1名暴动战士阵亡。

2月7日，战斗更加激烈了。近千名敌人从东、南两个方向发起进攻。曹万年带领队伍出击，1名战士受伤，曹万年头部中弹。战斗进行到上午11点左右，起义军及时改变战术，撤回教堂。敌人占领了教堂附近的民宅。黄昏，起义军凭借熟悉的地形发起反击，把敌人杀得狼狈不堪，重新控制

了教堂附近的民宅。

暴动领导分析了所处的形势：原先联络的一些红枪会及武装群众没来增援，教堂内的暴动队伍只有百十支枪，其他都是大刀长矛；参加暴动的多是农民，在教堂被围困的情况下，有些人思想动摇；原计划配合坡里暴动的博平暴动又没能发动起来；敌人10倍于我军，而我孤立无援，弹药殆尽。据此，大家一致同意撤出教堂，到大名一带，会合同韩建德有联系的红枪会打游击。

傍晚，暴动队伍将拘押的洋人和恶霸地主韩丕显、韩丕厚绑在马上，把老弱伤病员组织起来，做好了突围的准备。天黑后，暴动队伍点燃了放在铁桶里的鞭炮，一齐呐喊冲击，并派精悍的小分队向敌人发起佯攻，在枪声喊杀声中，趁着漫天的风沙，向西北方突围出去。

暴动队伍午夜过了堂邑，到达冠县境地后，韩建德让聂子政、申仲铭等返回聊城，向县委汇报情况。暴动队伍继续向西北撤，在大名一带，被直隶军阀褚玉璞部包围，暴动队伍被打垮。坡里暴动至此失败。

三

阳谷坡里暴动，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其所以失败，从根本上讲，是主观指导上执行当时左倾路线和错误盲动方针的结果。从客观情况分析，主要有以下3点：

第一、反革命势力还占优势。1927年底到1928年初，虽然军阀混战，但张宗昌的统治系统还很严密，反革命力量还很强大，因而张宗昌派了1个旅，配合大批的民团武装联合

进攻坡里。暴动队伍终因寡不敌众被迫突围，途中又遭褚部拦击而失败。

第二、组织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群众发动的不广泛、不深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鲁西一带的农民曾有过反抗军阀统治的斗争，但这些斗争大都是自发性的，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明确目的。坡里暴动时，只有附近郭店屯、九都杨几个村庄建立了党支部和五六十人参加的农民协会，这些会员缺乏严格的政治思想教育。对其他的农民群众宣传发动和组织得也不够。暴动起来后，起义武装几乎陷于孤军作战，得不到外面群众的支持和援助。

第三、缺少一支党所领导的坚强可靠的革命武装作骨干力量。参加暴动的农会会员，不仅武器少而劣，而且从未受过军事训练，虽有革命的热情，但实际战斗力很差。接受我党领导的韩建德的绿林武装，组织纪律性较差，革命目的不明确，是不能够作为暴动的骨干力量的。

坡里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鲁西以至山东有深远的影响。它给帝国主义分子、土豪劣绅和反动军阀以很大打击。特别是暴动开始后，立即分财分粮给劳苦大众，张贴布告宣传革命的道理，并对周围村的恶霸地主予以沉重打击，这些都教育鼓舞了农民群众，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作为全国革命的组成部分，作为武装斗争推翻反动统治的一次尝试，作为我党领导的山东最早的一次农民暴动，它的革命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原载《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1982年年会论文选编》）

阳谷县抗日武装与敌伪的部分战斗

县政协文史组 县党史办公室

青 杨 李 战 斗

抗日战争时期，青杨李是伪八区区部所在地。伪区长郝师温，向各村要枪要人，纠集了200多人，成立起两个中队。伪区团长是孟继汉和刘二闷子。为瓦解敌人，我方派共产党员李春谭、李春鸷打入青杨李伪团，李春谭任伪一中队副，李春鸷任班长。李程九同志经常与他们联系，并几次到这个伪团去了解情况，做工作。

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考虑条件已经成熟，请示县领导批准，决定收缴这个伪团的武装。规定以手电筒为信号，实行里应外合，里边用绿灯，外边用红灯。1940年2月的一个晚上，谷山游击队和四大队共200多人，携两挺机枪，在徐翼、李程九和齐南峰县长的带领下到达青杨李，和里边对上了暗号后，李春谭从南门拉出100多人，刘二闷子也从东门拉了出来。

伪团部负隅顽抗，拒不交枪，并要求谈判。我方派李程九同志进去谈，提出要他们3天完全缴械投降。敌人不从，我军又激烈地打了一阵，伪团部的敌人被迫交出3支匣枪，

7支大枪。从晚10点打到夜间两点，战斗告一段落，共获长短枪150多支，马20多匹。我方决定暂撤，并喊话给伪团部，要他们3天内投降。

天将明，阳谷、莘县、聊城3县的日军约有三四百人，赶到青杨李，见我军已撤，把伪团部和孟继汉接走，不久，把伪团长孟继汉枪毙了。这次战斗，我方无一伤亡。

在阳谷西关迫敌缴械

1940年7月，伪军在阳谷西关安了1个团部，设在路北民房，路南店里也住着40来个伪军。伪团长姓任，副官姓孟，有个班长叫二黑周。

县独立营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决定夜袭西关。营长李程九带领12名精干人员，从古柳树出发，把马放在刘灿明村，便快步进了西关。留两人在西门外放哨，观察城里敌人动静，其余的人分别进了路北、路南两个院。敌人有的正打着玩，有的在唱小曲，没有一点准备。我军出其不意，就把匣枪对准了他们的胸膛，严肃地说：“我们的大部队来接你们，请把枪栓摘下来跟我们走！好好地走，我们绝不伤害你们。”我军深夜突来，弄得他们摸不着头脑，只好乖乖地交出了枪支弹药。把枪栓全摘下来放在麻袋里，叫伪军扛着摘下枪栓的枪跟着走。这样一枪没放，就缴获了40多支大枪，7000多发子弹，200多颗手榴弹。天明时，已回古柳树。伪军见我方仅12人，脸上现出惊讶的表情，那个姓孟的副官后悔没有抵抗，并想趁机逃跑，被我方枪毙了。

郭魏陈伏击战

1942年7月，阳谷伪军5个中队，和阿城、七级、安乐镇、古柳树、朱庄5个据点的伪军各1个中队，共1000多伪军，还有40多名日军，到徐楼去安据点。当时在附近活动的我部队有七团1个连、八团1个连、县大队3个连，共500多人。接到情报后，经过分析情况，断定郭魏陈是敌人必经之地，便决定在这里打一个伏击战。黎明时埋伏好，太阳老高了，敌人还没来。正在等得心急的时候，只见从古柳树来了6辆车子，是先头侦探，随后大队伪军塞道而来。我军的计划是擒贼擒王，放过伪军，专打日军。伪军好长时间才过完，相隔不远，日军督后阵也过来了。等日军完全进入我埋伏圈以后，一声令下，两边枪声齐鸣，日军陷入包围之中。经过一阵激战，除1名日军逃跑外，其余全被打死。这名日军逃回古柳树据点后，也持枪自杀了。前头的伪军，听到后边激烈的枪声，惊慌失措，没敢回援，便狼狈逃窜了。

这次伏击战打得很漂亮，消灭了40多名日军，缴获不少枪支弹药，而我军无一伤亡。

广粮门战斗

1942年8月，我侦察员得到情报：东阿汉奸头子刘德超，带100多伪军、3匹马到广粮门（东阿县西部一个村名）去修据点。我县大队副李春鹏，带二、三连（共200来人）去截击。早晨我军埋伏在附近玉米地里。到9点来钟，

敌军来到。我军乘其不备，打了他个措手不及。在我猛烈的炮火下，敌人没敢还击，死伤10多人，其余很快被俘，汉奸头子刘德超逃跑了。这次战斗共缴枪100多支，我方无一伤亡，是一次很漂亮的伏击战。

七级翟庄战斗

1943年3月，上级调我地方武装军分区三团（团长王兴中，作战参谋李春鸷）去延安。这些同志，想在临走前打个漂亮仗，给日伪军点厉害看看，也给阳谷家乡留个纪念。当时，日伪的据点很多，七级据点除伪军外，还住有12名日军。我军准备采取“钓鱼战术”，把敌人从据点里“钓”出来消灭。

当时县大队是岳舜卿县长兼大队长，副大队长林路。县大队和区队以及驻我县的军分区三团联合参加了这次战斗。我军布置好以后，派3个侦察员到七级集上去打枪，据点里的敌人听到枪声并没出动。岳县长又派人去“钓”，准备把敌人引到七级南边柏树林里。这次去了10个人，悄悄溜到据点门外，对准岗哨10枪齐发，打死了1个岗哨，其余岗哨急奔入内。一会儿，伪军蜂拥而出，枪声也响成一片。10个侦察员有意暴露目标，边打边退，引敌人到柏树林处。三团出来猛击，敌人不能支持，仓皇向郎湾退去，转奔安乐镇。七级据点伪警察在所长曹福聚的带领下，也气势汹汹地赶到柏树林。我军趁机包围了柏树林，40名伪警察全部被俘，缴获40支枪、子弹一部分。

这时，12名日军又向柏树林凶猛地扑来，李延荣及其侄

都是县大队的神枪手，举枪打死了1名日军。在我猛烈炮火下，日军被迫撤退，我军乘机猛击，结果只跑掉1名日军（逃往阳谷），其余全被打死。

这次战斗，从七八点钟开始，到12点结束。打死11名日军，俘虏40名伪警察，伪军也死伤不少。我军牺牲10人，伤20多人。

我军料到敌人吃了败仗，不会善罢甘休，为避开敌人的锋芒，部队没休息，连夜开往城南李台附近，又转而到了范县。果然不出所料，敌人纠集了大批日伪军到七级一带围剿，结果扑了个空。

簸箕柳伏击战

1943年6月，县大队接到情报：伪军1个中队，从安乐镇出发，经胡楼到簸箕柳，便决定在簸箕柳打伏击。大队副林路和政委苏超，带一、二连和八区队共200来人，埋伏在簸箕柳以南望天猴处。不料情报有出入，从安乐镇来的不是1个中队伪军，而是50多名日军，还有两辆汽车。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我五分队分队长李凤伍、分队副张清安等10多人全部牺牲，八区队副杨顶章带领的1个小分队10来个人，除杨顶章外全都牺牲，6个小分队长牺牲了5个。这次战斗，日军死伤30多人，敌人受到沉重打击。

打簸箕柳据点

簸箕柳据点，住着1个伪中队。汉奸中队长张怀臣，作

恶多端，民愤极大。

1943年7月，徐翼副司令带三团3个连、县大队5个连共800多人攻打簸箕柳。夜里10点开始打，正赶上天下大雨，仗打得紧，雨下得紧，战士冒雨冲锋，到下3点把据点打开，战斗结束。伪军死40多人，伤10多人，其余50多人全部被俘。根据群众要求，在七级三里庄将张怀臣枪毙。

这次战斗缴获长枪100多支，手榴弹5000多颗。我军伤亡20多人，三连连长孙承杜壮烈牺牲。

土山寺战斗

1943年9月，阳谷基干大队住在六区土山寺村，有6个小分队，1个通讯班，共80多人，由大队副林路和连长赵刚带领。

坏人把县大队住在土山寺的情报报告了城里，敌人马上联合莘县和聊城的日伪军进攻土山寺。共有日军100多人，伪军400多人，于早晨包围了土山寺，开始是东、南、北三面，后来四面都有。我部队依凭村落和土岗沉着应战，神枪手李延荣在这次战斗中大显身手。由于大队副林路指挥得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战斗从早到晚，坚持了一天。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不宜长时间坚持阵地战，便趁黄昏时，在敌人力量薄弱的西北角冲出了包围圈。

这次战斗，敌人伤亡70多，光日军就被打死40多名。

在郭魏陈打治安军

1944年5月，我昆张支队打张秋治安军据点，阳谷治安军

和刘继春的汉奸大队增援张秋，路经阳谷城东郭魏陈。我县大队得知情报后，便布置在郭魏陈打伏击。县大队副林路为总指挥。队伍埋伏在武庄村后的麦地里，听林大队副的枪声为号行动。8点来钟，只见一伙敌人成扇面队形踏着麦地正对着埋伏圈走来。敌人距我约60米时，林大队副的信号枪响了，接着我军战士都和敌人接上了火。在我猛烈炮火下，敌人边打边退，仓皇逃到郭魏陈东头的民院，登房还击。我军乘胜追击，最后将这部分伪军包围缴了枪。

这次战斗历时4小时，到12点结束。敌伤亡10来人，被俘50多人。缴获长枪50多支，轻机枪1挺，子弹5万发。我军伤亡40多人，当场死亡9人。

四甲李战斗

1944年6月，阳谷伪军刘继春的两个中队200来人，在中队长唐振鲁（外号唐葫芦）、郭守坤的带领下，到四甲李去安据点，同时也企图去消灭我三区队。我军闻讯后，布置在四甲李打伏击。参战的有三区队80来人、县大队一、二连200来人和军分区三团200来人，共四五百人。

战斗开始，三区队首先与敌人接火，接着一、二连赶来参战，在我军火力痛击下，敌人被迫退到四甲李后街园子里。这时三团也赶到。为了防备北边老槐荫和西边据点的敌人增援，一连往北，二连往西，三团围歼龟缩在四甲李园子里的伪军，迫使敌人缴了械。

这场战斗，敌人伤亡30多人，被俘200多人，中队长唐振鲁被俘，郭守坤逃走。缴获两挺机枪，两个掷弹筒，200

支钢枪。我军伤亡30多人，一连指导员刘浩牺牲。

在古柳树据点深夜收枪

1943年10月，二区区队发展到30多人，下有3个班，一班班长袁宜代，二班班长李宪义，三班班长郭秀兰，区队指导员张少岩。区队与古柳树据点里1个伪班长和1个伪兵拉上了关系，通过工作，这两个人完全被争取过来，经常给我区队送情报。我区队提出，收该据点的枪。当时古柳树据点住伪军1个中队，据说有把握能稳妥收枪的只有1个小队，为了扩大我抗日武装，便决定先收这个小队的枪。一天夜里，正当这个小队值班站岗的时候，便里应外合，放下吊桥，我区队迅速闯入，一枪没放就收了这个小队的30支长枪。与我方联系的那个伪兵，随我军出来后又回去拿棉衣，被敌人发现落了吊桥，后来被捕，在阳谷被日军枪杀了。

熬盐场突围

1944年2月，七区区队副是许自新，指导员徐希鲁，有5个班，共50来人。一天，区队住在阎楼熬盐场，城里伪军知道后，由刘继春带领6个中队500人，于黎明包围了熬盐场。战斗打得很激烈，敌众我寡，区队面临被歼的危险，战士们都奋勇突围。二班在班长程培兰带领下，7个人7支枪，最后英勇地冲出了重围。

这次战斗，区队副许自新和指导员徐希鲁英勇牺牲，战士伤亡七八人，被俘30多人，损失比较大。敌人也有一些

伤亡。

骆驼巷截击

1944年9月，七区伪区长岳子敬，从城里到石庄去，10多个人，骑着10多辆车子。当时我七区区队住在双庙苏，闻讯后便急速到骆驼巷东头隐蔽，准备截击。等车子队到时，我区队开枪射击，除岳子敬逃跑外，其余全部被俘。缴枪10多支，子弹1000余发。

阎胡同突围

1944年11月，七区队由区队副赵凤臣带领32人住阎胡同。这天上午11点，阳谷伪军6个中队，古柳树两个中队，张楼1个中队，共1000来人（有30多匹马），包围了阎胡同。打了一阵，因力量悬殊，区队最后冲出重围，到范庄清点人数只剩15人。这次战斗，我区队伤6人，被俘3人，还跑散了一些，损失枪11支。敌人也死伤七八人。

四棚截击战

1944年11月，解放寿张时，阳谷七区队到四棚一带去截击逃窜的伪军。一天，有20来个伪军从寿张出来往阳谷跑，被七区队在四棚截击，全部缴了械，获枪20多支，子弹500发。我无一伤亡。

根据李程九、李凤祥、汤庆兰、刘春、李玉山、赵凤臣、薛长庚、尹作云等同志座谈整理

（原载1983年8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八辑、1983年7月《阳谷党史资料》第三期，1983年第四期《聊城地区党史资料》转载）

为抗日救国而斗争

李 旭 东

“七·七”事变的炮声，震动了全国，抗日救亡的声浪，传遍了城乡。日寇沿津浦铁路南侵，山东省长韩复榘携眷南逃，鲁西北各县国民党县长也闻风抢渡黄河。时局动乱，不堪言状。唯独聊城专员范筑先守土抗战，屹立未动，堪称鲁西北抗日领袖。

（一）宣传抗日，发展壮大党组织

阳谷和范县的国民党县长也都南渡黄河逃跑。当时我在范县城内第一小学教课。我想，我家在阳谷，不能跟他们跑，就回家来了。不意碰到了赵凤升同志，一见面他就问我：“时局动荡如此，你准备怎么办呢？”我说：“愿听你的意见。”于是他谈了抗日救亡的道理，提出成立教育界救国会。我同意他的主张，就与他一起在1937年下半年组织成立了教育界救国会，发起者多为抗日救国积极进步人士，赵凤升、王朝宗、胥雁宾、张瑞珍、李旭东等为委员，其中赵凤升、胥雁宾、张瑞珍为中共党员。中心任务是在城乡宣传抗日救国，组织青壮年参战，提倡有人出人，有钱出钱，一致抗战。这

是小知识分子的爱国组织。我们把未逃的教员集合在阳谷县城开了个会，打起红绿小旗，到城乡集市上宣传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我在县城内讲演，围了不少人听，讲完后还有人留下不走，并向我问三问四，于是我就进一步深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揭露国民党腐败不堪，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卖国罪行，并指出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这样每集都讲，上集来听的往往下集又来。我乘间问其姓名住址，记起来，以便结识再谈。与凤升同志汇报了相识群众，他与我意见相同。后来赵凤升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让我介绍够条件的人参加党。以后我介绍魏楼的魏法祥、王保玉村的王文胜入了党。

（二）争取郭安仁民团，组建抗日武装

1937年冬，在武装保家抗匪的名义下，地方民团风起云涌。为了组建党的抗日武装，党派我去做争取郭安仁民团的工作。郭安仁是城西北老庄一带的民团头子。城里北街的吕则信参加了他的民团。吕是我的街坊和同学，我通过吕的介绍，到了这个民团。我按党的“枪换肩”的指示，争取郭安仁，给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要求他首先抗日（“枪换肩”则是在秘密中搞的）。经过多次交谈，郭同意抗日并愿意追随范筑先，我把情况向赵凤升作了汇报，赵凤升答应给他请委。不久，阳谷县抗日政权建立，任命他为县游击总队第二大队长。张维庠作县长时其大队又改为保安一连。

(三) 抗日大旗插上了狮子楼

1937年冬,范筑先在聊城竖起抗日大旗,继而各县都派了县长和县政训处主任。阳谷也竖起抗日大旗,当时县长是徐茂里,政训处主任是徐明和黄主一,我是政训处政治服务员。县武装以宋丽泉(即宋励华)为游击总队长兼第一大队长,郭安仁为第二大队长,岳舜卿为第三大队长。下设中队,第四中队长是熊易五(即张介民,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我任第四中队政治指导员。此队枪支原系国民党警察局的武装,是照原警察队名单征集来的。为共同抗日救国,熊队长和我把分队长高、赵二人召集来,共结金兰之好(同盟兄弟),把战士团结好。熊队长提出,他无家口负担,愿将工资献出分给有困难的战士,我也响应队长的做法,将工资献给战士们了。

我们做政治工作主要是给战士们上政治课,还请熊队长讲游击战术。也教战士学汉语拼音,还跟留日学生学说“瓦打古希达西,瓦河里西马神(缴枪不杀)”的日语,当时战士都学会了呼喊瓦解日军的这个口号。

(四) 布永言偷破阳谷城,四中队被缴械

1938年古历二月二日夜,布永言率土匪夜攻县城。午夜之后,我四中队北门岗哨报告说土匪破城而入,县政府和县武装大部都出东门走了,只有北街所驻临清客军未动。熊队长闻讯即传命整队在北门集合,并派人与客军联系。至北门,熊队长和我分别去东西两边城上侦察,结果都发现土匪。我

问口令，对面答“老叶的人”，方知是叶士其的人。临清驻军要退出城去，我中队因无战斗力，提出先出北门，他们后出。我中队出城后，撤至城角孟村，拂晓又转移到八里营。因缺乏弹药，熊队长要我和两个战士去焦海村范筑先司令部取弹药。到了司令部问留守人员，说是司令不在，军需也不在，子弹没有。说话间已至中午，找村长吃了饭，问子弹仍无下落，无奈只得往回走。至八里营防地不见我中队人，问百姓说转移柴庄了。我们3人向柴庄走，途中听到枪声响得紧，象是在柴庄的方向。不一会望见一队人，向我们走来，细看还有3副担架。走近看，正是熊队长带着我们中队，他一见我们就痛哭着诉说战斗情况。原来我中队被匪缴械，牺牲3个同志，三大队长岳舜卿被俘。土匪问谁是队长，都说队长不在，因而熊队长幸免。我听后不免悲泣失声，战士无不流泪。怎么办？经议论决定去三教寺村。路经周庄，想进去暂时休息一下，该民团紧闭寨门不让进，又转至三教寺，找到侯乡长，他让我们去他家庙院中歇息。这时天色已晚，饭毕，熊队长主持开了个追悼会，悼念三烈士。请乡长给置办了3口棺木，盛殓烈士。分队长赵才贵烈士是城内北街人，段瑞生烈士是城内西街人，城内不能进去，就只派人去范县给邓烈士家送信去了。之后熊队长说，凡是能回家的可以暂时回家，免得家人悬念，家在城内不能回家的可跟他去焦海找领导汇报情况。当夜我也与熊易五同志分别了。

（五）收编布永言，县长易人

范司令调支队围城，派员说服布永言接受改编为十九支

队，不久就调去抗日前线了。

我县刚建立仅3个月的政权失掉以后，范筑先委任张维摩为阳谷县长。据说此人无党派，任职后，将抗日游击总队缩编为县保安大队，只有黄主一（黄居易）为主的政训处保留下来。从此游击总队同政权中我党骨干又重新回到各个党的组织中去发展党员和做群众工作了。我原是政训处的政治服务员，因而也留下来，具体做青年救国团的工作，也兼做党的工作。青年救国团是徐茂里当县长、黄主一当政训处主任时，为吸引城关青年参加抗日救国而设立的，是在党和政训处的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城关不少青年被吸收为青救团员，也有参加民先的。后来别的乡镇也有人找我报名加人民先的。在发展党员中曾介绍北街吕绍尹、北关杨少彦、张新吾、南街梁干卿等入党。

（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战与我争夺青年

张维摩当县长时，国民党反动派代表人物刘建高、熊纪明、张大成、翟仲范等乘机从外地归来。他们提出“一个党（国民党），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介石）”的主张，以“抗战建国纲领”来对抗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反对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承认国共合作。

此时中共阳谷县工委成立，申云浦为书记，王伯谨为组织部长，姚修文为宣传部长，王筱湖为统战兼武装部长。国民党刘建高成立了抗战动员委员会，与政训处搞对立，企图破坏和搞掉政训处。每次动委会开会，黄主一主任都参加，但每次会议必有斗争，有时激烈地吵起来，动委会什么决议也

没有。动委会应吸收群众代表参加，而他也不让参加会议。他们成立抗战青年团，与我青年救国团搞对立。刘建高曾找我谈，让我参加抗青团，意即取消青救团，想把青年都吸收到他抗青团中去。我看透了他的阴谋，当即严词拒绝。他想利用抗青团为其工具与我争夺青年，结果阴谋破产。当时阳谷许多青年虽也参加抗青团，但由于我党及时揭露其阴谋，又提出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不少抗青团的青年离开了他们，来我处报名参加民先，如姚德盈、张治华等，就连抗青团团长周稚昌也来政训处找黄主一交谈，表示愿意加入民先。除三青团头头徐学黉外，很少人听他的了。当然也有上当受骗的，不过是极个别人物。

（七）抗日救国，听从党指挥

1938年4月间，范筑先率队在濮县和日军作战，七里堂战斗赶跑日寇，党派我做临时战地工作，回来又令我去河北南宫参观学习八路军，听了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的报告和宋任穷政委的讲话，学习了抗战形势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以及游击战争等内容。回到阳谷政训处，见了黄主一和赵凤升同志，他们让我继续搞青年工作兼保安一连政治工作，并监督郭安仁的活动。

我在一连深入到班，团结战士，结识了王广福（贫农）、张万胜（南街小知识分子），感到他们的思想作风很好，就介绍他们入了党。了解到郭安仁是与土匪勾结绑票说项的财迷官迷人物，是个不可救药的人，预料其前途必无善果。赵凤升说，郭安仁的工作不好做，放弃了吧。于是我离

开了保安一连，又回到青救团，把青年工作开展起来。赵凤升同志担任了工委副书记，工作多，忙不过来，就把城关区委书记的工作全部委托给我。凤升同志又明确仍由孟广生同志负责城关支部并兼党的联络员，在张楼、岳海建立支部，以罗福杰为支部书记，在魏楼、王保玉村建立支部，以王文胜为支部书记。

（八）刘清泉围攻县城

反动道会门头子刘清泉在其后台沈鸿烈、李树椿的支持下，率领其门徒围攻阳谷县城，县长张维庠令县保安大队守城，又请邻县所驻支队增援。当保安一连守北门时，我也随去观阵，亲眼看到刘清泉手持大刀片，光着脊梁在叫骂。他在北门外护城河桥头一座石碑上磨刀时，只听一声“打”，一连贾班长开枪射击，刘清泉应声倒地，随即死去。其门徒回头就跑，接着援军支队尾追前进，枪声、追杀声逐渐由近而远，道会门徒向东北方向溃逃而去。城里人们议论着：“灾难走了！不然打进城来，还不知闹成什么样子呢！”

在这以前，政训处的同志们已撤离阳谷去冠县一带，到筑先纵队工作去了。我离开保安一连，段延禧接任政指工作，因三连余文伟同志调离，党又叫我去接任三连政指工作。经过一段工作，保安三连党的工作开展起来，党员武子升同志任该连文书，肖学冉、冯德华、许自新等任排长，三连原是特务大队合并来的，基础较好，所以又叫我退出来。我仍负责城关区委工作，另外城东徐庄徐亚洲所管的党关系，以及城南和寿张城附近党关系也都交给了我。我仍以邮局信差

为掩护。继续搞党的关系工作。

（九）在欢迎美国朋友卡尔逊的大会上

1938年7月间，美国海军少校卡尔逊专程到聊城参观访问，也曾来阳谷。当时县城组织了盛大欢迎集会，在黄主一主任布置下，动员了全城青年，排队进入会场，旗帜招展，还有中英两种文字书写的标语。每队都有带队人领呼口号。标语有我们的，也有国民党反动派的。政训处书写的多是各党派联合抗日、国共合作等口号，会场上唱的是抗日救亡歌曲，其中有国共合作的歌曲：“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那时省委派到聊城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分来阳谷不少，他们都是善于和国民党作斗争的经验丰富的同志。会场的布置，主要是接受他们的主张，大部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会场上所呼的口号，非常新鲜实际，动人心弦，令人振奋。而国民党反动派的布置非常单调，只是将“一个党（国民党）、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介石）”的滥调，写成标语贴在墙上，使人十分反感。在会场主席台上，有县政领导人，政训处黄主一主任，还有刘建高，以及陪同卡尔逊来的几位聊城司令部、政治部的人。在大会上除了陪同的人作介绍，县政领导人致欢迎词外，黄主任也发了言表示欢迎。在黄主任讲话时，群众高呼口号，热情很高。刘建高也讲了话，多是一党专政的陈词滥调，不受群众欢迎，没说几句就下台去了。特别卡尔逊的表情，在听别人致欢迎词时，精神专注；在刘建高讲话时，犹如听而未闻。当时我想这是翻译人员的问题，翻译定是进步人物（后

来知道是欧阳山尊)。此后，刘建高一手包办的抗青团的成员陆续退散，各奔前程。

(十) 谷山游击队、县抗日政府成立

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陷，范筑先将军殉国。出卖范将军的国民党分子王金祥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委任为聊城专员，继续为非作歹。范老将军收编的土匪支队，先后投敌。鲁西北各县军政人员，也有一部分投敌的。阳谷县长吕仁道害怕遭日军袭击，也忍受不了艰苦生活，就与我县进步人士商议，想把保安队的枪支插起来，李鸣陆等人同意了，共产党员武子升就帮助储存起来。保安队解散后，吕仁道离开阳谷不知去向。之后，武子升、岳舜卿、李鸣陆等同志向中共阳谷县工委建议，利用储存的枪支成立游击队。经县工委同意，成立了谷山游击队，由岳舜卿任队长。我党又动员民间枪支扩大谷山游击队，为建立县抗日政府作准备。1939年9月间，在东进纵队的支援下，阳谷县抗日政府成立了。成立大会是在阿城刘楼召开的，进步人士和各乡镇代表都参加，选举齐南峰同志为县长。他原是东进纵队的民运干事，为了加强地方而转到阳谷来的。

(十一) 县抗日政权与敌伪顽的斗争

我在阳谷城关区委领导组织党支部的活动中，同时兼做情报工作。后来赵凤升同志告诉我：“县委需要你去宣传部负责工作，同时县长齐南峰同志缺少秘书也需要你帮助工

作，城关区委和城里情报工作另选别人，你可做准备。”我当时是借邮政局信差工作为掩护做情报工作。我父亲是邮局信差，因病叫我代他工作。为了党的任务，我动员父亲退休，不干邮政信差了。这个工作办妥，我就交代了城关区委党组织的工作，到县里工作去了。在县委宣传部和县政府大约兼职工作5个多月，宣传部长由段緘三接任，县政府秘书由李鸣陆接任。后县工委派我负责民众动员委员会工作。阳谷县民众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是中共阳谷县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救国的群众组织，是在1940年2月阳谷县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即阳谷抗日县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年成立的。当时我在县委民运部任部长，因而县委决定令我组织领导动委会工作，任动委会主任委员。区动委会也都于同年先后建立。区动委会主任多系区党组织委派指定的，其他人选人数不定，视形势需要而增减，一般五六人。县动委会分组织科、动员科、宣传科、妇女科、青年（包括儿童）科。科的规模也视形势而增减，人员有段延世、张治华、刘贤、孙盛朝、梅作林、朱学智、段延修、田怀恭、赵勛勤、王锡三、茅兴伦等十几个同志。动委会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动员各界人民参军参战，宣传抗日保家保国，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服从党政领导，支援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伍，保卫建设抗日根据地，抗匪除奸，成立自卫队武装等。

1940年杨勇部打朱庄战役，动委会的同志们昼夜不息，在紧急动员人力物力支援部队除奸方面是出了力的。当时朱庄为刘清岚（刘清泉之弟）占据，为害二区一带人民，威胁阳谷抗日根据地，何参谋长（50多岁，当时称他为何老）率领一部分武装来阳谷后得知情况，坚决要拔掉这个伪据点，解

放朱庄，与县委领导商量组织人力物力，星夜行动。何参谋长住许楼，把我叫去，商量布置动员人民参战，挖战壕，筹粮米，建锅灶，搞担架，数字、人员、时间都很具体，我接受任务后就同县区有关同志筹划分配到各村庄，并及时检查督促，按时完成。何参谋长检查后即开始行动。他住薛庄，一天出村观察地形时，同去的有县长、区长（我也在内），还有他亲自培养的黄队长。刚走到一个战壕边，只听“嗖”的一声，一粒子弹正打在黄队长身上，黄队长不幸牺牲。何老顿时泪如雨下，随命进入壕沟开始战斗，急战了两昼夜，攻打不下。朱庄围墙非常坚固，木梯爬墙牺牲大，无效，最后动员当地轿车，上覆以水湿棉被多床，由壕沟推向围墙边，挖通围墙放入炸药，方克外墙，又挖通内墙，终于破围，将刘清岚捕获。这次战役虽然取得胜利，但牺牲太大。何老捉获刘清岚，没就地枪决。为体现不杀俘虏的政策，又把他放走了。

县动委会工作是短暂的，不到一年就又成立了阳谷抗联组织，代替了动委会。

在这期间，阳谷城里成立了以刘学来、王吉三为首的汉奸“维持会”，把从城里搬到农村去的市民动员回家，接着董政华来任汉奸县长，成立了伪县政府。阳谷城西北一带也出现了国民党的县长朱子梅（朱梅），运河两岸顽军石友三部十军团也派了自己的县长陈庆元，敌伪顽都建立县政府，搜刮民财，奸淫烧杀。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我抗日政权和军民与敌伪顽坚持了长期艰苦的斗争。论武器，敌伪顽军都比我们强，但人民群众是向着我们的。军民团结，政民一体，志在抗日保家。阳谷县抗日武装在县政权建立后逐步扩大，各

区政权建立后，区武装也建立起来。阳谷城里敌伪政权建立后，各区伪政权、伪军也相继建立。我抗日军民与敌伪斗争也越来越尖锐激烈。三区王筱湖同志的家被敌人剿、烧，几乎铲为平地。敌人疯狂地捕捉抗日干部战士，不少抗日家属不得不逃出家乡，投奔抗日根据地来。十军团在我抗日根据地，枪杀我党政干部李鸿甲等同志和无辜群众，激起抗日军民极大愤慨。后来八路军来阳谷把十军团赶走，接着瓦解了陈庆元的部下，使其无立足之地，运河两岸顽军从此销声匿迹了。

我抗日三区，在老党员、老区长王筱湖领导下，在聊阳公路两侧坚持对敌斗争，并与国民党县长朱子梅进行斗争，对运河两岸抗日根据地起了很大的支援作用。徐翼同志领导的东进纵队第四大队在运河两岸与敌伪周旋，四大队指战员多数家在运河两岸，他们北与军分区司令员刘志远联络，西南与大军区联络，对巩固阳谷县抗日军政机关和稳定人民的生产生活，起了主导援助作用。聊城、东阿、阳谷等抗日根据地在刚建起自己武装还不够巩固和扩大的时候，就一直依靠这支地方性的八路军。

(十二)回忆齐南峰

齐南峰原名齐岚峰，原是骑兵团民运干事，阳谷抗日县政府成立任第一任县长。他牺牲精神很强，很勇敢，听说有敌情，就勇往直前。他民主性强，群众观念强。我给他做了一段秘书工作，他每事爱与我商量，我也乐于为他当参谋。他文化不高，相当于初中程度，但很勤奋好学，我每见他阅

读党的文件或小册子，不懂的地方就请教别人，我常给他讲解字词句。我很尊重他，他也很尊重我。可惜相处时间不长。1939年9月上任，至1940年秋就又去朝城任县长开创新局面去了，不意在朝城遭遇战中牺牲。为纪念他，朝城曾改名为南峰县。他是个好同志，我对他的死深表哀悼。

本文作者 李旭东，1911年生，阳谷县十五里园乡枣棵李村人。聊城三师毕业。1937年8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城关区委书记、抗日县政府财政科长、县动委会主任、文教科长、交通局长。阳谷解放后，历任城关区区长、专署科员、秘书、徐翼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博平县教育科长。建国后，历任茌平县政府秘书、专署行政干校副校长、观城师范副校长、范县一中、张秋中学、寿张一中（阳谷二中）校长、阿城中学校革委主任、阳谷县工会主席、城镇中学（阳谷三中）校长。1979年10月离休。

（原载1983年5月《阳谷文史资料》第五辑，1983年7月《阳谷党史资料》第三期转载）

忆抗日战争时期阿城地下工作情况

李 景

“七·七”事变后，日寇向我华北大举进攻，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群众说他们“闻风四十里，炮响一百一”。山东主席韩复榘起先还在叫喊“山东寸土不让”，随着二十九军南撤，韩也放弃济南逃跑。国民党委任沈鸿烈为山东主席，其八大处驻张秋、阿城。在他们的支持下，红枪会遍地，土匪四起，阳谷东北一带忠孝团大兴。1938年11月聊城失守，抗日英雄范筑先壮烈殉国，王金祥等叛变投敌。当时鲁西北土匪各霸一方。冯寿彭部进驻阿城，1939年古历二月二惨遭日军包围袭击。1940年8月，石友三部十军团又窜入我地活动，他们不抗日，专打共产党，所委阳谷县长陈庆元在四合庄活埋我抗日四区队李鸿甲同志等7人。八路军肖华支队为消灭这股顽匪，以迂回的战术，把他们赶到薛庄、常楼一带，集中击溃，其残部南逃，打击了国民党顽军在我地活动的嚣张气焰，显示了我抗日八路军的威力。

当时，我出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经常联络同学，寻求抗日途径。但面临着顽军假抗日的局势，我们一时分辨不清。我和于庄同学高学仁、夏口同学夏焕冉3人，朝夕与共，计议抗日，一致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8年2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韩海韩相洪同志帮助

我们建立支部，明确夏焕冉为支书，我任宣委，从此我们开始了地下革命工作。

一、党的地下通信联络工作

1938年8月我在本村小学任教师，其时还担任地下通信联络转运工作，传送分发文件报刊。我和夏焕冉负责南至韩海张慎业、北至康庄王广达一线，后因任务繁重又发展夏口王道善入党，分配他单线联系投送文件。1940年，我们的文件报刊逐步由少到多。在顽匪猖狂的白色恐怖之下，我们化装成串书馆、杂货挑小商人的身份投送，有时利用夜间或一早一晚，背着粪筐把文件放在粪筐底层（双层底）。当时信件样式一般为折叠式的四角形或纽扣形，凡文件带“+”号为一般快件，“++”号为快件，“+++”号为急快件。1940年，快件加鸡毛为特快件。凡属快件，我们不避风雨，不分昼夜，务必完成任务。我们除接受鲁西南、鲁西北及运东三道主线的任务外，还负责本地5个区十三四个联络点的任务。四区送给刘湾刘彬，侯海送给×××，新添庙送给张××，郎湾送给郎保海、黄金朋，大杨油坊送给杨学诗，郑庄送给徐运功，北关通营桥大白庄分区后勤，五区送给陈茂胜，富安镇送给王福生，李庄送给李鸿鹏（李鸿甲烈士小弟），七区送给温碾温广祥，张秋五区送给颜营颜华的母亲，二区送给韩海张慎业、董营于继安以及张书安村×××。慎业同志还负责送阿城陈赞臣、柴楼柴如谐。王道善负责送给古河李月兴、夏堂夏庆芝，有重要文件道善同志夜间直接送到营桥大白庄分区后勤。当时他年龄不大，有胆略，

机智灵活腿快，距警桥大白庄有50来里，他步行一夜即早返回，我们说他是飞毛腿。3年的通信联络工作，除侯海断线外，其他联络点都顺利完成任务。在环境恶化情况紧张时期，不管有多大困难险阻，我们的通信联络工作从没中断。有一次王道善同志向鲁西北送文件，夜晚路经胡楼，遇到鬼子兵，他机动灵活地避开得以脱险。又一次向温碾送信，走到郭魏陈遇见十军团，他装哑巴摆脱了敌人的怀疑纠缠。

我们不仅完成通信联络任务，还发展党员，吸收郑保福、高兴武入党，壮大支部力量。韩相洪、张冠军、赵凤升及运东魏××（满子）经常住我校，帮助我们开展对敌斗争。我们夜间撕顽军县长陈庆元的布告，贴抗日政府的布告及标语口号。1939年，在县区政权建立之后我们又先后掌握了一些乡政权，义和乡齐学成任乡长，康平乡夏焕冉任乡长，阿城乡袁心斋任乡长，孟母乡田庆海任乡长，安乐乡张海鲁（包子三）任乡长，孟尝乡冯德润任乡长。各乡均有乡队二三十人。1941年汉奸土匪司令赵长显（外号赵二虎，薛寨人）、副司令郎丕纯（苇铺人）“虎狼”疯狂出动，从七级向南边于庄、阿城、徐楼增设据点。由于形势紧张，环境恶化，抗日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叛变，有几个区队副和乡长先后投敌，名曰张团、田团、杨团等。当时赵二虎部大约有13个团的兵力，2500人。开始安据点时，汉奸象疯狗一样，白天出动催粮催款，催伙筑寨，夜间出动牵牛架户，奸污妇女；地方上的反动安庆道卫会坏分子（三番子）暗地勾结汉奸，逮捕抗日家属和群众，敲诈勒索，从中取利。被抓的群众，遭受严刑拷打，汉奸名曰“有钱的打钱，无钱的打穷气”。群众昼夜胆战心惊，不能过安生日子。

二、抗日十区队的诞生

1941年县委决定组织抗日十区队，当时县府发给12条步枪，一部分子弹、手榴弹。我动员14名青年，3月间在七级东辛庄正式成立区队。区长齐武克，区委书记夏庆芝，我任区队指导员。区队成立后经常活动在运河东西两侧，仅三四个月的时间，区队发展到39人，建制3个班1个排，排长王增祥。区队没有好武器，一般是铅九子、九连登、套筒子，每个战士发三四枚手榴弹、七八发子弹。人数虽少，但士气很高。协助区部征收粮款，有时配合九区队（区长武仲景，区队指导员宋英）深入敌区安乐镇南庄户一带催收粮款。我们运用游击战术，乘敌不备打伏击战。朱庄伪八区孟宪章的伪军外出抢粮索款经常受到我们打击。1942年6月于庄伪据点放弃，住于庄司令部的聂副官（齐河人）逃跑。9月他带领3个人又返回我地活动，住田楼杜钦贞家，群众立即向我区队报告（当时区队住富安镇、陈庄），我即带领区队将其包围并活捉。当夜我和武仲景同志审讯他，他说是来联络当地汉奸，准备安据点的。晚上聂被房东痛打了一顿，后交县府在于庄枪毙了。其时刘明同志调十区队任区队副，我仍任指导员。

“九·二七”铁壁合围前夕，我十区队住夏堂，县府通知我区队即夜住齐店，县府住尤楼、常庄。铁壁合围的消息，区队早已获悉，分析敌人可能合围阿城西南一带，我和刘明同志研究，改变住地计划，下午出发奔向齐店，夜间返回东阿边境张园子，当夜与住高村北杨庄的分区司令部取得联系。我们夜间岗哨不带枪，监视敌人动向。下半夜鬼子从张园子西边大

道上向南过。敌人到达朱楼、阿城就进村搜索，县府陷入包围圈以内，被鬼子一直赶到银山、耿山口一带。由于我抗日武装对铁壁合围缺乏经验，没有及早突围，独立营、警卫连被敌人击垮，县长岳舜卿率部突围，伤亡甚重，警卫连仅剩下一二十人，次日来阿城区于庄驻防，与我区队取得联系。当时县府剩下8匹马，交给区队保存起来。从此日伪猖狂活动，到处扫荡，增设据点，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后县府通知我区队，暂时疏散待命。我们在东阿边境刘坑召开动员疏散会议。战士啼哭不走，经耐心说服，才服从命令，将枪插到离林庙伪碉堡1里地的水井里，各自疏散。但班排长不肯分离，愿同我一块活动，同生死，共患难。此时刘明同志已离开区队。当夜我带领班排长，深入敌区东阿南边境程村。该村南邻陶城铺，北抵伪碉堡，西靠阿城伪据点，东临位山伪据点。敌人扫荡时，从阿城通往位山的公路上，汽车昼夜来往不断。我估计敌人不会扫荡程村，结果出乎意料，第二天早晨敌人去程村扫荡，把我们冲散了。后因情况紧张，六区队（区长崔才）将区队的枪插到我家，也疏散了。我个别活动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县府通知区队集合，从此我区队又活动在七级以东刘文堂、井庄、郎湾一带。有时配合四区队，夜间深入十区催收粮款，并打击镇压地方上极坏的反动安庆道卫会头头，稳定局势，保护群众的安全和利益。1942年我地又逢大旱灾，群众生活极苦，吃树叶，挖野菜，区队当然也吃不好。10月寒冬，战士还穿不上袜子，站岗脚都冻肿了，也不叫苦。有时区队分散活动，白天隐蔽在房东家不敢出屋门。后来四区队和十区队合并，区队副是王月盈同志，指导员是吉太昌、李景。由于情况紧张，环境恶化，我们经

常活动在聊阳道东西，昼夜奔波。有时一夜移动两三次，躲避敌人的追击，有时对小股敌伪则给予打击。11月，我调分区司令部工作，随后区队升级编入六团。

三、县情报支站的诞生

1942年“九·二七”合围后，敌人先后在阳谷各集镇、交通沿线（除七级河东以外）安上碉堡据点，全县变成敌占区。但广大群众在我们一边，在敌人心脏或眼皮下，都有我们的同志在监视着敌人的动向，打击敌人的活动。各区政权和区武装为有利自己的活动，在敌伪据点内部通过亲朋关系搞情报（伪军大部是本乡本土人）。1943年阳谷县情报支队正式建立后，全县的情报工作逐步走向正规。我从分区后方情报总站（住赵寺）调县情报支队任指导员，站长是王月盈。我们配合敌工科和各区负责同志，物色亲朋可靠关系健全敌伪据点内外线和监视员工作。当时一般大城镇敌伪据点设双线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据点外设1—2人的监视员，小碉堡一般设单线联系，对原来不可靠的内线进行更新。半年多的时间建立各区分站，明确了分站长：一区卢明，二区赵文达，三区刘明，四区×××，五区王广文，六区张俊田，七区张贵臣，八区刘玉清。分站配备3—4名情报员，全县共62人（内线例外）。县情报支队设文书1—2人，情报员10人，接受转送情报。不仅掌握全县敌伪活动情况，如遇敌情变化，情报要及时送到部队和转送各区；同时负责接收转送大城市的情报，一区分站南至王申楼与王学经同志联系，接收南线濮范鄆等县的敌伪情报，三区分站北至朱老庄接收聊城的敌伪情

报，四区分站北至赵寺接收齐禹及济南的敌伪情报。我们的情报网，遍布各个敌伪据点，敌人一动我们即知。外地情报两三天内转到县站一次，如敌伪剧增，当天即可转到县站。倘若外地情报中断，我站即派员联系查询原因。当时县情报站经常活动在安乐镇一带，东住周叶、李楼、刘品、周庄，距安乐镇伪据点二三里路，或范楼、范庄、三官庙，距胡楼伪据点二三里路；西住平坊、刘窑，距安乐镇伪据点三四里路。我们利用伪政人员家属或有势力的地主，以及地方上的青皮作掩护进行活动，有时住东李楼后徐庄伪区长高殿为家里，有时住周叶伪乡长李金城家里。1943年上半年王月盈调离县情报支站，剩我一人负责。当时我化装商人，戴着礼帽，身穿大褂皮鞋，持有日伪证明，以合法身份，昼夜出没在敌人眼皮下，有时深入敌据点拉关系，都未曾遇风险，敌伪均未识破我的身份。这年8月，我去阿城伪据点通过关系同伪警察所长窦魁伍接头（窦系博平窦庙人），回来路过田楼，适逢鬼子从阿城开往七级，鬼子骑兵把我围着检查，我掏出日伪证明，鬼子说：“好的，好的，开路的，开路的。”我走到七里河村前，又碰上周堂据点袁玉岐的汉奸队。汉奸不问青红皂白，就将我带到他们队部。我知袁倾向我们，就告诉他，我叫李景，他很客气地对我说，对不起，快走吧，并派两个汉奸把我送出村外。我安全地回到范楼住地。

1943年敌伪虽然分布全县各地，但形势却起了变化，伪政人员为给自己留条后路，经过敌工科的工作，大部分被争取过来，他们暗地同我们拉关系送情报讨好，甚至掩护我抗日工作人员。如1943年10月敌人铁壁合围扫荡时，我县情报站住苑庄、小阎庄，聊城、阳谷敌人从四面八方向东合围县

政府，我站情报员一直监视敌人到达苑庄西头，方离开小阎庄到田楼据点。当时田楼汉奸正排队在围子门口准备迎接鬼子，汉奸队长崔玉祥看见我县情报站人员便接进据点，让我们上楼，换上汉奸军装。随后鬼子进田楼据点，崔玉祥在楼下招待鬼子喝水，鬼子问“八路的有”，崔玉祥说“八路的没有”。鬼子稍停即出发东进，我站全体人员即离开据点仍回小阎庄，继续跟踪侦察敌情。鬼子走到运河西岸，发现了河东大洼逃跑的群众，便开枪射击，追击到小冯、大杨。县府警卫连突围，县长岳舜卿尚未突围出来，隐藏在房东地瓜井子里，夜间八九点钟他来小阎庄找到县情报站，我即派人送他去找部队。县委委员张冠军住刘楼，他怕敌人进村搜索，带领群众跑出村外，到小冯被鬼子发现用刺刀挑死。对张冠军同志的不幸牺牲，我深感悲痛。

回想阳谷抗日工作人员惨遭敌人逮捕杀害的不仅冠军一人，阿城二区助理员李皖民同志，1943年农历二月住王庄被汉奸李洪图逮去，严刑拷打，李皖民威武不屈，大骂李洪图，第二天被李洪图枪杀了。农历三月十九日，我二、三团攻打阿城据点，同李洪图激战3天，李洪图顽守贺家大横，后因聊城、东阿鬼子增援，我部队撤离。之后，李洪图象疯狗一样对我阿城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大肆摧残迫害，杜尚仁同志的家被剿两次。后李洪图移防安乐镇，6月又在肖刘庄将我五区助理员杨子良同志（大杨庄人）逮去，我和周云章同志曾多次营救（李洪图是济宁人，其父同周云章是盟兄弟关系），李洪图坚决不放。后来他去阳谷返回安乐镇时，我阳谷内线及时送出情报，说李洪图明早8点乘汽车返回安乐镇。我接到情报，即送到三团和王参谋长商议打李洪图的截

击。第二天拂晓，部队在后屯埋伏好。上午9点半，狡猾的李洪图回安乐镇，前后有两辆汽车，他坐的后一辆，前车被截击，后车调头窜回阳谷。李洪图大发雷霆，狂叫要消灭县情报站活捉李景。从此我县情报站从安乐镇一带转移到20里外的东康、四合一带活动。不久，李洪图将杨子良同志押解阳谷，走到王子仪村用刺刀挑死。后来我县情报站移住刘窑，被敌人发觉，阳谷城内敌骑兵出动，企图包围刘窑消灭县情报站。但敌骑兵出动前我们已得到情报。正准备离开刘窑时，有一个装扮成化缘道士的敌人侦察，被我捉住审明情况，我即持枪在大街上高喊：“汉奸骑兵来啦，快跑！”我刚跑到西门，敌骑兵便打枪包围西门，我随群众顺着树行子奔向邵楼。我站情报员在家存放好车子、文件，走出胡同口，汉奸骑兵已包围东西两门，无奈只好从后围子墙跳下来逃脱。朱庄伪八区长孟宪章1943年枪杀我熬盐场情报员张爱柱同志，逮捕七区助理员周吉同志，他要亲口咬破周吉的耳朵尝尝共产党啥味的，后来周吉被营救出来。汉奸团长洪五申1941年住阿城北会馆，后住武将台，他们是反共暗杀团，时刻与我方作对。他们梦想拔掉插在他们心脏的县情报站，但经过3年时间的较量，并未损我们一根毫毛，我们却及时准确地掌握他们的活动。我们依靠群众，敌碉堡据点一个个为我军攻克。1945年7月，我军解放阳谷城，全歼城内敌伪。叛变投敌分子杨文胜、姚保章、张海鲁等终于先后死在我军枪弹之下。李洪图、孟宪章、洪五申等也没有逃脱人民的制裁，先后被枪决，偿还了血债。1945年下半年，县情报站完成任务，县区情报员动员升级编入六团，年老体弱的下放回家生产。我调阳谷县大队供给股任股长，后调冀鲁豫大

军区政干校学习保卫工作。

本人回忆不够全面准确处，请知情者补充更正。

本文作者 李景，阳谷县阿城镇北李庄人。1938年任抗日小学教师兼做地下交通联络工作，1941年后历任抗日十区队指导员、军分区司令部收发、县情报支站指导员、县大队供给股长，1947年在军分区教导队、大军区政干校学习，1948年任军区旅、团保卫干事，建国后任区医药合作社经理、区卫生所主任、公社卫生院院长、安乐镇分院院长。1975年退休。

（原载1988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忆 颜 华

颜世端 周金铎

颜华同志是中共党员。抗日初期先后任东阿县抗日二区分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41年后，任张秋县委组织部长兼做敌伪工作，1943年兼县支站（习称敌工科）长；后调七分区敌工科任副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济宁县委宣传部长、济北县长和县大队长。1947年10月死于山西冶陶。

一、颜华早期革命活动

颜华原名颜世平，1920年生于阳谷县阿城镇颜营村（当时属东阿县）。幼年丧父，兄弟二人靠母舅抚养长大。7岁入本村小学，13岁在阿城高小毕业，考入济南第一中学，1935年因散发抗日传单被开除。后又考入济南市立中学，1936年升入高中部，这时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受组织派遣回当地，在朱涛（王伯谨）、苏民、姜农等同志领导下，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工作。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经过斗争实践的锻炼，颜华很快提高了思想觉悟，同时也丰富了斗争经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派廖安邦到东阿办政治大队时，颜华受组织指示考入。在政治大队，他团结了青年学生朱明恭、魏翊厚、刘子盈、

谢克芝、董丕营、谭林等，秘密开展党的工作，这些人先后参加了我抗日武装和政府工作。1938年秋，颜华受命到鲁西联中（即安乐镇联中）以上学为名开展工作，团结了郛城的刁守信（现在山西工作）、济南的穆庆祥、金朝沫、诸城的石绍德（牺牲在沂水）、王均衡、赵崇年等同学，日寇攻打聊城时，他们都没有随学校南逃，而参加了抗日工作。

二、在东阿二区抗日政府时期

根据上级负责同志的指示，赵振清、苏民、颜华、李华斋等同志在东阿一带积极开展抗日活动。1939年秋，东阿抗日县政府成立，苏民任县长。秦延滨、赵振清先后任县委书记，颜华任二区分委书记兼动委会书记，负责苦山、斑鸠店、张秋一带的工作。组织委员开始是韩子东，韩调做情报联络工作后，由于明（于继深）继任，宣传委员刘坤召，民运周子臣，区委成员还有井正光、王向新、王万民（女）等。当时，国民党县长朱申也在组织和扩大他们的地主武装。二区茶庄地主、国民党员石雅乐，乘机组织了几百人的“抗日保民团”，按各村地亩摊派人和枪。为掌握他们的活动，并对其分化瓦解，在石雅乐到张秋一带博学、太丰、民康等多催要应出数额时，颜华派共产党员魏翊厚和颜占一、乔玉广、颜景焕、朱学文、林之笃等人乘机打入，被编为石团的两个小队，魏翊厚、颜占一任队长。另外，又派卢振环、魏茂仁打入其他中队。后来石雅乐随朱申南逃时，魏翊厚、颜占一和卢振环乘机把他们掌握的民团拉回本地，魏翊厚参加了我分区部队（魏1940年在范县牺牲），颜占一和卢振环的部分后

来则编入了二区队。

1939年冬，杨勇部何德全参谋长率队到岱庙、西汪一带开展抗日工作，经颜华联络，改编了郑三里郑丹亭（秀才）、郑海峰（大学生）组织的借抗日之名保存个人实力的地主武装。

1940年初，颜华、田鹏九等同志在马三里组建了东阿县二区抗日政府和区队，田鹏九任区长，魏翊廉任副区长（后任区长），马云涛任区队副，李振元任指导员（随后调县大队，由山西人黄杰继任）。区队3个班，50多人。由于颜华的内线工作，以及杨勇部何德全参谋长、吴机章后勤部长和东阿二区国民党区长王东安早建立的统战关系，王东安的二区武装接受改编编入抗日二区队。区政府和区队在县委领导下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不断伏击敌人，打击伪军，团结争取了广大爱国人士。黄庄乡长黄兴杰、张庄乡长陆家太、袁庄乡长袁子敬、老教师栾学安、以及李延荣，都积极协助我们催款催粮，筹备一切军需用品。特别是阿城侯肃斋、张秋杨锦堂等医生，积极帮助我们治疗伤病员，后来成为我们的地下医疗站，对支援抗日，巩固地方抗日政权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在张秋抗日政府时期的敌工工作

张秋是寿张、东阿、阳谷3县所辖的大镇。南门属寿张，东门、北门属东阿，西门和北门一部属阳谷。这一带的群众经常受到3县日伪军的扫荡，向他们交钱交粮，生活苦不堪言。为有力地打击敌人，边区和分区决定以张秋镇为中心建县。1941年6月，张秋县抗日政府在郑三里宣告成立，

夏仲远任县长，后柏洁民（即武少文）接任，秘书袁舒，公安局长先是李亚东，很短时间即由李克东接任，王克、杨鼎、万恩源等任科长。中共张秋县委会（当时称县政工室）书记是王化先（1941年六七月间从清平县调到张秋县，现名王华先），颜华任组织部长（后兼敌工站长），雷振任宣传部长。县大队和独立营也相继建立，杨朝炳任独立营长。张秋县抗日政府和武装建立后，在黄河（当时系干河）两岸、金堤两侧日伪盘踞的空隙地带活动，经常袭击、伏击和截击日伪据点的敌人。为开展敌伪工作，县委决定以颜华为首组织周子臣、郭文明、周金铸、任华峰等敌工干部和联络站人员，争取、瓦解、镇压敌人和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争取和发展内线工作人员，随时给我们送出可靠情报。还争取利用汉奸孙明柱、郭安仁等，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情报，还卖给我们一些弹药。根据他们的情报，我们及时镇压了铁杆汉奸数人，从而打开了局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敌人据点和炮楼附近也能够进行活动。

1940年东阿县伪营长刘振法被伪大队长刘德超派驻关山。刘振法是子路村人，34岁，出身较贫，识字不多，善广交，虽当土匪汉奸，但有杀富济贫思想，对不分穷富一概烧杀抢掠不满。根据掌握的刘振法与刘德超之间矛盾及其思想变化等情况，经县委研究，由李克东、颜华做争取刘振法反正的工作。颜华令其兄颜世端和韩子东等，制定了争取刘振法的计划，对他及时进行了工作。颜、韩同他多次交谈，陈述利弊，指出他与刘德超的矛盾，使他逐步认识到只有投靠抗日政府才有出路，并约定同颜华会面。1942年2月的一天，颜华带敌工干事周子臣、警卫员郭子明先到了子路村刘华亭酒

店，傍晚刘振法带了30多人，以回家为名，也到了酒店。颜华和周子臣迎到大门接他。这时，颜世端和韩子东也从关山赶到子路村，以免刘振法有思想顾虑。刘见颜华出门迎接，只带一人又无枪支，感到非常敬佩，知道颜华信得过他，也随即把他带来的那30多名伪军让到酒店外院去，自己和颜华一块商谈。颜华针对刘的想法，首先进行了攻心战，指出刘德超同他的枪支之争及人事矛盾，颜世端又进一步指出了刘德超利用鬼子处处钳制他的事实，说：“你只有忠实刘德超和鬼子，一切听从他的调遣，否则刘德超是对你不会客气的。”当时，刘振法的心情很复杂，很矛盾。颜华又从侧面讲了岳飞抗金、郑成功抗击倭寇的故事，并联系到当时的情况说：抗日救国是全国每个人的神圣职责，民族败类是很孤立的；刘营长虽错走了一步，及时改正也不失为英雄；刘德超死心卖国投靠日本，也只能同秦桧、吴三桂一样遗臭万年，绝不会有好下场。这次会面后，又接着见了两次面。我们派到他内部的颜占一和魏常州同时在下层进行活动，内促外拉，终于使刘振法下了决心。4月的一天，他拉出部队反正了，带来轻机枪1挺，长短枪100余支。县大队把刘部接到吴坝，召开了联欢会，分区敌工科长张萍、分区负责人邵子言、县委书记王化先、县长柏洁民都讲了话，刘振法也表了决心，说只有抗战才有光明，要紧跟共产党、八路军抗日到底。颜华代表上级组织宣布将刘部改编为张秋县抗日游击支队，刘振法任支队长，颜华兼政委。后来，刘振法被东阿县伪二区长刘振玉杀害了（刘振玉后被人民政府处决）。

颜华同志在县委领导下对争取瓦解伪军做了许多工作。1943年初，通过多次通信联系，和盘踞在郑三里的东阿县伪

中队长房辉华会面，并达成了协议。敌人每次扫荡，房能及时送出情报，并保护我抗日人员。1943年冬，刘德超为加强对方辉华的控制，把他调到广粮门（东阿刘集北），不久，房反正走上了抗日大道。颜华还先后争取了孟楼伪中队长郭安仁、陶城铺伪中队长刘东斋、司里伪中队长王广生等，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他们利用扫荡后的机会，赠送给我们部分弹药，卖给大批子弹。1944年打张秋据点时，由于伪中队长袁玉岐早同我们有联系，通过颜华喊话，就率队投诚了，带来轻机枪1挺，长短枪百余支。袁被送到范县敌工科学习。

1941年，敌工科长张萍和颜华在颜营建立了联络站，具体工作由韩子东和颜世端负责，联络员先后有魏翊武、颜世诚（即颜晓东，后调出）、颜世节、于继平等人。由黄河东东阿县的马俊青、斑鸠店的王明礼、马庄的杨修昌、黄河西苦山的刘坤召、张秋镇的黄登亭、运河西党店的王子贤、杨武龙的郭文正、阿城邱家饭铺等联络点，组成了张秋县地下联络网。联络点都同颜华有密切关系，掌握了大量敌人情报，为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提供了根据。

1944年12月，颜华调分区敌工科任副科长，负责东平、张秋、昆山、汶上等县的敌伪工作。东平伪县大队副赵乐银原来和东阿敌工部、后来和颜华都有一定工作关系，赵因敌伪内部矛盾，遭敌疑忌被鬼子活埋。颜华还争取了东平县伪中队长孙太清反正，昆山县汉奸马品山也主动交出枪支，洗手不干回家去了。

四、在济宁工作期间

1945年八九月份，颜华调济宁一带工作。在任济北县长

和县大队长时，除率队打击敌人外，也随时开展了争取瓦解敌人的工作。他通过在济北起义的原国民党团副官张文广，和隐藏在济宁市区的伪团长刘某拉上了关系并见了面，经多次谈话做工作，刘某交出了长短枪10余支，按照党的政策给了刘一部分钱。此后，刘又两次交出轻机枪两挺、步枪百余支和一部分子弹。

颜华和济北县政委黄天民、县委田鹏九、白瑞华、郑光等同志，深入群众，了解敌顽匪的活动情况。率县大队4个连，剿除了活动在水泊苇塘的敌顽匪高廷浮、刘本功一部，镇压了土匪白力功、邵子康，捕杀了国特敬斋和尚、李云弟等，并争取了特务帮头潘学山（开河人），潘交出了保存的轻机枪1挺，长短枪百余支。这些活动狠狠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加深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削弱了敌人的力量，为济宁地区的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以上情况经徐振达、任华峰、魏翊庚、郝长安等同志补充修改，但仍难免有错漏之处，请知情老同志指正。

本文作者 颜世端，1917年生，阳谷县阿城镇颜营人，颜华胞兄。阳谷县政协委员。 周金铸，1918年生，阳谷县张秋镇北街人，中共党员。1980年底在聊城市百货公司离休。本文收入选编时，根据几方面意见作了修改。

（原载1983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七辑，1984年《聊城地区党史资料》第十辑转载）

追忆余文伟烈士

段 延 世

余文伟同志是广州人，幼年丧父，随母先后寄居泰安、济南等地。1937年济南高中毕业后，于10月中旬同黄圭一、徐茂里、赵小舟、熊易五、徐明、夏炎、窦洪年等30余人来“聊城政训处驻阳谷办事处”（后改为阳谷政治部）工作。该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配合阳谷党组织创建阳谷抗日根据地。面对日寇的侵略，阳谷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准备弃职南逃，土匪乘机四起，会道门兴风作浪，暗藏的敌特汉奸也造谣惑众，群众惊恐不安，人心惶惶。在这种形势下，政训处的全体同志沉着努力，坚守岗位，积极配合地方党组织和学生抗日救国会，维持社会秩序，坚持发动抗日。年仅17岁的文伟同志更是几十位热血青年中工作多任务重的一个。因他在学校时即爱好歌舞，擅长写作和书法，能刻一笔俊秀的钢板字，所以，他除了白天联系工作，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外，夜间还要编写稿件，刻印宣传品，定时收发电报，真是达到了昼夜奔忙、席不暇暖的地步。

文伟同志是第一个在阳谷教唱抗战歌曲的人。他教唱的抗战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抗敌歌》、《九·一八小调》、《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五月韵鲜

花》等数十首之多。这些慷慨悲壮的革命歌曲，唤醒了人们，指出了方向，特别对当时青年学生是极大的鼓舞。正象一首歌中唱的那样：“我们歌声唤醒了城镇，也唤醒偏僻的大小村庄。这歌声给我们最大的力量，它引导着我们奔向前方。”当时的歌唱者和广大听众，情绪都在振奋激昂之中。悲壮的歌声刚歇，愤怒的高呼又起，这是对旧世界罪恶的控诉，是追求自由解放的宣誓。人民群众用歌声表达自己的决心和愿望，这歌声又成了推动人们前进的力量。其他教唱抗战歌曲的同志，还有王梦元（军政训练班主任）、申云浦、张继珍（女，申云浦爱人）、林荫茹（东平南街人）、丹彤（冠县人）、许可（女）、赵小舟等同志。他们的歌声鼓舞和引导阳谷青年学生和群众奔赴抗日前线，走向革命道路。

1937年12月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县工委和政训处研究，决定建立阳谷县抗日游击总队，队长赵小舟，教导员黄主一。下设少年抗日先锋队，简称少先队。余文伟同志兼任少先队指导员。他结合阳谷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积极分子，走东串西，发动青年参军，同时又和我动员了20多个少年儿童参加少先队。少先队员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他们穿上灰色军装，雄赳赳，气昂昂，神气十足，走在街上，人们对这些小兵无不投以惊奇赞美的眼光，孩子们看到更是羡慕异常。这些娃娃兵穿军装的时间是1937年冬，正值日军占据大名，炮声隆隆，大敌当前的危机时刻。他们毅然告别父母，投身抗战，与国民党军政官员弃职南逃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少先队成立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操练，余文伟同志亲自教导、训练。他们学习军事、政治，还特别注意学

文化，同时还进行抗日宣传。这些娃娃兵在战火中，很快锻炼成长起来，后来有的成为机智的侦察兵，有的当了指挥员，有的做了党政干部，也有的为国捐躯，拼死在疆场。如张秋党志强（回族）现在天津某大学做领导工作，城角孟孟广语曾任张秋县府秘书，西街段××（小名二立成）是先纵某团副连长，在琉璃寺战斗中和日寇作战壮烈牺牲。他们在阳谷青少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阳谷人民的革命斗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8年2月，春节刚过，县工委书记申云浦和赵小舟、黄主一、徐翼、王梦元等同志商定，从阳谷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和少先队中抽调40余人，组建临时的抗日巡回宣传队，由夏炎、余文伟负责。训练班抽调了张冠军、姚动、岳崇录（已牺牲）、张新亭（已牺牲）、段延世、刘庆珩、魏之朝等20余人，少先队抽调了党志强、孟广语、申景琳、李述春、安××等10余人。

巡回宣传队组建后，先后去南仓、阎兴鲁、骆驼巷、张秋、阿城、七级、安乐镇、石佛等地活动。每到一地，除召开群众大会演剧讲演外，还分组在附近村庄宣传。特别是化装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时，围观群众忘记了是在演戏，都很受感动。20多天里，宣传队到过百多个村子。当时，在这些偏僻的村镇，有组织地大唱革命歌曲，高呼抗日口号，进行抗日宣传，震动了人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亡国论”的影响，消除了惶恐悲观的情绪，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巡回宣传归来不久，正赶上二月二土匪打阳谷。局势突变，刚刚建立的新政权被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篡夺，新扩的抗

日武装被削弱。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争夺青年，在文庙建立假抗日真反共的训练班，培养爪牙，到处排斥进步人士，打击爱国青年。政训处同志大部分被迫调走，少先队部分队员随赵小舟、熊易五去冠县参加组建十支队。政训处仅留下黄主一、余文伟、窦洪年3人，他们冒着随时被捕和杀头的危险，和当地的党员一起坚持在阳谷斗争，直至聊城失守，阳谷无法存留时，才由李程九同志护送去冠县鲁西北特委听候分配。

文伟同志去冠县后，和黄主一一起被分配到先纵政治部工作，后调任营教导员（其他职务记不清了）。在此期间转战鲁西北平原，配合陈赓带领的六八八团有力地打击了日伪顽军。1939年春，部队东进开辟新区，在茌平琉璃寺和日寇作战中，余文伟同志壮烈牺牲，年仅19岁。

余文伟同志虽然不是阳谷人，可是他生前革命活动主要在阳谷，他是阳谷革命老前辈喜爱的战友，是抗日青少年的领导人。文伟同志少小离家，舍弃母爱投身革命，他的老母却不知道自己的独生爱儿已为革命献出生命，更不知道他葬身何处。

文伟同志把短暂的一生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革命精神、英雄行为、高贵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本文作者 段廷世，1922年生，阳谷镇西街人。1937年经赵凤升、司银章介绍入党，同时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脱党。后从事教育工作。1981年从山东省摩托车二厂退休回家。

（原载1986年11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对张冠军烈士的回忆

陈 赞 臣

张冠军同志，原名张玉峰，1918年7月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小商人家庭。祖籍阳谷县阿城镇陶城铺（旧属东阿县），民国初年，其父经商来阿城北镇剪子股街落户。冠军兄弟4人，他居长。在那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岁月里，他自幼养成一种艰苦自强、爱憎分明而又敦厚执着的性格。童年就读于私塾，稍长在阿城北镇县立第三完全小学（即县立三高）读书。读高级班强，受杨一斋（耕心）老师教益颇深，奠定了他爱国救民、寻求革命真理的思想。冠军当时即表现负重任远的气魄和一贯刻苦好学的精神，每期考试成绩居优。他平时虽不苟言笑，但为人正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因而得到同学们的敬佩和老师的喜爱。

1933年暑假，冠军高小毕业考入阳谷县立乡村师范。但他与杨一斋老师的联系并未中断，每次回家都要去杨老师处晤谈。1934年杨一斋老师发起组织“中坚社”（党的外围组织），介绍冠军参加。从此，冠军在县乡师成为团结青年学生，争取进步的一个核心。

1936年冠军从乡师毕业后，即任阿城南镇皋门小学教员，他又成为阿城一带团结在乡知识青年，争取进步的核心。他利用同学、亲友关系，以交朋友的方式，大力传播爱

国思想和革命真理，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和腐败政治，唤起人民大众起来救国救民，并在青年中发展中坚社员，我那时也由冠军介绍加入了中坚社。

1936年9月，由杨一斋老师主持，冠军同志由中坚社员转为中共党员。1937年1月，由冠军同志主持，我也转为中共党员。

1936年，赵凤升同志来阿城在西大街路北办民众教育馆，冠军积极协助他筹建夜校和半日制学校，使一些贫苦子弟得到学习文化和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冠军还和赵凤升同志发动知识青年，组织青年救国会，阅读进步书刊，如《新青年》、《创造十年》及鲁迅作品。西安事变发生后，冠军带领我们几个进步青年张贴标语，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国等主张。

“七·七”事变后，赵凤升同志回阳谷，杨玉琨（即杨肅）同志也从东阿县返回家乡阿城。冠军辞去阿城小学教员职务和徐凤岐（即徐亚洲）等去阳谷参加我党举办的干训班。1938年3月，冠军受党的指示去范筑先的十九支队政治部工作。秋，冠军奉上级指示，回乡领导党的地下工作，和杨玉琨同志建立了二区分委会。此后，冠军的家几乎成了我党抗日活动的公开地点。他家是商户，前门面东间是酒店，西间是染坊，东间后倒座是账房柜屋，有时也成了我们活动的场所；内宅两个院，西院是家属住，东院三间堂屋是顾客落脚之处。由于生意来往，群众认为都是做买卖的。有时我们在东柜屋以打麻将牌为名，开会座谈时事。当然，多数党的会议还是在夜间去花园后、王家林、大王庙等无人的地方开。1938年“红五月运动”期间，阿城地下党员由几名发展到十几名，除王

永德一人是雇农成份外，多数是中农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

1938年11月聊城沦陷，范筑先将军殉国，阳谷形势大变。冠军同志积极奔走，配合地方党员，联络开明士绅如刘镇南、刘维义、刘继东等，参加筹建县抗日民主政府和武装力量。1939年9月，在阿城刘楼成立阳谷县抗日民主政府，各区乡政权也相继建立，有三个区是阿城地下党员任区长，二区区长是杨玉琨、五区区长林继魁（没到职即为特务所害）、七区涂士奇；有的阿城党员担任了县区武装指导员，如二区队指导员赵子斋、县大队二中队指导员雷树范，阿城支部的朱学智、姬墨林等党员同志还去县区动委会工作。

1940年初，冠军同志积极配合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动员阿城民团团长刘镇南率120余人（配钢枪）的武装参加了县大队，编为二中队（即二连），刘镇南任连长，阿城地下党员雷树范任指导员。

1941年冬到1943年是我党抗日最艰苦的时期，到处有敌人的据点，炮楼林立，封锁沟如网，再加上大旱不雨、颗粒未收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的党员经受不住考验自动脱党，个别叛变投敌。如二、四区队在区队副带领下叛变投敌，二区区长徐亚洲同志几乎被害。敌人气焰非常嚣张，到处捕捉我地下党员和工作人员。阿城镇是阳谷敌人中心大据点，住日军1个小队、汉奸1个中队，还有新民会、警察所、伪区队、乡公所、镇公所、保甲长等。我主力部队也暂时撤走，只剩县、区武装与工作人员和敌人穿梭似地捉迷藏。在这种情况下，冠军同志毫不畏惧，虽任务繁重，但工作更加积极。为扭转全县这种不利局面，重建区乡政权和武装，经县委研究，冠军同志除任县委民运部长、县

各救联合会主任外，还兼做二区的工作和敌伪工作。他利用打进去、拉出来的方法，进行对敌斗争，稳定局势。通过关系，派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打入敌人内部，建立关系人、情报网。如阿城北镇的李方珍、傅延平（党员）以货郎挑为掩护，传递从敌人内部送出来的情报；冠军的弟弟张玉岚（党员）被派去伪乡公所工作，王永德（党员）被派去伪区队工作。冠军又通过同学王玉俊派我去海会寺小学任教，边做敌伪工作。当时我们争取了伪警察所长窦魁武和两个警长王友立、段传让，玉岚同志通过交朋友跟这两警长拜了仁兄弟，搞到了一部分良民证、新民会员证（牌子）和通行证，大大方便了我党工作人员的行动。冠军还利用关系在汉奸中队发展共产党员，有耿鸿章、郑继秀（给我家当过长工）等。后来又争取了阿城伪乡长、伪商会会长、伪镇长及伪保长，在敌人眼皮底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夜间能来征收麦秋公粮，按地亩给我们军队送给养。冠军同志还通过各种关系，利用给汉奸送给养青菜之机，将写有“要当中国的岳飞，不当中国的秦桧”，“要学关云长，人在曹营心在汉”一类内容的传单带进敌人据点，瓦解敌人。对死心踏地的汉奸头目则进行打击，如阿城据点有一个外号“坏胳膊”的汉奸小队长，经常敲诈群众，殴打送给养的老百姓。冠军得知后，派武工队员化装赶集，准备打死他。不料这小子做贼心虚，不出据点，好几个集都没等着。又利用写信的方式警告他，这家伙见到警告信吓得呆若木鸡，不久便要求调走了。

1942年，驻阿城日军调来一个叫铃木的小头目，非常凶恶野蛮，经常骑着洋马带着洋狗乱窜打人，唆使洋狗咬人。还不断带领汉奸队下乡清查户口，追捕我抗日党政工作人

员，并在汉奸内部安插铁杆奸细，组织秘密网点。如这样下去，我们设在敌人内部的关系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冠军发现这个情况后，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措施，决定采取“引蛇出洞”的方式，将这部分鬼子消灭。第二天便利用各方面的情报网，一齐向鬼子的亲信密探、铃木的翻译宗××回报我二区队住阿城北古河村的消息。铃木信以为真，马上通知汉奸中队长李德成和警察队出发，汉奸中队在前，警察队殿后，十几个鬼子在中间扛着机枪、掷弹筒，向古河村偷袭。当时正是谷子出穗，青纱帐满地起，我军分区三团早已在古河村前马趟子路旁谷地里布下埋伏，让过汉奸队，将中间的鬼子包围起来。机枪一响，李德成才知遇上八路军，吓得瘫在地上，由几个汉奸兵架着，从吕营（属东阿县）村前绕道跑回阿城据点，拉起吊桥。后边的警察队也吓得跑回据点里去了。宗翻译及日特密探侯福田拚命掩护鬼子撤退，被我们击毙，鬼子趁机冲出包围，我军一直追至阿城北门，活捉1名鬼子。铃木大发雷霆，大骂汉奸队长李德成胆小鬼无用，骂警察队怕死，并逼着警察所长、汉奸队长清出这次回报情报的人来。李德成是阿城当地人，人情很熟悉，他怕有人向鬼子告密，夜里偷偷将情况通知了我们。我马上离开阿城去郎湾找到冠军。郎湾一带是我们的联防堡垒村，冠军叫村长安排了我的食宿，并给我接上了党的关系，我又教起抗日小学来。后来，王永德和玉岚等同志也离开阿城，另安排了工作。

1943年9月间，敌人大扫荡。一天夜间，阿城据点的内部关系派人向冠军报告敌人扫荡的消息，并建议他去阿城关系户家躲一下。当时冠军正在刘楼和县区几个领导人开会，他

说：“叫我去躲藏起来，我反对。我们共产党革命人员，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吓不倒，冲不垮。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决不能在环境恶化时离开群众，放弃群众，自享苟安。我们要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否则，我们就会脱离群众，敌人知道也会耻笑我们的。”在场同志无不佩服。第二天敌人大扫荡开始，冠军带领群众转移到大赵、小冯之间的田野里，不幸被敌人包围遇难，年仅26岁。在场群众无不痛哭流涕，广大干部、党员、群众闻知这一消息，无不悲伤。当时因形势紧张，暂将烈士遗体埋葬在阿城东堤口村（属东阿县）西田野里。

1944年阿城解放后，县委将冠军烈士的灵柩移至阿城东会馆。由岳舜卿县长主持，以地县委的名义，开了一个全县范围的追悼大会，东阿和聊城也都派了代表参加。会后又将烈士安葬在陶城铺祖坟地。多年来，每到清明节，阿城一带的机关、学校都组织干部、学生祭扫冠军烈士坟墓，敬献花圈，进行悼念。

张冠军烈士生前历任阿城早期党支部书记、二区分委宣教委员、阳谷县委秘书、县委委员、县委民运部长、县各救联合会主任、冀鲁豫边区参议等职。

我和冠军是同乡、同学，他是我入党介绍人，两家老人并有旧交。当时我有空便去他家，对他知道的较多些，但事隔几十年之久，记不清之处甚多。当时党的活动都是保密的，有些事情是以后知道的，如他介绍的党员多数是在他家东柜屋举行的入党仪式，但谁也不知谁是党员，以后谈起来才知道。现将我所知道的烈士片断事迹写出，以表对冠军同志的怀念和哀悼。有不对的地方，希老同志、同学知详情者

指正。

本文作者 陈赞臣，原名陈廷襄，阳谷县阿城镇人。参加革命工作后，曾任抗日小学教员、小学校长、银行营业所主任、粮所主任等职。现离休，任阿城镇离退休党支部副书记。

（原载1986年11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回忆李鸿甲烈士

李鸿鹏、于令让、于令泗口述 田明远整理

被 捕

李鸿甲是阳谷县范海乡李庄人，贫农出身，济南爱美中学毕业后，又入韩复榘第三集团军学兵连3年。后参加革命，在家乡一带活动，为国民党县政府副官焦冠军、侦探焦风之密告，被国民党阳谷县政府逮捕，惨遭活埋，年仅25岁。

鸿甲上学时即思想进步，对时事多所愤慨，1937年年底济南失守，鸿甲回家，经范司令副官姚来增介绍到茌平博平一带工作。一年后聊城失守，即回家搞鲁西运销合作社，盘查从济南来的日货，令其报税以筹军饷。1939年夏，受东进支队委任，为聊阳阿工作团团长，扩充抗日队伍。当时队伍刚建立，力量薄弱，配合阳谷四区（七级）在聊城南部、阳谷东北和东阿西部一带活动。1939年冬末，队伍住七级西边焦庄，这时国民党阳谷县政府住四合庄，相距不过六七里。鸿甲认为时值国难当头，国共合作统一抗战时期，不会出别的意外，虽有同志建议，也没加防备。腊月初一早晨，突然听说村外过队伍，鸿甲和弟弟鸿鹏以及齐学珠等同志到庄北墙缺口处观望，忽见县保安营卢连长带着二十几个人正沿着墙跟由东往西来。鸿甲认识卢，即招呼他到住处来休息。卢

也没辞，即跟李到住处，随走着即在胡同口、门口设上了岗，刚进屋卢就翻了脸，说李鸿甲等人是土匪，下掉李鸿甲、齐学珠等人的枪，接着又命战士们和区部人员在院中站队。因我们枪少，没子弹，又措手不及，没敢动手。当时工作团的同志都穿着军装，佩戴十八集团军袖章，敌人很注意，区工作人员穿便衣，敌人不注意。李鸿甲和区长王子恒站到一块。鸿甲知事不妙，暗中拉了一下王的衣襟，王会意即伪装上厕所趁机跑掉。原来在这天天刚明时，国民党县政府保安营200余人就包围了焦庄，是有计划地破坏统一战线，来逮捕李鸿甲同志的。回四合庄时，国民党保安营站到路两旁，被捕的同志走在路当中，到四合庄后，把李鸿甲同志押在一处，战士们另外押在一处。这次事件除区长王子恒和两名姓陈的因穿着便衣得以跑脱，崔衍勋、于令让、王明孚三人因请假回家外，其余23人全部被捕。

敌人审讯

当天晚上，国民党阳谷县长陈庆元、公安局长李秀峰、保安营长郭安仁，对李鸿甲进行审问。李鸿甲身材魁梧，气昂昂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指着臂上的袖章说：“我们是十八集团军。”陈庆元狞笑说：“十八集团军在延安，你们是假的。”李鸿甲说：“当前日寇侵华，国难当头，咱们要讲统一战线，共同抗日。”陈庆元说：“你们假借盘查商人，令人家报税筹划军饷，是断道劫路，不是抗日，是土匪。”还审问共产党的组织和八路军住在什么地方，追究枪支，李鸿甲一概拒绝回答。敌人还把李鸿甲吊到梁上打了一

顿棍子，也没得到一点情况。陈庆元直急得跳劲不安。

惨遭活埋

这时，日军住到北焦、高楼一带，十军团和国民党县政府、保安营惊慌万状，晚饭后即向西窜去。临走前（腊月初三），令四合庄老百姓在村后挖了个大土坑，有1丈见方，8尺多深，队伍荷枪实弹，押着李鸿甲、李文会（分队长）、陆克敏（筑先二营侦察排长）、齐子亭、邢怀义等5人，推到土坑里活埋了。就义前李鸿甲还质问陈庆元“抗战何罪”，邢怀义等人也骂不绝口，敌人用刺刀割烂邢怀义的嘴，邢仍嘟囔着骂。李鸿甲等同志为了抗战，没死在日寇屠刀之下，反死在破坏统一战线、搞磨擦者之手，真令人发指。其余被捕人员以后陆续取保释放。

反磨擦斗争

李鸿甲同志牺牲后，东进支队有10多名领导人骑着马来四合庄，观察了烈士被活埋的土坑等现场，决定为烈士报仇，展开反磨擦斗争。我武工队夜间把告密的焦凤之处决在他家里。1940年正月初三，趁过年之机又把焦冠军逮捕，枪毙在七级大杨。在此前后，十军团打着中央军的正统招牌招摇撞骗，收拢了阳谷的旧官僚、土豪劣绅、地主武装，有县保安营长郭安仁，土绅、红枪会头子雷××，地主武装毛坊民团，忠孝团等等，加上十军团1个旅，号称4万大军，气焰嚣张，住

在薛庄、东西乔楼、殷坑、柴楼、武庄、南李楼一带。1940年正月十三日夜間，八路军肖华支队发起袭击，激战一夜，地主武装全被打垮，保安营被消灭，东西乔楼的十军团被压到薛庄寨子里，第二天抱头南窜。接着在濮范之间又打了一仗，十军团总算知道了八路军的厉害，从此南窜安徽，一蹶不振。

追悼会

1940年3月上旬，阳谷县抗日政府住到富安镇，谷山游击队已改编成县大队。为给李鸿甲等同志正名复仇，洗去敌人给安的“假八路”、“土匪”、“抢劫”等罪名，在李鸿甲家乡李庄召开了追悼大会，聊城南部、阳谷东北和东阿西南部的村庄，都选代表参加，县区乡村干部全部参加。到会的有两千多人。周围村都有县区武装，以维持追悼会秩序，避免敌人扰乱。会场设在李庄村南大场院，主席台是用布棚搭的，两旁搭了两溜大箔棚，里面放有100多张桌子，招待宾客休息和吃饭。主席台上和两边棚里，黑纱白纱挂得满满的，各级政府和领导人都送了挽联。这天还有农村乐队架鼓助威。这次追悼会，大大振奋了人心，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原载1986年11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本文作者 田明远，1918年生，阳谷县七级镇四合庄人，中共党员。1942年参加工作，历任小学教员、区文化教员、区秘书、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记、代书记、林场场长、林业局副局长等职，1981年秋离休。

古城岭上埋忠骨

——忆李皖民烈士

贺东启、刘延庚、孙迪贤等口述 郭炳庆整理

在阳谷县阿城镇王庄村西，逶迤着一列东西走向的高土岭，人称古城岭，传为古阿邑城墙废墟。古城岭上，苍柏翠柳掩映下，长眠着人民的好儿子——李皖民烈士。

李皖民，原名李玉成，传说是安徽省庐江县赵桥镇白庙村人。玉成是独子，因家贫，13岁就到天津投奔教中学的舅舅彭晓林当了一名校友。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侵占华北，舅甥二人随流亡师生南下。彭晓林更名谷泉，在阳谷县抗日政府当了秘书，玉成回了老家。玉成父亲体弱多病，全家靠母亲彭爱英一人支撑。1941年，玉成19岁时，父母给他成了婚，爱人张春香是他童年的伙伴。就在这时，舅舅来信要他同小姨和表姐一起到山东阳谷县参加抗日工作。他说服了父母，告别了新婚不满3个月的妻子，同小姨和表姐一起，于这年农历六月，来到了阳谷县阿城镇，住在夏口街刘明庚店里。玉成舅发信地址是阿城邮政局，但问邮局并不知彭晓林这个人。正巧县政府参议周云章在场，说县政府秘书谷泉是安徽人，可问他是不是彭晓林。到王庄（抗日县政府是流动的，当时住王庄）一问，谷泉正是彭晓林。当天，他们3

人就被接到了王庄。

李玉成更名李皖民，先到五大队受训，历时 3 个月结业，分配到县政府当收发员。干了两个来月，又被分配到二区（阿城）当民政助理员。李皖民日夜辛劳，为抗日军队筹粮筹款，成绩突出，曾多次受到军分区和县政府的表扬。1942 年日寇“铁壁大合围”时，他被困在东阿县小冯村。在这次日寇扫荡中，吴亚乌和张冠军同志牺牲，李皖民左腰部也受了枪伤。天明时，几个汉奸围了过来，李皖民心想，自己是南方人，不是本地口音，若开口讲话，必然会暴露身份，于是就佯装因负伤过重而昏迷，在汉奸逼问时，死不开口，只吃力地在地上划出“天津”两个字，意思是刚从天津做生意回来，才得混了过去。脱险后，他先后在韩海、朱楼、阿城镇、王庄养伤，两个多月后痊愈。那时，老百姓生活很苦，但还是摊了小米煎饼送给李皖民同志补养。

阿城镇是大汉奸李洪图长期盘据的地方，一向戒备森严。李皖民为了筹集抗日粮款，从不顾及个人的安危，经常出入阿城镇。有一次，他带孙迪贤到阿城商会委员胡子才处去取筹集的粮款，胡子才见了面很热情，非要准备酒菜招待不可，李皖民说啥也不应承，点清款数，转身走出门来。二人刚到皋门，就听胡子才院子近处响起了枪声，往北刚走不远，就遇上孟虎臣的巡逻队。李皖民临变不慌，当机立断，让孙迪贤带钱先走，自己打了两枪，把敌人引过来。李皖民转到街里，敌人尾追上来，他转身躲进澡塘里。卖票的老大爷认识李皖民，忙说：“你快走，李洪图正在里边洗澡哩！”皖民笑道：“知道，我正要找他。”忙躲进澡塘盥洗间里。几个汉奸追进澡塘，被李洪图骂了出来。李皖民随即冲进澡

塘，用枪口顶住了李洪图的后背，说：“李队长，请送我出镇！”两个光屁股的伪军惊得目瞪口呆，李洪图只得乖乖地将他送出镇来。

1943年农历二月十八日黄昏，由于被人告密，李皖民在王庄被捕了，关押在阿城北会馆。审讯时，李洪图先软后硬，使出了种种伎俩，但李皖民意志坚强，软硬不吃，大骂不止。这时警察所长窦魁武来了，见皖民这般坚贞不屈，暗暗放心。因为窦魁武虽是国民党的警察所长，却有爱国心，暗地里为我方做了不少工作，他深怕皖民受刑不过，挺不住。李洪图被骂得灰溜溜的，没办法，只得将李皖民押了下去。

得知李皖民被捕和第二天押解阳谷的消息，我地下党组织做了两手准备，并通过窦魁武和张玉岚（张冠军之弟）转告给李皖民：一、以刘维义、刘镇南为首的阿城镇士绅出面保释，不惜一切经济代价；二、由袁心斋区长带领区中队在董庄埋伏，准备截击营救。李皖民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押解阳谷是假，就地处决是真；保释是没有希望的，截击倒是办法，但就怕远水救不了近火。他心里坦然，一被捕就没想能活着出去，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通过窦魁武给舅父谷泉（这时已调任东阿县长）带口信，并请转告父母和妻子，不要为他的牺牲过分难过。他还反复地向看守他的几个伪军宣传抗日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

第二天天明，即1943年农历二月十九日早晨，天气晴和而清冷，李皖民被带出来，通过运粮河桥（俗称闸背）往西北缓缓走去。皖民心里明白，这就是往阳谷“押解”了。一路上，他心情坦荡，从容镇定，倒使伪军们感到震惊。

这时，在董庄准备截击的袁心斋等正等得心急如焚，
这时，刘维义、刘镇南等刚刚在郭家茶馆会齐，
也就在这时，骑在马上李洪图朝席怀忠喊了一声，
“席班长，准备！”李皖民急转身跳上河西岸高坡，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共产党万岁！”枪
声响了，李皖民倒在血泊里，年仅22岁。

李洪图放出话来，不准收尸，并派人看守。农历二月二十日夜里，王庄群众预先打好棺材，然后冒着生命危险，把李皖民遗体偷背回来，安葬在古城岭下。他们是：司金岭、张挺彬、张佃甲、李厚德等。皖民同志牺牲后，阳谷县委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原候补期未滿）。

1967年，王庄的群众在管理区书记刘延庚带领下，将李皖民烈士遗体移葬在古城岭上，并栽上松柏杨柳，供人们瞻仰、祭扫。

编者按：1981年6月阳谷县政协曾致函安徽省庐江县赵桥镇公社党委，请帮助调查烈士材料，10月得庐江县民政局函复，称该县无赵桥镇，亦无此烈士档案，将原信退回。烈士籍贯待查。

本文作者 郭炳庆，1940年生，中共党员，阳谷县阿城中学教师。聊城地区作协分会会员，近年有百首短诗在报刊发表。

（原载1988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濮 县 战 役

周 云 章

1938年4月，日寇坂垣师团占领了河北大名，又南犯清丰、南乐，继而侵占濮县，在李桥、董口、鼓楼一带渡口过黄河，直扑曹县。企图切断陇海路钳击徐州，以配合徐州会战，并留1个联队占据濮县，以保护黄河渡口和作为其后方基地。范筑先将军率领鲁西北抗日武装6千余人，围困敌人近两个月，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毙伤数百敌人，缴获机枪、步枪、钢盔、军旗、电线杆、罐头等大宗军用物资，在对敌人严重打击下，濮县终被收复。兹将几次主要战斗记述如下。

一、收复范县

范司令接到敌人占领濮县情报后，于1938年3月16日（农历二月十五日）召集第二、五、六、十九、二十二、二十三各支队司令以及直属有关人员在聊城开会，布置战斗任务。会上范司令介绍和分析了敌情，大意是：敌人占领濮县，主要任务是掩护坂垣师团进攻徐州。日军兵力约1个联队，不到1千人，联队司令是大岛（岛？），还有伪军千余，装备有平射炮和小山炮等轻武器。我们为配合徐州会战，对濮县敌人进行围困，要对士兵作很好的动员，说明道理，行军时要维

持群众纪律，凡是徒手没有武装的和土枪土炮都留在后方，兵要精干。农历二月二十日到范县西30里一带集中待命，到那里再交代具体任务。他谈完后便展开军事地图，确定了各支队的行军路线和驻军地点，并确定由崔乐三组织濮县、范县、朝城等县临时兵站，负责作战供应；袁仲贤参加作战指挥；姚第鸿负责组织群众。会后，各返原防作准备。

3月19日，我随范司令、袁仲贤率领传令队、手枪队和20余名骑兵先到了阳谷，第二支队李团也随我们一同出发。侦察员报告，濮县日寇百余和伪军一部，已占领了范县。随即打电话通知寿张县大队即刻出发迎击范县之敌，并命令李团于当夜两点出发赶赴范县，我们也率领直属部队随后赶来。次日下午四五点钟即到了范县城（今古城）东北25里之李台村（现属阳谷）。据报敌人出城东犯，即命令部队以战斗队形堵击敌人。在城东5里子路堤和敌人接触，双方相持有两小时之久。范司令派1个连兵力从右侧进攻，县大队从左侧进攻，又派20名骑兵绕敌后方，李团和直属部队正面攻击，范司令亲自指挥。敌人看到四面被围，而且天色将晚，即向西狼狈溃退。我们跟踪追击，敌人在范县没敢停留即向濮县逃走，范县遂被收复。

当天晚上，范司令率部队进驻范县城内。范县县长周子明率县府人员也随部队进了城，并召集警备队、公安局人员恢复秩序，安民守城。这次战斗敌死伤10余人，俘虏伪军7人，我伤亡7人。

二、围攻濮县

参加围困濮县的部队有二、五、六、十九、二十一、二

十二、二十三和二十六支队。还有直属部队游击营、卫队营、手枪连等，共约6千余人。部队3月26日拂晓出发，行至白衣阁区公所，约10点，段区长准备好了早饭，饭后稍事休息又继续进发。下午3时即到达了濮县东北18里之大李庄。部队都按时到达了指定地点。当天晚上，范司令召集栾省三、布永言、刘耀庭、袁寿山、于其水、韩春和、石鸿典、林金堂、路子衡等20余人，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范司令把围困濮县的重要意义重新作了详细的阐述，并分别交代了具体任务：第六、十九、二十六3个支队进攻北门，是主攻方面；二十三支队佯攻南门，以吸引敌人，由刘宅南部派两个连到黄河渡口李桥一带警戒，以防河南之敌增援；另派林金堂的游击营两个连及县武装在濮县西北25里之某镇布防，以堵击大名增援之敌；第二支队、手枪连、游击营、卫队营等部担任总预备队。总后方设在大李庄，前方临时指挥所在濮县东北18里之王堤口，总兵站设在城东杨集。并叫濮县政府组织城附近民团站岗放哨，配合主力作战。在会上又规定了进攻时间、统一联络信号，划分了各支队进攻地带。会后各回原防作准备。

3月28日夜12点，南门袁寿山部首先打响。他们用猛烈的火力袭击南门，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东线各支队也开始进攻，并占领了东关。北线韩春和、栾省三部也占领了距城1里许之丁庄、葛楼一带。这时敌人把炮火都集中在北门，控制着北关。韩春和、栾省三、布永言都亲自在前线指挥，几次冲击都被敌人火力所阻，一直打了3个多小时。天快亮时，我们都撤出战斗。东线和北线都撤到距城五六里一带，进攻南门和担任其他任务的部队也各返原防。这次战斗

北门打得最激烈，我伤亡20余人。

战斗结束后，当晚7时，在大李庄召集各支队司令开会，汇报战斗情况，总结战斗经验。

三、北门歼敌

围困敌人约1周之后，4月2日（农历三月初二）拂晓，在3辆坦克的掩护下，约有300名鬼子和伪军一部出北门向我袭击。行至葛楼以南，坦克即陷入了防坦克壕内，不能转动，我和韩春和、栾省三、布永言等看到敌人坦克已被打坏，遂率领部队从左右两翼冲上去。这时，范司令派袁仲贤率李团两参谋到了前方阵地，看到敌增援部队已出城，唯恐受损失，即命令布永言部向马路以西撤，韩春和向马路以东撤，栾省三向城东北撤。倘敌增援部队再对我进攻，布、韩两支队从两翼反击敌人，栾部插到敌人的后面以堵其后路，另派总预备队1个营的兵力堵击正面。待布置好后，敌增援部队已修好坦克，拉了死尸，收容溃散的鬼子撤回城。我们追击了一下，又各撤回原防。这次战斗击毙击伤敌六七十人，缴获饭包、水壶、皮鞋、钢盔以及枪支弹药甚多。我伤亡30余人，内有两名排长。这次胜利，政治影响很大，全县很快传开，四乡群众前来慰劳者络绎不绝。

第二天，范司令在大李庄召集各支队领导开会，总结这次战斗，特别表扬了韩春和等机动灵活的战法，英勇果敢的精神；并指出，这次敌人遭到失败，他们不会甘心，一定会寻机报复。要求各支队把工事修好，把地雷埋好，把防坦克壕挖好，把武器弹药修理保管好，严防敌人突然袭击。

4月5日，范司令、袁仲贤和我到前线视察阵地，检查工事构筑情况。首先仔细观察了围困北门的几个支队的每一个工事和战壕。范司令很亲切地对士兵们说：“这次你们打得很好，不仅消灭了六七十个敌人，还得了很多战利品，敌人的坦克也被打坏了，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敌人并不可怕，坦克和好武器也不可怕。问题在我们是否敢打，只要我们敢打敌人，最后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接着又对干部们讲：“要把工事修好，准备迎击敌人的突然袭击。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当检查到六支队时，他看到工事修筑不合要求，便亲自指挥修好了一个样子，召集了其他支队的干部参观，当时对布永言、韩春和、栾省三严肃地指示说：“你们今后必须按照这个样来修筑工事！”

开完观摩会后，天已正午，范司令就蹲在士兵中间，拿起一个碗和他们一同吃饭，我们也参加到士兵队伍中。范司令一边吃，一边笑指着碗里的饭和菜说：“你们吃的可不错啊！老百姓哪能吃到这些！如果把日本鬼子打不出去，做了亡国奴，想吃这样的伙食是不可能的。”饭后又到了城东防地，也仔细检视了每一个工事和战壕，直到天黑才回到大李庄。士兵们看到范司令亲自到了前线，得到首长的鼓励，无不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四、麦田伏击

我们的围困工事修好之后，敌人很长时间没敢向我们出击。因为城内缺粮，马缺草料，敌人每天到城外附近放马吃麦苗。围城战士看见敌人肆无忌惮地出城放马，纷纷向上级

反映，要求“先干他一下再说”。请示范司令，范说：“不要慌，先麻痹敌人一下。咱们要放长线钓大鱼，待机而行。”遂通知东门部队，今后不许打枪，以麻痹敌人。我们每天注意观察敌人的情况变化。敌人开始在城附近放马，附近麦苗吃完了，果然，逐渐向外扩展，时间一久，成为习惯，待扩展到城外三四里之远，城上火力已接应不上，这时范司令计划打一个伏击战，消灭放马的敌人。4月26日，从各支队和直属部队选拔了百余精干士兵，又从地方上物色善于打枪的好猎手，组成了一个200余人的突击队。每人配备子弹100发，手榴弹6个，枪上都配有刺刀，准备进行白刃战，并配了4挺机枪。战士们都进行了伪装，头带草箍，身披草蓑衣。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范司令召集讲话。他风趣地说：“这次该钓大鱼了，鱼已上了钩了，只看你们的本领了。”接着提出了打伏击战的几点要求：第一要隐蔽好，不要提前暴露目标，第二要进行突然袭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敌人措手不及；第三要沉着勇敢，千万不可慌；第四要猛打猛冲，使敌人遭到伏击后，在混乱中无还手之力。接着，袁仲贤也讲了话。因为袁是南方人，很多人听不懂，范司令便不断解释，有时别人也给他重述。

下午，袁仲贤带领几个干部，到城东敌人经常放马的地方进行阵地侦察。四五月的季节，麦子已埋过人，伏在麦田里十几米也难以发现，正是打伏击的好时机。袁仲贤等离开了王堤口，直奔距城四五里之某村，对那一带地形进行了详细观察并作了标志，对可能发生的几种情况和如何打法作了估计和计划。他们回来之后又作了具体研究，晚8时向范司令作了详细汇报。范司令很审慎地检查了他们的计划，

嘱咐袁仲贤说：“打埋伏一定要胆大心细，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决定部队夜间1点出发，3点前埋伏好。

夜12点半，战士们都吃完了饭。临出发前，范司令又讲了话，一再强调“千万要沉着”。夜1点，队伍离开了王堤口，绕过村庄，直奔伏击阵地，于拂晓前埋伏在城东北4里许一块麦田里，挖好工事，架起机枪，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单等敌人到来。

队伍隐蔽得很好，在麦田里趴了几个钟头，没有暴露目标。有的战士等得不耐烦了，小声对袁仲贤说：“这次鱼钓不成了吧？”袁仲贤鼓励他们说：“不要慌，打埋伏仗就是要有耐心，敌人总会上钩的。”一直到9点多钟，果然有200多匹马活蹦乱跳地从东门出来了，后边有七八十名鬼子赶着，散在麦田里渐渐向东北伸展。因为城附近麦子大部分吃光，马群很快进入我们的埋伏地带。战士们看到敌人步步接近，恨不得一口把他们吞下去。只有一二百米了，已听到马蹄声，还没有打的命令。待接近到百米左右，只听袁仲贤一声“打”，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发，马听到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立即惊不成群，四处乱窜；七八十个鬼子遭到突然袭击，在马冲枪击之下，也乱成一团。我200多名勇士端起步枪冲上前去，打得敌人乱嚎乱叫，抱头鼠窜逃回城去。当场击毙击伤鬼子30余人，击毙马30匹，缴获马30余匹、枪支弹药、钢盔等战利品甚多。城内敌人出来增援时，我们已打扫完战场，携带战利品凯旋而归了。

第二天，范司令召集附近村庄群众在王堤口开了个庆祝大会，把缴获的战利品和活马都作了展览，一部分死马分给了群众。范司令在会上讲道：“我们的军队也是老百姓，只

要加强训练，就能抗日，就能打日本。敌人并不可怕。”

敌人初占濮县的时候十分疯狂，每天三五成群出来烧杀抢掠，扰乱得城附近的群众日夜不安。我们就把城附近的青壮年都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捉拿汉奸，基本上每天和日伪都有战斗。有一次，城附近民团捉了两个鬼子，带着两支大盖枪到司令部请赏。范司令当即把枪给了他们，并鼓励说：

“你们打鬼子打得很好，出来1个消灭1个，出来两个消灭一双。只要我们老百姓都组织起来，就有抗日力量，有了力量就能卫国保家。我们中国是人山人海，敌人迟早会淹死在这里！”

五、城南伏击

鲁西北抗日武装配合地方民团，围困敌人快1个月了，敌人气焰逐渐被打下去。过去每次扰敌，敌人火力十分猛烈，只要向城上打几枪，敌人的机关枪、小炮就疯狂地向我们打一阵，后来火力也逐渐减弱了。敌人为巩固濮县据点，又从济宁调汽车数十辆、鬼子200余增援。范司令得到情报后，召集我和袁仲贤，计议打一个伏击战。

援敌已从济宁出发，很快即到黄河渡口，因此没有更多的准备时间。范司令叫我马上打电话，通知离司令部较近的五、六支队，各挑选60名有战斗经验的战士，由一个连级干部率领速到王堤口司令部集合；从二支队也挑选了一部分。共200多人，组成一个突击队。当天下午都集中在王堤口，经过简单动员，由袁仲贤率领，于当晚出发。5月2日（农历四月初三），部队埋伏在濮县东南10余里的沙窝里。

这里地形起伏，灌木丛生。靠北是一片开阔地，从黄河渡口到濮县城的汽车路贯穿中间。部队埋伏在公路两边，准备夹击敌人。一直到次日11点，仍没有一点动静，正准备撤走，忽听东南方有马达声，用望远镜看到几十辆汽车由东南向西北蠕行。战士们摩拳擦掌，专听号令一响出击。汽车越来越近了，在大队汽车前方数百米远，有两三辆侦察车。这时，六支队有个战士“砰”地打了一枪。敌人发现有情况，马上下了汽车，200多鬼子正端着枪，喊着杀声凶猛地冲上来，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和敌人相持两小时多。敌人集中火力向六支队猛冲，他们支持不住，即向北撤退。北边是一片开阔地，在敌人的火力追击下，我伤亡30余名。其他部队也撤出了战斗。敌人汽车开进了濮县城。这次伏击战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但也给敌人很大打击。

六、七里堂战斗

敌人进抵濮县，范司令率直属部队200余人，于5月9日（农历四月初十），进驻城东北七里堂以布置军事。敌人很快得到了情报。次日拂晓，日寇50余配合300余伪军，向我七里堂临时指挥部突然偷袭。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七里堂村有一个残破的土围子，周围有些树木。栾省三司令部驻东南某村，六支队驻正西某村，3个村成犄角之势。范司令到了那里之后，即叫特务连派出岗哨，在围子四周修了简单的工事，向西南方派出了游击哨。大约在夜间两点多钟，哨兵听到城东关有狗咬声，他们就提高了警惕，注意着前方的动静，游击哨已作了战斗准备。果然于黎明前发现前方有人

影移动，急问“口令”，没有回答。哨兵发现有敌人偷袭，就开枪射击。这时敌人随枪声冲上来，我们的哨兵边打边退。范司令听到村外枪声很激烈，马上起来，带着传令队、特务连跑出村外，占领了阵地。这时，鬼子已经离我们只有三四百米远，喊着杀声猛向前冲。范司令亲自指挥部队，利用土围子向敌人猛烈扫射，阻止敌人前进，同时叫我打电话，马上通知布永言、韩春和、栾省三3个支队火速来援，命令布永言率队直插敌人背后以击其尾，韩春和攻其右侧，栾省三除派一部兵力攻敌左侧外，栾本人率主力火速来七里堂增援正面。栾省三接知范司令被袭击的情况，立即手拿匣子枪，率其主力飞奔七里堂增援。这时，敌人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火力更加猛烈。敌众我寡，我们阻止不住敌人的前进，并已伤亡几十人，范司令的警卫员也有数人受伤。敌人冲到距我阵地几十米时，战士们便用手榴弹向敌人投掷，眼看就要进入白刃战。警卫员十分着急地劝说范司令急速离开阵地，但他仍很沉着地在阵地指挥。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栾省三光着膀子，领着几十个弟兄，象猛虎一样从背后冲上来，把敌人顶住。栾省三为保护总司令的安全，一边劝说，一边把他拖下阵地。敌人仍不顾生死地向前冲击。这时，忽听到右侧方有枪声，韩春和从右侧增援上来。敌人看形势不利，急想后撤，但后面又响起枪声，布永言已抄其后路，敌人只好从西北方向绕道逃窜回城。这次战斗敌伤亡四五十人，我伤亡七八十人。

战斗结束后，范司令回到王堤口，召集各支队司令开会，总结这次战斗经验教训。在会上特别表扬了栾省三英勇果敢，奋不顾身，使这次战斗化险为夷；并对各支队提出要

求，今后一定要严加警惕，防止敌人再发动突然袭击，对各支队的防地又作了重新部署。

七、石墓头伏击

1938年5月29日，徐州失陷，日寇在濮县设据点以保护黄河渡口作用就不大了，估计敌人可能要放弃濮县。据侦察报告，濮县城内汽车大都开走，还留有30多辆，6月上旬将全部撤走。范司令召集袁仲贤和我计议，决定在濮县西南15里之石墓头一带打一个伏击战。

决定之后，就从二十一支队、六支队和直属卫队营抽调有作战经验的战士200余人，组成一个突击队，于6月5日（农历五月初八）集中在王堤口前方指挥部。范司令作了动员，说明这次伏击战的意义，并提出一些要求。部队正准备出发时，濮县西南温庄、文庙两村的村长到了指挥部，诉说鬼子烧杀抢掠，民不聊生，请求派兵帮助抗敌。范司令就请他当向导，率领队伍开往濮县西南寻找战机。

6月6日，部队作了一天的行军准备，夜间出发了。范司令、袁仲贤、姚第鸿率领传令队黎明才走，沿着大堤赶上了部队。7日上午11点，部队在濮县城北5里之高家寺吃午饭，下午绕过濮县城，经十里铺、姚庄、王堙堆庄，到了温庄、文庙，分别住下，范司令住在文庙。晚上，范司令请了几个当地群众，询问了一下敌情和这一带的地形，并和袁仲贤等研究了作战计划。

石墓头村是敌人汽车往返必经之路，因此决定就在此村打伏击。第二天下午，范司令召集了该队干部到石墓头侦察

地形，走到姚庄，侦察员报告说，敌人100多辆汽车自濮县开来，已听到了马达声。范司令急率这些干部赶到石墓头南3里的小刘庄。刚进村，一个老百姓跑来向范司令报告说，敌人汽车有一百几十辆从西向东开来，车多是空的，每辆车都有鬼子。范司令得此情报，知道情况起了变化，便在小刘庄停留了几小时。等敌人汽车过去，又听到东南五六里黄河大堤上有激烈的枪声，侦察员报告说，濮县城内约三四十名鬼子，穿着中国衣服，伪装成游击队偷袭温庄，在黄民埝和六支队游击哨遭遇，已被击退。

天快黑了，敌人的汽车又从东向西开过。派人在村上用望远镜观察，共60辆，停了一会，第二批又来了，有67辆，车上装着军用物资，用布蒙着。根据上午情报东去163辆，还有36辆未开回来，我们就计划在石墓头打这36辆汽车。

天黑了，范司令又率领干部到石墓头侦察地形。村子正中间有一座庙，庙前就是一条东西汽车路；村四周有一道已坍塌不齐的土寨子墙，寨外都是树木和苇塘，便于隐蔽；到处都是小路，出入很方便，打伏击具备很好的条件。大家随范司令围村转了一遍，边走边研究，哪里埋地雷，哪里设伏兵，哪里安机枪，哪里挖枪眼等等，都作了布置，范司令并叫标记下了地形军事要点。大约有两个多小时，从东寨门东行2里许，在崔庄稍事休息，即回到宿营地小刘庄。已有半夜了，范司令又召集这些干部开了个会，一再嘱咐说：“打伏击战一定要勇敢沉着，有勇有谋。和鬼子作战要胆大心细，行动迅速，千万不要大意！”并作了具体布置，要工兵队把地雷埋设在村东西两头，在临大街的房顶上、庙门内和通大街的院子中都挖好枪眼，修好工事、鹿柴、陷阱，如敌

人从东来先拉村西地雷，后拉村东地雷，把敌人夹在中间，埋伏在房顶上、院子中的部队听到地雷声即开始射击，把敌人消灭在村子里；如发生不利情况要交替掩护，互相接应撤出村外。会后，袁仲贤随着队伍出发到石墓头布置阵地。直到鸡叫时，范司令才稍休息片刻。

天未明，范司令就起来到石墓头检查，从村东到村西一个个工事都进行了细致观察，最后他满意地说：“布置得还可以！”然后就到石墓头西南1里许之小李庄等候战果。

9点多钟，听到村西南有汽车声，大家都作好了战斗准备。不到一刻，村西已发现汽车100多辆，第一辆已中地雷，其他车上的敌人下来车即向村中攻击。村内伏兵也开始向敌人射击，因寡不敌众，最后撤出村北。范司令听到石墓头打响，正想出村看看，这时敌人已转移主攻方向，从李庄西北攻了上来，村西的警戒一边打一边后撤。情况十分紧急，范司令命令往村东南高地转移。刚出村，敌人已占领了村西头，用火火力猛烈追击。范司令和直属队一边跑，一边隐蔽，终于突出了敌人的火力网。跑了约1里许，到了一个高地，才开始还击。打了半个小时，敌人也没再追击，范司令就在距石墓头六七里的某村住下。敌人汽车开进了濮县城。

第二天，据侦察员报告，敌人全部撤走了，范司令马上派工兵队进城搜索了1天，以防敌人埋设地雷，同时对城外也进行了搜索清除。范司令随机关进了城，住在西街县政府内，以总司令的名义出“安民布告”。大意是：日寇盘据月余，人民生灵涂炭；今鬼子已被打跑，以后可以安居乐业；现在虽然胜利了，但仍要提高警惕，加强防守，以防敌人卷土重来等等。对受害者都予以安置，房子被破坏的由政府帮

助修建，范司令亲自到受害者家里慰问。还由政府组织了一个小型庆祝会，参加的有地方士绅、各区区长、民团团长以及当地机关、群众共四五百人。范司令讲了话，大意和布告相同。会后，群众送了许多慰问品，范司令都予以谢绝，概未接收，并向群众说：“国难当头，群众的负担很大。收复濮县是我尽守土之责，接受这些东西是爱民呢，还是增加人民的负担？”范司令在濮县住了几天，即经冠县、馆陶，去河北威县会见徐向前司令。各支队除留冀振国十三支队驻防濮县外，于其水调禹城，韩春和回铜城，石鸿典调阳谷，袁寿山回范县，他们在返防途中备受群众热烈迎送。

本文作者 周云章，原籍济宁市。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中共党员。“七·七”事变后，携全家到鲁西北参加范筑先领导的抗日活动，在范筑先抗日游击总司令部任参议。其后相继任聊阳阿抗日游击第四大队参谋、鲁西支队参谋、阳谷抗日县政府参议、聊阳阿情报站站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冀鲁豫区人代会代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参议员、徐翼县人民医院院长、卫生科长、阳谷县政府卫生科长。1952年后，任阳谷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会副主席、阳谷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县政协副主席。1975年4月病故，终年88岁。本文写于1964年。

（原载1982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二辑，1983年第四期《聊城地区党史资料》，1988年10月《聊城文史资料》第五辑转载）

阳谷忠孝团叛乱始末

申 仲 铭

1938年11月（农历九月），阳谷反动道会门忠孝团突起叛乱，致抗日英雄范筑先将军殉难聊城；复与我东进八路军为敌，妨害抗战。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沈鸿烈、李树椿“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最恶劣的一个事例。那时我正在家乡，居住在忠孝团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安乐镇，幸得夺取东门旁口出走，我堂弟东生则被该团杀死。这个叛乱不是偶然的。兹就记忆，复与若干老战友谈及，得到不少参证，记述如下。

一、忠孝团怎样起来的？

鲁西一向是红枪会活跃的地区。参加的基本群众多是中小农户，但因它属于宗教迷信会门性质，也带有封建反动的一面，特别是领导人物一旦与反动势力相联系，就很容易被利用，做反动派的工具和鹰犬。阳谷县红枪会向有耿门、赵门、周门之别。赵门系统绝大多数是中小农，我曾见过赵法师，他的门徒多在安乐镇一带，纯由自卫出发。1926年抗粮抗捐，抵御兵匪，几次围攻县城，多是赵门会众参加。耿门则不然，耿的门徒多在地富庄寨，如胡家楼、朱家庄、薛家寨。听说耿法师收门徒，尚收受礼金。这起红枪会，事实上

与地主武装民团合而为一，做了地富看家护院的保镖。周门则介于两者之间，影响不大，不如耿、赵两门人多。

大革命时期，鲁西和冀鲁豫各省同样，红枪会对摧毁北洋军阀起了相当的作用。国民党统治时期，韩复榘用梁漱溟、梁仲华“政、教、富、卫”之说，以乡建派的办法，在山东推行“乡农学校”制度，征调民间枪支壮丁，成立地主武装，扼杀了一般农民自卫组织，红枪会无形中也消沉下去了。1937年日寇入侵，地方有些混乱，红枪会因而又起，有出于保家自卫的，有参加抗战的，也有一贯为地主阶级服务而反对抗战的。忠孝团的前身，属于耿门系统，它的反动叛乱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山东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不从韩复榘的乱命，誓留黄河以北，守土抗战，并取得共产党的支持，动员群众抗日，屡次击退敌寇，以聊城为中心，建立了鲁西抗日根据地。他收编了36个抗日支队、8路民军，共约5万人左右，收复了20多个县城，复与东进八路军一二九师联系，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抗战形势本来极好，日敌亦誉范为“华北第一人”。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对范的行为极为不快，造谣中伤，百般破坏，联合地方反动势力，阴谋倒范反共，破坏抗战事业。忠孝团就被他们选中，相互勾结，阴谋叛乱。

1938年初，范筑先收复阳谷县城，即以共产党员徐茂里充任县长。阳谷是接连聊城的一个大县，也是鲁西粮米给养的后方基地。但大地主盘据的朱家庄一带，却凭仗其民团、红枪会（耿门）势力，抗粮不纳，连田赋正税也不愿缴。范筑先据报并接受阳谷县长徐茂里的建议，调党所掌握的廖云山、李福尧队和池宗衮、杨笑如队由堂邑、博平集合到阳谷，

镇服朱家庄一带地主民团，推动抗日县政。表面上看，这虽是一件小事，内中也包含着对各种反动派的尖锐斗争。这支武装，当时尚在萌芽时期（即后来的十支队、筑先纵队前身）。为巩固阳谷政权及扩大抗战力量，鲁西特委以政治部名义建议把廖、池两部调来阳谷，一则用以协助阳谷党推行县政，二则把这支武装放在党所掌握的阳谷县政之下，也好培养成为抗日劲旅。

1938年3月间，由廖云山、李福尧、陈中民、池宗安、杨笑如、靳士林等率领这支武装约100多人，还从寿张特务大队借来晋造冲锋枪1支，用红布蒙着冒充机关枪，寿张特务大队的姜威扬骑马走在队前，县政府秘书孙鹏程尾随其后，县政府金库主任王润槐骑自行车先行，前往朱家庄一带催征田赋。队伍离朱庄约有1里多路，即听村内鸣枪，接着王润槐骑车奔回。队伍知道朱庄已决心抗拒政府。为了压服朱庄，决定对朱庄实行包围。廖队进驻村南，池队迂回村西，各占据村外场院。不料池队不慎，烤火点着场院柴禾垛，燃起熊熊大火。周围村庄的地主以为共产党的队伍要进攻朱庄围寨，遂纷纷吹牛角调动红枪会支援朱庄。两队干部恐被红枪会暗算，遂返回阳谷城。以后范筑先为镇服朱庄，从黄河南借调四区专员赵仁泉的党品玉营来阳谷，出动4个正规连，始压服朱庄，使其缴纳部分田赋。

原来，这个事件是大地主民团长刘学来鼓动的。不久，党营调走，范无正规军驻扎阳谷，朱家庄一带的民团又不服政府号令，凭借朱家庄的深宅大院，圈楼碉堡，培植匪团，继续顽抗，一直抗粮抗税。

这个忠孝团，据说原先发生于阳谷东邻东阿县境，

“七·七”事变后即组织成，后来传到阳谷县东部各乡。有8个分团（一说是1个团），团长为刘清泉、赵二虎（赵长街）、焦维贤（一说焦东海）、贺登岱（一说贺登州）、王培臣、段学彦、刘叔宝、贺立新，分布于阳谷县东北丁庄、东金、王屯、刘集、焦庄一带。后来，地主民团首领徐芳德、翟青云、刘学来，也都附和参加，以朱家庄大地主李姓碉堡寨子为其根据地。赵二虎原是张勋部下小军官，张勋复辟失败后，他就成了北洋军阀的兵贩子，这时则勾结敌伪，终于做了汉奸队长、司令。此人招摇撞骗，威胁百姓，一向为人民所痛恨。翟青云原系地痞流氓，以国民党部势力人物翟秀山、翟仲范为后台，是七级镇一带的恶霸。

按忠孝团的组织，溯其源流，是白莲教中的无极道，是红枪会门各派中最落后反动的一支。忠孝团会首刘清泉，也是地富分子，安乐镇东10里丁庄人。此人40多岁，念过私塾，略识文字，蓄发留须，迷信符咒，手持木剑，自称这木剑能杀死人。他又用胶泥捏成坦克、飞机，类同儿童玩具，自谓用法气一吹，泥飞机可以上天，泥坦克可以行走。其弟刘清岚30岁左右，原系安乐镇省立第四职业学校学生。此人并不迷信，但他有政治野心，想做大官，就利用忠孝团红枪会众作为他的政治资本，勾结敌伪，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倒范反共，称兵叛乱。

二、沈鸿烈、李树椿和忠孝团勾结倒范反共

1938年，范筑先取得共产党的支持，在鲁西北南部，初步建立了抗日基地。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由鲁西南一再败退，6月窜至东阿，不堪日寇一击，因渡黄河依范，居于

聊城。范为照顾省主席的面子，亲自到河边迎接，沈在聊城设下主席行辕。但沈以范筑先重用共产党员，联系八路，心中不悦，遂将行辕改迁于阳谷县属的张秋镇，并以民政厅长李树椿兼任行辕主任，日谋倒范反共。这年秋天，张秋与聊城之间，势成敌国，在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斗争磨擦极为尖锐和复杂。沈这时已奉蒋介石命令，厉行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范仇视逐日加深。

正如刘伯承《我们在太行山上》一文（1961年6月21日《人民日报》）所写：“这时，日寇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逐渐转移其军事力量，对付敌后我军；国民党则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加紧磨擦，为投降妥协作准备。他们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的口号。他们到处勾结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横征暴敛，欺压人民，一再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这也恰是此时鲁西的写照。沈鸿烈、李树椿用内外夹攻的手段，陷害范筑先将军。一方面由李树椿利用旧属关系拉拢范的参谋长兼第二支队司令王金祥，联合六区专署旧员中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从内部腐蚀分化；一方面在阳谷县召聚劣绅、国民党反动分子陈受之（名增佑）、李立如（名钟豫）、李士修（名维德），勾结忠孝团，密谋对范举兵叛乱，欲置范于死地。同时又以省主席之尊，迫范撤换共产党员县长（如范县周子明、寿张管大同、阳谷徐茂里等），向范筑先、八路军“收复失地”。最恶毒的是，沈、李在张秋镇故意对忠孝团说：“省府行辕三不要：一不要枪，二不要人，三不要钱粮。”其实，国民党省府这班人游而不击，既不打仗，又握有省府“民生银行”钱

票发行权，结果还是坑害人民。但这个欺骗人民的手段也颇能煽惑人心，沈、李和地方国民党反动派、土劣分子，又直接授意忠孝团及一般地富说：“无省府命令，不必向范纳粮。你们尽可反对。”这样累次煽风点火，遂致忠孝团叛乱。

沈鸿烈字成章，湖北人，在奉张时代，曾任过东北海军舰队司令。1929年东北当局因中东铁路问题与苏联红军引起武装冲突时，沈是抗俄的江防海军前敌指挥，同江口一战大败，江防舰队全军覆没。阎、冯反蒋大战时，他是第一个怂恿张学良进关的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沈鸿烈早就投蒋做了反共官僚。

李树椿原是韩复榘的参谋长兼民政厅长，韩被处决后，沈由蒋任命为山东省主席，李蝉联任省民政厅长。沈由聊城迁往张秋镇后，自去鲁南，以李树椿代主行辕，而另以己系的廖安邦任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实权操在廖手里。但李为邀宠，以取信于沈，并且出于他北洋军阀的反动本性，其效忠于蒋、沈的反共政策，不让于沈之党徒嫡系廖安邦和胡学仁之流。他勾结利用范的参谋长王金祥，积极反共，在濮县杀害了范的十三支队司令、共产党员王青云和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汪毅。在这场屠杀之后，犹以为不足，还要消灭共产党所掌握的第十支队。可是这支武装在张维翰、王幼平、刘志远等率领下，甚为坚强，他不能如愿。于是这个老猢猻的李树椿急切地煽动忠孝团，要在范的肘腋之下发动叛乱。阳谷土劣陈受之是国民党“剿共”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超万）的侄儿，北京高警出身，曾做过警官。陈这时乡居，以地主阔少姿态出入乡里，烜赫一时。他和忠孝团首刘清岚是亲戚，由李立如、李士修（二人都在韩复榘时任过县长）撮合，将刘清岚介绍给

李树椿。李以为奇货可居，委刘为行辕参谋，合地主民团徐芳德部作为张秋行辕的外围，并以忠孝团为前锋，在敌人攻聊城的同时，发动攻占安乐镇和阳谷县城。据传，刘清岚还曾去济南，受过敌伪训练，有人也见过敌伪派遣的特务，化名为马太师、史御史，在忠孝团内部策动。1938年11月15日（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忠孝团攻占安乐镇，次日又进攻阳谷县城，开始了他们的黑色恐怖。

三、忠孝团的黑色恐怖

当忠孝团暴乱焚烧村庄时，10里内外火光冲天，白天也黑烟滚滚，人们称之为“黑色恐怖”，形容其狂暴烧杀、暗无天日的情景。

1938年11月上旬，忠孝团在李树椿及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策动下，蠢蠢欲动，已见显著，终于走向公开的暴动叛乱。忠孝团众口一词，说是奉沈主席命令，“只须完正税，不许拿附加”，“要钱要粮，都是老范一人所为”，要杀死范筑先。这时范已得报。因阳谷东北各乡大都加入了忠孝团，如有异动，距离聊城不过五六十里，影响抗战，关系很大，正筹镇服之策。谁知李树椿、廖安邦先下手为强，早已定计安排，阴谋陷害范筑先于死地。

11月中旬，范下令要驻扎阳谷县城的刘耀庭支队及阳谷县长刘子璋，相机进军镇服。这个命令下达不久，即被驻张秋行辕的廖安邦知道，廖打电话教唆王金祥，要他转告范筑先说：“他们（指忠孝团）是些无知老百姓，只要范司令亲去开导开导，即可解除误会，和平处理。”王金祥当即告范。范

正在考虑，忽接情报，日寇在东阿集结数千人，由姜沟渡河已到鱼山，有直犯聊城趋向。这时适有卸职的四区专员韩多峰在座，见范无从脱身，便自告奋勇要代范走一趟。范欣然应许说：“偏劳你吧！”韩次早（11月14日）同几位随从骑自行车去了。

韩和范同是西北军旧人。在韩复榘时期，韩多峰是山东联庄会会长。抗战开始，韩任四区（临清）专员，对于抗日工作尚称努力。当范号召“八一东征”时，范的幼子范树民率领青年抗日挺进队进逼济南，韩曾配合作战。因此，韩多峰也不见容于沈，终被撤换，改以沈的内侄胡学仁（字宪之）继任。范为了抗战，曾进言沈鸿烈予以维持，但未被采纳。韩此时亦因范子阵亡（齐河之役，范树民遇敌，寡不敌众，壮烈牺牲），联系自己，互有同感。韩的奋勇代范，前往说服忠孝团，是有这些曲折原因的。

11月14日，忠孝团以刘清泉为首，突起暴乱。先在安乐镇东乡薛家庄一带，胁众迫从，烧杀抢掠，村村兼并；并置有铡刀一口，上覆红布，有不从者，用铡刀铡死，所以人人自危，不得不从。这天晚上，我正在安乐镇街，10里之外，即望见火光，街上顿显紧张。我们料到安乐镇是忠孝团攻占的目标，我家便是他们要杀的对象，因此当夜暂避于安乐镇南于家营。次日（农历九月二十四日）正值安乐镇大集，来往行人不绝于途，一如平常。我劝父暂留于家营，自己则亲往安乐镇街察看情况，集合父老们筹思对策。时近中午，我正在天和堂药铺和父老们谈话，忽闻枪声几响，来自南方。初以为区部试枪，正在奇怪，继而枪声大作，街上商号纷纷上板，集市人众也一哄散去。日寇飞机，适在此时盘旋空

中，轰隆作响，似为忠孝团助威。这时才知，忠孝团已从南门攻入，奔向区部，缴了区丁们的枪，占据第四职校作为大本营。我在群众哄散时，急奔东门偏南的围墙裂口走脱。忠孝团即开始搜查，我堂弟东生被捉去杀死。还有西街商人李姓等数人，也被惨害。

风暴之后，则有寂静。忠孝团非正规军队，占领安乐镇后，自以为了不起，也是他们的骄傲，而对镇内外的设岗放哨等等，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韩多峰恰在这天同几位随从由聊城来到镇上，即到区部给张秋行辕的廖安邦打电话。廖得知忙接电话，问韩几时到的，并说他也要到安乐镇来。

韩放下电话，转入区部，即遭团众若干人用标枪、快枪阻击。韩被击受伤。其中有人认识他，说他不是范筑先的人，韩才幸免于难。可见李树椿、廖安邦勾结忠孝团，企图杀害范筑先，显然是有预谋的。在忠孝团发动叛乱时，李树椿于11月13日匆匆去聊，力主范筑先守城，使反动分子王金祥借机逃脱。次日城破，范氏壮烈殉难。再证以廖安邦自张秋镇向聊城打的电话，可见李、廖合谋，分工害范，事极显然。

四、打不打忠孝团的一场辩论

忠孝团占领了安乐镇，聊城同时失守，范筑先将军殉国。在鲁西群众震悼之中，这一股反动恶势力，更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的狰狞面目。忠孝团头目刘清泉，此时更加疯狂，时时拿着杏黄旗，口口声声说是“打老范”。他们随即挥众进攻阳谷城。原因是阳谷县城的刘耀庭支队和县长刘子璋是

属于范的系统，而不是属于张秋行轅的，也就是说，是“范的人”而不是“沈的人”。

……阳谷县城的刘耀庭和刘子璋，人颇干练。当这几天忠孝团突起暴乱时，虽寡不敌众，仍坚守县城，构筑工事，储备粮秣，准备固守。特别在北门、东门配备得力战士，满持手榴弹，架上机关枪，等候刘清泉到来。这时的刘清泉疯狂到了极点，他披发持剑，领众直奔阳谷城下。城上守军一枪不发，刘清泉就叫人用刀劈砍城门。守军见时机已到，突以机枪向城下扫射，团众应声倒毙多人，守军接着又投掷手榴弹，恰巧把刘清泉也打死在城下。团众见首领击毙，有的逃走，阳谷守军随即敞开城门，乘胜追击，忠孝团大败散去。王金祥在范殉难之后，即被沈鸿烈、李树椿委为六区代理专员。这时他假名援助阳谷军警剿办忠孝团，乘机窃占了安乐镇，把司令部也设在第四职校。

我在忠孝团攻占安乐镇后，奔向西北乡，躲到聊城西南的靖堤口。3天后听到忠孝团攻城失败，王金祥进驻了安乐镇。这时王也捎信要我去见他，我以地方安危攸关，遂决定回镇。我曾在聊城任范的秘书兼《抗战日报》社长，又主持“经济设计委员会”事宜，因这些工作关系，和王算是同僚。他知道我虽和共产党接近，但系非党的所谓地方人士，不以为忤，又因我是安乐镇人，关于如何对待忠孝团的问题，认为有和我商量的必要，他至少要从我口气，试探地方人士的意见。我也估计王金祥虽是李树椿的党徒，但他既弄到了代专员，就要抓地盘，搞他自己的势力圈。况且范殉难之后，六区军民均要为范复仇，王鉴此舆情，对待倒范的忠孝团，就不可能和李树椿、廖安邦辈采取同样态度。忠孝团攻城虽

败，但大部退还东乡朱家庄一带，由刘清泉之弟刘清岚带领，继续顽抗。对王金祥来说，这也是不能并存的。我到了镇上与王谈了半夜，分析了地方情况，向他指出：“你不打忠孝团，忠孝团可要揍你呢！”王金祥只是微笑着听我说话，总不明白表示态度。临别时，他说：“明天开个会，代我约请父老们，大家来谈谈吧。”

第二天上午10点，我先一步到了王金祥的司令部。不多时，李树椿坐着汽车也到了安乐镇，土劣辈陈受之、李立如、李士修等，在后边紧跟着。大家落坐，李树椿对我仅点了点头，打了个照面，接着就指东划西，乱说了一通。地主劣绅代表陈受之，以有他们的厅长大人李树椿在场做后台，便开门见山，当众发表言论说：“忠孝团都是老百姓，不应剿，只应抚，不应打，也打不得！”两个国民党小官僚李立如、李士修，也你一言我一语为陈受之帮腔。李树椿笑着说：“阳谷县出这乱子，主席（指沈鸿烈）有德，我不敢说，有错是我的错。决不可再害地方，再杀百姓。”陈受之如此猖狂，惹起我的火来，我面对李树椿质问陈受之说：“受之，你说刘清泉、刘清岚是好百姓吗？烧杀抢掠，聚众叛乱，这是什么老百姓？”我又转过面对王金祥说：“瑞亭（王金祥字），陈受之给你打保票，忠孝团不再造反，你信吗？”陈受之一时答不上话来。我接着又压他一句：“安乐镇被烧了，我的弟弟也被杀了，忠孝团不再造反，我不信。谁给我保证，我把全家就搬到谁家住，你家大楼许我们住吗？”

我们在屋里激烈辩论，我父亲同镇上十几位老人正在屋外请愿，要候见李厅长，此时一拥而进。见了李树椿，十几位老人当众一齐向他跪下磕了个头，说：“请厅长保护，我

们安乐镇将来给厅长立碑挂匾。”这一下子使李树椿颇窘，他连声说：“主席有德，我有错，不敢不敢。”王金祥就此宣布散会。李树椿放下几条香烟，作为对王金祥部下的慰劳，午饭没吃，就匆匆坐上汽车回张秋而去。这场说理斗争到此结束。

王金祥究竟打不打，我还拿不准，东乡的忠孝团在刘清岚指挥之下，还是声言要打安乐镇。王金祥早已派出了侦察，他自有回报。第二天大清早，天刚发亮，王金祥率部东进，抵午在焦庄打上，击毙匪首焦东海、贺登岱，基本上稳住了安乐镇，王金祥即把队伍开走，另干他所要干的勾当去了。

五、攻打朱家庄，生擒刘清岚

范筑先将军殉难后，1939年初，鲁西地方一度为国民党反动派李树椿、廖安邦的鲁西行辕所控制。国民党大小头目，如李文斋、刘心沃、梁醒璜、熊纪明、刘培誉等，以范县为中心，推行他们的国民党统治。王金祥正式归顺了他们。沈、李、廖辈，十分快意，认为实现了他们从共产党手中“收复失地”的罪恶企图（注①）。但他们好景不长。日寇以聊城为据点，在鲁西开始大扫荡，侵占了阳谷县城，接着又把铁甲汽车开到安乐镇，出东门直驶我家住宅，放火烧了我家的房屋（注②）。李树椿、廖安邦看到日寇四出骚扰，难以存身，也就不战而去，放弃他们的行辕所在地张秋镇，逃奔鲁西南曹县，依附被八路军在冀南所击败的石友三军团去了。1940年初，石友三正式和日伪勾结，李树椿和石友三会见，表示“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李、廖辈得石友三的

庇护，六七月间又北渡黄河，回到鲁西濮县城南刘坑，重新开张他们的行辕，继续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

自1939年初起，鲁西抗战进入艰难阶段。阳谷的几位老党员王筱糊、申云浦、赵凤升、岳舜卿、宋金川（丽泉，即宋励华）、魏宗尧（则先）、申和生（怡之），还有我大哥申伯锦，在阳谷党工委领导下（申云浦、赵凤升先后任中共阳谷县工委会书记），积极奔走组织地方武装，拉起了谷山抗日游击队，坚持聊阳边区抗日工作。1939年冬，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东进聊阳一带。这是一支勇敢善战的劲旅，浩浩荡荡，驰骋于鲁西大平原，累次捕捉敌人，不断给日寇以重大打击，鼓舞了鲁西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但阳谷反动的忠孝团由刘清岚率领，盘据朱家庄一带，仍然与李树椿等反动派相结合，并勾结石友三叛军，破坏抗战。这时在党的领导下，已成立了抗日的阳谷县政府，推齐南峰（注③）为县长。忠孝团总是破坏我们的工作，成了抗日政府的一个绊脚石。党又正在筹建鲁西抗日行政公署，而顽军石友三军团却要向共产党所开展的抗战地区“收复失地”。由李树椿向石友三要来其部下陈庆元做阳谷县长，与我们的抗日县政府作对。他们利用忠孝团，杀害了共产党员李鸿甲等7名同志，还包围我们驻在焦庄的四区区部，除区长王子恒走脱外，其余工作人员均被活埋。为向群众揭穿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我们一面抗敌，一面讨叛。我们的县长齐南峰和石友三的县长陈庆元靠着住，陈庆元躲到那里，我们也进驻到那里，敌伪来了就打。这样陈庆元有些害怕，随后他就弃职逃走。我们的县政府在群众中威信逐步提高。1940年初，以肖华、杨勇为首的八路军一部东进鲁西，开创抗日根据地，对潜居在鲁西南的

石友三顽军继续讨伐，阳谷成为讨顽的后方。

刘清岚这股反动的忠孝团，更有剿除的必要。刘清岚盘据的朱家庄有一大地主李守正，是个前清秀才。这个人很会剥削，据说他起初教书，还代人拟试卷、作文章，俗称“枪手”（又称“卖才”或“卖秀才”）（注④）。他卖了钱，又以高利贷放出，积累了财产，占田几十顷，做了这一方的大地主。但就怕兵匪，便自己绘制设计，起造了一处不小的大寨院子。这个寨子，周围砖石砌墙，院内是楼套楼、院套院，且多夹道，一旦外人攻进，莫辨出入，就有被消灭的可能。李守正早在清末死去，他的子孙几个支系继承下来，仍是老样子。几十年来，是个所谓“家道不衰”的大地主，也是阳谷出名的封建顽固堡垒。

1939年冬，肖永智政委曾率八路军一二九师先纵一部，不费一枪一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策略进驻了朱家庄。刘清岚及李姓地主措手不及，难以抵抗，不得已对八路军改拒为迎。刘清岚表示了态度，伪作顺服。八路军为扩大抗战力量，对刘也加以争取。那时，我和大哥伯锦为了访问肖永智政委，第一次到朱家庄，借机参观了李家寨子，真是碉堡森严，确非虚传。此后，八路军准备讨伐石友三顽军，刘清岚复又叛变投敌。八路军于是决心要拔掉这个反动的地主堡垒。但要攻破它也不是容易的。在黄河南七八十里外有顽军石友三部，而阳谷城内也驻有日寇，安乐镇又为忠孝团同伙赵二虎的伪军所据，近在咫尺，一两个小时就可到达朱家庄。在八路军方面，利在速战速决，但李姓这个寨子，碉堡坚固，未必一攻即下，稍有推迟，难免生变。

我久经战阵的八路军，一向贯彻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在

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不轻视敌人，运用以一当十、以十对一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攻打朱家庄战斗中，针对这个坚固的堡垒围寨，配以相当的优势兵力。1940年春，杨勇司令员派何德全参谋长指挥，加上炮兵为攻坚准备。参加战斗的部队，以彭雄的黄河支队为主，另有张维翰的筑先纵队二营，徐翼率领的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第四大队，及岳舜卿率领的谷山抗日游击队配合，共约两千多人。

3月中旬战斗开始，一方面波浪式攻击，一方面在寨外一二里许挖掘地道，直达寨墙根下，等攻逼寨下，架起云梯连番爬墙。攻战竟日，而未能攻入。当时，我在15里外的杨庄，但闻枪炮声响，迄晚未得捷报。攻破朱家庄虽不成问题，但阳谷县城和安乐镇的日伪如乘机而来，不无可虑。打了三四天，虽有进展，仍未攻入，我当时颇为焦急。到了第五天，继续进攻。我军找到几辆旧马车，上覆帆布，里面衬上水湿的破棉被，战士们蹲在车内，用手榴弹向寨内掷击，拥到墙根，一些战士又用硬木旧桌覆上水湿破棉被作为防护，冒着砖石炮火，挖掘墙根，凿透几处墙洞。这时机枪密集扫射，手榴弹齐发，战士们一拥而进，攻入寨内。刘匪凭借楼院及窄狭的夹道继续顽抗。经逐院逐楼、各条夹道巷战多时，才将寨子完全占领。400余敌人全被消灭，刘清岚被生擒。为了不使这个碉堡寨子再被敌伪用作据点，当即把它毁平。在采取这个措施以前，曾开仓放粮，中小农户及无食贫民，扶老携幼，各有所得，远近欢跃，人人称快。

我和齐南峰县长得报，异常兴奋。齐县长应群众建议，转请何老参谋长把刘清岚交付群众处决，但未被采纳，反而把刘清岚释放了。这件事情许多同志想不通，更为地方父老

所不解，以为刘清岚作了许多孽，我们攻打朱家庄又付了这么多的代价，真是宽大无边了。不过半年，刘清岚又投向济南敌伪，做了汉奸。可是，忠孝团却从此消灭。

注① 范殉国后，李、廖曾电报当时在鲁南的沈鸿烈，沈复电有“幸正！幸正！”之语。

注② 我家住安乐镇东门外里许之申刘庄，有一后院，环植杨榆，地甚幽静，地下党员同志常密议于此。竟为日寇所知，认为是八路军县政府，焚以泄忿。

注③ 齐南峰，冠县人，时年20多岁。后调任朝城县长，在一次作战时牺牲。为纪念他，朝城县曾改名为“南峰县”。

注④ 枪手，亦称枪替手，指科举考试时冒名顶替进场，专门替别人作文章和答题的人。

本文作者 申仲铭，原名兰生，1906年生，阳谷县安乐镇人。曾留学日本大学社会学科。1927年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期，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国共分裂后回乡，在党组织领导下参加组织发动坡里农民暴动。抗战开始后，追随范筑先在鲁西北创办《抗战日报》，任社长。建国后在北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机关工作，1986年6月去世。

（原载1982年11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四辑，收入中华书局1984年5月出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民国会门武装》一书）

日寇在阳谷罪行录

政协文史组整理

1938年4月4日(农历三月初四)，日寇百余路经子路堤，发现村里有红缨枪，便蛮横地把群众赶出，把枪刀收起来捆在一起，强行把该村自卫团和枪刀一起带走。刚到村南头，臧佃信、臧景文等乘敌人不备，抽出枪刀来猛向敌人刺砍，肉搏激战约1时许，当场刺死日军10余人。后敌人开来铁甲车增援。在敌人猛烈火力下，臧佃信等23人壮烈牺牲。

1939年1月25日，范筑先抗日二支队（高团）驻薛寨，给群众演剧进行军民联欢。日寇乘机进犯，遭到激烈抵抗，日军死伤多名（其中军官1名）。部队转移后，日寇占了薛寨，烧毁房屋400余间，杀害群众10余名，伤2名。

1939年3月，日寇从莘县出发向阳谷一带扫荡，走到胡马庄，强迫农民张景海、孟宪忠带路到安乐镇。走到三岔路口时，张、孟把日军引向了岔道，还没来得及找人给安乐镇送信，不幸被其发觉，敌人用刺刀将二人挑死。

1939年3月22日（农历二月二）日寇由聊城、东阿等地出发侵犯阿城。当时驻防阿城的二十九军冯寿彭部死伤百余人，群众被杀112人，房屋被烧千余间。

1939年农历二月二，日寇在阿城大屠杀之后，乘机进犯寿张，打死打伤阻击日寇的区队和保安队12名，杀害我无辜

群众岳修林、吴景福等多人，并将从阿城带来的17名冯军俘虏全部刺死。

1939年农历三月，日寇二次进占寿张城。农历五月十九日，日寇第三次进占寿张城并长驻下来。日寇这两次进城，照例烧杀抢掠，闹得乌烟瘴气。占驻寿张的日军，还经常下乡骚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甚至将妇女轮奸后杀死取乐，灭绝人性。

1939年农历六月，日寇300多人由细木中队长率领，又一次从莘县向阳谷扫荡，并占据了阳谷城。驻阳谷日寇向城东龙虎寨、华陀庙一带骚扰，敌人把全村男女老少集合到场里，威逼着交出我革命干部和共产党员。当场挑死农民梁登月、刘佃作、教师钟本成等7人。

1939年农历八月初四下午，日寇在安乐镇周围大扫荡，晚上住在西李楼、郭庄、赵庄等村，到处抓人抢东西，奸淫妇女。对逮捕的群众拷打审问，逼着说出八路军在哪里。李梅田被炮弹炸死，李中华被机枪射死。共抓群众42人，杀死5人，牵走马87匹，烧毁房屋34间。附近村里群众都逃往古城屯东南赵王河滩躲避，李玉亮妻分娩三天也跑出去，因受风寒惊吓得病，小孩受风死掉。第二天天还没亮，青年农民李西方、郭小方回村打探消息，被日军抓住，日军说他俩是八路军侦探，用刺刀刺死。

1939年8月，日伪在郭店屯安上据点，住日军三五人或10余人监督，并经常带领伪区队下乡扫荡。1940年2月在黄庄抓人打人，严刑审问打死农民徐俊民。又一次在后梨园住了一夜，抢走群众财物，将一没逃走的女盲人打死。

1941年1月20日，日军500人、伪军1500余人由聊城出发围

攻大杨庄，用刺刀挑死杨学正、杨学敏、杨庆保、杨建化、杨庆起5人，烧毁房屋200间，财物损失甚多。走时，又从阿城带走30余人，家属花了1千多元才将人赎回来。

1941年农历四月初七，日寇和汉奸特务连在寿张城西门外把逮捕的我4个同胞绑在4根柱子上，作为练刺杀的靶子。4个日本兵各持刺刀，站在10丈多远处一条线上，听到口令猛窜上前，“嘿嘿”两声，明晃晃的刺刀刺入我同胞胸膛，然后把刺刀再插在水桶内涮去鲜血，这样反复轮刺，直到我同胞死去。

1941年10月，日寇百余人由济南经东阿来阿城一带扫荡，赵二虎带汉奸队随同。下午到达朱楼，把衣服财物抢光，鸡鸭猪羊等连吃加糟踏都给毁掉，缸盆家什砸个粉碎，轮奸没跑掉的妇女，还扇在锅里，烧得四处冒起黑烟。

1942年6月16日，日伪千余人扫荡大杨庄，抢去耕牛50余头，大车6辆，粮食5千余斤，并带走56人，后来花了1万余元才赎回。

1942年7月12日，日寇由济南出动，加伪军共700人扫荡大杨庄，杀2人（井福代、杨庭掌），挑死1人，伤1人（郑保甫），烧毁房屋6间，带走10余人。

1942年7月17日夜1时，东阿、阿城、阳谷日寇约200余人和剿共班一起包围大杨庄，周云章全家被打，内人受伤，周被捕去，我情报员杨明亮被日犬咬死在七级东门外。

1942年“八·二三”大扫荡，日寇搞“铁壁合围”，四面压缩。十五里园未跑得及的张乐文被敌人用枪壳子砸得不能动，他的黑毛驴也被牵走。张圣伦酒铺的酒被喝光，纸烟拿去，还被痛打一顿，八九岁的孩子张君珍吓得哭起来，

也挨了一巴掌。张君×跑到东洼地里，被追上挨了一刺刀。在王堤口南金堤上，敌人抓住王传信，用刀杀死。刘海刘宗贵在村前藏粮食收包被一枪打死，20多岁的贾小头被用刺刀挑死，50多岁的贾德福藏在院中夹道里被翻出来，打得头破血流。白区长因掩护群众逃避，自己没来得及躲藏，被抓往用刺刀刺死。被抢去东西，宰杀鸡鸭牛羊猪无数。日寇还在锅里拉屎，在水缸里撒尿。

1942年“九·二七”（农历八月十八）大扫荡，日寇向我根据地全面合围。在张秋地区钱楼、窟窿石、桑段营一带，日寇对手无寸铁的群众用机枪扫射，打死打伤40多人。在堤南的顾庄、金庄一带用机枪打死打伤群众60多人，敌人还用汽车载走几百人。在朱庄、东邵庄一带用机枪扫射，死伤群众70多人。在寿张地区玉皇岭和苗口大洼，不少群众也死在日寇刺刀、机枪之下和烈火之中。在旧城，日寇把群众赶到猪圈里、土坑里，除了实行屠杀之外，还把青壮年用汽车运走去做苦工。

1942年“九·二七”大扫荡，合围圈压缩到阎楼一带时，古柳树、张楼据点的汉奸出来接应。双庙苏4个青年农民来不及跑，藏到车屋里，被日军堵住用机枪射死。王中穿一身紫花衣裳，被抓住后硬说他是八路军，后用汽车载到聊城严刑拷问，活埋了。关庄杜金钱在地里做活，日军抓着就摔跤，摔不过他就用刺刀挑了。温碾村霍兆平、霍兆雷、朱佃彭等5人也被枪杀。粮食、家具、大车都被集中起来烧毁，翻箱倒柜，抢走细软衣物，家畜家禽一扫光，连几斤的小猪都给吃了。

1943年正月初四，日寇汉奸24辆汽车扫荡毛坊，吃、拿、烧，厨在锅里、面缸里，连棒槌也给抢走了。又一年8

月，日寇汉奸闯进毛坊，挑死了王怀如，吓死王文田，抢走14头牛，走时还放了一把火。

1943年10月12日，日寇纠集聊城、东阿、阳谷、寿张、莘县及济南一部分兵力，进行最后一次大扫荡。在聊阳阿边区大杨、小冯一带包围了阳谷县抗日政府和基干大队，将我军政人员和群众80余人，用铁丝穿透胳膊，装汽车载到济南埋了。专署民政科长吴亚乌、县委宣传部长张冠军被枪杀在小冯附近沙滩上。群众死亡53人。这次扫荡，敌人采用合围、蚕食、清乡等毒辣手段，从“准治安区”（游击区）开始，慢慢向我根据地压缩。在寿张一带，到了距寿张城8里的赵升白就开始抓人、抢东西；在岳楼、西鲁强奸幼女1人、妇女3人，把3个老乡毒打之后，栽到水缸里饮足水，又用皮鞭打，用皮鞋反复践踏，弄得死去活来。敌人到了裴城寺北边朱那里附近，受到我军阻击。我军转移后，敌人便向群众进行报复。从朱那里到曹岭10华里的路上，就杀死烧死10余人。这次敌人扫荡，群众死伤近百人。

1943年一天，日军骑马在阳谷东关把1个孩子的头踏烂。驻周庄日军拿活人当靶子，把1个老大爷的头打烂，他们却狞笑起来。

1944年一天，日军汽车在阳谷街上横冲直撞，轧死1个老人，连车也不停就飞驶而过。

据以上材料不完全统计，日寇在阳谷烧杀抢掠20多起，即杀害我同胞五六百人，烧毁房屋、抢劫财物无法计算，对阳谷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

（原载1982年8月《阳谷文史资料》第三辑）

日寇在阳谷的暴行三例

政协文史组整理

日寇在阿城的大屠杀

1939年农历二月二，日寇千余和两千多伪军，分3路向阿城进犯。一路由聊城经阳谷到阿城；一路由聊城经七级、刘集、吕营到阿城；一路由东阿出发到阿城。把阿城从西、北、东三面包围，只留南面一个口。

当时在阿城驻防的，是原国民党二十九军第四旅冯寿彭（外号冯二皮）的队伍。冯军除留一部抵抗外，其余人员南逃。日军进村后，见人就杀，半天时间，阿城街上就到处是血泊和尸体了。除冯军死伤百余人外，群众有112人被杀。不少户全家遭惨杀，如北镇齐云路父子8人全被杀死，杜广平父子2人、司佃玉兄弟2人也一块惨死，朱常德全家6口人，即有祖父孙3人被害。更惨的是刘集一个姓杨的雇工，被迫给日军带路，到阿城时几个日军被冯军打死，日军便拿他出气，把他绑到树上，一刀一刀地活剥了。

日军还放火烧毁民房1千余间，财物被抢被毁的无法统计。街上的尸体，3天后才有人掩埋。

日寇3次侵占寿张的暴行

1939年农历二月二，日寇从聊城出发，沿着运河南侵。在阿城大屠杀之后，乘机进犯张秋，并顺金堤向西进犯寿张。国民党县长冯谦光闻讯逃跑，受进步思想影响的区队及第一保安中队，为掩护群众撤退，阻击日军。日寇炮火猛烈，区队和保安中队死伤12人，最后也撤退了。敌人进至东大堤和南大堤，把手无寸铁的群众赶至南大堤上，命令全跪下，把机枪架在群众头上向城内扫射，吓唬群众。敌人进城后更大肆残杀。路过城东北角许堤，日寇用刺刀活剥了许昌贵的大儿媳妇、三儿媳妇（李春风）和孙女（庆仙）；在北台打死了67岁的岳修林；在东关杀死了陈二黄病；在城内吴家街杀死了卖馍的吴景福；给日军打了一夜水的孟昭之仍被杀死；东官路给日军带路的岳存新，也被拉下汽车用枪打死。日军还把从阿城带来的冯寿彭部队的17名俘虏，全部刺死在书院门前，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日寇进城烧杀抢掠了一阵，次日清晨撤走了。

同年农历三月，日寇第二次进犯寿张城。进城后，大肆烧杀抢掠，到处拉屎撒尿，锅碗盆砸得粉碎，见书报家具都一火焚之，将城内闹得天翻地覆，乌烟瘴气。这次进城也没住下，又随即撤走了。

农历五月十九日，日寇第三次侵占寿张城。日军秋山司令率领日伪数千人，以机枪、大炮开路，气势汹汹地进入寿张城内。照例烧杀抢掠一阵之后，便留酒井司令带300多日军和一部分伪军长期驻守，其余大队向梁山进犯。占驻寿张的日军经常下乡骚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有一次，一群

日寇在王楼村把一头小牛绑在树上，用洋刀把头割下，每人刮下一块肉在大火上燎着吃。更灭绝人性的是，将妇女轮奸后再杀死取乐。

日寇3次侵占寿张城，给寿张人民带来了3次浩劫，损失之大，是无法估量的。

日寇在“九·二七”大扫荡中的暴行

1942年“九·二七”（农历八月十八日）日寇大扫荡，出动精锐部队数万人，分几路对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全面展开了残酷的“铁壁合围”、“梳篦清剿”。日寇从阳谷、寿张、安乐镇、阿城、东阿、范县、观城、濮县、东平、梁山等地同时出发，向阿城、张秋一带（寿、阳、阿小边区）合围。陶城铺、窦营、张秋、曹堤口等一带金堤沿线满是敌人，汽车、飞机、大炮、机枪各种声音响成一片。阳谷基干大队和张秋独立营都突出重围。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被赶的群众越来越多，在钱楼、窟窿石、桑段营中间地带，日寇对手无寸铁的群众用机枪扫射，打死打伤40多人。向堤南合围的日寇，在顾庄、金庄一带又用机枪扫射，死伤群众60多人。敌人还用汽车载走群众好几百人。天黑时，敌人又在朱庄、东邵庄东南茭草地里，用机枪扫射，死伤群众70多人。

在寿张一带，敌人分西、南两路向西南散开了包围圈。每隔几十米设一组日伪军，漫野太阳旗，遍地日伪军，或端着刺刀，或举着洋刀，战马嘶嘶，大炮隆隆，天上还有飞机，杀气腾腾，把广大群众向西南压缩。在玉皇岭，日寇把抓到的群众赶到一个园子里，命令他们全跪下，用机枪“看

着”。几个青年农民被剥光衣服，四肢绑起，仰面吊在树上，下面生起大火，烧燎得满背流油，其状惨不忍睹。这时群众一哄而起，向四处逃奔，不少人死于敌人刺刀下和烈火中。在城西南苗口大洼，日寇赶上了一群逃难的群众，用作战一样的行动，对群众用机枪扫射，光少年儿童死的就一片连一片。圈子越缩越小，日寇将群众赶到旧城一带，把人一队一队地排起来，把逃难的群众赶到猪圈里、土坑里，强迫睡倒，谁动一下，就是一刺刀，用皮鞭打，皮鞋踢。又拉出四五个青壮年当场用刺刀穿死，借以威吓群众。就这样群众被赶了两天两夜，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以后，青壮年被日寇运走去做苦工。

（原载1982年8月《阳谷文史资料》第三辑）

阿城惨案追忆

陈 赞 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大批部队节节败退，纷纷南逃。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率领第三路军一枪未发，早跑得无影无踪。只有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老将军，在共产党帮助下，拒绝了韩复榘的南逃命令，在聊城地区树起了抗日大旗。1938年4月，国民党新任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从东阿（今东阿镇）跑到阿城镇（当年秋初，蒋介石用飞机给沈鸿烈送过大批纸钞，当时沈鸿烈在阿城），以正统名义惑众，借抗日之名，招募部分青少年成立了教导一、二团和山东省第一巡回宣传队。其目的是在敌后监视、阻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行动。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守，范筑先将军殉国。沈鸿烈从阿城逃到张秋，以委任当时的杂牌军司令冯寿彭当专员为名，调冯部来阿城镇驻防，作为沈鸿烈驻地张秋与聊城之间的屏障。

冯寿彭系山东省清平县人，当年30多岁，绿林出身。因为他的队伍所到之处骚扰百姓，有土匪性质，所以群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冯二皮脸”。冯寿彭第一次来阿城时，人马不过200，枪支百余。1938年冬，冯被沈鸿烈委任专员时，号称山东省行营旅长，人员增至二三千人，编为十团、十一团、十二团、十三团4个团（实为4个营的兵力）。每连

配有机枪二三挺，还有迫击炮、掷弹筒等。冯来阿城后，司令部设在海会寺南周永典家，冯部警卫连驻司令部周围，余者驻北门及四街。阿城周围都挖有工事（战壕），并设操场。各要道口设岗哨，架机枪，严阵以待。当时阿城有北门、西门、东门3个城门。北门有大木门，门楼上有文昌神像，门前有座20米长的大石桥，两旁有残缺的旧城墙和护城壕。北门以外约百米，有条横贯东西的大葫芦沟，围住北门北面。东西两面只有门洞，无有木门。紧靠西门有南北运河，好似护城河，河岸上还有一段高堤。阿城北镇还有通往临清、聊城、济南的大官道，向西南有通往阳谷的大道。所以阿城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冯军官兵多吸毒品（海洛因），所以不断敲诈百姓。但当时冯军还算有些民族气节，对日作战还英勇。日军为了逼他投降，先以武力攻打，然后乘机诱降（后冯寿彭率部投降日本，当了长清县伪县长）。1939年古历正月初，日寇在老东阿阴柳棵、龟山一带佯作过黄河来犯冯部。冯上当，便将3个团调至阴柳棵一带阻击。阿城镇只留一个十团和冯的司令部、警卫连及部分后勤人员。二月初一那天，有一马戏团来冯司令部门前大场里演出，冯命驻阿城所有官兵全副武装出来观看。那知这个马戏团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冯部驻阿城的兵力和部署情况全被侦察了去。第二天（二月初二），日寇便从聊城、阳谷等地，调集日伪军约1500多人，开着汽车，携带大小炮、轻重机枪，还从济南调来一架轰炸机，于黎明时将阿城镇东、西、北三面包围。冯部毫无准备，士兵们正出操喊一二三四。东方刚冒红头，我从家里走到学校，听到四周响起零星的枪声，都以为是二月二群众

围困放鞭炮。不一会，大炮、机枪声响成一片，才知是鬼子来了。学校放学，马上各自回家。我家（东义和村）正处北面前线第一防线，炮弹不断落到我家房子左右，子弹有的落在房顶上，有的呼啸而过，飞机错房檐低旋，响声刺耳；机关枪不断扫射住宅的前后。冯部官兵在街上来回跑动。战斗打响以后，冯寿彭在警卫连保护下，携带家眷（据说冯的老婆是个马戏团演员，在马上能使两把匣枪）从阿城镇南街逃跑到张秋三里庄一带，其他非战斗人员也先后随冯逃跑，只剩下驻阿城十团3个连的兵力坚持战斗。

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是阿城北门内外，其次是西门外运河套、小田庄，东门外的王家林。阿城西门、北门、东门共约2里长，打得最激烈、残酷，双方伤亡都很大。北门外、韩家林、程家院子和东义和村，这几处都有冯军战前挖好的工事，是正面战线的中心。战斗一开始，冯军连长就光着脊梁指挥战斗，凭借工事和东西葫芦沟，打得鬼子不能靠近。鬼子每次冲锋都被打退，伤亡严重。后来鬼子用飞机轮番轰炸、扫射，地面冲锋的鬼子又使用空炸炮弹，冯军伤亡很大，只得退守北门，凭借北门城楼，居高临下，阻击敌人。后来冯军士兵又和攻上来的鬼子在北门里展开白刃搏斗，来回数次冲杀，争夺北门。这时，该连只剩下1个班的兵力，寡不敌众，退至北门里路东朱家院里，俯卧房顶继续战斗，使日寇不能前进。最后，残暴的敌人使用燃烧弹，将朱家大院的房子打着，把十几名战士活活烧死，才结束战斗。西门外运河套也是1个连防守。据说这个连长叫马振国，在运河堤上指挥战斗，与士兵一起同鬼子拼杀。后来这个马连长多处受伤，打成血人，仍不下战场，被几个士兵强拉硬架退到岳

庄。其余未战死的20名左右士兵，被迫退守杨家大院，同样被鬼子用燃烧弹全部烧死。东门外的王家林战斗，冯军也是1个连，连长姓张，官兵与占绝对优势的日军英勇拼杀，结果全部牺牲。战斗到太阳东南偏晌午，全镇被日寇攻陷。由于冯军顽强抵抗，日军伤亡也很大，用汽车拉死尸。

日伪军占据村镇后，这群野兽对我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和蹂躏。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青少年，只要当时没有躲藏好或未跑出者，无一幸存。如北门外东义和村（又叫小脚庄），当时不过七八户人家，就被鬼子用刺刀挑死11人。我大哥被鬼子当靶子用刺刀穿刺了十几个洞，最后又从后脊梁搅了个大窟窿，倒在血泊里；二哥被鬼子挑死。我幸而跑出。还有1个青年也被鬼子当靶子刺死。贫农刘佃忠，早晨上街卖豆腐，遇上战斗藏在北门桥下，被鬼子用刺刀从他嘴里捅进，将头部搅烂。若不是刘身上有记号，连自己亲人也认不出来是谁。北门里朱学智家的房子被战火烧掉，其兄弟朱学礼祖孙三代（祖父朱长法70岁，父亲朱金海50岁）藏在地瓜窖里，全被鬼子用毒气熏上来又用刺刀劈死。杜清溪、曹登云被鬼子剖腹后挑出肠子。有的人给前面的鬼子磕头，后边的鬼子就用刺刀从肛门里刺进，如薛氏、徐氏等，其惨状目不忍睹，令人发指。据不完全统计，我镇被鬼子屠杀212人，死而复生者10人（其中妇女数人）。冯寿彭的3个连270人，几乎全部战死。北门里外牺牲的士兵和被屠杀的群众最多最集中，真是横尸成堆，血流遍地。

在日寇残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时，还出现一位白手夺枪的英雄人物。他叫李法山，当年28岁，身材魁梧高大，练有一身武术。一个鬼子闯进他家行凶，刚要用刺刀捅他，李法山

把身子一闪，伸手把鬼子的枪抓着，飞起一脚把鬼子踢倒在地，把鬼子的钢枪夺过来，吓得这个鬼子没命地嚎叫。正当李法山要打发这小子上西天之际，从门外跑来的鬼子趁李不备，一枪把李打倒。在凶恶残暴的敌人面前，一个普通的农民，敢于赤手空拳夺解枪支，是很了不起的。

当天午后，日寇南去。群众唯恐鬼子再回来杀人，顾不得收尸，纷纷扶老携幼逃往乡下，多日不敢回家。真是路上横尸无人问，家中亲人无人埋。（当时沈鸿烈在阿城统治很严，我党处于保密阶段，还未建政权。）好几天后，冯部才派人来阿城配合地方（当地负责的叫地方）和古河里的张保龙（此人是办行户的经纪人，成天在阿城镇集市上），又雇了几个穷人，才将阵亡的官兵全部埋葬在西会馆西边一片空地里（也叫西高堤）。被鬼子残杀的群众尸体，幸存者已无力埋葬，只好靠外村（街）或亲友前来收殓。还有的好几天找不到尸体的下落。如刘金文背着母亲（瞎子）外逃，被鬼子用刺刀挑死在北门外家庙后边狼窝里，这是平时无人去的地方，找了好多天才将尸体找到。这次惨案使阿城镇家家穿孝，户户白服，哭天叫地，日夜不止。仅北门内外统计，即死绝10户，无法生活被迫下关东的9户，改嫁的5人。

北门外路东，东义和村不过七八户人家，被害的有：陈廷元、陈廷举兄弟2人，杜广平、杜清溪父子俩，刘金文、刘佃明、郎凤祥（绝户）、王尿（绝户）、曹登云（绝户）、刘佃忠和1个住在他家的亲戚，共11人。

北门外路西小杠庄被杀者有：齐云路、齐学成、齐小六父子3人和齐化云（绝户）、曹登明、程广兴、程魁廷，共7人。

北门里死者有：朱长法、朱金海、朱学礼祖孙8人，肖凤鸣、杜广善（绝户）、张金诚、杜清源、贺兆庆（绝户）、李法山、徐愁二、崔衍祥、贺大广、王振吉，芦金元、芦振祥父子俩（已绝户），勾佃玉、勾佃举兄弟2人，李佃英、杨守法（绝户），解少田、解腾龙父子俩（已绝），刘金平、杨学武，共23人。

西门被杀者有：杨庆文、杨慎行父子俩，傅兆才、傅希同父子俩，李瑞祥、邢怀清、郭景壹、张学珠、程守魁、薛鸿（绝户）、李福武、徐氏（女）、薛氏（女）、陈保民、刘成甲、陈井昌、魏翊才（回民），共17人。

东门被杀者有：解思同、王学礼、刘纪红、刘华斌、徐汉文，共5人。

北门外林庄被害者有：林丙然、林士其、林刘随3人。其余被害者现已写不出名字。

（原载1986年10月《阳谷党史资料》第八期）

我所目睹的阿城二月二惨案

时 效 民

农历二月初二，农村传说是龙抬头的日子。这天，家家户户都起得很早，为了盼望一年丰收，都到自己的场院“围囤”，即用草木灰撒一个圆圈，再在圈的中心挖一个小坑，放些麦粒、玉米、谷子或豆类，然后用土埋上，象征着当年大丰收的意思。这些都必须在日出以前搞完。

1939年农历二月初二，鸡叫2遍约凌晨4点我们全家就起来了。我家在阿城镇西3里的王家庄。我和老人正在紧张地干活，忽然看见一队日本兵从西边向我们走来，其中几个兵正鞭打脚踢姓汪的邻居。汪是个精神病患者，经常在拂晓前大喊大叫，日本兵可能认为他是给驻阿城的部队发信号。我和父亲从远处看到他被打时惨叫的情景，立刻吓得藏了起来，躲在一个破房子里，还不时地偷看这队日本兵想干什么。只见他们分成三三两两，到各家农户去抢东西。忽然从村东边响了一枪，紧接着又是一阵“哒哒哒”的冲锋枪声。日军顾不得在各家纠缠，急匆匆地跑了出来准备战斗。我趴在村东一个壕沟里，亲眼看到驻阿城的部队和日军厮杀的情形。开始日本兵很傲慢，指挥员举着指挥刀，士兵端着枪，挺着胸脯向前冲，但遭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后，也趴在那里利用地形地物掩蔽着。日本兵使用的武器是三八大盖、歪把

机枪、小掷弹筒，没有大炮。我看到日本军队向前冲了几次，都没有突破阿城驻军的防线。一直打到太阳出来1丈多高，约9点左右，忽然来了一架飞机，“嘟嘟嘟”地进行低空扫射。我是第一次见飞机，开始很害怕。但飞机转了几圈，又没在我上空射击，也就不大害怕了。可能阿城守军缺乏防空经验，日本兵很快就冲了上去。日军冲进去后，我虽然看不见了，但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有时还伴随着小孩的哭叫声，听得清清楚楚。大概持续了吃两顿饭的功夫，就听不见枪声了，只见有的地方浓烟滚滚，是日本人在烧房子。事后得知，阿城守军被日本兵四处包围，寡不敌众，往东南方向突围，日军也往东南方向追击去了。驻阿城的中国军队是冯寿彭部，老乡称冯寿彭为冯二皮。据说前两天他们在东阿鱼山和日军打了一场交手仗，日本兵还吃了他们大刀的呢。

日军虽然在阿城停的时间不长，但烧杀奸淫，无恶不作。阿城镇是一个大镇，是水陆交通要道，有近千户人家。日军攻入后，见大人孩子都杀。过后我也想到镇上去看看，老人怕我见了尸体害怕，晚上睡不着觉，没让我去。听从镇上回来的人说，大街小巷、院落都有尸体。有的一家5口被杀死在一个炕上，有的被捆在树上杀死。日寇杀人除了个别是用枪射击外，大部分都是用刺刀捅死的。有几个年轻妇女被强奸后，又被用刺刀捅小腹致死。连吃奶的小孩也未幸免。有的尸体还被肢解，挂在树上。其惨状真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被烧的房子那就更多了，大的店铺，好的院落，和尚住的庙宇，几乎都被烧过。日寇在阿城大屠杀，究竟多少人受难，烧了多少房屋，当时说法不一。有的说被杀的有一

二百，有的说三四百，还有的说5百也不止。那时兵荒马乱，无人统计。我们只知道死了很多人，附近几十里地的棺材不够用；只知道邻近亲属都到那里协助掩埋尸体，重整家园。

日寇在阿城的罪行，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激发了我抗日的爱国热情。第二年我参加了八路军，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本文作者 时救民，1923年生，阳谷县阿城镇王庄人。1939年10月参加阳谷抗日游击大队，1940年入党，一直随部队转战南北。解放后在通信兵部队工作，1966年转业。1983年底离休。离休前任电子工业部西北电子器材公司（在陕西省西安市）党委副书记。

（原载1988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我在西安事变中参加捉蒋的一段经历

郭庆林

1936年夏天，我在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的卫队二营七连六班当二级兵卫士，住西安东城门楼上。我们营的卫士都是军士，三级兵是下士，二级兵是中士，一级兵是上士。每一个卫士都有连环保，即尉官3个，校官1个，将官1个。我们的任务是专为保卫张学良将军安全的，是张学良将军的子弟兵，唯有我们卫队二营是这样。我们的营长先是周文章，1936年秋换为孙铭九。孙营长到任不久，营部就发下一张表，卫士每人一张，班长在内，官长没有。表上有两个空白格，各有一句问话，第一格上问“国家可救吗”，第二格上问“用什么方法救”。我在第一格上填的是：国家可救，马上就得救，救晚了就要当亡国奴。第二格我填的是：立即停止内战，联合各党派共同对日宣战。没过几天，全营共选了18个卫士集中到营部学习，我是第一个被营部指导员喊去个别谈话的。当时主持谈话的人有汪乃平，还有一位杨指导员，夸我表填得很好，并给我指出：我们对日是抗战，不是宣战，因为宣战要在规定时间内打败敌国，否则就得算战败国，抗战是没有时间上的限制的。从那以后，我才了解宣战与抗战的不同。谈完话后，我们开始学习，由杨指导员及汪乃平作报告，又领导我们讨论。学习内容：蒋中央“攘外必

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抗日8个月亡国、不抗可以不亡的亡国论，还有唯武器论等等。学习地点在西安东城门楼东南城墙角上边。参加学习的卫士有王义和、张义臣、唐智明、张权、袁澄、李洪志、王得胜、郭庆林等。经过一个时期学习，结业回连，后即成立连政治部，当时叫俱乐部，实际上就是地下政治部。俱乐部设管理员（即政治指导员）1人，助理员（政治助理员）2人。在开成立大会时，我当选为大会主席，成立后我当选为助理员，还有一个助理员是唐智明。不过时间很短，西安事变后即改为政治部。当时我连政治指导员是张化东。

1936年秋，张学良将军为培养抗日干部，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连级以上的干部轮流去受训，灌输非联共抗日不能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思想。8月底，蒋特所控制的陕西省党部，逮捕了张副司令的参谋、秘书、机要室人员关思润、马绍周、宋黎、孙达生、刘澜波5位中共地下党人。营长孙铭九汇报给张副司令，张立即打电话给陕西省党部，要他们立即放回被捕人员，省党部回答不放。张学良将军又派参谋副官去交涉，仍是不放。张副司令亲笔写信，命令陕西省党部立即放回被捕人员。省党部不但不放，并要连夜送往南京，回答说非有蒋委员长的亲笔手令才放，张副司令的命令不管用。张学良将军勃然大怒，立即派孙铭九营长带卫队营，包围省党部，抢回我部先后被捕人员，并抄出许多有关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一些重要机密文件。从此，蒋张之间矛盾开始恶化。王曲军官训练团共4期，前两期教育长是王以哲，后两期是黄显声。为什么把王以哲撤掉换上黄显声？因为：一、王在王曲任教育长时，对学员们所讲的完全是他在庐山受训的那一套，与联共抗日格格不入；二、对联共抗日逐渐

消极；三、到处安插亲信，潜伏着拥王代张的威胁；四、援助红军的物资及款项都是王亲自经手，到了陕北发现有所短缺。经中共地下党刘鼎汇报给张副司令，因此，张才把王撤掉，换上积极主张联共抗日的黄显声（黄1949年将近解放时被蒋杀害在重庆）。10月间，蒋介石飞抵西安，住临潼华清池。10月下旬，老蒋亲自窜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他说：明礼义知廉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内患不除，无法抗击外敌，攘外必先安内，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是内外不分，缓急不辨，是非不明，本末倒置，就是危害国家的不忠不孝之人。对这种人国家有法律在，一定要予以制裁。老蒋这一套陈词滥调等于警告张学良将军，不准再提联共抗日之事，也表明了蒋介石个人的态度是决不联共抗日，决心把剿共的内战进行到底。听了老蒋这篇讲话，人们无不满腔气愤。由于蒋介石在王曲军官训练团的讲话对联共抗日起着一定程度的破坏作用，第二天，王曲军官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即与我们营长孙铭九及应德田等人商议，把关押在卫队营的苗疯子（即苗剑秋）放出来，叫他来王曲作一次反驳老蒋所讲的反动的亡国论调的讲话。当时卫队营关押着4个人：有东北军团长董道源，因泄露机密，而被关押，他曾故意地守着老蒋的亲信晏道刚大谈联共抗日；第二个是秘书张潜华，在外估测着张副司令的联共抗日瞎讲乱说；第三个是《西京民报》总编辑赵雨时，在报上大骂联共抗日，因此，张副司令派孙铭九把他抓进卫队营关起来；第四个是苗剑秋，因他在外面大喊大叫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怕影响大局，破坏大事，因此也把他暂时关押在卫队营。即在老蒋讲话的第二

天，由我们营长孙铭九亲自带苗剑秋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他说：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错误的。昨天竟然有人在这里胡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失地，要我们做亡国奴，要我们专门为他打内战，打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他这是放屁！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都变成亡省亡家之人啦，我们东北军稍有良心有血气就不应该让这种人站着走出去，而应该让他爬着滚出去。苗剑秋这一番针锋相对的讲话，被特务头子晏道刚知道，指名向张副司令要人。张答应枪毙苗剑秋，惩办孙铭九。结果对苗剑秋不但没有枪毙，反而保护起来，暗地里转送出去。至于对孙铭九不但没有惩办，反而由中校营长提升为特务团少将团长兼抗日学生先锋队队长。先锋队即是我营学兵队，是中共地下党刘鼎同志建议设立的，由营长孙铭九负责，召集北京、天津一带的爱国学生成立的。其目的是把训练好的学兵充实东北军基层，是张学良将军为彻底改造东北军而设立的。谷牧、王一平、康洪泰、张化东、秦川都是我营学兵（康洪泰是学兵队队长）。张学良将军不但下决心要把东北军改造成一支坚决抗日的部队，而且有信心把东北军改造成一支革命的部队。1936年4月初，他在洛川与周恩来副主席会谈之后，9月初中共地下党刘鼎与叶剑英将军先后住进张公馆。张学良将军更加精神焕发，信心百倍，又开创了抗日同志会，有刘鼎同志参加，有我们营长孙铭九参加。虽然人数不多，时间不长，但对联共抗日，在捉蒋逼蒋抗日上起着重大的作用。由是年9月开始，东北军各军师旅团营连均成立了地下政治部，军师旅团有政委，营有

政治主任，连有政治指导员。这一系列的重要措施都代表着张学良将军的信心与决心。

1936年12月9日早晨，王协一连长在全连各班亲自挑选精壮战士20名，交排长王振东率领，说是孙铭九营长命令我连派兵保护学生游行队伍。我们20人各自带好随身武器，即三八式马大盖1支，自来德手枪1支，子弹带足，每人还带4枚手榴弹，立即出发去南辕门。到达时，学生们刚开始游行。有一位20多岁的大学生跑过来说：刚才在集合队伍时，一位12岁的女学生带头喊“打倒汉奸走狗”，被一个蒋警开枪打伤头部，现在医院里抢救。王排长问那个开枪的警察现在在哪里，学生说已经看不见了，可能在抢救那个女孩子时趁一阵混乱躲起来啦。我说：他妈的敢再开枪我们就干掉他。当时西安城四门落锁，蒋军警宪特戒备森严，各要道口都架着机枪，如临大敌。在东北军士兵协助下，群众气愤地砸开城门上的大铁锁，学生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冲向临潼。这时正是张副司令为联共抗日向老蒋哭谏回来，闻知蒋介石下了屠杀爱国学生的命令，只要学生游行队伍冲过灞桥就格杀勿论；因而担心学生吃亏，立即乘车赶到灞桥拦住学生游行队伍，并作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同学们、弟兄们、同胞们，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加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给你们转达到。天快黑了，快回去吧！如果我张学良不带领我的东北军去抗日，如果我不带领我的东北军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你们大家都可以处置我。每一个弟兄手里都有一棵枪，你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给一枪嘛！请你们相信我，给我一定的时间，我决定在最近几天内，以我的实际行动来答复你们的请求。此时

学生们高呼口号：拥护抗日领袖张副司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张副司令讲完话之后，大部分学生回了城，但仍有一部分学生没有回城，退住在灞桥附近的十里铺一个学校里。我们是奉命保护学生安全的，因此也就随同学生住在一起，并在学校门口设立了岗哨。10日下午四五点钟，连长王协一带排长沈连峰及30名战士来我们驻地，与我们会合在一起，同时进驻灞桥。11日下午，营副商亚东又带领30多名战士来到灞桥，与我们会合在一起。傍晚，营部开来两部载重汽车，停在我们驻地附近。当时我们战士认为是营长派车接我们回城的。晚上，商副营长还带领我们进行了一次巷战演习。

12月12日凌晨两点半左右，我刚上了两至四的岗，这时队伍紧急集合，当时我认为又是巷战演习。队伍刚集合好，没想到营长孙铭九亲来讲讲话。我岗哨的位置虽然离营长讲话的地方不太远，但也听不清到底讲些什么。营长讲话声音特别低，不象平时讲话的声音。只有几分钟的时间队伍就解散啦。只看见连长王协一跑步回来，还有排长沈连峰也紧跟着跑步回来。王连长喊一声：“撤岗上车，快快快！”我和靠近的战士立即跳上第一部载重卡车。两部卡车每部车上是29名战士。第一部卡车是王协一连长率领，第二部是孙铭九营长率领。车上的战士都很紧张严肃。我用小声问：“刚才我们营长讲的什么话？”袁澄回答说：“去抓蒋介石！”我说：“好！”此时，只看见我们连长坐在汽车驾驶室里，手里握着手枪，对驾驶员赵国立讲话，讲些什么没注意听。这时将近3点钟，我们每个战士内心里的激动与兴奋无法形容。汽车很快开到临潼华清池，如果不是两扇大铁门紧闭，看样子汽车就要冲进去。王连长亲自指挥我们战士下车。大门旁边有

一个小门开着，门口有3个蒋宪兵守卫，我首先冲上去夺了他的手枪，抓住他的衣领，一个泼脚把他摔倒在地，心想用刺刀捅他的大腿几刀，使他不能动弹时，我们再进去抓蒋介石。往里跑的那个蒋宪兵一边跑一边回头用巴拉克漫冲锋枪打我们，这就打破了我们不打枪的思想顾虑。原先我们担心枪一响，会惊跑蒋介石。被我摔倒的都个蒋宪兵翻身正要爬起来，班长王得胜立即用自来德手枪照他的后背连开了3枪，我们立即冲进大门。这时，里面枪声大作，子弹呼呼地由我们身边飞过。再冲过月亮门，里面是一道小桥。我们以夜幕和假山作掩护，五十几个战士鱼贯前进，开始攻打贵妃池。贵妃池小楼上约有宪兵1个排，很快被我们打垮，全部缴械，而没有蒋介石。第二个据点是一排平房，里面的蒋宪兵抵抗最为激烈，我们都怀疑老蒋躲在那里面。我们分兵两路，一路由营长孙铭九率领直扑五间厅，第二路由连长王协一率领包围这一排平房。经过一番激烈战斗，仍攻不下来，我们心急如焚。此时，已近天亮。正在危急之际，突然听见营长孙铭九大声喊话：“赶快停止抵抗，缴枪不杀！否则我们就要扔手榴弹啦，把你们都炸死在里面！”果然起了很大作用，里面的冲锋枪不响啦，别的枪声也逐渐停下来。突然从窗户里扔出来1支巴拉克漫冲锋枪，我立即跃身起来去拾那支冲锋枪。此时虽然这边房里不向我们打枪，但别的房子里仍不断向我们这边打枪。我正在哈腰拿那支冲锋枪时，突然觉着左大腿部好象被一块小石子猛的打了一下，当时只顾抓蒋介石，不知道自己已经负了伤。蒋宪兵扔枪的目的就等于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扔手榴弹，我们已经缴枪啦。连长王协一冲上去，一脚把门踢开，我们立即冲进房内。当时5点

多，房内看人看得见，看脸看不清，我们就一个一个揪着他的衣领或耳朵拖到院子里看脸，一看不是蒋介石，我们立即乒的一下子给他个耳光，叫他远一点靠边站着，一直到天亮没找着老蒋。我们随着营长又冲进五间厅，只看见老蒋的大黑斗篷仍旧挂在那里，桌上放着军帽手套，水杯里还泡着老蒋的假牙子，用手去摸他那床鸭绒丝绵被窝，尚有余温，估计逃之不远。孙营长命令连长王协一带领一部分战士继续搜查及看守俘虏，他亲自带一部分战士搜山。在搜山开始时，我捉到老蒋的一个便衣侍卫，40多岁，镶着一口金牙。我问他蒋介石躲在那里，他不肯说。我又在他身上搜出一支美造六轮子小手枪，在他衣袋里又搜出蒋介石与宋美龄并排站的放大照片。此时，第四连的阎永祥排长率领全连战士也赶到参加搜山（四连连长张万山当时因病未到，我们把蒋介石捉下山来，张万山才乘刘多荃的小汽车赶到）。第七连及第四连联合搜山的官兵，现在记得姓名的有：营长孙铭九、排长阎永祥，战士陈广善、郭庆林、袁澄、王得胜、高福昌、郑克田、李庆林、齐纪元、蔡景珍、王栖萍、范福堂、杜保善、陈志孝等。约十几分钟的时间，听到骊山半腰里有人喊：“委员长在这里呐！”接着又有人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儿呐！”过后才知道喊第一声的是王栖萍，第二次喊的是陈志孝。我听到喊声，立即用最快速度跑去。只看见蒋介石穿一件酱紫色虎皮袍子，下身穿一条白色睡裤，滚得一身烂泥土与蜘蛛网，打着一只赤脚，脚脖子上被荆棘刺针挂得一条一条的血印子，站在一个小山洞口一块大石头旁，用手扶着那块石头，连吓带冻面孔苍白，两眼赛淋鸡，浑身索索发抖。我们十几个战士把他团团包围起来，蒋介石假装镇静，

大声问：“你们是哪里的队伍？”孙营长立即回答说：“我们是东北军，奉张副司令命令，请委员长进城。只要你领导我们抗日，我们就拥护你。”说完，对王栖萍使个眼色，意思叫王栖萍拖老蒋出来。王栖萍立即上去拖他，他耍赖不走，又上去一个战士去拖，他还是不走。王栖萍又转到老蒋背后去推他，我们营长也上去扶他，这才连推带拉把老蒋拖下山。孙营长亲自扶他下山，又亲自把老蒋塞进一部事先准备好的小轿车。谭海还坐在里面没来得及下车。孙营长又把车子里事先准备好的一件皮大衣给老蒋披上。我带头喊“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抗日领袖张副司令万岁”的口号。来的时候就卫队营两部大卡车，我上的是第一部，回去时来接的车还有高射炮队的车，我上的是第四部卡车。大小汽车一起开动，我又带头领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抗日歌曲。车开得很快，直奔西安新城大楼张、杨办公的地址。这次捉蒋任务完成得干净利落，保密好，行动快。正因为我们很快冲进华清池，才隔断了蒋孝先与蒋介石的联系，使他坐小汽车去营救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只差三五分钟骊山半腰里已发现一架黄色小飞机，飞得很低很低，盘旋着寻找蒋介石，如果不是我们行动快，蒋介石也很可能被小飞机救走。

12月12日深夜，张学良将军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的内容指示杨虎城绥靖主任办公室参谋长李兴中“建千载一时之功”，叫他设法营救蒋介石出去，张副司令感到让蒋介石住在绥靖公署即新城大楼极不妥当，因此指示孙铭九连夜去催老蒋迁居金家巷高桂滋公馆。又是在深夜，又是亲自捉住他的人，又带着手枪，态度又很严肃，因此蒋介石估计是杀害

他。他大惊失色，大喊：“我不去，我不去，我什么地方都不去！这是公家的地方，我死就死在这里。”说罢，蒙被大哭。12月13日上午看到《号外》登着张、杨二将军的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逮捕的爱国七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从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还有张、杨通电全国人民及蒋中央的电文。

我们完成任务后，连长王协一才把我们在战斗中负伤的3个伤兵送进西安医院头等第10号病房。我们住院的3个伤兵受到各界热烈慰问，有工商界代表团、新闻界代表团、学联代表团，还有我营学兵队代表。他们赠送了许多糖果、饼干、罐头等慰劳品。学联代表团还列队唱歌，请我们讲话。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了我们伤兵的讲话。商亚东副营长曾多次来医院看望我们。王协一连长也来过两三次，连指导员张化东多次来看望，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新书，有《现代哲学基本问题》、《母亲》、《八月的乡村》、《通俗社会经济学》等。尤其使人终身难忘的是，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将军也亲自来医院看望过我们。在住院养伤期间，我得到3次慰问奖，共50多元；我在华清池大门口缴获蒋宪兵快慢机自来德手枪1支，在攻打禹王庙时缴获蒋宪兵巴拉克漫冲锋枪1支，在搜山时缴获侍卫美造六轮子小手枪1支，又得到奖金25元。同样是负伤，蒋宪兵的好几个伤兵，住在普通病房里，衣服被褥较差，房间里没有火炉，而我们3个伤兵独住一间病房，被褥较好，又有火炉。我们这边慰问队、代表团络绎不绝，又是学生唱歌，又是伤兵讲话，又是热烈鼓掌，

又是高呼口号，热闹非凡，可蒋宪伤兵那边却是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去慰问，更没有人送什么慰劳品。我想他们不会没有感触，就主动找他们谈话。经过几次个别谈，发现他们里面还是有比较进步的，我就把我分得的慰劳品拿一些分给他们；张指导员介绍给我们的书，我们看完之后又转借给蒋宪伤兵去看。没想到有两个蒋宪兵感动得拉住我的手，痛哭流涕地说：“你们的负伤是光荣的，我们的负伤是耻辱的。你们应该享受的慰劳品分给我们，实感惭愧。”并向我表示伤愈之后决不回原部队，愿意参加我们东北军一道去抗日。

12月25日下午五六点钟，唐智明等来医院看我们，他说：张副司令已把蒋介石送走啦。我们3个伤兵闻声，不约而同地说：“啊！真的？”他说：“怎么不真呢！我们营长孙铭九得到看守蒋介石的战士的报告，立即去找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还说怎么不早说，我们营长说他也是刚得到战士的报告。当时周副主席同我们营长一起乘车急追至飞机场，但飞机已经起飞，只是在飞机上扔下张副司令手谕，上写‘余去南京，我东北军由军长于学忠统率，归杨虎城主任指挥’。”当时我们3个伤兵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一个晴天霹雷，使我们呆若木鸡，当时的沉痛心情无法形容。我们最担心的是：第一，蒋介石背信弃义，翻脸不认账；第二，是张副司令的安全；第三，抗日不成反而会引起更大规模的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这时的心情，一方面是失望，一方面又把希望放在张副司令能够在短时期内回来上边，否则我们认为捉蒋白捉，伤白负，血白流。谈笑风生的10号病房一下子沉默下去。

1937年1月底，我们伤愈回连。张学良将军亲自送蒋返回南京，果然不出我们所料，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翻脸不认账，把忠厚善良为民请命的张学良将军扣押起来，又派他的亲信朱绍周来西安，对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进行分化拉拢。渭南会议的决议是不撤兵，不放蒋中央十几位军政大员，不放蒋中央50架飞机以及数百名航空工作人员。以特务团少将团长孙铭九为首的东北军少壮派坚决执行渭南会议决议，争取张副司令回来；以王以哲、何柱国为首的东北军将级军官主张无条件释放蒋中央十几位军政大员、50架飞机及全部航空工作人员，无条件撤兵，这样做就等于使张副司令永无回来之日了。两种不能调和的矛盾终于导致“二·二事件”的爆发，孙铭九派连长于文俊带兵去杀掉王以哲；派商亚东带兵去捉何柱国，未遂。六十七军和一百〇五师喊出来要“消灭卫队营，枪毙孙铭九”。此事六十七军少校参谋林志强最清楚，因他参加了活捉孙铭九的机密会议。为避免东北军内部一场相互惨杀，周恩来副主席派刘鼎同志迅速把孙铭九等几位少壮派转送到红军处保护起来，时间是1937年2月4日下午。后来于文俊连长被绑架，并被剖腹挖心供奉王以哲。2月上旬的一天，刘凤德集合卫队二营的官兵讲话，他说：“孙营长他走啦，营长职务谭副师长命我暂时代理。”讲完后立即派兵把各连政治指导员看押起来，直至队伍开到常武县后，才撤销对各连政治指导员的武装看押。因我在医院做过蒋宪兵的政治工作，得到营政治部主任辛德茂的赏识，到常武后，我被调到营政治部任政治上士。后来听辛德茂主任说，刘凤德抄了我们营长孙铭九的家，抢去营长的位置，本来营长应是奇袭华清池有功的王协一连长的。此时，我们的

部队与红军第一军团联防。红一军团许政委带青年队来常武县与我们东北军一起召开军民联欢大会，许政委在大会上讲话，之后由红军青年队跳乌克兰舞、渡黄河舞，还演出了一个独幕话剧《百灵庙》。我们东北军东调时，红军青年队列队在马路边唱送别歌，记得歌词是：“东北健儿，抗日英雄，将士们多英勇，我们在此立正敬礼唱歌来欢送。祝你们向东行，始终如一团结莫放松；祝你们向东行，一致努力为国立功。暂别了呀莫悲痛，满腔热血为君送，祝你健康和珍重，抗日前线再相逢。”当许政委率领的红军青年队完成任务，回去之前向我们告别时，我曾提醒我们主任辛德茂建议营长刘凤德，赠送给红军一批武器和子弹。辛德茂主任立即去见刘凤德，果然刘凤德赠送给红军两支巴拉克漫冲锋枪。刘凤德确实在与红军联欢之后对我们政治工作人员态度大有好转，不象在西安“二·二事件”后那样。

1937年8月间，我们队伍开到安徽蚌埠后，蒋中央下令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主任及团、师、军的政委等，一律到淮远集训，负责集训的是郭维城。经过一个时期的集训后被解散，强迫上火车，押送至北京。在这个时期，我和马愚指导员以营政治部的名义印了许多宣传抗日的小册子，刚装订好，营长刘凤德带领4个亲信卫士冲进室内，拣巴拣巴塞进麻袋里一下子扛走了。他大发雷霆，说：“告诉过不准再宣传政治，你们为什么还宣传政治？你们这样做对团体不利。”把我们训了一顿走了。没过几天，各军、师、旅、团、营、连政治部一律撤销，我被强迫下谭永久连第一排第二班当三级兵。我本来是二级兵，调升营政治部政治上士，强迫我下连当下士三级兵，无形中降我二级，算是对我不听他的话的处

分。从那以后，一切政治工作转入地下。四五月间，队伍开至江苏清江浦时，由王者均介绍我参加长虹剧社话剧组去演话剧。话剧团的最高领导人是郭维城，我的直接领导人是张汉臣，他原是张学良将军专管照相的随从少校参谋。此后，我们长虹话剧团跟着部队转移到河南漯河，又转到武汉，全部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改名为长风话剧团，住武昌明月桥张学良将军公馆。在抗日宣传周，在汉口中山铜像下面演过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及《盲哑恨》。

以上是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段亲身经历。西安事变已经过去48年了，每当回忆起华清池的战斗和搜山捉蒋的情景，还好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在这里让我借用叶剑英委员长1979年重游西安时写的一首诗来表达我的心情吧：

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

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

本文作者 郭庆林，现名郭勉。阳谷县四棚乡大碾郭村人。原在上海中华造船厂工作，已退休。现为上海市虹口区第五支民革成员。郭庆林老人1984年底以79岁高龄回乡探亲时，曾应阳谷县政协邀请谈西安事变捉蒋经历。此文即根据其手稿和谈话记录整理而成。

（原载1985年12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附：

擒蒋五志士 重逢在杭州

许 寅

照片中的5位老人，都是西安事变的有功之人：右一戴眼镜者，即是当年曾经叱咤风云的东北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正是他，于1936年12月12日，奉张学良将军之命，率领卫队二营，深夜奇袭华清池，勇闯五间厅（蒋介石住所），并于黎明直上骊山，“请”蒋介石“进城议事”。中间躺在床上的，是当年卫队二营的连长王协一——正是他，在孙铭九的直接指挥下，一马当先，冒着枪林弹雨率全连战士杀开一条血路，闯进了五间厅。右二郭庆林，左二王栖萍，均系卫队二营战士，奋战华清，上山追蒋的参加者。左一曹永昌，系卫队二营学兵队班长。这个学兵队，是张学良将军根据我党建议设立的招募北平、天津一带爱国学生，加以短期训练后，用以充实东北军基层，并且以此作为改造东北军的一项重要措施。学兵队内有我党地下组织，时间虽然不长，却培养了不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做出了不少贡献。

这些西安事变的有功之人，在十年浩劫中都遭到了迫害。“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方才得到党和政府的照顾。最近，有关部门特地让王协一老人来杭州部队医院进行手术，以便他在杭工作的亲人就近照顾。他的老战友孙铭九等人闻

讯，专程赶来杭州探望。阔别40余年，一旦重逢，语及旧事，无限感慨，而且5颗心都深深怀念着至今被困台湾的张学良将军，祝愿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日益繁荣富强。

（原载1981年4月25日浙江《经济生活报》，1985年12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六辑转载）

西安事变时韩复榘通电前后

李玉法

西安事变时，我正在济南政训所上学。当时一闻蒋介石被扣，全国沸腾，济南市大街上的喇叭广播声震耳欲聋，各界人士态度不一，国民党中央各将领则联名通电主张讨伐张、杨。

这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一听到张学良的广播通电，五内徬徨，马上召集4厅厅长、省府委员、8个师的师长等开紧急会议，目的是如何应付这一大事变。半天都不敢说话，厅长中李树椿年龄大些，与韩关系较深。他说：“咱们见识不高，还是把邹平研究院的梁漱溟先生请来商议商议吧。”他这样提，一则因为韩对梁信任较深，二则个人也可推脱责任。于是打电报把梁叫来。梁在会议桌上说，好办。决议通电全国。大家都说，请梁先生执笔起草吧。电稿拟完，内有“现在国难当头，日军进兵我长城外三省，应该团结对敌。不应再起内讧”等语。征求大家意见，都说行。于是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名义发出，称为“马电”，“马”字是二十一日的电报代号。韩本是河南省主席，冯玉祥的部下，阎、冯倒蒋失败，又马上倒冯投蒋。他这个“马电”抱中立态度，既得罪了蒋，又使冯以后有所借口，种下了死根。

西安事变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得以和平解决，国共达成

协议，实行合作抗日，蒋介石也飞返南京。这时韩复榘恐慌万状，俗话说“捉虎容易放虎难”，他万想不到西安事变能这样地结束。于是又召开了一个会，叫作“骂会”。韩说：我混蛋，你们也都混蛋吗？全场没有一个人敢吭气。韩脱下鞋来，摁倒秘书长张绍堂打了一顿，据说把门牙打落几个。这时梁漱溟也就吓跑啦。蒋回去后，住南昌养病。韩复榘派山东省府委员张悦，携带礼品往南昌看望蒋，目的是试探蒋介石对他的意见如何。中日战起，韩复榘果为蒋介石扣押起来，以不战退却的罪名枪决于武汉。

本文作者 李玉法，1903年生，阳谷县安乐镇袁庄人。解放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小学教员、校长、中学教员，现退休在家。

（原载1985年12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我所耳闻目睹的南京请愿情况

王 社 光

1931年我在当时的北平朝阳大学上学，暑假后开学不久，学校教师休息室的东山墙头上，贴着用红笔圈起来的“大字报”式的墙报，上写“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等内容，大概是学生会贴的。连着多天，每天都有这样的墙报。很多同学争着围观，都很激动和愤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九·一八”事变。

又待了不久，从墙报上、报纸上看到各大学学生往南京政府（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愿的消息。接着我校也发出通知，发动去南京请愿报名。我和阳谷老乡、同学刘振鲁（解放后在黑龙江省任森林局长）报了名，不日即去前门车站上了火车。我俩的坐位是餐车的一个饭桌。因去的人多，不分头二等车或是餐车，都挤得满满的，学校多，不知有多少人。上车后，听说车站接到上级指示，不叫载着请愿学生的火车开往南京。这一消息引起了风波，接着很多男女学生到开往各地的火车头前面，卧轨阻止开行。很多学生到车站去找站长，要求开车去南京。听说把站长也打了，把车站上的门窗玻璃也砸碎了。一直闹了三四天，因交通不能断绝，当局被迫又允许学生去南京，火车这才开出。

在火车上坐了两三天。到各个车站上，各人买点吃头充

饥，因人多，买不着的就得饿着。过济南时，那里的中学生也要求去南京请愿，上了火车。到了浦口，火车停止，学生会的领队喊道：“同学们，下车后，站好队跟着走，不要掉队乱跑，有人来接我们。过去江到下关，我们再坐小火车进城。”（当时从江岸下关到南京城内是小火车，相当于现在的电车或公共汽车。）

我们下了小火车，排成五六路纵队，看不到头尾。队伍顺着大街奔向国民政府，一路喊着口号，有“要求蒋委员长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发给我们枪打日本”等等。到了政府门前，见两排军警，荷枪分列大门两侧，不准进去。我们学生队伍两边，一路都有戴着红色白字袖章的学生纠察队维持秩序。我们站了好长时间，经过学生会的领队再三交涉，才放我们进去，到一广场集合。不大工夫，出来一位首长，据说是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向我们讲话。有人呼喊：“要求蒋委员长讲话！”张说：“委员长一定接见同学们，准备明天在军校和同学们见面。”讲了不大会，学生就列队由人领着到军校去了。那天就住到军校学员宿舍。

军校学员宿舍，是临时腾给我们的，房间很大，放着许多木制双人床。吃饭是军校管的，每顿五六个大菜，四五个人一组，吃的大米据说是“西贡米”。

晚上睡觉后，有人小声私议：“我们上当了，把我们看起来了。”“听说我们前头来的那列火车上的学生，把《中央日报》社砸了，把教育部长蔡元培的头都打破了。军警逮了100多同学，抓人的时候，有的同学逃跑，跳《中央日报》社的后窗子，跳到秦淮河里，淹死了好多。”……

第二天早饭后，学生会的领队又喊：“同学们集合了，

到礼堂去听蒋委员长讲话。”我们列队到了军校礼堂。礼堂很大，学生进去，站到座北朝南的讲台前，才占了半个礼堂。不大工夫，果然蒋在讲台上出现了。有的学生鼓掌，有的不动（学生有国共两党）。我们是没有立场的学生，看着人家有不鼓的也就没鼓掌。见到蒋的长相，大秃头光光的，脸长的下窄上宽，和相片上有些相同。记得他讲的是：“你们这批同学很好，来到南京安分守己。前两天来的那一批就不老实，胳膊上都戴着示威的袖章。示威到租界地里去示威，到中央政府来示什么威呢！”还说：“同学们要求发枪抗日，精神很好，不过同学们大多数是大学生了，将来建设国家都是栋梁之材，国家能肯先叫你们去打仗吗！国家还有几百万队伍没上前线。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上前线打仗，应叫他们先去，不能叫同学们先去打仗。”最后又说：“同学们可能有些没到南京来过，散会后可以叫张教育长领着同学们，到中山陵等名胜地方去看看，什么时候回去，给你们预备火车好回去。”散会时，有喊“蒋委员长万岁”的，有不喊的，我们也莫名其妙。后来听说，学生中有国民党的特务，夹在学生中喊口号，还监视着学生，看见有不轨举动的，当即逮捕；谁往衣袋里摸东西，就要抓着带走。当场我倒没看到抓人。因有北平、上海等各大城市的学生，谁也不认识谁，所以国民党特务分子混在学生行列里，也不知道。

散会后，学生们列队去中山陵谒陵。回来每人发两块面包，叫去上火车，打发各自回去。这次请愿来回共1周的时间。

回校后，见报上每天都有南京请愿学生被捕、失踪、死亡的消息，以及营救的情况，一直继续了很久。后来我校学

生也有不断失踪、被捕的，都是因共产党嫌疑所致。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些学生活动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个人过去是死读书不问政治的人，从此也深感不对。

本文作者 王社光，1907年生，阳谷县四棚乡三支王村人。退休中学教师。现住寿张镇。

（原载1985年12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熊观民先生事略

熊 玮 光

先严熊梦宾，字观民。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生于阳谷城内南街春和堂药铺祖宅，1953年11月23日逝世，终年67岁。

早岁为清朝末科秀才，后由东昌府保送济南优级师范为首届学员，专攻理化，毕业后去曹州（今菏泽）省立六中任教。在此期间，参加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成为山东早期革命党人。后调济南任省教育厅第一科长。清朝亡，民国兴，孙中山先生北上，先严与山东同盟会员，代表山东省群众迎孙先生北上。此后先严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后去青岛任胶澳督办公署秘书长。8年后，由其挚友王鸿一先生邀请去北京，任京汉铁路局长。数年后，由其同学李子善先生介绍，与冯玉祥将军结识，后由冯先生邀请出任西北军秘书长。

北伐时期，成立4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蒋介石，第二集团军冯玉祥，第三集团军阎锡山，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共竞北伐大业。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要独霸中国，冯、阎合作，共同讨蒋，形成中原大战。先严当时代表冯、阎，曾来往香港、广州数次，与广东陈济棠及广西李、白洽商，共同讨蒋。蒋介石运用其优厚经济实力，对广东、广西进行分化瓦解，冯、阎实力不支，阎锡山首先退守娘子关，冯先生孤军奋战，终于败走西北，兼

道出国。先严因积劳日久，又体质欠佳，致心脏病发作，不能与先生出国，只有隐居津门租界内。之后，李济深先生因反对蒋介石独裁，创建福建人民政府，先严曾去与李先生联系并大力支持，后终因势孤失败。

抗日战争起，冯先生回国，初居泰山普照寺，电召先严上山共议大事，后同去南京，又同轮去汉口转重庆。在重庆时，先严经常与冯先生、李济深等聚晤，并与中共代表有接触。抗战结束，与冯先生同乘民联轮出川去南京。后冯先生去美国，先严以心脏病留上海租界内养病。在此时期，曾与早已去香港的李济深先生联系，并同在上海的西北军将领李兴中等人从事反蒋及协助解放上海工作（当时上海租界内反蒋报刊有登载）。

新中国成立，李济深先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革中央主席。先严应李先生邀请，由上海到北京参加民革中央第一次会议，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后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欲留其北京工作，先严以心脏病时发时愈，不堪重任，乃请求回山东。于是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山东省人委委员，兼文史馆长，并受民革中央李济深委派为山东省民革负责人。

先严1950年春回山东，因政体初建，工作繁忙，致病势日重。延至1953年冬，终因医治无效，逝世于济南林祥南街寓所，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公葬于济南金牛山干部公墓。

本文作者 熊玮光，现任北京市崇文区政协常委、祖国统一委员会副主任、民进区负责人。

（原载1985年11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附：

上海《新民报》1949年4月10日

报道熊观民等西北军旧属

参加冯玉祥将军追悼会消息

1949年4月10日，上海解放前夕，熊观民先生及冯玉祥将军旧属原西北军将领在上海租界内追悼冯玉祥将军，上海《新民报》（晚刊）当日第一版予以报道，记者是李士钊。追悼会上挽联、祭文均系熊观民撰写。报道原文如下：

无言的追悼会

西北军旧属今祭冯玉祥

仪式简单仅五分钟

（本报讯）自冯玉祥将军去秋由美赴欧途中不幸逝世后，其旧日部属及亲友以消息隔绝，传说纷纭，未能证实，近始证实冯氏确已逝世，其旧属李鸣钟、薛笃弼、张之江、孙连仲、李兴中、冯治安、李文田、刘汝珍、刘治洲、刘骥、曹福林、毛仁亨、熊梦宾、李光汉等四十余人，今晨十时半假长乐路中西疗养院礼堂举行追悼会。会堂庄严肃穆，正中悬挂冯氏照相，供以鲜花香具，旁悬挽联一副，文为“伟范常照灿烂勋猷归史册，羁魂不返凄凉部属失瞻仰”，上书“煥公先生千古”，下书“旧属敬挽”。追悼仪式历时仅五分钟，由李鸣钟主祭，薛笃弼、孙连仲、李兴中等陪祭，上香献花之后，向冯氏遗像行最敬礼、默哀，旋由前冯之秘书长熊梦宾读祭文，与祭者均泣不成声，祭文几不能卒

读，此一无言之哀悼会，亦告结束。

（原载1935年11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先父申集磐行略

申 仲 铭

先父申鸿渐，字集磐，1882年（清光绪八年）生于阳谷县安乐镇申刘庄，1951年逝世。他一生办学，人多称集磐先生。1904年23岁时，以策论应试兖州，中了秀才。邑人同时进学者有熊观民（梦宾）、范珍卿（献琳）诸先生，后来在省城分习师范和法政，对国家社会都很有抱负。辛亥革命时，他由熊观民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年他在山东省立单级教员养成总所（总所长是鄆城王鸿一）毕业，遂又加入山东的民治社（即山东的民治党派，在王鸿一先生领导下，与山东的保守顽固派作斗争。该派曾以省议会票决，驱逐山东督军段系军阀张树元）。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孙中山将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袁邀请孙先生赴京共商国事。孙中山北上过济南，各界代表在省咨议局（即省议会）大楼举行盛大集会，先父与熊观民都去参加。人众起哄，我父被挤，自楼上坠地，当时熊观民在台上司记录，幸均未致伤。是年先父剃辮返里，时风气未开，乡人嘲笑。旋被任为阳谷县单级分所所长，就学者少长咸集，多前清秀才。他又在家乡安乐镇联合名流杨万选（进士）、李瞻泰（廩生）毁镇上庄严寺佛塑，创办两等小学堂（即第二完小前身）。这个学校，育才颇

多，留学东西洋者有之；大革命时，投笔从戎参加黄埔军校者有之，非仅我邑之冠，且著于鲁西。

1923年，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改组，国共两党合作。1925年，安乐镇小学出身的王寅生同志，率东昌（聊城）二中及三师同学中先进分子，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是为黄埔第四期生。次年北返。为策应北伐，扩展党务，王寅生与我父在济南魏家庄孟树珊（名传瑾，阳谷人，山东省议员）宅计议，年较长在社会上有影响者，如孟树珊及我父可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青少年优秀分子，则分别吸收为共产党的C P和C Y，同时动员一批同学南下投考黄埔学习。据我所知，在本县有高宗夏（树校）、刘修民（武琢）、顾子澄（时清）和我大哥申伯锦（荷生），都是黄埔第五期生。还有阳谷南街的熊纪明（有光）、南孙丰庄的孙芳兰，他俩在济南一中和东昌三师就学，这时也先后去广州考入黄埔。安乐镇还有一位女性朱庆荣（华亭），也在王寅生动员及我父鼓励下，于1926年南下武汉，参加了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所长宋庆龄）。这些人中，国共两党都有，当时并肩作战，打倒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

1926年秋，我父在天津，曾对驻天津小站的直鲁联军一部策动起义。邑人陈耀汉，时任褚玉璞某部参谋长，与我父有旧交。我父遂偕北来的黄埔同志亲往小站，说陈反正。冬，陈即在部队开拔南下徐州途中，率部起义，倒向北伐南军，被提升为国民革命军的独立旅长。这一年，是我父最紧张的一年，当时我由日本留学返国，即与王寅生同志，还有许多黄埔同学，参加北伐策反工作，不幸在济南贡院墙根街被张宗昌军逮捕，旋由我父好友筹资现大洋千余元赎回，逃往

天津，时我父患腿病，即由孟树珊先生亲送我至天津法界，搭轮南下。我父亦不能再留津，遂归隐乡里。

1927年国共分裂，共产党人王寅生、赵以政、聂子政、孙大安等，自南方返乡，就地革命。同年秋，我亦自武汉归，与诸同志在聊城计议，发动坡里革命暴动。先父知我在天主教堂中与起义军司令韩建德并肩作战，亦知起义部队众寡不敌，乃应伪命，以阳谷县民团总团长职率部佯作围剿，暗中掩护，使坡里起义部队，在大风沙之夜，潜出教堂，撤至大名一带，惜被张（宗昌）、褚（玉璞）联军击散。先父在坡里之役中，与韩建德密使往还，做了不少工作，乃至呕血。

1930年阎冯反蒋战起，阳谷由土著匪军薛传峰占据。薛以阎锡山的委任，号称反蒋，我父被胁，继续在县财政任职（我父上年任县财政局长）。奈薛部多骚扰，我父与之面争，无效。薛部在城内杀人，竟至活埋人命，我父曾前往挥杖制止，亲手扒土呼吁，路人见之，多为感动。反蒋失败，我父及我兄伯锦被蒋通缉，遂出亡关外，时我在哈埠任报馆记者，得暂依而居。至“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国事蜩螗，我父返乡。时国民党师长陈耀汉亦赋闲家居，我父怂恿陈出资在安乐镇建立第四职校，并扩建安乐镇第二完小，四方来学者甚众，一时安乐镇被视为文化中心。当时阳谷县长是杨霁峰，先父一方面在职校教书，一方面联合县内知名人士张蕊榜（绍堂）等编纂《阳谷县志》，费时二载，稿成。县正拟出版，“七·七”事变起，杨霁峰弃职离县，出版事宜只得作罢。当时我父为保存这个文献，曾将其一部稿本藏于济南植灵茶栈，济南沦陷后，不知去向（近年已由县

志办从省购其复制本一部)。

1937年，聊城专员范筑先将军拒绝韩复榘南撤之命，通电全国，誓留河北（黄河以北）守土抗战。年关前后，土著军布永言两次据城，民心惶惶，范专员往抚。时我随范军中，我父缒城，大雨雪中，晤范见布，往复3次，布降城解，民大欢喜。1938年，我父被范聘为参议，兼阳谷县动员委员会委员。范积极抗战，部众扩至数万，收复鲁西各县城，日敌惮之。11月15日，国民党省主席沈鸿烈及省民政厅长李树椿，串通地方劣绅，勾结利用反动道会门忠孝团作乱，烧杀安乐镇，并进攻阳谷县城。聊城亦被日寇乘机进攻包围，范专员殉国。我父大愤，曾面质李树椿，李因衔恨，日谋陷害我家族。日寇占领阳谷县城后，复用装甲汽车，直驶安乐镇，出东门外，纵兵将我西园房屋焚毁。

1939年11月，共产党领导的阳谷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阿城宣布成立，县长齐南峰，我父被聘为县参议。1940年，我大哥伯锦与共产党员赵凤升、岳舜卿、王筱湖、武金堂（子升）组织谷山抗日游击队，我家老小，从此离家，随军抗战。此时八路军陆续东来，当时多由地下党负责人申云浦（安乐镇人）接头，故我家亦多得先声。著名的毛坊民团，乃我乡一强，民团首领王仙台老先生，专差来问我父：“这八路军有没有根？”我父答曰：“有根！”王老因此决策改拒为迎，传谕所属，八路军若来，照供给养。我县有名的地主寨子朱家庄，一度曾由肖永智政委率领骑兵和平进驻，不久，又被忠孝团首刘清岚占据，致有5月间攻打朱家庄之举。当时我军曾动员兵力数千，附炮几门，攻战约及旬日，始将朱家庄攻克，并生擒刘清岚。随着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鲁西抗日公署

成立，我父被推为行政委员。1941年冀鲁豫行署成立，晁哲甫、董君毅（即段君毅）、贾心斋3主任聘我父为行署参议。1945年1月我父被选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直到1947年7月。

先父在1942年，得毛泽东著《论持久战》，得知抗战为持久战，革命是有前途的。一日，军中某科长张同志画竹，竹叶皆成字，我父为之赋诗，有“老骥空存千里志，愧无能力效南支”句，可见他老而不衰，其志愈坚。日伪县长董政华曾以纂修《阳谷县志》为名，挽先父至友左庆琛函劝我父入城，我父即以长函痛绝之。

先父生平素以正义至诚待人，人多信服。我县知识界前辈，若王仙台、张蕊榜、张德如、孟树珊、陈超群、魏炯堂、李宜农、冯鲁民、李耀堂、刘星五、刘镇南等人，在历次运动中，皆能排除邪恶，站在进步一边。西安事变，张杨扣蒋，全国震动，社会上争论亦烈。向由共产党员杨耕心、王筱湖、武金堂执教，已成为阳谷地下党本据的安乐镇二高，夜间曾贴出抗日标语，事为县城内国民党部得知，要县当局逮捕安乐镇教员学生，并勒令停办二高，借以扼杀阳谷县的进步势力，因我父挽出孟树珊、陈超群出面向县当局关说始罢。

1947年春，鲁西一带大饥，我父手造菜窝窝，报行署推广施赈。他一生除热心教育外，尤好植树造林，为乡里倡。这年8月，他被任为聊城专署靖堤口果木园主任，直至病逝。安乐镇学校庭园、和尚坟、东门外大桥两侧、天齐庙荒地废基上的树木，多其手植，前后不下万株。1950年，我自北京返里，与父会晤于田庄苗圃，畅叙终宵。他感慨地

说：“国难家事，也算都解决了。”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正欣奋地工作时，竟于1951年5月3日病逝，终年70岁。

（原载1985年11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杨兰亭先生传略

杨宗震

杨兰亭（1880—1961），号竹泉，阳谷县郭店屯乡九都杨人。先生幼时就学于安乐镇孟庙私塾，考秀才未中，后改考济南国立高等学堂，学期4年。在此期间，奠定了他终生献身教育事业的决心。

1918年4月，当时任段祺瑞的陆军参谋长的范耘经（阳谷城里人），拿出1万元作本，利用息金在县考院由孟传瑾筹建范氏私立崇实两等学堂，孟自任该校第一任校长。不久孟传瑾离校赴济，任张宗昌的省参议职务，而介绍他在济南高等学堂读书时的同窗好友杨兰亭接任崇实小学校长。校内设有高小两个班（3年毕业），教师4人，初小1个班，教师1人，庶务1人。在当时任校长职务者，一般要学识较高，能教他人不能教的课程。杨校长担任英语、数学两科。他教学对学生要求甚严，学生都很爱戴他，听从他的教诲。

杨校长秉性耿直，疾恶如仇，对坏人坏事，坚决抵制、斗争。1921年阳谷县令孙某，作风十分恶劣，民怨极深，杨校长请了3天假赴省告孙。当时交通不便，他在鱼山搭黄河的船去济南，找到孟传瑾，叫孟带他见张宗昌的秘书长，面陈孙某的恶迹罪状，秘书长听了大为震怒，立即下令将孙某免

职。他回县后只3天，孙某即灰溜溜地走了。

九都杨是阳谷城北有名的穷村，土地瘠薄，地多盐碱，适宜晒盐。当时各县都有盐务局，养着一批盐巡，负责卖海盐，并查禁农民晒小盐（称之为私盐）。杨校长为了给本村农民谋条生路，特再三向盐务部门要求准予九都杨村晒盐，终未获准。他便自己出钱向所有盐巡请客送礼，九都杨村民晒盐才免于查禁。

1926年，他和范家三少爷因事发生矛盾，虽经前任校长孟传瑾劝阻，但仍辞去崇实校长职务，到安乐镇县立二高任数学教师。第二年，安乐镇二高毛子建校长升任县教育科长，杨即接任该校校长，并仍担任数学教师。

1928年，其子杨耕心等共产党人发动鲁西闻名的坡里暴动，在十倍于我的强敌围攻下，暴动不久失败，杨耕心等遭到当局通缉。杨校长送耕心同志流亡东北，并立即去济南活动，得以免于剿家灭门之祸。从此，他辞掉安乐镇二高校长职务，回家教初级小学。

杨校长回家后，仍热衷于教学工作。个人出资在自己的后院建了一座宽敞明亮的校舍，并利用原有的两间西屋，招收附近村庄三、四年级学生，亲自教课。他教的学生，大部分都能考上高小，并且成绩居于上游。直到“七·七”事变，学校仍未停办。

杨校长在本村教学期间，还为群众办了很多好事。当时赌徒遭凶杀，凶手罄产赔偿，流亡关外。他把全村赌徒全都请到家中，用上等酒饭款待，晓以大义，号召忌赌；大家全为感动，当场把赌具交出销毁，表示永不再赌。以后每逢春节，杨校长都把他们请到家中，置酒款待，尽欢而散。至今

群众还传说“杨二先生忌赌”的故事。他还从外地购来鱼苗，放入村内官坑，养至年底打捞出来，卖了钱全部救济村中孤寡老人。他又购来洋槐树苗，发动群众栽种于九都杨界内的聊阳公路两旁，树成材后，便归全村公用，深为乡里称赞。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了东北三省，其子杨耕心从哈尔滨回到老家。杨校长当即到县要求毛科长，把耕心同志安置在阿城县立三高。这时，耕心同志虽然还有通缉令在身，但还是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员，筹建“中坚社”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后受反动势力排挤，不得已转到安乐镇二高，在那里建立了安乐镇中心支部，负责领导附近几个县的党的活动。若非杨校长的大力协助，不但无人敢安置他，就算得到安置也站不住脚。

1937年“七·七”事变后，耕心同志受党的委托，打入国民党军队做地下工作。杨校长一面在家操持家务，一面热心支持抗日，和汉奸反动派从无丝毫来往，但和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交往甚密。他对徐翼县长很敬佩，曾当面吟诗一首送与徐翼。

建国后，他曾被邀请参加县人民代表大会。1961年夏不幸溺死，享年81岁。

本文作者 杨宗震，1917年生，杨耕心烈士长子。建筑工程师。1946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79年在河南省建筑工程学校退休，1983年转离休。

（原载1986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追记张稷臣先生

高振康

张稷臣，字绍农，阳谷县张秋镇桑营村人。生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1972年无疾而逝，享年97岁。他是晚清廪生。终生从教，工书法。新中国成立后，受任为山东省文史馆馆员。

我从先生学书，虽直接受教于先生甚晚，但因有同乡关系，对其书法自幼耳濡目染，得他耳提面命颇多，故而印象甚深；对其生平，我虽知之不多，但同学好友常常谈及。谨记述如下。

先生幼时家贫，全靠其父租种他人田地得以维持生活。然而他天资聪颖，嗜书好学。启蒙时，跟他的表亲陈希彭（清贡生）学习，10岁通五经，能诗文。陈嘉其笃学聪慧，拟3年内把他培送县学。可惜时间不长，陈因病老而停教，收帐时，特意将他推荐给秀才李洪恩。李对他也非常喜爱，教授格外悉心。14岁时，赴县应童子试，名列前茅。县令赠送团扇两把，并书蒲松龄撰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激励他奋进成才。18岁时，参加兖州府考，以优异成绩中秀才，继而补廪生。同年，因家境贫困，遂于张秋镇陕西会馆设蒙馆，边授徒，边攻读，仍求知若渴，常常夜以继

日，毫无倦怠。贾垓村的贾子珍先生（清优贡）也同处坐帐教授高级生，很赞赏他的聪慧，又敬佩他的意志，故主动为之面批作业，致其文思大进。不久，他赴济南应乡试，在考期临近时，母亲病急，只得赶紧回归。同门知他才富学实，功名在握，都为他不能应试感到惋惜，劝他考试完再回。他断言谢绝，说：“闻母病急，方寸已乱。如不能生见母面，我要个举人何为！”此后不复应试。

先生出生于封建社会末期，童年和少年在饥寒交迫中度过；中年时期，正是军阀混战、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以及日寇入侵的灾难岁月；年届古稀，才迎来了新中国。他身为宿学名儒，饱经人间沧桑，终于走上了拥护革命、拥护共产党之路。抗日战争时期，张秋镇是鲁西一带我党重要根据地之一。他深明民族大义，积极支持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曾被选为冀鲁豫边区人民代表，并与晁哲甫、贾心斋、董君毅（段君毅）同志合影，肖华、杨勇等同志都给他送过贺年片。新中国成立后，他热爱新社会，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积极参加党的各项政治活动，曾多次被选为县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事业。自18岁起至87岁止，在近70年的时间里，他含辛茹苦，呕心沥血，从未间断过。曾先后在濮阳（黄委会）、北京、天津、济南等地教专馆；50岁后归家教散馆，在东阿十里堡、蔡家山庄、张秋王宅、董宅、常宅等多处设帐。他收授学生重德重才，教不择人，诲人不倦，虽贫穷子弟，只要好学正派亦可免费入馆，所以名誉遐迩，深得乡里父老敬重。私塾废后，公学即开，他一直

立堂执教。晚年，他还在本村教小学，多次被评为县模范教师。他白天教书，晚上备课批改作业。他教授有方，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从学堵络绎不绝，在册学生即达3000多名，后来成材众多，桃李遍布。教书之余，他还每每挥笔为人作书，给省文史馆撰写文史资料，书香满室，卷轴盈几，乐此不疲，直到终老。他在87岁时曾写给我一首诗，后四句是：“有用光阴知多少，无穷事业担双肩，垂老涂鸦还未善，欲将铁砚再磨穿。”这诗句真实地反映出他一生的事业活动和思想情志。他终生执教、挥毫不息的形象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鞭策后学不敢稍懈；他那“孺子牛”精神，受到社会的普遍颂扬。县人民委员会曾多次在会议和文件上表扬他；教育部门曾把他树为榜样人师；人民群众和他心心相印。他逝世时尽管正当国逢浩劫、万马齐喑的岁月，但十里八乡，知者无不为之悲痛，深深感喟他的德业。

先生以终生从教名，尤以书法名。先生之书法，师柳（公权）、颜（真卿），兼习王（羲之）、孙（过庭）、欧（欧阳询）、米（芾）、赵（孟頫）、郑（燮）诸家，尤爱柳帖。其书既具柳体之筋骨遒健，又备颜体之端庄雄伟，且取多家之长，潇洒圆润，雄健庄秀，气势奔放，“熔百家”，“出吾体”，卓犖一家。他执笔宗法《拨镫》，主张转指。拨镫法为晚唐书家卢肇依托前人传授所秘守，后传林韞，林作《拨镫序》，以“推、拖、拈、拽”四字为诀。就此四字意义看来，实是转指法。后代书家又有言七字法的，有言五字法的。先生精演此法，深得神妙。他执笔遵循“振、押、钩、格、抵（或振、押、钩、贴、辅）”五字法，指实掌虚，五指齐力，加之兼用转指，故作书力透纸背，得心应手。他的正

楷，点、画、勒、掠，刚柔相济，笔笔中锋，操度精绝，肥瘦适中，长短得宜，于规矩中透出无穷的风韵；其行书，用笔轻重起伏自然，顿挫转折自如，圆润流畅，落拓挺秀，处处似行云流水，通篇神采飞动，变化之妙全在笔梢，其笔势奔放而姿媚端整，笔意自然而契合物象。他那娴熟的技巧，深湛的功力，独特的风格，处处闪烁着书法艺术的光彩。

先生教授书法，以颜、柳推崇的“永字八法”为准。世传张旭首先发现了“永”字备有汉字的八种笔势，可以概括汉字书法的基本诀窍，从而提出了“八法”理论。继张旭之后的颜、柳极倡“八法”说。张稷臣先生对“八法”理论深有领悟，并认真运用于自己的书法实践。他教学生作书，也总以“永”字为根，刻意求工，从不稍求简易。他说，学书须从正楷始，正楷当从“永”字起，一点一画，由简而繁，精演熟练，熟而后生，方可见功；正楷功到，然后改习行书，以至草书，犹如人会站、会行，而后学跳跃、学翻腾一样，立定根基，循序渐进，功夫一到，水到渠成。如果不悟此理，一味求速，浮躁畏难，那就走了背路，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他常说，草木到了叶茂花锦时，人争笑看，固是好景；殊不知锦簇花团，皆由一颗颗种子或一段段根蔓而始。当两瓣破土或一鞘萌发之初，除了种花人之外，他人多不屑于一顾；而后，日逗月拂，风梳雨洗，枝繁叶茂，渐露花容，人始知美，观赏吟哦，日夕流连。学书法亦然，开始练笔时，岂止是不被人注意，甚至还被人讥嘲，而一旦成名，被人赞赏，已是笔秃砚穿，池水遍黑之时，其间正不知度过多少风晨月夕，熬过多少酷暑严寒。对那些学业不扎实，功底不深厚，只见别人成功，不知人家流了多少汗水，自己一

心梦寻捷径的人，先生很不以为然。对那种于书法不深钻细研，不肯下真功夫硬功夫，只知信手刷墨，以假乱真的人，先生常批评说：“狂怪妖媚，俱系俗书，纵邀时名，难逃真鉴。”而对于肯下功夫、努力奋进的学生或社会青年，则大加鼓励，衷心期望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落老师巢臼。他认为，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应当推陈出新，不断发展。特别是在古帖真迹日少，摹本拓片多伪的情况下，更应学古不泥古，法师而超师，在学习古代书法的同时，要结合自己的实践，加以比较鉴别，有所发现，汲取精华，提高自己。他反对那种只慕其名而不辨真伪的虚浮学风，指出：有不少“传世墨宝”，在行家评论时却多言其劣，甚或不屑一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当年位高名显，书以人贵，趋之者竞相鼓吹以讨其欢心，无识俗徒随波逐流以附庸风雅，人云亦云，因循相误。他告诫学生，对书法这门学问，决不可存势利苟且之心，有一些墨迹石刻虽未名显当世，却是妙笔苟留者，要潜心精研，万勿轻弃。

先生一生作书甚多，所到之处，常流溢着他的墨香。民国时山东督军张怀芝在阿城镇皋上村祖茔立墓碑，一时间名流缙绅云集。试书互评，却众说纷纭，都不合张怀芝的心意。当时，先生正在张秋镇设馆，有人荐于张怀芝。先生应邀而往。试笔四座惊，墨落共赞词。故张怀芝祖茔30通碑皆由先生一人所书，由此书名大噪。先生所书北京西山某寺院“蟠桃宫”大字匾额，神韵辉秀，当年誉满京华，至今犹在，见者无不叫绝。阳谷、东阿和原寿张3县，多存先生墨迹。特别是张秋、寿张一带，无论街面还是乡下，公私堂舍，店铺坊寓，多悬挂他书写的中堂条幅，虽片纸只语，却

雅气顿生；至于碑牌帖屏，更是举目可见。可惜“文革”中焚毁殆尽。

先生书法，独树一帜，为当世所爱，被誉为“张体”。起而仿效者颇成一派。其中得其衣钵薪传者，如董麟章、郭子岩、袁心斋、周俊卿、李树德、赵文卿等，多已作古。其子张邦振、其徒高寿山、杨培身、陈金柱、王学伟、侯继澍、党万标、李辰荣、李长玉等，可以为继者大不乏其人，皆追随其后，一脉相承，或有变异，未离其宗。至于崇尚其字，师法其书者，可谓风靡远近诸乡镇，此风正方兴未艾。

先生藏书甚多，精篋中珍储诸多秘本，所作诗文、史稿都精装匣存。“文化大革命”中也一炬为烬。他所撰书的碑刻，“景阳岗”、“王伦故里”、“挂剑祠”、“贾子珍先生教学德行碑”、“汤氏墓碑”等尚存。

先生才高而不骄。他常对赞誉他的人说：“我书不如岳（岳俞会，寿张镇人，清廪生）、熊（熊绍诗，阳谷镇人，清拔贡）”，或不如某某。他那真诚的敬人自谦精神，越发受到人们的敬重。

先生心胸旷达，光明磊落，于人于事，泰然自若，每常躬身自省，存一种淡泊之心，故得颐养百年。他51岁时，曾一度花眼。因坚持在夏秋曙光未射之前散步田野，以麻子叶所承露水洗目，视力很快得以恢复，直到96岁，仍可不戴眼镜读报写字。其听力，90时尚属正常。他的长寿，与其人品、道德、书法有关，以至被传为佳话。

（原载1985年11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冀鲁豫建国学院述略

县教育志编写组 郑芷华执笔

1945年8月14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0日，菏泽城解放，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进驻菏泽。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各种建国人材”，冀鲁豫边区党委和行署于1946年2月23日作出决定，在菏泽成立冀鲁豫建国学院。

1946年3月初，建国学院筹委会成立，前省立六中校长刘培源先生等多人被聘为筹备委员。4日，筹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在聊城中学执教多年的边区参议员王静山先生也出席了会议，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晁哲甫适来巡视工作，也到会指导。会议对菏泽一带新解放区学生的就学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决定了建国学院所设专业和班次。经过1个多月的筹备，4月1日第一届新生入学，10日正式开课。校址在菏泽城内原省立六中旧址。

1946年秋，国民党向鲁西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为了尽量争取有个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建院于8月迁出菏泽，撤到临泽县，西股驻顺城集、大张庄、郝庄一带，东股驻张楼及附近诸村，协助当地群众搞了两个月的土改。9月份，建院随同区党委、行署继续北撤，北过黄河，驻在寿张毛河、孙口一带，秋后又迁到阳谷堤口、油坊。1947年初（春节

后），到筑先县（聊城）搞土改复查。5月，土改参军基本结束后，集合在杜庄、谭庄、郝路口。秋收时节，迁到阳谷城西俞楼、杜庄一带。是年冬，又迁到朝城、南乐的边境大张、马集、范村一带。其间，全院党员教职员，除留下个别人外，全部到定村参加区党委整党会议。1948年4月，整党会议结束，学校迁到朝城西白庙一带。1948年麦收时，学校从朝城白庙搬到阳谷坡里教堂，从此校址固定。1948年底，大部分师生调濮阳、范县、观城工作，一部分南下。战争年代的冀鲁豫建国学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49年2月改为冀鲁豫区第一师范，10月改名平原省立第一师范。

建院是战争年代冀鲁豫边区的一所综合性学校，它既培训党政军干部，又培训师资、新闻工作者、会计、科技人员和培育中学生。初建校时共分3个部：一为行政干训部，设财务行政、司法、银行会计3个班，一为师范部，设师范、中学两个班，一为专门职业部，设电话、汽车两个班，另有一个新闻研究班。上述各部，除专门职业部外，均招收初中毕业学生。建院一开始就有招收300多学生的规模，接着续招师范班、初中班、电报班、电话班、财务行政班各20名，汽车班、银行会计班各30名，又招收初中二、三年级、高中一年级、简师二、三年级编级生5个班。过黄河后，师范班、中学班增多，全校师生近两千人。1947年7月份和冀鲁豫边区第一职业学校合并，1948年初和冀鲁豫边区第九中学合并，教学人员更加充实，行政设置更加完善。学校定址坡里后，调整结构，减少专业，设政民部两个班，师范部两个班，中学部6个班。

建院的行政组织机构是院部，设正副院长、教育长、正

副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另有图书、医务、警卫、通讯、印刷、工厂、货栈、商店等辅助单位。建院一成立，行署即任命杨汉章为院长，张挽钧教育长。开课后，又调第一分区专员张耀南任副院长。张挽调走后，解彭年任副院长兼教育长，后宋辛夷继任教育长。教导主任先后是李蕴玉、吴力践、陈桐源、刘昭；副教导主任先后是刘衍洲、王镜如、杨子毅；总务主任先后是金树尧、王岱峰、王化甫、王怀仁、于克非、张守芹。学校的政治领导核心在1948年初坡里整党以前是院党委，整党以后是党总支。党委（或总支）书记前后是张耀南、解彭年、刘昭，分支书记多由学生干部担任。

各班设班主任，有专职的，如干训班是路丁，师范班是贺光；也有兼职的。还设教导干事（班主任助手），中学班是杨清美，师范班是于传璧。专职教师有高镇五、牛润亭、李云华、岑明、贾崇岩、李蕴华（女）、李宽宏、许伯亮、辛古（女）、肖鲁斌（女）、何建民、王卓如、何绍先、孙亚宁、李华、张明锡、王荣（女）、耿俊如、曹克一等。

建院领导干部和专职教师多半是从后方调来的干部，如张耀南来院前是分区专员，路丁是长征干部，解彭年是20年代的老党员、老干部；也有从游击区、敌占区来的失业知识分子。学生来源，一是机关干部和部队中年龄较小的同志（当时称“小鬼”），例如翟子亭同志原在一分区教导队工作，1946年春带着一分区司令部的信到建院报考；二是干部子女，例如晁哲甫的长子晁丁杰是建院师范班学生；三是解放区、游击区的进步青年学生；四是向往革命、向往解放区的敌占区进步青年学生。他们都是经过政府有关部门介绍来的。入学条件主要是政治条件，年龄放得较宽，中学班16—20

岁，专门职业班16—30岁，文化考核也不很严格，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有大学肄业的，也有中小学水平的。

建院存在于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因此，在办学形式和教学方针上，充分体现了为人民战争服务和为人民群众政治斗争服务的特点。（一）学习内容：中学主要科目包括国语、数学（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历史、地理、博物、理化、政治、常识、外国语等项；师范课程，将以上科目酌情减少，另加教育及美术；电话、汽车、司法、财务行政及银行会计等专门职业班，则偏重于总结实际工作经验和形势政策教育。（二）修业期限：原规定干训部、专门职业部修业期限为6个月，中学修业期限为2年，师范修业期限为1年。以后则根据战争和实际工作需要，采取随到随收、随调随走，流水似的招收分配办法。（三）参军参政：在与国民党军生死搏斗的3年中，建院曾多次抽调部分师生参加支前工作，并多次组织师生南下。1947年秋，刘邓大军渡黄河，建院有80名优秀师生参军参战；1948年底，大部分干部、学员北上参政，一部分南下（少数师生留在坡里，编入师范）。（四）为群众政治斗争服务：1947年春，建院全体师生，组成土改复查工作队，到筑先县（聊城）同地方干部一起，发动农民进行土改复查；土改结束后，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参军人数达几个团之多。在帮助土改、发动群众参军工作中，不少师生立功受奖。1948年6月修渠、8月扑蝗，战绩辉煌，至今犹留在当年师生的记忆之中。学校所办的以介绍服务政治中心经验为主的校刊（油印，16开毛头纸），登载着立功者名单和表扬信，是当年情况的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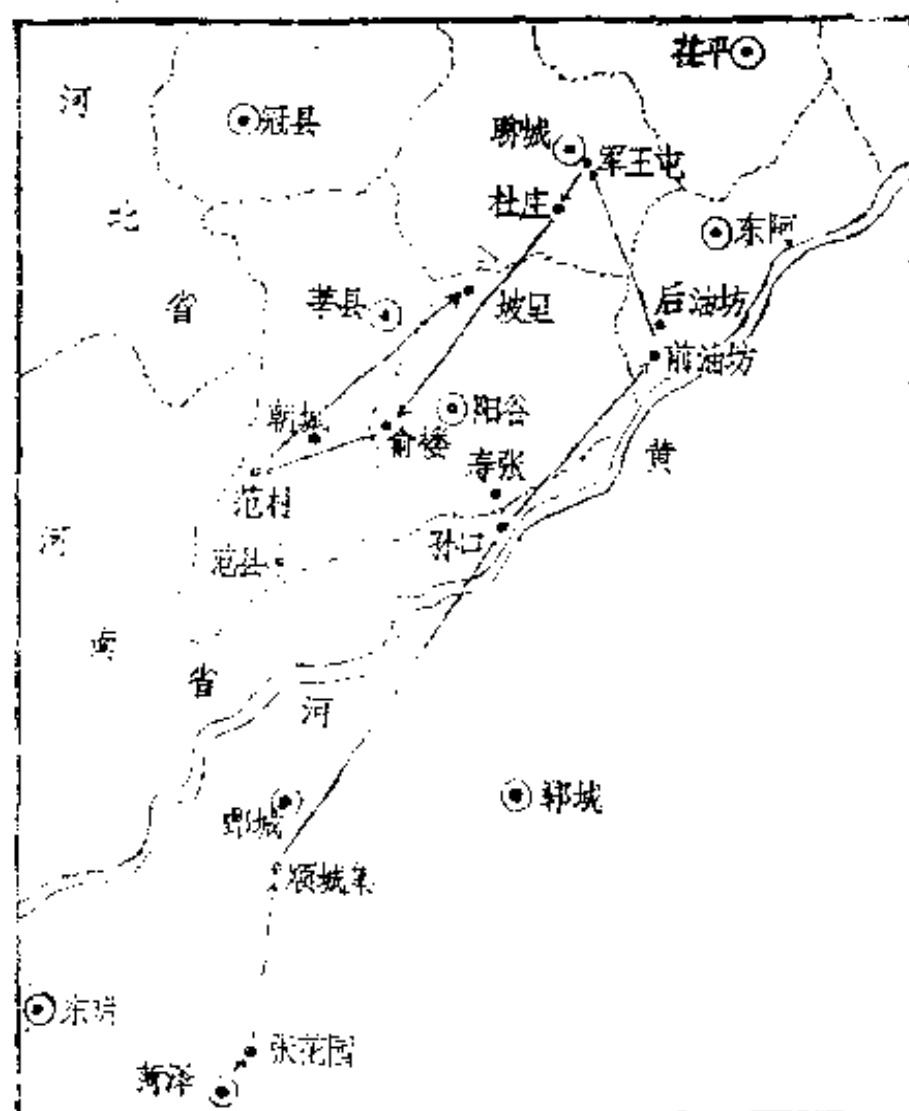
建院师生经受了战争年代艰苦生活的磨炼，教职员实行

供给制，学生除中学自理外，其他均由国家供给膳食、书籍和灯油费，家庭困难的补助衣服。吃的小米饭，穿的粗布衣。学习条件也很差，没有校舍，住群众房屋，一口住房，既当教室，又当宿舍和饭堂。学习没正式课本，靠抄讲义、记笔记，使用的纸张全部是边区和本校生产的毛头纸。汽车班没有供实习用的汽车头，化学课上没有做实验的仪器。学校流动时，运输工具靠群众的牛车。

经过战争洗礼和艰苦锻炼的建院领导骨干和教职员，在建国后，有的成为大专院校的领导人，有的在党政军或科技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如杨汉章任山东省人大代表、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高镇五任河南省教育厅长、副省长，刘昭任贵州省政府秘书长，宋辛夷任郑州市委副书记，解彭年任贵州化工学院院长，于传璧任新乡市郊区党委宣传部长，王镜如任北京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陈桐源任云南省化工厅长，李宽宏任贵州省教育厅长，杨子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党委书记。建院所培养的数以千计的优秀学员，如今在党政军文各条战线，已成长为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骨干，担负着重要职务，如石友堂（湖北军人疗养院党委书记）、李方茂（上海党校政治部主任）、杨荣贵（三门峡钢厂党委书记）、苏达（新乡市副市长）、段纯华（原子能研究会专家）等。建院大部分时间驻阳谷境内，当初阳谷在建院学习的甚多，现在本县担任领导职务的，如张子魁（副县长）、王汉杰（县委统战部长）、魏之林（县一中校长）等，据统计有30余人。

冀鲁豫建国学院建校3年，在冀鲁豫边区革命斗争中创立了不朽业绩，在该地区教育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篇章。

附：冀鲁豫建国学院搬迁路线图



（原载1983年10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辑，1984年5月《聊城地区党史资料》第九辑、1985年6月《聊城地区教育史志资料》第二期载）

本文作者 郑芷华，1932年生，梁山县人。1954年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在阳谷一中任语文教师。1983年后主编《阳谷县教育志》、《阳谷一中校史》，1987年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冀鲁豫边区卫生学校简介

县教育局编写组 县卫生志编写组

冀鲁豫边区卫生学校建于1947年10月，校址在阳谷县大布乡李堂村。校长由边区卫生局局长李奕兼任，副校长由边区医院院长苏厚润兼任，政委是陈辑五。学校的具体负责人是李协理员；李调走后，贾波当队长。一年之内换了3个领导人，这3个领导人都是负伤后一面养伤一面工作的，伤养好后就归队了。

学校在行政上归边区卫生局领导，在业务上归边区医院领导。只有3个专职教师，其他教师由医院的大夫兼任。医院当时在那楼，离李堂1里多地。美籍国际友人哈利生带着器材、药品来华支援我国的抗日战争，不幸在阳谷县张秋镇病逝。为了纪念他，边区医院命名为哈利生医院。

当时学校有100余人（其中女生六七人），按军事编制分为3个区队，一个区队3个班，以班为单位活动，行动军事化。

主要课程有3门：药理学，由徐老师（医院司药）教；生理解剖学，由关老师教；战场包扎，由贾波队长教。另外还有政治课，由陈辑五政委教；外语，学拉丁文。

学生来源：大多是军队、地方保送来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也有从学校保送来的参干的学生。学生年龄小的十

五六岁，大的二十四五岁。文化程度也不齐，有小学毕业的，也有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实行供给制，管吃管穿，每人每月6斤小米的津贴。

学校设备相当简陋，教具都是自制的。附近有无主孤坟，夜里老师领着学生扒了死人骨头装在麻袋里，回来蒸后装成整副骨架；枪毙人后，把无主尸体拿来解剖，或把各器官（心、肺、肝、膀胱、男女生殖器等）放在药水里当标本。

教学方法：除老师讲授外，还提倡互教互学，“一帮一，一对红”。这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很大作用。

学生实习，就在边区医院里。打针、换药、包扎、治疗，外科、内科全面实习。虽然学的是护士专业，做的却是医生的工作。实习时，夜班没有夜餐费，晚饭时学生便自己留个窝窝头或地瓜当夜餐。给伤员端屎端尿，喂药喂饭，洗衣服，洗绷带，什么活都干。有时还给伤员输血。有一次，有个伤员流血过多，生命垂危，校领导号召学生献血，16岁的唐义同学献了100CC，因为年轻，学校领导不让多献。

学校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当时有个外科大夫叫冯兰馨，因为出身不好被斗争，校长李奕给他解了围。后来冯兰馨调到北京，还出了书，做出了贡献。

冀鲁豫边区卫生学校第一期于1948年八九月间毕业。第二期招生后就迁往菏泽孔楼，后又迁往新乡。1949年10月平原省成立，学校又迁到河南汲县。第一期毕业的学生大部分随军南下，一部分留当地工作，阳谷、聊城、新乡、郑州都有。这些同志大都成了各级医院、卫校的负责人。如：陈锐锋，在保定卫校任讲师，郑国兴，在贵阳市人民政府任副秘

书长；车震，在贵州省防治地方病办公室任主任；李明彬，在贵阳市任纪检副书记；范新华，在贵州省中心血站任党支部书记；刘鸣君，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卫生院任院长；胡志彬，在聊城市医院任外科主任；唐义，在聊城地区卫生局任副局长；庞同德，在聊城地区医院任副书记；吕宗章，在聊城地区药检所任主任；单德润（鸿泽），在东阿县医院任党支部书记；陆嘉全，在阳谷县寿张医院任外科主任；于福海，在阳谷县防疫站办公室任主任。冀鲁豫边区卫生学校对党的卫生事业做出了贡献。

（原载1986年11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冀鲁豫边区抗日第四中学一分校

崔衍双 整理

一、学校概况

1945年7月阳谷县城解放，全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为了培养革命建设人才，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在阳谷创办一所干部培训班性质的学校，遂于8月在县城原中学旧址，成立冀鲁豫边区抗日第四中学一分校。办学宗旨是适应革命需要，培养革命干部。

当时由边区四中派人来接收敌伪时期的中学、师范，组织筹建分校。阳谷县长岳舜卿指派李鸣陆、崔才等协助筹建工作。岳舜卿以县长兼校长的名义发布告，动员敌伪时期中学和师范的学生回校学习，教师继续任教，同时招收新生；岳县长还亲自动员他家岳海及附近村的学生回校或报考。起初招一级两个班学生120人，1946年招二级1个班60余人。原中学师范的50多名学生编为1个班，后因有的学生被抽调参加工作，人数渐少，遂将这个班学生编入一级两个班中。1946年还建立了中学附小即高级班，招生60余人，校长为崔衍勋，教师有熊兰生、武子栋、谷何。

1946年底，国民党新五军进犯范县一带，为了有个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学校由县城搬到七级大杨庄。此时又招三级

1个班60余人。1947年初搬到东阿县秦老庄，和抗日第四中学本校合并。分校一、二、三级分别并入本校五级、八级、九级，上年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学生回校后并入六、七联级。当时校长是张海萍，副校长傅毅远，教导处主任田民。因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学校不能固定在一个校址。有时为躲避敌人的袭击和轰炸，师生住在农民家里，在树林里上课。

二、学校领导机构和教职员

分校隶属于冀鲁豫边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由边区教育处管辖。直接领导是边区第一地委和专署（以后划归第六地委和专署），同时还接受边区四中和阳谷县委的领导。学校主要负责人是校主任（即校长），下设教导处、总务处等机构。政治领导核心是党支部，设政治指导员（即支部书记）。当时人员情况是：分校主任李玉慈，教导主任林翔（又名金默生），教导员范新平、吴忠民，教导干事王秀阁（女）、马凯民（女），政治指导员崔才（又名崔存才）、范新平，总务处负责人王敏，会计刘安仁（已故），管理员隋继春（已故）、杨震（已故）。

教员有李鸣陆（又名李玉宏）、崔跃南（又名崔存斗，已故）、张含贞（又名张蕴淑，已故）、张松坡（又名焦衍祐）、杨志宏（又名杨宗汉，已故）、郎镜如（已故）、吴忠民（兼）、范新平（兼）、王社光（又名王会祥）、吕廷枢（又名吕秉钧，已故）、胡学达（已故）等。

1946年秋，李玉慈去边区党校学习，由阳谷县委宣传部长阮浩兼任学校负责人。

党支部成员是李玉慈、崔才、范新平、林翔、郎镜如、吴忠民、张松坡。

学生会成员有杨宪敬、周作栋、周凤兰（又名周森，女）、苑清洛、翟世春（已故）。

三、学生来源和分配

学生来源有几方面：党政军中年龄较小的同志（当时称“红小鬼”）；革命干部军人的子女；各地抗日高小保送和考入的优秀学生；从敌占区投身革命，通过党的地下机关介绍入校的进步青年；各地选送的优秀青年教师和儿童团的干部；根据地机关干部在职培训。如一级学生周作栋、秦广荣、陈振元、陈明昌、刘文宿，都是地下党员；周凤兰、杨先梅（又名杨坤，女）、邱笑是革命干部子女，原来在外过流亡生活，无家可归；林斌是革命干部亲属；林岩（又名王学军）、周义秋（又名周介民）、孙兴和是机关选送的在职干部。

学校没有固定学制，革命何时需要，何时抽出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学生成批的被分到军区、军分区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工作，及时给各部门输送干部；还有部分学生保送进冀鲁豫建国学院、军事干校继续深造，有的留校工作，如苑清洛、杨宪敬、秦佃文、陈克明留校任教导员、管理员；还有的跟随大军南下，如韩庆丰、魏玉湖随部队南下大别山，刘文宿在冀鲁豫九地委报社工作岗位上下南贵州。

四、课程设置的课外活动

为了培养干部、快出人才的需要，从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增强写作能力出发，学校以政治、语文为主要课程。

政治课主要内容是，结合党的中心工作，讲授党的方针、政策，以便于学生参加减租减息、增资增佃、征收公粮、支前、土地改革和其他突击性的工作。主要教材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反对自由主义》、刘少奇《新人生观》、朱德《论解放区战场》、艾思奇《社会科学概论》以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理论。教学目的在于端正学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除联系革命斗争实际学习革命理论外，还经常邀请上级党政领导来校作政治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当时地委书记申云浦曾多次到校作政治报告。

语文课，主要选学毛泽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鲁迅《阿Q正传》等。为激发学生的爱国革命热忱，还讲述我国古代民族英雄的诗文，如岳飞《满江红》、文天祥《过零丁洋》等。为了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还选讲一部分通讯报道、党报社论和文艺作品。

为开展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的需要，数学课只选学了四则、比例和代数部分内容，而未系统开设。其他课程，多根据实际需要和师资条件开设，如农业知识、历史、地理、音乐等。没有正式课本，讲义都是教师自编，学生刻版油印的。

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学校行动军事化，一切活动都是集体统一的，有较强的部队特点和作风。学生分年级、班、组，相当于部队的连、排、班。早操、开会、上课、行军、住宿，都以班组为单位。每个学生都有一套“被夹子”，是

用小木棒做的象篮子鼻样的东西，行军时背着被子，上课时放在地上做凳子，膝盖当课桌。

学校政治空气浓厚，党的组织虽不公开，但组织严密，发展党员和党的集会均以秘密方式进行。年龄大、表现好的学生随时被吸收入党。苑清洛、杨宪敬、周凤兰、杨先梅、翟世春、胡欣之等都是在学校入党的。学生每周开一次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地、县和学校领导人经常利用周会和政治课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五、学校经费、师生待遇

学校经费由上级财政拨粮、款，学费、讲义费、医疗、伙食，全部实行供给制，家庭困难的和无家可归的还发给衣服。政府还在城西任老伍村周围拨给50亩地，学校买了耕牛、骡马、大车。为改善生活，还养猪。由专人分管生产，学生轮流参加劳动。教师也是供给制，每月发给一定数量的小米作津贴。

六、学校对革命事业的贡献

这所学校从创办以来，始终是边学习，边参加革命斗争实践，为群众革命斗争服务。根据革命需要随时抽调学生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冬曾组织部分学生到农村参加减租减息。1946年下半年，抽调学生30多人，参加阳谷土改工作队，历时半年。在校学生经常到集镇和农村，进行革命形势和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宣传。1947年，全校师生又组成工作

队，参加土改复查。土改结束后，又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在参加地方群众运动中，有不少师生立功受奖。

经过战争洗礼和艰苦锻炼的学校领导和师生，建国后走上了全国各条战线。南至康藏川黔，北至内蒙、东北边疆以及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分布在党政军、科研、学校等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本文作者 崔衍双，1930年生，中共党员，1982年在阳谷县计委任副主任时离休。作者系冀鲁豫边区四中一分校一级学生，此文根据李玉慈、崔才、范新平、张松坡等提供材料整理。

（原载1986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1964年前的阳谷师范

赵 明

一、学校成立经过

1945年抗战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可是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妄图独吞胜利果实。我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在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同时，拿起武器保卫胜利果实，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1947年我区进行土地改革，广大贫苦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翻了身；各村农会有很大的权力，贫下中农当家做了主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迫切要求在文化上也得到翻身。当时每个区只有1处完小，几个村才有1处小学，而且师资很差，很多小学教师连小学课本也读不通。根据这种情况，冀鲁豫九专署决定抽调各地教育干部，于1948年夏天，在寿张县莲花池村借用群众房屋成立了小学教师轮训队，对范县、观城、朝城、寿张4个县的部分教师进行短期轮训，让他们首先学通小学课本，初步会用启发式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质量。队部设立办公室，主任是于佩之，教导员是陈东原、陈经堂。各县教师自成一队，生活学习由1名班主任、1名管理员和两名教师负责。

为了进一步满足广大群众要求，1949年初，专署又决

定利用原轮训队的家具和一部分干部，在朝城县徐集村成立短期师范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和有上进心的青年，男女兼收，学制1年。同时附设高训和初训3个教师班。校长由专署教育科长夏子凡兼任，教导主任仍是于佩之，总务科长是陈经堂。

2月开学以后，陆续招收一级新生4个班（包括师训班因年龄小未分配的116名学员），和初训、高训两个师训班（夏天毕业）。6月招收二级新生两个班。秋后，从莘县转来1个班，也编为二级。为了切实提高教学质量，造就一支教师队伍，当年秋天，专署又决定范、观、朝、寿、莘和东阿6个县联合成立师范学校，校址设在阳谷县安乐镇，招收高小毕业生，男女兼收，学制3年。八九月份，学校用自己的马车把一切教具、炊具等学校用具，全部搬到安乐镇。开学时原短师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一齐到校，校长仍由夏子凡兼任，教导主任于佩之，总务科长（主任）陈经堂，还配备了1名校医（张汉三）。校园不大，长满了荒草，还有70多棵洋槐，笼罩着缺少门窗的房屋，呈现着阴森凄凉的景象。随即雇工维修房屋，赶做桌凳门窗，师生自己动手安玻璃、上油漆，整理环境，稳定生活。为了便于学生实习，将安乐镇完小改为师范附小，配备主任全面负责。

建校后，大家勤勤恳恳地工作学习。校领导首先制订工作计划，学期中间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学期终了进行工作总结。教导处、总务处和各教学研究组、全体教职员，也都照例制订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教师上课都有备课笔记，下课轮流辅导自习；学生有听课笔记和作业练习。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和星期天，扒掉日伪炮楼，填平学校门前的围子壕，不

到半年时间，在一片废墟上建起了新校园。教师 4 人 1 间房，学生多数睡土炕，生活供应多粗粮。虽然有些困难，可是大家都无比欢欣。节日期间，课外活动，甚至上早操时，都敲锣打鼓，奏军乐，唱歌跳舞，扭秧歌。

入冬，将学生重新编班。把原一级年龄较小的学生编成 1 个班，并入二级，这样一级成为 3 个班，二级成为 4 个班。建校开始实行春季始业，1950 年改为秋季始业，全年放寒暑假。头两年实行的是供给制。关于干部任免，教师派遣，招收新生和毕业生分配，统归专署领导。

为急于向国家输送人材，普遍提高小学教师的水平，50 年代中期曾招收两届 1 年制中速师和两年制初速师。1959 年暑假举办一届初中教师培训班，将原中师 5 个班的学生（一师合来的）编成语文、数学、理化、史地 4 个班，分科教学，并去坡里中学等学校实习。

二、组织领导和主要负责人的更替

校内建有党支部，下有若干党小组，党支部书记先后为陈东原、于佩之、岳克寒、杨道卓、张端甫。还建有团总支，下有若干分支。团总支书记先后为谭赅曾、杨道卓、肖新民、张海清、刘怀钦等。另外，中苏友协、教育工会、学生会等组织也都定期开展活动。

学校行政领导为校长负责制，校长掌握全校工作，向上对政府负责，对外代表学校。校长办公室组织校务会议，研究学校工作，处理重大问题。教导处设教导主任，负责教学业务和对学生的教育，通过各科教研组改进提高教学工作，

通过班主任会议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总务处设总务主任，负责校产管理和师生的生活，通过处务会议改进工作。

历届校长更替情况是：

第一任夏子凡(兼)，1949—1950年。第二任于佩之(副)，1950—1951年，调平原省教育厅。第三任岳克寒(副)，1951—1952年，调聊专教育局。第四任陈东原(副)，1953—1954年，调临清师范。第五任董鲁，1954—1956年，调山东省教育厅。第六任张端甫(副)，1956—1965年，调聊城师院。1957年一、二师合校后，第一副校长为常静萍，1957—1958年，调聊城师专；副校长还有张端甫、张云峰(1961—1970年，病逝)。

三、学校的规模、沿革和两次搬迁

1、规模：阳谷师范初名为平原省九专署联立安乐镇师范学校，设于安乐镇南街战前山东省立第四职业学校旧址。学校面积20余亩，房屋百余间，学生7个班300余人，教职员工30余人。

1956、1957两年扩建办公室18间、大伙房10间、教室12间、平房10余间，学校面积达30余亩。1957年暑假，阳谷一师和二师合并，图书达上万册，教具、仪器等学校用品一应俱全。1958年，校内有初速师(2年制)、中师、中速师(1年制)13个班，546名学生，教职员工60余人；附设小学教师函授部和星期日学校，辅导各区小学教师的学习。这时是学校规模最大的时期。

从建校到1964年再迁寿张前，总计共招收学生65个班，3030人，毕业学生60个班，2828人。

2、沿革：其前身为1948年的冀鲁豫九专署教师轮训队，驻原寿张县莲花池村。1949年上半年为冀鲁豫九专署联立短期师范学校，驻原朝城县徐集村。1949年下半年为平原省九专署联立安乐镇师范学校，驻阳谷县安乐镇。1952年12月平原省撤销后，称阳谷师范学校。1954年改称阳谷二师（坡里为一师）。1957年暑假，阳谷一师并入二师，仍称阳谷师范学校。1958年底阳谷县撤销，划归寿张县，改称寿张师范学校。1964年寿张县撤销，恢复阳谷县，校名也复称阳谷师范学校。

3、两次搬迁：根据领导指示，1960年4月，学校搬迁寿张，调用小车（地排车）80余辆。有些东西不便装小车，就肩挑人抬。阳谷中学、寿张中学都帮了很大忙。可是，1961年8月，又从寿张搬回安乐镇。张端甫校长在师范返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当前国际形势很好，国内形势有很大好转。一个专区3个重点师范学校，我们学校在寿张，就偏南一些，阳谷30万群众一致要求我们回来，阳谷县委还拨给我们300亩地，让咱们搞好生活，这样我们就有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的困难还是很大的，同学们的助学金每人每月只有8元5，咱们家底不厚。可咱是重点学校，咱得提高教学质量，所以我们今天得把生活搞好，把学习搞好。同学们要明确学习目的，加强纪律性，提高思想觉悟，还要搞好群众关系，要通达世事人情，借东西一定要还……”接着教师崔英仁、学生时福维等发言表决心。散会后，大家以“我们怎么办”为题目进行讨论。

由于自然灾害，生活困难，学校接着放长假1年。张喜鸾等几个无家可归的学生转往聊城。在校教师代管初中3个班。

1962年7月两个师训班进校，9月中师八级4个班复课，12月份以3个中学班为基础，成立阳谷县第四中学。1963年师范九级、十级学生复课。1964年春，领导又指示，根据形势需要，学校再迁寿张。这样，在学生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于暑假期间，学校第二次搬往寿张。两次搬迁，给学校造成很大损失。

四、教师和教学工作

建校初期，教师情况比较复杂，有东北的，有江南的，有大学毕业生，也有师范和中学毕业生，有老教师，也有小青年；出身有地主富农，也有贫下中农；还有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日伪专员、法官、国大代表。由于当时注意了对旧人员的团结改造，因此，都能大胆高兴地工作。以后，经过“镇反”、“三反五反”、“肃反”、“整风反右”等累次政治运动，清洗整顿了教师队伍。大家普遍表现积极小心，服从领导，钻研业务。实行“集体办公”、“五环教学”制度化，开展学习普通话，并运用普通话教学，课堂上正规板书。

学校一向没有统一的专用课本，按照教学计划，初师、初速师开设语文、代数、政治、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动物、植物、体育、音乐、图画等十几门课程，采用初中课本，另有专业课教育学，同时设实习课（平日见习），毕业时则集中实习。每周30课时左右。中师、中速师则采用高中课本，增设儿童心理学和各科教学法，每周也是30课时左右。1958年以后，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的口号下，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增设劳动课；学校建立农场、饲养场，有生产地30亩，养猪80头，羊50只；另有面粉厂、化肥厂、木工厂、编织厂、缝纫厂，还“大炼钢铁”。这些场（厂）的建立，有一定的成绩，但是打乱了教学秩序，对学生文化课学习造成很大损失。

1959年，按教学计划安排课时，规定学生每天睡眠8—9小时，吃饭、休息4—5小时，上课、自习和课外活动（包括校会、班会、团会、文体活动）共10小时。

为了改进教育工作，提高教学水平，学校曾采取了几项具体措施：

①成立教学研究组。有语文、数理、史地、艺体等小组，每星期开会1次（政治学习和业务研究间周进行）。

②进行集体备课。同科同教材的教师，在自备的基础上集体研究，统一教学目的要求，确定重点难点，研究教学方法。

③组织相互听课和公开课。印发听课卡片，规定每人每周最低听1节课，取长补短，以老带新，有计划的将新教师的课排在老教师课时后边，便于新教师边学边教；让职工随班听课，充当不在名册的学生，提高文化水平，在有经验的教师教某一课时，号召各科教师一起去听，各取所需，即所谓“公开课”。

④组织观摩教学。各教研组每学期组织1—2次观摩教学，事先确定教材、课时和教员，人人备课，集体研究，通过教案，事后进行总结讲评，让执教者先谈体会，大家再提优缺点，组长作总结。

⑤鼓励教师进修。选送青年职员去省党校学习，让青年教师参加高考，组织教师参加山师函授。使有的初师教员成

了大学毕业生、留学生、讲师、建筑专家。

五、思想教育

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是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和专业思想教育。教师备课，要深入发掘教材中的思想因素，作为一项教学目的写入教案，并贯彻于课堂教学中。党团活动、节日活动和一些课外活动也都贯彻思想教育内容。在专业教育方面，通过见习课、集中实习，请毕业同学回校作报告、请老教师作报告，树立教育事业崇高、教师地位光荣，立志献身教育事业的思想。

历届学生都是那样的纯洁、朴实、刻苦，服从领导。他们毕业时对学校特别留恋，彼此难舍难离。最后都能愉快地接受分配，以到困难的地方去为荣。50年代前期，一般是各回各县；50年代后期，有了支援外地的任务，凡要出县或去外地区，不管路远，交通不便，都是按时报到。在工作岗位上，他们埋头苦干，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没有辜负学校对他们的培养和期望。

六、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

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继续，对活跃学校生活，巩固课堂成果都起到作用。各科成立课外研究小组，定期活动。学生会文娱部组织同学唱歌、跳舞、演戏。刚建校时，大家唱《解放区的天》，跳邀请舞、交际舞，演话剧、歌剧。1951

年聊城组织中等学校文娛会演，学生王冬梅、卢培秋等在新华舞台演出大型歌剧《王秀鸾》，获得总分第一。同年地区组织中等学校田径运动会，在孙懋官老师指导下，学生张广恩、王祥云等大显身手，总分名列前茅。1958年寿张县组织中等学校文娛会演时，在黄正刚老师指导下，学生张西元、马桂英等自编自演《逛寿张》（四平调）等节目，获得了第一面红旗。

社会活动方面，建校初期曾帮助安乐镇北街成立夜校，群众情绪很高。抗美援朝时期，学生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宣传，逢集去大街敲锣打鼓、演讲、扭秧歌、打腰鼓、拉洋片，晚饭后组织广播筒上街，或抬着汽灯下乡演戏，揭露美帝侵朝罪行。1958年后，在进行劳动教育的基础上，重视了支农工作。每当麦秋时期，就和附近生产队联系，帮助抢收抢种，尽管当时生活条件不够好，但是大家情绪很高。

以上回忆有错漏之处，敬希指正。

本文作者 赵明，1919年生，河南省清丰县人，中共党员。解放前即从事革命教育工作，曾在阳谷师范工作多年，先后任教师、附小主任、教导副主任。师范搬迁后任阳谷四中（后改七中）教导主任，1974年4月任阳谷二中革委副主任。1976年退休，1980年改离休。

（原载1983年10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辑，1985年3月《聊城地区教育史志资料》第一期载）

八乡师建校

张景颢口述 刘子长整理

30年代初，山东省已有7处乡师，又准备建立第八乡师。原计划设在烟台，因烟台在福山县境内，福山有些人以文化落后为理由，要求建在福山县城内。两地相争，并都托人到省教育厅活动，教育厅也举棋不定，实在作难。一次，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和秘书杨沛如闲谈时说：“关于八乡师建校问题，烟台和福山争得很激烈，事到如今，建在哪里厅里都不好说话了。如果有个第三者申请，那就干脆挪到别处去建，以免打哭一家，引笑一家。”

杨沛如是原寿张县莲花池人，他听了何思源的谈话，便想到把建立八乡师挪到寿张的问题。当时寿张县在济南工作的，除杨沛如外，还有金斗营的王聘三，在省教育厅任内收发主任；蔡楼的蔡蕴之，在教育厅任省督学；吴口的马春海，在省建设厅任技正；我在省第五实验小学（在济南市三合街）任教导主任。因老乡关系，几个人经常到一块玩。于是杨沛如便通知都到他住处（正谊中学）商量此事。一提这个事都很高兴，并表示抓住良机，坚决办好此事。

第二天，杨沛如便向何思源提出了这个意见。何思源为卸烟台、福山之争的包袱，便欣然同意杨沛如的意见，答应八乡师西迁寿张，但要求县里拿出3万元作建校经费。杨沛

如说，只要能这样办，可回去与县里商量。何思源说，可赶快去人商量。杨沛如又召集几位在济南的老乡商量，决定派我急速回县办理此事。

我回县后，见了县长尚焕章、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雷电霆（梁山县人）和教育科长张××（单县人，曲阜二师毕业），给他们一提此事都很欢迎，表示决心办成。于是尚县长很快就召集了各区区长、科长和商会会长等有关人士相商，主要研究钱的问题，结果大家一致同意附加征收，按地亩摊敛。财科科长朱瑞五（原寿张县高张村人）说：“敛附加得请示省财政厅批准才行。”经请示，省财政厅答复说，不到完银米的时候，不能敛附加，等完银米时可以加在一块；此款当时不能敛。这时商会会长蔡如清表示，可由商会暂把此款垫支出来，以后再还。向银号和商店也都借了款。钱的问题解决后，县教科马上写了要求在寿张建八乡师的呈文，叫我带着去省里回报。

我到省教育厅找到杨沛如，向他说明回县办理的情况，万事俱备，只欠批准。杨沛如立即向何思源交了呈文，很快就获批准，指定王豪卿（惠民人，北大毕业）为八乡师筹建主任，又派我到寿张教育局任督学，协助王豪卿筹建八乡师。

在寿张建八乡师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阳谷。阳谷有些人认为，阳谷的条件比寿张好，八乡师应该设在阳谷，于是就派人到省找陈耀汉活动。陈耀汉是阳谷陈集人，任五十八师师长，省政府委员。陈认为这是给家乡办件好事，很热心办理，便找省主席韩复榘，要求把八乡师建在阳谷。韩复榘把陈的意见及时转告了何思源。何思源刚批准了寿张的呈请，不好再改口硬挪地方；同时又感到韩主席和陈师长的面子不

好驳，衡量轻重，认为阳谷的根子硬，对寿张建校发生了动摇。在王豪卿赴任寿张临行之前，何思源密告此意，说到寿张筹建若有困难，就挪到阳谷去。王豪卿到寿张后，对建校表现了多方刁难，仅校址的确定，就费了很大周折。县里起初提出建在文庙，不行；后提出建在武衙门，也不行；又提出建在北关（现二中处），还不行。县里说：“你看哪里行呢？”他想来想去，说：“建在东关东头。”他可能认为那里太洼，县里不会同意，不同意就以无适当地址为名，迁到阳谷去。县里向王豪卿提出，此处太洼，雨大存水，不合适，他根本不听。县里也看到，如不同意此处，就有迁到阳谷的可能，最后决定，建在此处也不能叫它跑了，于是就同意了王豪卿的意见。王豪卿一看挪动的目的达不到了，就回教育厅向何思源作了回报。何思源一看校址挪不成了，就暗许陈耀汉第二年在阳谷建一所省立第四职业学校。八乡师这才算最后确定建在寿张了。

校址定后，便由县出头买地100亩，50亩建教室、宿舍，50亩建操场、农场。王豪卿从济南调来了建筑工人，建筑材料也是从济南运来的，开始动工。一面建校，一面招生，先招了两个班。这时，省正式明确王豪卿为校长，高秉然为教导主任，教员多是北大毕业的惠民人。大家说，八乡师是“北大派、惠民帮”，名不虚传。

八乡师建附小后，调我到附小任教导主任。这时有人反映王豪卿在建校中有贪污行为，并告到省里。省教育厅派督学吴兰圃到寿张调查此事。吴兰圃是我在曲阜二师时的级任老师，我以师生关系去看望过他几次，因而引起王豪卿的怀疑，认为我向吴兰圃反映他的情况，于是就对我冷眼相待。

我不愿受此冷遇，便辞职离开寿张另谋职业。以后八乡师的事我就不清楚了。

（原载1986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四 职 始 末

李玉法 高澄波

山东省立第四职业学校设在阳谷县安乐镇，建于1932年，1933年招生。该校发起人是陈集陈耀汉，监修总管是安乐镇申刘庄申鸿渐先生。建校花洋3万8千元，连同立纪念碑，请人撰写，共计4万多元。建筑木材均由济南运来，又从荆门闸运来石头，建筑工人也是济南来的。学校建成后，又在门外盖了几间门市部，以便推销货物。1933年夏，省教育厅委马东瀛（号海宸）为四职校长，李伦福为训育主任，任俊甫为教务主任（李、任均系单县人），定校名为“山东第四染织职业学校”；所用教职员工，也是上级派来的，教师都是大学染织科毕业的专门人才。暑假开始，当年招考3年制正科新生两班，次年续招3年制两班，另外又招1年制速成科新生1个班。先招的正科两个班和速成科1个班毕业了，后招的学生因“七·七”事变发生，学校停办未能毕业。所学课程，虽也有语文、数学，但还是以染织为主。当时中国纺织还多是手工业生产，所出布匹为手工机织品，成本高，质量低，抵不上进口的外国机械化生产的布匹，况且人民生活贫困，宁穿自织的贱价土布，不买国产布，因此纺织品销路窄。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从职业学校毕业后，往往找不着工作，一套本领卖不出去，多数不得不转入小学当教师。用非所学，学

而无用，这是一种矛盾现象。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在教育上也是无能为力。

陈耀汉，一名陈超万，字子杰，是国民党五十八师师长。他参加过围剿红军，结果被打得溃败。他为什么修建四职呢？有人说，陈因当师长发了横财，对上级想买个捐资兴学的美名，对家乡也落个为地方办公益的名声。陈耀汉原打算在安乐镇办一处陈氏私立中学，因南京教育部当时办学宗旨标榜发展职业，振兴实业，不再发展中学，因此备不上案；他无奈只好听从命令，把校权让出，自己甘当一位名誉校董。陈本是有文化的人，曾当过省立六中教员。四职建成后，为了立石纪念，特请河北省前清翰林高步瀛先生撰了一篇碑文，又请关外长白山人著名书法家宝熙先生书写，原文是写在纸上的，工笔正楷，二人各酬400元；从北京琉璃厂请来一位刻碑能手，也花钱不少。碑立起后，附近文化人争往观看，安乐镇街有个姓张的前清秀才，也去看碑，连字都认不下来，悻悻而回。原来碑文引用了好多不着边际的古典，内容空洞，文字艰涩难懂，很多是古体字。文不通俗，字不合今，难怪很多人看不懂。

“七·七”事变后，学校停办，校长教员逃避一空，留下事务员王某看校，这个人把能卖的东西卖了个精光，最后也跑了。解放后，校舍改建，现为阳谷七中。碑也早被拉倒。

（原载1986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关于四职的回忆

顾寿祥 王福来口述 李印元整理

山东省立第四职业学校于1932年春建校，由陈超万捐助现洋3万3千元。传说他半年没发兵饷，扣下钱建了这个学校。陈超万曾任国民党五十八师师长，他家陈集原属安乐镇老四区。建校由申集磐主办总务。校址设在和尚坟地（安乐镇旧有庄严寺），有三四十亩。当时盖了3排教室，还有宿舍、伙房，共130间。招生时房子不够用，以后又接着盖。还建有车间厂房15间，安了十来台织布机器，有提花机、铁机（木机在别处）。织布厂机器房后来改成了礼堂。

四职是培养染织技术人才的专业学校，设有染、织两科。请的教员都是学染织的大学毕业生，教织的是张中南，教染的是范文轩，天津人。校长马东瀛也是大学生，菏泽人，学校停办后他去了仁丰纱厂，听说现在还健在。办学宗旨是为发展平民工厂（织布），培养厂长、技师。1933年暑假开始招收3年本科两班，每班40人。第二年招1个1年速成班，两个本科班，共120人。以后每年招两班。学生外县的多，莘县、聊城、郛城、鄆城、菏泽、济南的都有。我俩都是上的本科一级一班，刘韧（刘瑞峰）在二班。安乐镇街上的李长修（现在阳谷百货公司）也是四职学生。

1936年北京清河镇的国民党军政部织呢厂要人，曾去了

33个学生，后来北京失守，工厂南撤，学生大多跑了回来，只有王学彦（王福来的叔）、刘庙刘维印（已故）、郅城袁廷贞 8 人留厂。王学彦原在银川轻工业研究所当工程师，退休后被潍坊第二毛纺厂聘去。

1937年阴历九月，阳谷县长杨霁峰弃职南逃，学校也随之解散。之后利用原校址临时成了个山东省立安乐镇联中。1939年忠孝团占据了学校，把学生轰散了。1940年日寇汉奸又将原四职和小学占据。1945年阳谷解放后，县里办的教员训练班曾住 1 个月，以后又安成区部。1946年下半年又改成培训排级干部的随军学校。

在四职停办、联中还没成立前，范筑先曾在这里办了个小加工厂，派了个姓郭（？）的厂长，收罗过去织过布的人，给部队织白洋布染军装。顾寿祥和石佛孙庄的孙庆云都参加了。郭很凶，说要实行军事纪律，顾寿祥待了一段就去陈集了，那里也有个织布厂，原是老师为解决生活办的。

陈超万曾和红军作战，全军覆没。有一次，他回家坐着汽车到学校里看了看，并在礼堂讲了话，光说共产党厉害；说起为什么盖学校，他讲：我们这里贫困落后，现在盖起学校，将来学成技术帮助发展小工厂，农民办工业等等。学生毕业后安排不下，他借给40元钱，让在家买织布机。陈走后没再来过。

四职纪念碑是我们毕业时立的。碑文很难懂，写字的宝熙传说是皇帝的叔辈，刻石的是北平琉璃厂翰茂斋的李月庭，1天鏐两三个字。

（原载1986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安乐镇小学的创办与发展

李玉法 高澄波

安乐镇小学，前身是安乐镇两等小学堂，1911年（清宣统三年）在安乐镇庄严寺旧址创设；1913年（民国二年）改称安乐镇公立两等小学校。传说佛寺始建于唐朝，建校时，寺内后院还有住持僧3人。在大殿前檐，紧接着修建了墙壁与瓦顶，作为高级班教室。殿东西两庑，作为高级学生自习和寝室。殿前东西两庙屋各3间，作为高教住室。大殿后院有初级两班，教室系新建，初教住室也在殿后院。当时，高等1班，初等两班，学生共90余人。

该校初办系乡立。1921年（民国九年）改名安乐镇蔚文小学，仍是乡立。学校经费，靠安乐镇孟庙24亩祀田地租，县里还把安乐镇街行业（如牲畜、屠宰、粮店等）税收，拨归学校作为底款，此系民办官助办学法。校董会由热心教育的地方士绅申德修、李瞻太、范殿邦、高永太、申鸿渐等人组成。校长、教员由校董会聘请与免职。教职员待遇与官立小学同。学制：高级3年、初级4年。课程：国文、算术、地理、历史、英文、体操、唱歌、图画、手工等。办学方针：上级颁布“三育（智育、德育、体育）并进”。校董会申鸿渐先生，编了一首校歌，词曰：“安乐重镇寺庄严，两等学校立此间。人民捐献作补助，学田行税作底款。一为地

方谋幸福，一为国家育英贤。荡荡乎民国庄严，巍巍乎学校庄严，宜如何发扬而光大之，前途责任端在吾少年。”

乡立时代，一任校长杨万选（进士），教员杨兰亭；二任校长李瞻太（秀才），教员毛文衡（三师），三任校长毛文衡，教员宋云汉（三师）、武仲景（三师）。

1928年改称县立第二小学。一任校长武仲景，教员袁广玠、武金梁、李进修等。课程有所增减，学制也有变更。从此高、初级加倍扩班，学校经费，由县教育局拨发，人员由县里委派。二任校长武金堂。三任校长杨元瓚。“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安乐镇，校院为其所占据，学校停办。解放后，在安乐镇小学旧址，建立新完小，增建教室，添设班级，更加发扬光大，蔚然可观了。

早期从安乐镇高小毕业的学生，知名的有胡学鑫、胡学羈、李维德、李寓鸿、商树校、顾时清、武仲景、申兰生、王寅生、申云浦等人。在新旧政府两时代，均有相当地位，不过分属正反两面的人物罢了。

（原载1986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阳谷医林名录(古代)

李 印 元

有了人类，同时就有了疾病，也就有了医生。在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医林中，既出现了象扁鹊、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那样光辉夺目的医药明星；更有着无数的分布各地城乡民间的无名医生，他们更直接、更广泛、更大量地从事着治病救人、增进人民健康的工作，是群众医疗卫生的基础。随着一代代时光的流逝，他们也一代代被埋没了。近古各地兴起修志热，注意及此。然而由于中国旧的传统文化影响，无论在正史还是地方志中，都是重政教艺文，轻术数方技，以致往往将医药学这一科学技术和巫卜星相归属在一起，不公平地、不恰当地置于小道末技之类。我们说，救死扶伤，功莫大焉，善莫大焉，应该给他们以崇高的地位。一时有一时之人物，一地有一地之人物。有识于此，笔者仅据所见之董本《阳谷县志》及杨本《阳谷县志》（部分）将所载有关阳谷医林人物摘抄汇辑，略加整理编排。其记载散见于“孝义、文苑、师道、善行、贞烈”等卷，其年代多为清朝中后期至民国初，至于其人其事大多语焉不详。或著籍散佚于民间，或医泽仅存于口碑，未得收集记载者，定有甚多。有所缺漏及错谬，尚待补正。

李维典 字虞载，城东北李家楼人。太学生，考授儒林郎，候选州同知。生活于清朝康雍乾时期。晚精岐黄，以期救世。远道贫病者给以食宿，无倦容，神效良法，施药极夥。后十数世犹有行之不衰者。

商琦 字步韩，城东南商家坑人。性慷慨，精医术。创制乌金膏，治疗筋骨疼痛及五积六聚一切痞积等症极效，有购求者必给与，辄慨赠不取值，远近登门祈求者不绝，远者食宿之，求者达数百里。子殿三（联芳）承其志与术，其孙君平又相继，遂专以舍药为事。康熙四十九年，邑侯王公以“乐善不倦”四字旌之，世代相传，至民国年间犹存。

刘重任 字嗣尹，翰林琰之孙。庠生，后举孝廉方正。敏而好学，兼通医术。晚年著有《镜古养正录》、《历代统绪》、《女史奇迹》各数卷行世。

张廷珍 字聘显，城东北焦海人。6岁失怙，哀毁逾恒，母董氏辛勤教养。廷珍体亲心，嗜读以慰母。后失明，遍请名医，皆曰不治。乃令子泮林读方书，默听以自择，字有不识则令写于手而讲解之。2年目复明，益潜心性理，精研医学。村有萎人子，痘症危，人皆束手，治之，寻愈。四方来者日众，活人无算。著有医书行世。

李灿固 城东李庄人。早入泮，以医名。

马景长 字师贤，城南三里庄人。由儒入医，精痘疹，全活无算。邑令邱公特器重，每邀至署访利弊议兴除，景长非公不至，令望弥彰焉。

孙兰坡 字秋畹，城东孙家楼人。咸同年间，以团防出力保翰林院待诏。精岐黄术，活人甚多，乡论翕然。

袁士峨 字汝山，城东袁家楼人，后迁半街楼。儒雅平

恕，接物以诚，以膏肓有术，丐药求疗者背望踵接，为之裹疮敷药，寒暑无倦，其乐善好施，感人尤深。

张明书 字酉堂，城北四都人。好施予，精医术，尤善外科。凡求方药者无贫富贵贱，概不取值。咸同间以襄办团务保五品衔，充团正。乡里慕其清操，公送旗匾。

孙镛 字东序，城东薛庄人。以监生候选州同花翎运同衔。性慈善，好施予。精外科，赠药品，辨证施治，无不应手而愈。来者日数十起，远者优给食宿，病愈乃去。不稍倦，全活无算，声名益震，时称“孙善人”。年79岁而逝，乡谥正达先生。同治三年，聊城傅绳勋（曾任江苏巡抚）为撰《朝议大夫副都转孙公保乡善行碑记》，另有“为善扬名”、“心同良相”、“一方保障”等8架匾，前十数年碑匾尚存。

杨心安 字民斋，城东南贾家庄人。性方鲠，言动不苟。晚年以医道济人，手抄验方用以传世，全活无算，后数世乡人犹盛称之。

谢芳邻 城南仁厚村人。通经史，兼精医术。著有《脉诀精微》四卷。

王经邦 城东北王屯人。岁贡生，医学兼优。

熊起藺 字象芹，原籍江西南昌，弱冠迁于阳谷。精医善诊，活人无算。设茶肆，缔造成家。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歿于阳谷南街春和堂药店，寿70岁。

胥殿选 城西胥家庄人。善治小儿痘疹，自制“痘症善后十八方”，妙应如神，全活极多。后世子孙继其术，盛名犹著，遐迩感德。

郝金铎 字振愚，城西北郝家楼人。因母受疮症，遂精

习外科。四方求医者日众，近者给药，远者给食或路费，有优礼谢者均却不受。故四方表其门，有“术著岐黄”、“乐善好施”匾额。

吴际经 城南吴家堂人。善治筋骨损伤，一经抚摩，病即若失。年逾八旬，虽盛夏严冬，不乘车，不扰酒饭，乡人立石表之。

张维格 字衍四，城东张家楼人。圣庙诗礼堂启事官。由儒习医，济人甚众。

常茂樽 城东常家楼人。耿介质直，一毫不苟。精医道。年老衣食恒不给，而狷介益坚，挽回一方浇俗不少。

孙金铭 字陶卿，城东八里营人。庠生。枕藉经史，精通医理，克绍先绪，咽喉一症尤有家学，一经诊治无不着手成春，救济甚多。子璠坡能继先志。

熊绍谔 字美华，改号美臣，亦字梅岑。象芹先生第四子。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18岁时取入本县文庠第八名，后例捐附贡生。知县何式珍（光绪八年任）聘为西席，教其子弟。精医学，乡里公送“德劬医良”、“杏林春暖”、县长孙丹骥赠“功媲良相”等匾额。历充本县公益筹备处长、城区议事会议长，监修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

申绍文 安乐镇人。时号名医，开有天和堂药店。

（原载1986年11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孟西园的医学著作

孙亚先 武金池

孟先生名翰，字西园，阳谷城内南街人。人皆知其名，而不知其生卒年代，访问其子孙亦不知。著作甚多，都是抄本，散传民间，没有出版。后见其所著《医品心余验录》卷五第13页“霍乱门”最后有一段记载：“余年五十岁，时在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七月间，人遭此症，死者不计其数，治法大抵先针臂弯、腿弯，然后服药，治愈甚多。”据此可推知先生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行医时间在嘉庆、道光时期。据传说，先生名声很大，求医者盈庭满室，能识别死生，有阴阳门，指使病人出阳门者生，出阴门者死。

《医品心余验录》卷五记有暑症、消症、痿厥逆、霍乱、痢疾、关格症等27种病症。卷六记载了胃肠病，如痞满呕吐、胃痛、肤痛等32种病症。辨证以八纲为基础，着眼阴阳的偏盛，治疗大法，益脾胃升清气，每一种病俱备了理法方药，附以己方和土单验方，内容丰富，很有临床实用价值。可惜一至四卷未收集到。

所著《孟氏妇科》，经、带、胎、产分别论治，大旨女以血为主，气为血帅，气机和畅，经血可调。血属阴，气属阳，阴为本，阳为用，治疗血病参助阳用。所著《脉会》、

《舌镜论》、《瘟疫扼要》等书均有很多发挥，增添了新内容。先生理论渊博，经验丰富，确有治疗奇迹，名声之远大至今称颂。

（原载1986年11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本文作者 孙亚先，阳谷县石门宋乡东八里营村人。1952年平原省医学专科毕业后，在阳谷县医院当内科医生。现任县卫生局业务科科长，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武金池，1916年生，阳谷县安乐镇于营村人，1951年在聊城中医进修学校学习结业参加工作，先后在聊城专区中心医院、阳谷县大布卫生院、县医院工作，1980年12月退休。

孟西园先生妇科及医疗简介

李 玉 法

先生姓孟名翰，字西园，阳谷南街人。解放前，阳谷南街小隅首往西不远处路北，有孟氏家庙一座，当中存放着孟西园高大的神主牌。

先生以儒士热爱医学，公余之暇，精心研究，对男、妇、儿科均有著述，奇而不离于正，颇能阐发岐黄内经之秘旨。其男、妇科著作，统名《医品心余集验录》。其自述云：“忆前室因伤寒落胎，时乏名手，成蓐劳丧生，至今痛心，故力究妇人之科，加意产后。”其于妇女经产科，独有得心，应手之妙，至今在我县农村犹传颂不绝。遂以医名世。惜其著作终未付印，在乡间流传者，均系手抄本，沿袭日久，难免鲁鱼亥豕之误。其女科抄本，仅我见过的就有3种。考其内容大同小异，想作者当时随笔记录临床经验，前后时间有不同耳。

孟氏女科，内分调经、种子、胎前、小产、产后及治疗经验几门。其治病先理论而后方法。他说，妇人之病在血，而调之在气，取“气行血行，气止血止”之义也。其治妇人病，凡温、凉、补、泻，率皆因病而施，一丝不苟。他说：

“余治妇人病，一病一方，其要在脉，其通在心，虽有验方，亦乌狗耳，不得不参考也。余治产后症无数，率皆因病

而施，故救困于顷刻。奉劝世人，认病要真，无惜药而咎其不效也。”孟氏治产后症，重用“佛手散”（当归、川芎二味），以酒为加减焉，效如桴鼓，“佛手散”真佛手也。他说：人率视余有奇术，不知只此一个心术耳。有一妇人，因小产中风，求人治之。孟曰：惜也，此妇死矣！安能徒跣救之！苟不以风治，尚不即死，明日可语以治法，乃果进风药而歿矣。然每欲以杖俗士一百徙三年，岂妄谈哉！人问：“你以何方治之？”孟曰：“先以佛手散加荆芥大剂灌之，亦可调以四物四君子加荆芥可矣，如宜参亦不惜数钱也。噫，余于妇人病，实以自觉有知，后世当有知之者，安知非千百女子之福也。”此系孟氏诸多医案之1例，特录之以概其余。

孟之小儿著作，未见其书。传说山东巡抚之子患天花，请孟往诊，诊断结果，孟曰痘毒内攻，法在不治。这位巡抚又请一位医生治好啦。大家正在喝喜庆酒时，家人来报“小少爷不行”，不一会死啦。巡抚问故，孟答痘毒攻心，心脏有一颗痘疮。巡抚赞叹说：“你真是个孟半仙，名不虚传。”有人说，“孟半仙”之名由此始。

（原载1986年11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八辑，题为“《孟西园先生妇女科》序言”，收入选编时和作者1987年另稿经加工合为一篇，改为此题。）

编者按：关于孟西园生平事迹，传说不一，县志记载极略，仅在卷六“学校·贡士”栏有“拔贡 孟翰 康熙十一年选拔官齐东训导”记载，卷十五“题咏”有署名“选拔 孟

翰 邑人”所作《秋登盟台赋》一文。编者为核对上两篇关于孟西园的材料，曾寻访孟氏后人。终于得家居阳谷镇南街的孟广兴老先生提供族谱资料，澄清事实。据载，孟子43代孙孟忠于后周世宗（即柴荣，公元954—959年在位）时由邹县出居阳谷奉孟母庙（在今安乐镇）祀事，遂家于是；后世两迁至昭庆院西（即今李台之孟家楼），明朝后期60世孟孔传由孟家楼迁至阳谷城内居住。孔传三子同人、其人、长人，县志皆有记载。孟西园即其人之子，孟子62世孙。西园其字，名翰，号羽秋。年16即采芹（考中秀才入学做生员），旋食饩（明清时，生员试优等者，官给廪饩，称廪生）。于书无不读，淹贯经史，尤精于四子书，所著有《存说存辨默识录》行于世。壬子（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获选拔（拔贡），任莱阳司训（训导）。丙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丁母忧归，恨不知医，留心《素问》、《脉经》诸书，皆探其奥；又得岛夷（北方人对南方的轻侮称呼）人焦公尽以其术相传，公以之诊脉尽知病源与其富贵穷通、贫贱夭寿。时称一代名医，有起死回生之术。服闋（母丧满三年）补齐东（旧县名，其地分别划归邹平、博兴、高青）训导，卒于官。著述甚多。存目者有《伤寒存说录》、《验方论》、《亦耕堂管窥》，后世医家名宗之。曾任湖广崇山县知县的马世骥为撰《西园先生传》载于谱。族谱卷首尚载有雍正己酉（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孟西园撰写的《阳谷孟氏谱序》。孟西园墓在其祖籍李台古竹口北鲇堤之上。李台一带至今流传孟西园的故事，张忠聚搜集整理的《名医孟西元（应为园）的传说》载于县文化局、文化馆1987年编的《阳谷民间故事》。

狄大光先生传

孙亚先 武金池

狄大光先生（1883—1959），字化远，阳谷县七级镇人。幼读诗书，颖敏好学，工楷书，写作俱优。先生世代业医，为继承家传，庭训习医，因攻读医书。刻苦力学，溽暑严寒，夜读达旦，学而不倦。内难仲圣之书，四家诸贤之卷，数稔之间，阅读殆尽。先生奉承家训，证以心得，确信医书充栋，惟经典著作是可靠之依据，方药繁多，经方为有效之方剂。执简御繁，由博返约，对经典经方，深刻研究，奉以为法。

弱冠行医，遵六经辨证施治，运用经方不妄添蛇足。重视体力，正盛邪可自却，扶正首重阳用，阳不患多而患不秘，阴以平为度，阳以秘为贵。深明“大气一转，其气乃散”之旨，对诸般杂症，沉痾痼疾，斡旋大气，治愈甚多。就诊者接踵相继，日以百数，声名昭著，扬邑内外，群众有“大先生”之称，医林有“经方派”之誉。异城市都诸治不愈之症，着先生手而获速愈者，不可胜计。此先生之理论实践，确有孤诣独到之处也。

先生对病人认真负责，无富贵贫贱，四诊合参，细心诊治，贫困无钱者，药不索值。乡士庶民感惠戴德，而不忍忘没也，议树石碑2通于门前，一曰“嘉惠均沾”，一曰“懿德

可风”；赠悬木匾8面于堂上，一曰“三世种德”，一曰“遐迩铭恩”，一曰“国手佛心”，以表感戴云。

晚年（1955年），受请参加聊城专区人民医院工作，闻名求诊者益多，深获群众厚望焉。

（原载1986年11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毛 登 岭

县卫生志编写组

毛登岭（1859—1944），字俊卿，阳谷县毛庙村人。十年寒窗，熟读经典，矢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以拯斯民于水火。

后闾里疾病蔓延，无人问津，先生立志学医，对内、难、伤寒杂病等书熟读精通，尤对《神农本草》、《本草纲目》手不释卷。常说：“用药贵精不贵多，少则力专，多则掣肘。”既不泥于经方，又不习于时方，治病用药，独出心裁。处方一、二、三味居多，最多六味，无不药到病除。求治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善用土单验方，立除大小新久病魔。以不花钱、少花钱为主导，虽妇人孺子，莫不知先生法多、方多，好病多，花钱不多。

先生天资聪明，善于思考，对内、外、妇、儿各科无不精通，医德高尚，应手回春。

东昌府道尹陆春元之妻，月经病不育，遍求名医，治疗十余年无效，闻名前来求治，服药十余剂，月事以时下，次年生一子。甚喜，遂赠匾示意，上书“著手成春”四字。而后名声大振，远扬四方。先生不骄不躁，仍持以虚心、细心、关心，功绩面前作起点，在医林征途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原载1986年11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魏殿卿老中医传略及其医疗经验

魏洪遠 魏仲遠

先父魏金奎（1914—1984），字殿卿，世居阳谷县西湖乡任老伍村，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先祖父魏法唐，字绪贤，医文并茂，为当地名医。先父自幼聪慧好学，从先祖父习医，博学苦读，精勤不倦。年17即随先祖父应诊，远近就医者络绎不绝。在阳谷、莘县、东阿、范县、聊城一带颇负盛名，尤以妇科著称。1951年参加阳谷县人民医院工作。由于思想进步，医德高尚，作风正派，深受领导重视和群众好评，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被邀任第一届县政协委员。著有《魏殿卿医案》存世。今将其学术思想及医疗经验作一简介。

一、采诸家之长，弃门户之见。

他尊崇古人，但师古而不泥古，对前人成说常验之临床，发前人之未发。如金匱半夏厚朴汤，原治梅核气之病，但先父却广泛运用于临床。凡证属肝胃不和所致胃脘疼、呕吐、噎气等症，用之每获佳效。又如金匱黄土汤原为治虚寒便血而设。先父认为，黄土汤症便血，其病机是中气虚寒，脾气不能统摄而血渗于下，所谓“阳虚者，阴必走”是也。该方不

仅治疗便血，即吐血、衄血、崩中久不止、有虚寒见症者均可用之。

二、对妇科诸症，学识经验俱丰。

妇科之病不外经带胎产，凡行医者皆悉。但因立法有异，其效自然悬殊。先父于妇科之症，除宗前人之法外尚有独见。特别对不孕症，先父提出：“不孕之理大致有二：一曰淤，二曰虚。淤则气血壅塞，冲任不调，如渠道之淤塞；虚则气血虚弱，冲任不固，如渠道之干涸，此二者皆不能坐胎。治当以活血化淤与补气血为主。”以此为则治疗不孕症，颇有成绩。

三、善治温热，治乙型脑炎、肠伤寒 疗效卓著。

先父以治温热病见长。对吴又可《温疫论》、叶天士《温热论》、王孟英《温热经纬》、雷少逸《时病论》均有较深研究。故对时疫险症，辨证准确，无踌躇徘徊之虑，临症如对敌，用药如用兵。先父一旦得病之情，便单刀直入恰到好处，克疾制胜，于垂危之候，挽回人命，表现了纯熟的理论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如1956年—1957年，全县乙型脑炎流行，先父积极参与救治，先后治疗乙脑数百例，治愈率达80%以上，挽救了不少垂危患儿。1963年肠伤寒流行，先父也治愈不少危重患者。

四、集各家之长，选有效方药，酿造 创制各种药露。

先父诊病用药，从不墨守陈规，集各家之长，总结家传治疗经验，创制有效验方，酿造制作各种药露，如金丹露、保坤露、健脾露、安胎露等，验于临床，疗效显著。

五、乐善好施，医德高尚，培育桃李， 造就新人。

先父为人正直，忠厚待人，不追求名利，不逢迎权贵，安分守己，专事医业。他常说：“医者仁术也，当以济世活人为己任，不得求财谋利。有钱治病，无钱亦治病；见死不救，为医者心下何忍！”先父早年开业时，每遇穷苦无钱之危重病人，常不收药费或舍钞以济贫。解放前夕，范县红庙村有一常氏老姬患血崩症，由其子用小车推着来求治，诉说：“家中贫寒，无钱吃药。闻说先生治病高明，请您看看是啥病，明白明白就行了。”经先父诊治为老妇血崩，如不及时治疗，后果不堪设想。先父视其母子二人衣着褴褛，实是可怜，便将其留至家中免费治疗，月余康复如常。这母子二人感激万分，道谢不已。

先父一生为救疾危，常不分昼夜，不避寒暑，不怕脏累，不畏艰险，无好恶贵贱之分。解放前，某年冬天温病流行，疫情严重，求医者昼夜不绝。先父常夜间步行10余里出

诊，有时一夜数次，彻夜不眠，白天照常应诊。此次疫情流行达1月之久，先父夜间几乎都是和衣而睡。他生前经常这样教导他的后代和徒弟：“若有疾危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穷富，长幼妍媸，怨亲仇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恶，不分昼夜寒暑，不管饥渴疲劳，一心赴救，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身命。”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行的。每遇外诊，必先急者，不惮步履，至则施诊，诊毕辄辞去。如是者数十年，全活无算。而益以普济为怀，虽至筋力衰颓，无倦容。

先父在医务繁忙中，仍注意培养后进，对徒弟要求甚严。白天忙于施诊，夜晚对徒讲授，有时讲到深夜，也毫无倦意。先父教过的徒弟有数十人。如阿城镇医院中医师孟传凯，金斗营乡医院中医孙涛，在外地工作的，山西潘英政、台前县王学文、吉林张福香等，都是先父的高徒，他们都成为当地中医骨干，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声誉。

（原载1986年11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本文作者 魏洪逵，1936年生，阳谷县西湖乡任老伍村人。1959年中学毕业后入阳谷县医院随父学医，现任阳谷县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主治医师。 魏仲逵，1939年生，1962年山东中医学院毕业，现任莘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

一门祖孙三中医

田金聚 孙亚先

杜 有 仁

杜有仁（1860—1940），字忠朴，阳谷县四棚乡大杜村人。

先生幼入私塾，聪颖好学。时疫病流行，乡民求诊甚难，先生目睹此状，立志习医。攻读《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精研医理，且涉猎百家，广撷博采，刻苦钻研，大胆实践，勇于创新。自此医术大进，尤善于妇科，长于针灸，名闻乡里，应诊不暇。并自立“万寿堂”药铺，以利于民。

先生不仅诊病甚详，组方巧妙，更喜用土、单、验方，以针灸治病，深得群众信赖。如对梅核气，以含化杏梅子治，疗效甚佳。治疗烧烫伤，药涂患处，一袋烟时痛止，不感染，汗腺毛通畅，10日可愈，愈后不留疤痕。又惯用针灸，既经济，除病效果又好，病家赠“灵砭妙医”匾颂之。

先生不仅医术精湛，而且为人敦厚，医德高尚。凡寒门邀诊，路途远近不辞，不分富贵穷贱，治病必尽其心力。因此在当地颇有盛名。

杜 广 心

杜广心（1901—1976），字德斋，阳谷县四棚乡大杜村人。

先生自幼入私塾，好学不倦，颇具文才，擅书法，通文学，赋性质朴守正。早年教学于乡里两年，后弃教从祖父有仁习医，勤奋攻读医籍，精研经典，博采众方，医术大进。求诊者比肩接踵，沉痾屡起。遂立“广生斋”药铺，自为坐堂医。

解放后，先生热诚接受党的教育，参加工作后，于1955年在三支王联合诊所从医。后赴泰安、茌平两次进修针灸。学成后留寿张县医院针灸科工作。

先生素日刻苦钻研，喜读四大经典，勇于实践。其治病处常达变，法圆方活，诊断甚详，用药谨慎，而获效甚捷；尤其在针灸方面，造诣较深。

先生不仅在院内工作积极有信，远近乡村凡延请者，或风雨寒暑，或披星戴月，皆立赴不辞。每至病家，详细诊察，毫不草率。无论富贵穷贱，一视同仁，对人诚挚热情，深得人们的尊敬。曾被选为数届县人民代表，其事迹在《大众日报》登载，省电台广播。

1958年，先生年近60，在台前红专医科大学授课，教务繁忙，而从不叫苦，以劳为乐。此时曾献土单验方几首，收入《寿张县土单验方选编》一书。

先生带徒，诚恳施教，平易可亲。曾给徒赋诗曰：“世人皆云上天难，学医难于上青天，青光冷月寒窗苦，如履薄

冰过三关。吾胸有志把医授，唯凭吾徒意志坚，共为民生造幸福，煎熬心血亦所甘。”希望将自己临床经验倾囊于后学，又希望后来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杜 广 居

杜广居（1908—1961），字清斋，阳谷县四棚乡大杜村人。

先生少时进私塾，16岁随祖父有仁习医。先生为人质朴守正，举止庄重，平素寡言，言必有信。后自立“万寿堂”药铺，行医乡里。

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毛庙、王庄、四棚等联合诊所从医。1959年在四棚联合诊所任所长期间，上级布置除四害打麻雀，他如实回报打了4只，被“拔白旗”并劳动改造。1961年在马庙卫生所，带病坚守岗位，直至病故。

先生从医30余年，对经典医籍，精读苦研，务求贯通其理，尤熟《景岳全书》、《极阴纲目》、《妇科良方集要》，临床经验丰富，能尊古而不泥于古。他根据妇女一生不同年龄的生理特点，总结了“三期”治疗规律，他常教后人说：

“妇人属阴，以血为主。少年期，天癸将至未至之际，月经将行未行之间，处在发育时期，病多及于肾，治以肾为本，治先天以助后天，用药以四物汤加味；中年期，天癸正旺时期，月经盛行之际，经、带、孕、产、乳多伤血分，情志易动多伤气分，病多肝郁血虚，治以肝经为本，疏肝解郁佐以扶脾，用药以逍遥散加减；老年期，天癸欲竭未竭之际，月经欲绝未绝之时，肾气虚衰，须赖后天滋养与补充，病多与脾

有关，治以脾为主，补后天以养先天，药用归脾汤之类。”用之临床，疗效显著。又说：“读书易，学德难，学活更难。”他不仅智圆方活，用药巧妙，还善用土单验方，使病人既治病又少花钱。

（原载1986年11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本文作者 田金聚，1940年生，1961年参加工作，1967年7月山东中医学院函大毕业，现任阳谷县四棚卫生院中医主治医师。 孙亚先，见前。

正骨医师赵传忠

孙 亚 先

赵传忠（1880—1975），阳谷县七级镇郎湾村人。先生出身贫寒，无力求学，只粗通文字，为生计16岁学徒打铁。19岁改学医术，投东昌府（今聊城）陈先生习正骨和针灸，由于心诚意专，刻苦钻研，细心揣摩，数年之间，尽得陈氏之传。后回家施正骨术，不以钱财为重，不论亲疏贫富，分文不取，有求必应；遇重伤脱病人行动困难者，往往徒步应诊至百余里之远，远者登门求医给以食宿，求医者络绎不绝。

1950年先生参加县医联会，1956年参加县人民医院工作任正骨医师，就医者满室盈门，门诊日近百数，颇负盛名。

先生一面施诊，一面带徒，对病人、教徒两方面负责。80高龄时仍整日门诊。处理病人师徒合治。新徒则师为主，徒为助；旧徒则徒为主，师为助；目睹亲授，倾心而教，使众徒能很快掌握技术，单独处理病人。从其求习医术者先后有50余人，遍及阳谷、莘县、东阿、梁山、聊城等县。

（原载1986年11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張秋鎮年画调查

谢 昌 一

1963年1月我曾与王树村同志同赴聊城县调查东昌府年画，我们在聊城的清孝街访问了过去在这里开年画店的老人；此后我们又去堂邑苗庄一带，并到了东昌府刻书的发源地西三奶奶庙等村庄调查，弄清了东昌府年画的基本情况。在调查中我们得知东昌府年画是由张秋镇传来，并在集市中购得几幅上署“张秋镇年画店”字号的门神。当时由于时近春节，主要还是对张秋镇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就未能去张秋镇。对此我一直感到很遗憾。近年来去张秋镇的意愿未消，我并为此作准备，查阅了《寿张县志》和山东省图书馆珍藏的唯一的一本康熙版《张秋镇志》，终于在1981年1月与戎玉秀、黄鹍同志在阳谷县文化局、文化馆大力协同下，奔赴张秋镇。

一、张秋镇概况

现属山东阳谷县的张秋镇，位于县城正东45里，著名的景阳冈在镇西北4里。张秋镇南靠秦代金堤，京杭大运河故道自北至南穿镇而过，其形势有南北两都襟喉之称。过去镇四周筑有城墙并有护城河环绕。

张秋镇因五代时宰相李谷治堤自阳谷抵张秋口，张秋之

名著此。宋代曾一度易名景德镇，明更名安平镇，后因与安平县重名，又改名张秋。

张秋镇为鲁西大镇，清末民初约有两千户人家，旧称有72趟街、82个胡同，运河码头位于镇中，号称“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临清、张秋）”，是一个十分繁华的集镇。该镇汉回民族杂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清末山西、陕西二省商贾来镇开设店铺达30余家。

二、张秋镇年画的起源

张秋镇年画起源于何时，已无实证查考。据源茂永年画店现年68岁的老业主阎均振说：“张秋镇年画店均由山西人开设，据山西业主说年画是元代从山西传来。”这个说法是可信的。我们知道山西晋南地区的木版年画具有悠久的历史，目前我国最早的一张木版年画《四麦图》，即是宋金时代晋南地区的产品。我见到一幅晋南木版年画“魁头”（贴于门头之上），这一体裁张秋镇也有，但在山东其他年画产地从未见，因此张秋镇年画受山西晋南年画的影响是可能的。在张秋镇残存的年画原版中，我见到一对以儿童为题材的“娃娃画”（房门画）《富贵有余》，这对房门画我曾在山东平度年画中见过，显然是杨柳青年画的翻版，由此可见张秋镇年画还受杨柳青年画的影响。

在清代张秋镇的年画店共3家，有源茂永、鲁兴聚、刘振升画店，均为山西人开设。后来刘振升画店迁往聊城，从而促成了东昌府年画的发展（过去相传东昌府年画受河南朱仙镇年画影响有误），至此张秋镇的年画店仅剩两家。1918

年源茂永画店的山西业主李殿源将画店转卖给当地人阎均振经营。

张秋镇的年画店由于生产神祇主，名纸祇店，也称祇子店。由于这里紧靠运河，交通发达，清末民初年画仍十分兴旺。1918年间，源茂永画店有25盘印画案子，鲁兴聚画店也相仿。刻版艺人从堂邑西三奶奶庙等处雇来，一次请10多人，从春天开始刻版，印工则临时雇用。当时鲁兴聚画店有门头5间，雇印工、查发货人员等多达80余人。源茂永画店一年最多印48件纸（达1440令），加上鲁兴聚画店的印数，张秋镇印制年画一年达2800令纸，数量相当可观。张秋镇年画店历来只坐庄卖画，画店春天印扇面画，供给做扇子的手工业者；阴历八月底开始印年画，十一月初一挂牌子出售，一冬来镇贩卖年画的客商小贩达千人。年画除销售本省外，还销往山西、河南、河北、东北等地。

三、张秋镇年画的题材和体裁

张秋镇没有自己的画工和刻工，年画题材均因袭传统画样，题材以神像为主，仅门神一项就达130多种，加上其他年画题材，品种多达300多种。年画题材有取自列国演义、三国演义、戏曲故事、神话故事及反映儿童生活等方面。张秋镇年画体裁及包含的题材如下：

1、魁头 又名判头，分大判、二判两种，上画魁星，贴大门上端门头。

2、门神 分大裁、二裁、三裁三种（二裁、三裁又称二鞭、三鞭，因取秦琼、敬德执鞭取名）。其题材有神荼、郁垒

(俗名佛锤,也称甥锤),秦琼、敬德(鱼鳞甲),王君可(大朔刀)、赵公明与燃灯道人(大下山、大黑虎),马超、马岱(对金爪)、赵云救阿斗(长坂坡),火烧杨滚(泗水关)、杨延景、杨延昭(虎皮座)、寇准(天官、加官进花),魁星点状元、三星、五子等。

3、单座(单扇门神) 有秦琼、敬德(抱鞭)、抢令等。

4、娃娃画(房门画) 有花篮娃娃、钓鱼娃娃、采藕娃娃、打猫娃娃、刘梅戏金蟾、独占鳌头。

5、扇面画 有取材于列国演义、三国演义、戏曲故事等。

6、画对子 外加一横披,有全家福花对子、八仙画对子、五彩花对子等。

7、月饼签 是包在月饼上的标签,上画嫦娥与玉兔。

8、轿车围子 嫁娶时贴于大车两侧,画有麒麟送子、喜字图案等。

9、纸扎画 用于丧事纸扎,有八仙等。

10、神祠 有凤辇(泰山奶奶、上泰山进香用)、观音、灶祠、天地神、河神祠(龙王)、山神、土地等。

张秋镇年画的体裁不止以上10类。仅从以上体裁看,它和山东其他年画产地一样,年画和群众生活相结合的特点是鲜明的。它和其他年画产地在题材和体裁上的区别是:1、从来没有纯欣赏的年画;2、在门神中绘有《三国演义》、《杨家将》的题材;3、房门画中仅表现儿童,而其他地区

的房门画中妇女儿童题材并重。

四、张秋镇年画的造型和色彩

张秋镇年画的线条简洁、流畅有力，人物造型的特征是眼睛窄长，它特别加强了下眼皮的描绘，鼻梁鼻翼瘦窄，形象丰满古朴，表情安详含蓄。

张秋镇年画的刻工印工较为认真，虽然历来只有草版（全部套印），但从不偷工减色。东昌府年画一般只套印5遍（五色），而张秋镇年画一般要印8遍、7遍，很少印6遍。它的色彩有亮青（黑）、大红、二红（水红）、大绿（黄绿）、绛绿、丹红（杏黄）、黄、蓝八色。张秋镇年画的色彩较为沉着，整个风格显得古朴。

张秋镇年画的颜色早期用自制的亮青（蛋青加黑胭脂、苏木红、黄丹、槐黄、铜绿），后期采用品色。在印刷方法是左手执把（山东其他年画产地是右手执把）。

五、张秋镇年画的衰落

张秋镇及其年画发展至清末民初仍比较兴旺，其原因是运河故道仍起着南北枢纽的作用。此后现代化交通逐渐发展，火车、汽车运输剧增，古运河故道的水上交通则逐渐衰落，这条促成张秋镇繁荣发展的生命线，受到了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冲击，加上抗日战争爆发，局势动荡，张秋镇年画遂趋于衰落。

1947年鲁西地区解放后，冀鲁豫解放区对张秋镇年画非

常重视，1948年至1949年间，从张秋镇聘请了原源茂永画店业主阎均振，并调集了部分刻版艺人和印工，和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相结合，在莘县、朝城一带创作了一批反映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军民生活的新木版年画，在解放区推广。随着解放战争的南移，1950年冀鲁豫解放区有关部门将这批新内容的木版年画原版交阎均振带回张秋镇推广发展。由于新木版年画与当地群众欣赏要求不完全一致，未能推广。

解放前鲁兴聚画店因后继无人，早已息业，年画版全部散失；源茂永画店的年画版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浩劫，数百套原版被焚毁。我们在源茂永画店老业主的一间草屋中，找到了残存的年画残版13种，这是目前仅有的张秋镇年画的可贵资料，这批原版现已由省文联全部买下。

张秋镇年画为什么衰落，除以上提到的随镇衰落的原因外，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张秋镇年画历来刻、印分家，张秋镇本身没有刻工，刻工要从百里以外的堂邑雇来，或将画样送往堂邑刻制。这样开设年画作坊，配制一定数量的年画版，需有相当的资金，这是一般民户所不能及。

2、张秋镇年画以神像年画为主，没有纯欣赏的年画。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风俗习惯的变易，年画的路子则越来越显得窄小。

3、张秋镇本身没有画工。解放后虽一度对其进行过改革，但由于未能持续下去，因此张秋镇年画得不到进一步改革和发展。

这次去张秋镇虽为时过晚，但收获很大，了解了张秋镇年画的历史，弄清了张秋镇年画对东昌府年画发展的影响，

至此对鲁西地区这一年画派系基本摸清，抢救了一批年画原版，为研究张秋镇年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原载1981、2《山东工艺美术》，1983年9月《阳谷文史资料》第九辑转载。阳谷县文化局张学峰供稿。）

张秋和朝城的蓝印花布

民 艺

1981年春节前后，我们在聊城地区工艺美术公司的同志配合下，到了阳谷县张秋镇和莘县朝城两地，收集到民间蓝印花布传统版样20余种，扎染花纹一种。这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幸存在民间的一部分宝贵资料。其内容丰富，构图饱满、完整、风格古朴而粗犷，较之我省其他地区的蓝印花布又别具一格。如其中的狮子滚绣球、鲤鱼戏莲、猫蝶富贵、凤凰牡丹、石榴和鹿等，构图造型都相当精彩。

据张秋镇和朝城两地染坊的艺人介绍，该地蓝印花布技艺最早均由山西传来。因张秋镇、朝城均为鲁西大镇，是古运河故道，南北交通枢纽，清末民初年代，山西人来此经商、开设店铺者颇多，经济技术交往频繁，山东人前往山西学艺，将蓝印花布技艺带回，传授给后代子孙，流传至今，民间仍保留着传统印花布技术，从每年旧历二月初二开始直干到腊月才歇业。但过去蓝印花布的版样很多，数以百计的版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毁，目前仅靠残存的这几块版进行生产。

我们与聊城地区工艺美术公司和朝城工艺美术一厂的设计人员一起，根据收集的蓝印花布资料，设计了一批为现代人民生活服务的新品种，如窗帘、沙发布、台布、茶几布、

坐垫、围裙、书包等，共20余种，曾在全国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品展销会上试销过，将根据各方面意见进一步改进。

（原载1981、2《山东工艺美术》，原题为《聊城地区的蓝印花布》，1993年9月《阳谷文史资料》第九辑转载。阳谷县文化局张学峰供稿。）

张秋的草编苇编

于培章

张秋镇地跨运河两岸，运粮通行时，号称“南到苏杭，北到临（清）张（秋）”，是一有名古镇。由于这个原因，农副手工业也应运而生。张秋东北沿金堤一溜营子和附近村庄，编织手工业历史悠久，花色品种也很多，用途很广。我家在董营，在我10来岁时（20年代初），苇编即很兴盛。那时苇编尺寸，有四六席、五八席，用于铺炕、盖庄稼垛、缝粮食囤、搭席棚、包装盐糖个子，还有笼顶席；后来就地取材，又编秫秸席，编簋子，用红白高粱蔑编圈席、枕头席、凉席等，图案有枣花、卍字花、线板花等，花样翻新，极为美观。当时编织户大多数是无地民或少地户，借此手工业谋生。想起这一阶层的人民，起早睡晚辛勤劳动，创造了极高的编织艺术，其情可悯，其志可敬。

以后，又扩展到用蒲草编包，也叫打包。蒲草是行商从东平一带贩运来的，编包户都是赊蒲草，等编成包卖了钱再还账，贩运商也可从中多取利，因而打包户就增多了。我家也是打包户，当时我没学会打包，只能划蔑子，别包沿。在那个社会里，富户是不用打包的，中农户向上爬的心极切，记得邻居有个姓韩的主妇说：“咱全家都狠狠心拼命打包赚钱，咱今年要他十几亩地。”编的包有敞口的、大改样、小

方包、行包等。包的用途极广，卖棉花的盛棉花，打烧枣包，打裕襟纳鞋底等，其余都被行商收买运往东昌（今聊城）去销售。

新中国成立后，草苇编副业有了很大发展。政府设立了供销合作社，原料就地取，成品就地销。因此，编织户又增多了，不但避免了商人从中渔利，而且得到空前的便宜，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后来因国家大力兴修水利，打堤挖河，随之又出现了条编。因用新胶轮车运土，再用那不结实的席簍，就太不适应了；有技术的社员，就买白腊条、荆条、阴柳条编结实的运土簍，一到打堤挖河时，这簍供不应求，很能赚钱。用条编还能编饭篮子、鱼壶、粮食囤、粪箕子等。我有一外甥叫郭伯岭，在后沙沃庄，他除种好责任田，就是靠这条编发家致富的。他来看我时说：“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新大挂钟我都买全了，过去家具橱柜，现又看不上眼了。我想买套很好的沙发，还有存款几百元。”我说：“你咋这么多钱？”他说：“我除条编外，今春又给人家编苇笆，人家酒饭招待除外，还净落150元。”我说：“过去常说：‘编筐编簍，一养九口。’何况你只4口人，咋会不富上加富啊！”薛暮桥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这样写道：“手工业是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助手，它会长期存在，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人民要求吃饭、穿衣的质量更好。对手工劳动的需求，不会减少，而会增多。”（见该书47页）我认为这段话，很符合当前现实，是顺乎党心合乎民意的。

编织副业生产，原来存在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困难的问题，一溜营子苇席积压。随着生产的发展，现已有所

好转。

本文作者 于培章，阳谷县张秋镇董营村人。中学语文教师，已退休。

（原载1933年9月《阳谷文史资料》第九辑）

民间艺人李保正和他的阳谷哨

李士钊

泥制乐器阳谷哨的发明制造者李保正，是山东省阳谷县大冢郭庄的农民，他开始研究制造这种泥制的民间乐器，已有12年的历史了。李保正1956年35岁，他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小时只读过3年书，但从小就喜欢玩乐器，特别喜欢玩芦管或竹管制的哨子。他十多岁的时候曾想参加附近庄上的响器班（即民间职业乐队），由于他父亲囿于封建思想的影响，坚决反对他学吹鼓手，使他在这方面的智慧和喜好一直没有机会得到发展。他在家从事农业劳动，常在农闲的时候玩胶泥（粘土），捏制可以吹响的长短哨管，并自己摸索着学习吹奏。这种乐器的音响效果和苇哨、柳皮哨差不多，虽然没有音程的变化，但已构成后来的阳谷哨的初步形体。

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家吹弄这种初具雏形的泥制乐器时，遇到一个鄄城来阳谷买小羊的农民丁景秀。丁能吹一手好管子，丁景秀帮助他在泥葫芦上扎了两个眼之后，吹起来比先前好听多了。他又捏制了在上面扎上3个孔的泥葫芦，渐渐可以吹出花腔和颤音；后来他又改钻成5个孔，自己虽然没有音律的基本知识，但已可能吹奏出他从各处听会的民间小调。为了使它更加好听，他又根据民间唢呐管的形状改钻成6个孔，按照竹制顺笛的样子做出一个扁咀，加上7个

孔和1个风孔，就成为今天这种阳谷哨的原始样式。

在日寇占领阳谷的时期，汉奸部队经常到县城附近的农村催讨给养和抢粮。大碾郭庄位于阳谷东南12里与寿张交界处，遭受日寇汉奸的蹂躏特别严重，使得一般农民无法维持生活。李保正给汉奸拿不起给养，生活困难，就决定捏制一批泥哨带到阳谷城里去，卖点钱换粮食。他头一次做了60个泥哨，晒干后想用农民传统的烧窑方法烧成象瓦盆似的陶器，可以不怕摔碰，但因为他自己没有烧窑的经验，第一次的出品烧毁了30多个，其余的也都变得乌漆皂光的很难看。他并不灰心，当再度回窑的时候只剩下17个了。

1944年旧历正月十四日，他带着第一次制造出品的泥哨到县城赶集发卖。最初他有些不好意思，恐怕乡亲们笑他“穷极卖起泥玩艺儿来”。他用一个包袱包着他的泥哨，自己只拿出一个站在阳谷东街小隅首，吹奏起民间流行的《二姑娘要陪送》、《十杯酒》、《斗鹌鹑》等小曲，和旧军队中的集合号音等曲谱，招揽行人的注意。赶集的人马上把他围起来，但都没有一个人自动出来买。后来一个卖馍馍的掌柜问他：“你吹的这个哨是那里来的？”他不敢说是自己造的，恐怕汉奸拿去了不给钱。因为“远来的物主贵”，他就对围着他的群众撒了个谎，说是从泰安贩来的，因为鲁西的农民每年都有香社到泰安的“大泰山”和东阿的“小泰山”去烧香，归途中总带些泥制的黑色“咕咕虫”来送给小孩们玩。他的这种泥哨在农民的心目中自然也属于泰山上带来的“咕咕虫”的一种。

李保正在街上吹了两三个小时，虽然不断地有人围起来看，但却没有一个买主。他以为指望着卖哨求生活办不了

事，有些灰心，曾想卷起包袱回家。那个卖馍馍的掌柜坚决不要他走，问他卖多少钱一个，他自己也想不出应该卖多少钱好。当时的伪币已很不值钱，5块钱只能买两个烧饼，他就随便一说：“卖5块钱一个吧。”那卖馍馍的立即买了1个，接着卖水饺的也买去1个，另外一个十三四岁的学生也买去1个，其余的14个不大一会儿也被人们抢购一空。他自己真有说不出的喜悦。

以后每年冬天农闲时，他就在家里制造这种泥哨，到春节后再四出到集市或庙会上去卖，并当场把吹奏的方法教给买哨的人，很受群众欢迎。不久，他就把制造泥哨作为主要的副业生产，每年冬天能制造三四千个，一到春天很快就能卖完，从此远近都知名了。

有一次，他到阳谷阿城镇赶集卖泥哨，遇到一位老先生问他：“你知道你这个哨的来历吗？”李保正答不出来。那位老先生告诉他说：“中国古书《诗经》上有‘伯氏吹埙，仲氏吹篪（注：见《诗经·小雅·何人斯》）两句话。埙是泥土制的，篪是竹子制的。中国古时的埙是圆的，上面有1个孔，前面分两排有6个孔，就是《三字经》上所说的‘匏土革，木石金’6种乐器原料中的土制的乐器。”从此，他觉得受到名人的指教，在思想上得到很大启示，就更加悉心地钻研他的泥哨。由于这种泥制乐器没有固定的名称，有些本地人叫它“洋咕咕虫”（因为它不同于泰山庙会上的“咕咕虫”）；又因为他是阳谷人，这种乐器首先在他的家乡一带流传起来，所以后来到北京以后经赵沅同志定名为“阳谷哨”，以纪念这个泥制乐器出生的地方。

1947年他曾到过山东北部的德县去卖他的泥哨，有一位

老先生把自己家里收藏的清朝乾隆年间制成的埙（泥制，外涂紫红并描金）给他看，他才第一次看到他所创制的这种泥制乐器的始祖，使他得到更大的鼓舞，以后他又到清平的麻佛寺赶会，也有几位老先生和他谈起中国乐器中的埙的历史。

1949年以前，他还到过华北解放区的石家庄、邯郸和开封、济南等地，使他这种泥制的乐器在冀鲁豫和山东革命老根据地逐渐流传开来。购买的人们中有农民、工人、战士、学生、机关干部和文艺工作者。他都是当场传授吹奏方法，群众都很快地学会并互相传授起来。

他在1952年第一次到了北京，曾用小手推车推去3000多个泥哨，不到10天就卖光了。为了增强音响效果，他在每一个哨的右首都扎1个孔并贴上苇膜，不但可以吹出8个音而且可以吹出颤音来。这种乐器的制造成本很低，他在乡下时每个只卖5百圆（即新人民币5分），到了北京加上旅费每个卖1千圆也很容易出手。有一个时期，每当他出现在北京街头吹起他的哨，就立刻被群众包围起来，他的哨音又随着群众的足迹而流传到各处。

1953年春节前，他第二次到北京，这次只带去800个哨，又很快卖光了。后来他曾到天津北的杨村车站，在一家小店里住下来，又继续制造了几百个泥哨回北京，也很快卖光了。1953年春节，山东省聊城专区12县举行民间艺术会演时，聊城专署文教科曾准备找他到聊城参加预选，并想推荐他到济南参加山东省民间艺术会演，因为那时他正在北京，而未能参加这一次盛会。

李保正的耳朵很灵，他能吹奏十几首民间小曲，都是凭

自己的记忆听来的，有些曲调他听过几次就可以吹出来。虽然他不认识乐谱，却有很正确的节奏感。过去他能吹奏的10个小曲是：

1、《卖饺子》（山东民间小调）

2、《四根弦大原板》（即《娃娃》，山东民间戏曲曲牌）

3、《送情郎》（山东民歌）

4、《四贝上工》（山东民歌）

5、《锡大缸》（山东民间小调）

6、《十杯酒》（山东民歌）

7、《斗鹌鹑》（山东民间小调）

8、《二姑娘要陪送》（山东民歌）

9、《大梆子原板》（山东民间戏曲曲牌）

10、《大梆子开门》（山东民间戏曲曲牌）

此外他还可以吹奏《秧歌舞》等曲调。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著名民族音乐家查阜西同志1952年春天在北京街头买过李保正的泥哨，因为听到它能吹奏《秧歌舞曲》，音色响亮悦耳，一时没有适当的名称，曾拟把它定名为“秧歌埙”，并曾在他的《音乐札记》中专门写了一篇短文记述这个乐器的来历和价值。

1953年春，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著名琵琶演奏家杨大钧同志在听过李保正的演奏后，曾约他参观自己收藏的各种中国民族乐器和清朝“康熙钦制”的瓷埙，很愿意帮助他改进泥哨的制造。后来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民族音乐家杨荫浏同志和民族音乐系的师生多人也都听过他的演奏，大家一致肯定它的群众性和社会价值。有人主张把它改进成

为一种群众性的“音乐玩具”，可能在推广群众性的文娱活动中发挥很大作用；也有人以为这种泥制乐器的音阶有限，没有半音，似乎没有发展的前途，因而得不出一致的结论。

李保正在1953年4月间拜会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音乐理论家赵沅同志。赵沅同志听过他的演奏后，立即介绍他拜会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著名物理学家和戏剧家丁西林同志，李保正述说了他的创造过程并演奏了一些山东的民间曲调。丁西林同志在听过他的演奏后非常高兴，认为阳谷哨这个富有群众基础的民间乐器如果经过科学的改良大有前途。虽然它的音域有限，但是它的音色很优美，很可以作为一种高音部乐器编在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中，其地位类似西洋管弦乐队中的短笛，它本身既可以独立演奏，也可以靠它的特殊音色增强整个乐队的效果。

丁西林同志谈到他自己在改良中国的11孔笛和笙的过程中，体验到中国乐器有3个缺点：首先是中国乐器的制造方法不标准，如竹管乐器的风孔大小不同，就一直无法取得一致的标准音。过去中国乐器的10支箫、10支管子或10支笛的音色就不可能完全相同（现在上海大同乐会已经可以制造各种调子的竹制横笛）。只有在改用金属原料并用机器制造后，才可能制造出同样乐器使发出同样的音色。其次是中国乐器的音域太窄，不能象西洋乐器中的风琴、钢琴和箜篌一样，能有7个均发出80多个不同音的音响。如中国笛只有1个均，而且没有半音，外国的长笛有两均之外还可以吹出半音来。最主要的是中国乐器中多为高亢的单音乐器，缺乏洪亮的低音乐器。基于这些理由，他觉得李保正的阳谷哨虽然本身构造简单，但是可以独立吹奏，再加上制造成本低，

很容易普及，就很值得进一步地提倡和谋求改进。同样应该把中国古代的埙也列入民族乐器之林，因为中国几千年前早已有了这种土制乐器，它的制造方法本身也有其一定的科学基础。对这种民族乐器提倡并加以改良并非标新立异，而是使传统的民族形式的乐器得到发展。

丁西林同志还谈到1941年在重庆研究11孔笛时最初的动机，主要在想使许多穷苦的音乐工作者或音乐学校的学生们，能以低廉的代价掌握一种比较科学的中国乐器。他所改良的11孔笛最初是用金属做的，现在则是用活动的木头做成的，既可以伸缩也可以转调。最后他谈到中国的笙在世界音乐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外国的管乐都不能吹奏复音与和声，中国笙的特点，则是由3个管齐鸣形成和音的。他还谈到自己在研究中国笙的改造上所费的时间，远比他过去研究11孔笛的改造所费的时间更多，也就是这个道理。

李保正最初的阳谷哨有7个孔，只能吹出8个声音（1个均），根据已有的基础改成8个或10个孔后，能够吹出包括5个半音的12平均律的曲子。它的标准音可以利用钢琴、风琴、口琴等乐器上的标准音作为校正的基准。必须保持原有的样式、风孔部位和指法，进一步使之放大以增强音量并改变音质。

关于阳谷哨是否贴膜问题，丁西林同志也提了意见。他以为中国的笛子上有膜，这成为中国乐器的一个特点。阳谷哨上如果加上苇膜发生颤音，则易于使人意识到是笛子的一类，反而不如不加上苇膜，使之更能保持其独特的风格。

李保正的阳谷哨是一种简易而轻便的民族乐器，它的原料是北方各地普遍出产的胶泥（粘土）。制造的工具则只用

几种简单的竹刀和铁条。过去他一个人每天能制造 60 个泥哨，如果用硬模铸造，其产量更可以增加。过去只经窑一次烧成粗糙的陶器，如果能改用瓷泥做成瓷质或者在陶器的基础上加上陶釉，其质量将更坚实，音色将更响亮而优美。丁西林觉得将来可用胶木来制造，各种调的哨都可制成固定的模型加以复制。

李保正的阳谷哨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乐器，因为制造过程简单，成本低廉，而流传的范围很广，凡是他的足迹所到的地方，都留传下他的阳谷哨的声音。以每年出产 3 千个左右计，1953 年以前的 9 年中至少已有近 3 万个阳谷哨传播到华北各地的广大群众中。由于它本身便于携带，吹奏方法易于学习，很可能成为一种比口琴还容易普及的乐器。因为它不但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而且具有显著的地理基础，正象中国南方的人民住在盛产竹子的地带，竹制的管乐器如笛、箫、芦笙等非常普及，甚至有人能把一片竹叶子做成很好听的口哨，吹出各种优美的曲调来一样。在缺乏竹器的中国北方，人民能以本地方盛产的胶泥制造出一种自己所喜爱的乐器，正可以说明它的民族地方特点。

根据以上的理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办公厅曾在 1953 年 5 月，介绍李保正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陶瓷系附属实习工厂去学习，希望把他的阳谷哨试验改制成瓷的或在陶上加釉，如果获得成功就可以更大量地加以推广。

李保正在两位熟练的陶器技工傅浚和许翰臣同志的帮助下，学习了制造瓷模和用旋子制造阳谷哨。用旋盆旋碗的工具来制造阳谷哨的坯子，比他过去完全用人工制造大大地提高了一步。用旋子翻出来的泥坯子比人工制造的厚薄匀

称，而且放大了两三倍。在初步制造的模型中，根据钢琴上的基准音可以分出有 A、bB、C、和 G 4 种不同调子的泥哨。经过第一次窑烧之后，有的因为体积缩小发生了音质的变化，但是音调的准确性比以前提高了。这个期间他又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展览会上展出的各种木制竖笛，并借到一支美国制造的胶木竖笛，因而他又学习仿制了几支用瓷泥做的中国式竖笛，音响效果很好，音阶的部位也很准确。

他在中央美术学院陶瓷系技工的帮助下，用旋子制了 1 千多个比原来放大 1 倍多的阳谷哨，大部分哨的音响都在钢琴上校正过。另外他还用瓷泥和坭子土（耐火土）试制过几个小型的阳谷哨，其音响效果比泥制的更加响亮而清脆。他所改造的那一批阳谷哨，曾找北京东郊制陶生产合作社加上赭色和翠绿色的陶釉，不但成为一种非常美观的彩陶乐器，而且也成为一种非常古雅的工艺品。在他学习期间，文化部为了鼓励他继续钻研，曾补助他人民币 70 万圆以解决脱产时期生活上的困难。

李保正在北京期间，许多音乐工作者都听过他的演奏，北京市文化处音乐工作组曾愿意指定一个干部专门教他识谱，但是因为他为一般农民特有的保守思想所限，没有坚持下去。在 1953 年 9 月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他曾把一批改良过的阳谷哨带到中国音乐协会大会会场上出售，中国各地的音乐家们都带着很大的兴趣，把他的改良阳谷哨抢购一空带向了全国各地，一位新疆来的音乐工作者，特地买了几个带回边疆。

李保正的两次北京之行，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象。《北京日报》记者曹尔泗同志特别为他写过一篇专栏文章，但由于音乐家们争论它是一种乐器抑或为一种音乐玩具，一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最后只能把那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改成几百字的简介，发表在1953年10月8日《北京日报》的“文化生活”版上。除刊载了改良阳谷哨的图形外，美术家陈今吾同志还为李保正的演奏绘制了一幅速写图刊在文章的后面。文章发表后，李保正曾收到北京大学的学生和石景山的工人给他的许多来信，约他去传授阳谷哨的吹奏法，可以想见阳谷哨在群众中影响是多么广泛。但是由于农民的落后想法，当他把那1500个改良阳谷哨售出之后，他没能继续追求进一步巩固他的改良成就，不久又回到山东故乡去了。

据了解，目前中国音乐界，能够吹奏这种中国古代民族乐器埙的人很少，可以指出姓名的只有上海大同乐会的琵琶演奏家陈夫乐等几个人会吹埙，再过些年很可能就会失传了。为了抢救中国的民族乐器的演奏技巧并进行改良，1954年春天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后，我曾把李保正和阳谷哨的有关材料介绍给他们，希望民族音乐研究所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帮助他继续改进，但仍然为了“乐器乎抑音乐玩具乎”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而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

自从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使我又想到这个久悬未决的问题，也应该在破除一切清规戒律的号召下得到适当的解决。特别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后，农村的文娱生活需要大力开展，而李保正的阳谷哨正是推动农村文化生活的一种有力的工具。它究竟能否成为一种

具有群众基础的民间乐器，抑或只能作为“音乐玩具”，很需要在群众的考验中去谋求答案。根据1955年在北京的实际影响而言，我肯定他是可以获得更大的成绩的。希望有关文化领导部门能够及时地进行研究，并期能进一步得出结论。

1953年4月10日初稿于北京

1956年7月25日改写于北京

一 点 补 充

1957年1月我回山东工作，曾在济南街上遇到过李保正，当时他刚从北京回来不久，正准备去青岛卖阳谷哨。第二年他从青岛回来又去北京，中间还到过烟台3个月。1958年秋他还到南京住了4天，上海住了两个多月，在南京、上海等地传播了他的阳谷哨。然后再次到青岛住了一个冬天和一个正月，在郊区制作阳谷哨，到市内去发售和传授吹奏技术，很受当地青少年和工人群众的欢迎。

1959年困难时期，他又到长春住了3年。先在砖瓦窑厂干临时工，冬天到了长春玩具厂大量制作阳谷哨。由玩具厂出成品，然后再发出去。当时玩具厂每月给他固定工资48元，55斤粮食，使他的生活比自己流浪街头有了保障，也使这个小小的乐器进一步得向更大的范围推广。

1957年他在北京时，北京艺术师范学院音乐系教授杨大钧同志，曾介绍他入北京市文教用品联谊会，设法改良和推广阳谷哨。同时他还见到中央轻工业部乐器改良研究所的王

玫和胡彦久等著名乐器改良专家，他们曾帮助他改进阳谷哨的风孔和音准，使之更加科学。

李保正不断地到处活动，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闻，也学习到一些音乐基本知识。进而学习到更多的流行民间曲调和群众歌曲曲调，如《四季歌》、《小放牛》、《康定情歌》和古代的军歌曲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原始曲调）等。

1951年李保正曾在寿张吴堤口教给一个说落子书的民间艺人吴小喜，使他学会了吹奏阳谷哨，并且也能自己制作发售。1954年在北京通县还教一个叫韩春生的人学会了吹奏和制作方法。这些人后来都能自己制作并自己发售，使李保正及其阳谷哨的影响更加扩大开来。在他的故乡大碾郭庄也有不少人学会了吹奏和制作。有一年他到冠县产棉区住了两三个月，用发售和传授阳谷哨的总收入买了20多石高粱，后来换成200来斤棉花，用小车推回家来。当地又有20多个青年人学着手制作和演奏阳谷哨。

1964年5月我去阳谷坡里调查革命史迹时，曾专程去大碾郭庄看望李保正，他对我说了这些情况。从那以后，我又有十几年未见过李保正同志了。他在五六十年代的活动，对于普及民间乐器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李士钊

1983年3月23日于济南

本文作者 李士钊，1916年生，山东省聊城市人。1933年入聊城省立三师后潮第九级学习，1935年秋考入上海国立

音乐专科学校师范科。1937年任山东文艺青年协会常务干事，《文艺俱乐部》文学月刊(铅印)编委兼发行人。抗战开始后在聊城政训处宣传部门工作，主编油印《抗战日报》，1938年5月改铅印版后任该报编辑记者及冀鲁青年记者团团长、《战地文化》半月刊编委等。1939年去大后方，在报刊发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报道多篇。1943年冬任重庆国立音乐院讲师、国立歌剧学校讲师。1946年7月任上海社会大学(即上海武训学校)校长。1947年5月后相继任上海大中华唱片厂音乐部主任、上海广播乐团团长、上海《新民报》(晚刊)政治记者等。1950年在北京中央歌剧院艺术处工作，1953年调中央文化部研究室编辑《文化资料》译刊。1957年调山东任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主编《山东省志资料》。1979年落实政策后，在省政府参事室工作。现为省政协委员、省史志编纂委员会委员、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原载1984年12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二辑，阳谷县文化局供稿)

附：

阳谷哨——一种民间乐器

《北京日报》记者 曹尔泗

在北京的街头上，常见一个农民卖一种泥制的哨子，能吹奏很动人的民间小调。

这个农民叫李保正，泥制的乐器就是他发明的，他的家是山东省阳谷县，因此这种哨子叫“阳谷哨”。

十几年前，李保正在农闲时用胶泥做了一个单孔的哨吹着玩，后来加了两个孔便能吹出简单的音阶。再以后，他又逐步摸索着增加到7个孔，便能吹出各种小调来。他觉得非常好玩，在农闲时就制造了一些到各处去卖，受到很多人的欢迎。有位老先生告诉他，这种东西很象中国的古乐器埙，这给他增加了不少勇气。于是他又把它改进到8个孔，另外在哨上开了风孔，加上象笛子上用的苇膜，吹出的声音更加好听了。

他在去年来到北京，得到几位音乐家的帮助，校正了阳谷哨的音阶，又把阳谷哨改变了几种形状，并试用瓷制造。

阳谷哨声音好听，学起来也很容易，可以做为一种音乐玩具。普通的一种是前面有并排的6个孔，后排有上下两个孔，全闭时为“1”，启后面的下孔是“2”，再启前面的左下孔是“3”，启右下孔为“4”……以此类推，等到全

部孔都启开时，那就是最高音了。

文后附有两个插图：

①李保正吹阳谷哨

陈今言速写

②两种瓷制阳谷哨

（原载1953年10月8日《北京日报》第三版“文化生活”栏，1984年12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二辑转载，阳谷县文化局供稿。）

关于埙的资料

李 印 元

埙(同埙, 音xūn, 又读xūan)是我国古代一种吹奏管乐器。古代辞书《尔雅》中有注, 属八音之一土类, 陶制, 故又名陶埙, 也有用石、骨或象牙制成的。用土烧制而成的, 大如鹅蛋或鸡蛋, 形如秤锤, 上尖下平中空, 顶上1孔为吹口, 前面4孔, 后面两孔。殷朝以前有球形和椭圆形的数种, 音孔1至三五个不等。殷以后的埙, 有梨形、鱼形、球形、笔管形之别。解放前在山西万泉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过最早的埙。解放后, 浙江余姚河姆渡和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遗址出土有骨哨和陶哨, 距今有6千多年历史, 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乐器。哨进一步发展为埙。半坡出土文物中的两个陶哨, 实即我国最早的陶埙, 其中一个有1音孔, 可吹出小3度的两个音。殷商时代, 埙已发展成5个音孔, 可以吹奏出11个音, 已经是一个旋律乐器了。河南郑州二里岗商代文化遗址也出土有几个陶埙, 仍可吹出声音来。音乐家吕骥同志曾去甘肃、陕西、山西、河南4省, 考察研究了不同形状、不同时代的陶埙二十几个, 并写有《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几种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一文。到汉代出现了6音孔陶埙(曲阜孔庙里保存有1个)。

在古代, 埙常和另一种竹制管乐器篪(音chí)合奏,

二者声音和谐。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关于埙和箛的记载，在《大雅·板》章有“天之牖民，如埙如箛”的诗，意为上帝之教导如利用土而制成埙，利用竹而制成箛，都是因其材质，使其成器；在《小雅·何人斯》章中有“伯氏吹埙，仲氏吹箛”的诗句，写大哥吹埙，二弟吹箛的和乐情景，后来因用“埙箛”、“伯埙仲箛”赞美和比喻兄弟和睦。埙主要用于历代宫廷雅乐，民间也有流传。

古埙几乎濒临失传。目前，历史上遗留下的埙谱，只有清末吴淦源（棠湖，河北吴桥县人）编纂的《棠湖埙谱》。吴和民国初年山东德州的李雨村，都曾一度恢复制造5音孔陶埙传世，并能吹奏难度较大的民间乐曲和昆曲调。其后继者至今仍有人在。我国现代音乐工作者为了研究和探索这一古老乐器，使之复活并在舞台上演奏新曲，付出了辛勤努力。上海古埙专家陈重教授1942年在他和几个同志创办的国乐研究会举办的民乐演奏会上，用泥埙演奏《楚歌·别姬》获得成功。1952年在一次“今虞琴社”的演奏会上，他又用以50元大洋买来、从清宫盗卖出来的胶泥埙吹奏了《普庵咒》、《关山月》。1979年，在中国音协负责人吕骥的要求下，他开始着手埙的研制工作，经过多次失败，终于在宜兴陶瓷工人的帮助下，用注浆法制作成了9孔陶埙，能吹出13个音阶，8个半音。1993年1月9日，陈重的学生杜次文用埙在人民大会堂吹奏了《九歌》中的《哀郢》，引起了中外音乐家的震惊和极大的兴趣。杜吹奏的《楚歌》被中国音协选为参加1984年7月在美国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的独奏节目。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了两千多年前的大批古乐器。湖北省歌舞团依据历史文献，仿制出这些古代乐器，并编排了

大型《编钟乐舞》，其中有“吹埙”这个节目。1983年9月湖北省歌舞团在北京演出时，《人民日报》曾以半个版的篇幅刊登摄影介绍，诗人徐刚配诗：“心之哀，歌之情，吹埙以‘哀郢’。此心不死，此曲不断，绕梁三日，期待风雨雷鸣”，对吹埙演奏作了形象生动的描写。埙音色醇厚古朴，低沉悲壮，听起来如泣如诉，使人仿佛进到一个幽远古老的境界。电影《张衡》、《华陀与曹操》中，有几段音乐就是用埙演奏的。

（原载1984年12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收入选编时又补充了一些新材料。引文篇目，恕不一一列出。）

鲁庄的造纸和传说

顾辛年及石佛鲁庄供稿 政协文史办整理

石佛乡鲁庄，位于阳谷县城北35里。这个村生产手工抄纸，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主要生产呈文纸、小麻纸和草纸。在旧社会，群众是作为挣饭吃的一条生路，出力吃苦，落个糊口。官府乱加干涉，层层克扣盘剥，最后群众所得无几。在革命战争年代，鲁庄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41年7月冀鲁豫边区成立，当时因敌人经济封锁，断绝纸源，区党委责成阳谷县委发动鲁庄群众，利用传统抄纸尺寸，改版加厚毛头纸，提高质量，解决了印刷用纸供给。1942年至1945年间，为了保证革命的需要，他们手推小独轮车，星夜往冀南、太行山等解放区送纸。汉奸不断到村里抓人，说是八路军的工人。1945年至1949年期间，冀鲁豫边区政府在这里专设机构，组织造纸生产5年之久，作为政治任务，规定这里不出战勤。当时边区党委和政府印发党报、纸币、地约以及《中国土地法大纲》小册子等，都用此地产的毛头纸。总店设在朝城县，下有冀南大名、朝城城内、阳谷安乐镇3个支店的冀鲁豫书店印行毛主席著作等革命文献，就是用的鲁庄产的纸。当年印的书有的珍藏至今，成了宝贵的革命文物，可贵的历史见证。建国后，聊城行署印土地证也是用的这种纸。1955年前，县供销合作总社生产

科两名同志在这里组织和管理纸业生产。1955年组织阳谷县手工业合作联社，1956年鲁庄纸业生产联合社成立，80%的劳力参加了纸业社，当时有职工286人，为县纸厂前身。1959年搬到阳谷城内，鲁庄随去了一批工人，三年困难时期多半又回庄了。1962年至1965年，鲁庄在村西又办起纸厂，每个生产队年收入二三万元，购置了骡马胶轮车、机械等，积蓄了较厚的家底。“文革”中搞纸业被批为“资本主义尾巴”，有的只能偷偷地生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村造纸业迅速发展。现在，全村234户960人中有590人参加抄纸，共有纸坑110个，其中纸厂14个坑。每年生产呈文纸十万万（1000万张），产值75万元，人均790元；获利润37万元，人均390元；每年向国家纳税4.5万元。他们生产的呈文纸，拉力强、吸水性强、柔软，用途广（糊窗户、套棉衣、做卫生纸），主要销往东北3省21个县市，深受东北人民欢迎。

鲁庄造纸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周围的村庄。据调查，鲁庄及周围5个村庄共有手工抄纸作坊103个，年产350吨。又据周围23个村的统计，3700多人从事抄纸生产，年产各类纸9100万张，产值546万元，获利273万元，为发展乡镇企业作出了贡献。

鲁庄抄纸主要原料曾使用过桑皮、𣎵（又叫枸或楮）皮，由于这种树木减少，现主要采用麻和麻绳头为原料，掺有少量废纸。整个生产过程仍沿用原始工艺：废麻绳选料——切断（串绳）浸泡——碾压（多数为槽碾，用马拉转动）——冲洗——浸石灰水——汽蒸（放于露天锅上蒸12小时）——碾浆——洗浆——打浆（打池）——捞纸——压纸——晒纸

（贴于墙上）——揭纸——打包。这个村准备组织起来，办起机械化纸厂，进一步扩大生产和销量。

鲁庄的自然条件有利于发展造纸。这里地势较低，地下水源充足，村周有河水环绕，村内砖井水很旺，一眼井每天能出水700余桶，可供10余个池坑用水。村中无论那里都能安碾子，迷信说法是“青龙大吉”，不用看“风水”。现在，村中可见大碾碓石头磨了2尺深，古井遗迹还在。

几百年来，这个村的抄纸虽然品种有别，生意总是顺利有门路。这里世代宗奉蔡伦为祖师。说他们抄纸为生，是蔡伦先师给留下的饭碗。传说蔡伦为发明造纸，游遍了中国大地，教了3个徒弟，大徒弟抄木浆白宣纸，二徒弟抄桑皮麻浆毛头纸，三徒弟抄草纸，鲁庄的纸坊就是二徒弟传下来的。村里习惯，老人常把后辈叫到跟前，让年轻人记住两句话：蔡祖师姓蔡名伦字敬仲，湖广衡州耒阳县蔡子池人；祖师享年55岁，农历三月十七是其生日，十月十日是其忌日。纸户在抄纸开工时都要放鞭炮、烧香纸，供上蔡伦神牌位，两边对联是“汉世科家地，钦封玉龙侯”，横额“万古流芳”。每年三月十七、十月初十，当地都作为两大节日，纸工们停止生产，杀猪宰羊，摆上酒场，欢聚一堂，互送节礼。三月十七这天，村上还集资唱戏举行纪念活动。“文革”期间曾停办，三中全会后重又恢复这一民间纪念活动。1986年农历三月十七日，鲁庄隆重举行纪念造纸祖师蔡伦诞辰活动，邀请国家轻工部原副部长、全国造纸协会理事长王逸之、全国造纸协会理事赵淑哲、省一轻厅副厅长李昭太、省造纸公司经理曹珍仪和地县领导参加，农业科技制片厂、省电视台等进行了现场录像。纪念活动进行了4天，有豫

剧、魔术演出，饭店、副食、百货布棚林立，个体摊点摆满场地，还有木料、牲口、鸟市等贸易，鼓乐喧天，鞭炮齐鸣，参加的群众有近8万人。

（原载1986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小资料：

蔡 伦 造 纸

政协文史办

蔡伦（？——121），字敬仲，东汉桂阳（今湖南耒阳县）人。他从小就到皇宫里去当太监，担任职位较低的职务——小黄门，后来得到汉和帝信任，被提升为中常侍，参预一些机要大事的谋划。后来，他又加任尚方令的官职，掌管宫廷用品生产和供应，负责皇宫内的手工作坊，监督工匠为皇室制造宝剑和其他各种器械。他所监造的刀剑，“莫不精工坚密”，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

由于所担任职务的原因，蔡伦经常和工匠们接触，这都是全国各地来的优秀工人。他直接参加一些生产的试验活动。劳动人民的精湛技术和创造精神，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当时，蔡伦看到大家写字很不方便，竹简和木简太笨重，丝帛太贵，丝绵纸不可能大量生产，都有缺点。于是，他就研究改进造纸的方法。

蔡伦广泛研究总结民间的造纸经验，在西汉以来用麻质纤维造纸的基础上，改进造纸工艺，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旧鱼网等植物纤维为原料，把造纸技术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先把这些东西剪碎或切断，放在水里浸渍相当时间，再捣烂成浆状物，还可能经过蒸煮，然后在席子上摊成薄片，放在太阳底下晒干，这样就成纸了。用这种方法造出来的

纸，体轻质薄，很适合写字，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公元105年（和帝元兴元年），蔡伦把这个重大成就报告了汉和帝，献上了他监造的第一批纸，受到了和帝的赞扬。从此，全国都采用这样的方法造纸。公元114年（安帝元初元年），蔡伦被邓太后封为龙亭侯，于是，人们称这种纸为“蔡侯纸”。

蔡伦带领工匠改进造纸方法和技术，造出了质量较高的纸。他用树皮、麻头、破布、旧鱼网做原料，这些原料来源广泛，价钱便宜，有的还是废物利用。至于用树皮做原料，更是一个新的发现。这就为纸的大规模生产和推广使用开辟了道路。

蔡伦改进造纸方法成功，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后，别人又不断把他的方法加以改进，造纸业迅速发展起来。蔡伦的巨大功绩，也被载入史册，在中华民族各族人民中世代相传。造纸术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传播到全世界。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作出的一项伟大贡献。

（原载1986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鲁庄造纸情况见闻

李 玉 法

阳谷造纸业特别发达，纸商业户主要集中在石佛乡鲁庄、柳园、孙庄、高庄、廉庄一带，连阳谷城内的县纸厂，也从这几个村聘请技术人员。这几个村家家户户，除照常耕种田地外，一年四季把精力集中到造纸上。每年春三月间，几个庄凑鲁庄一个广场上，搭台唱戏，纪念造纸发明家蔡伦。演戏时，神棚里挂着蔡伦画像，供人瞻拜。

我曾去鲁庄听戏，和村干部谈起该村造纸的历史。他说：中国的造纸业者，不独阳谷，而阳谷石佛仅是千百中的一个。不过我们这几个村，是造纸的发祥地，蔡伦先师发明造纸后，这里首先响应，历史是悠久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纸张奇缺，冀鲁豫边区政府规定，阳谷石佛区鲁庄几个村，不出战勤，发给资本和原料，叫纸商们抄麻纸，供给边区各县印刷公事、文件、宣传品及抗日中小学课本之用，贡献很大。

鲁庄一带出产的麻纸，远销东北黑龙江各地。在鲁庄我逛了一遍，见家家户户均有轧料碾子，房屋墙上均用石灰泥粉饰，以便贴晒纸张。又见有几辆大汽车，装满纸捆往东北运。我问村干部管送吗，他说不管，谁买谁运。我问：“每户全年能盈余多少？”答：“平均每户4000多元。”因此鲁

庄几个村是阳谷最富庶地区。我问戏费何所出，他说附近村纸户均摊钱，连阳谷县立纸厂也摊钱。

（原载1986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阳谷溯源

县志办公室 张万知执笔

一、置县起源

阳谷属黄河下游开化比较早的地域之一。1972年以来，先后在县境南部发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多处，说明至少在五六千年以前，境内即有氏族部落聚居。春秋时期，今阳谷地处齐、卫之交而大部属齐，为齐柯邑（又称阿邑，遗址在今阿城镇西北6里）地。《春秋·庄十三年》：公会齐侯盟于柯。“柯”即指此地。秦时改称东阿。汉置东阿县。西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汉将彭越渡河击东阿，斩楚将薛公（《史记·高祖本纪》），此东阿即春秋时之柯。北魏时东阿县城东迁，故郦道元《水经注》称此地为“东阿故城”。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置阳谷县（《隋书·地理志》），历代相沿至今。

有关阳谷置县起源，明清不同版本的《阳谷县志》均沿用这样一种说法，即：隋开皇十六年，改须昌曰宿城，而别置须昌属东平郡，析置阳谷县属济北郡（汉须昌县城在今东平县州城镇西，北魏时移至无盐——今东平县宿城乡驻地。隋改须昌县名为宿城，另于汉须昌县故城设须昌县），认为阳谷县是由原须昌县划分出来的。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可靠。一

是距离太远，风马牛不相及。隋初须昌县城远在今宿城，距今阳谷县城一百五六十里，其间又有东阿（当时治所在今阳谷县阿城镇东）、寿张（当时治所在今东平县境内）两县相隔，须昌县的范围不可能向西延伸那么远，以至于能包容今阳谷县地。二是所据资料有误，以讹传讹。《左传·僖公三年》：江人、黄人、齐侯、宋公会于阳谷（杜预注：阳谷，古地名，在须昌县北）。《后汉书·地理志》：须昌……有阳谷城。这些记载所指的“阳谷”，是“在须昌（今东平县州城镇西）县北”的“古地名”，并非隋代以后的阳谷县城。后人编修地志，不太了解实际地理情况而错会其意。唐李吉甫修《元和郡县志》，误称阳谷“汉为须昌县地”，其后辗转相抄，未加考证，一误再误。

清初叶圭绶著《续山东考古录》，开始发现并纠正了这个相沿已久的错误，指出《左传》（杜注）及《后汉书·地理志》所指的阳谷“乃古邑名，并非隋县”，同时肯定“隋置阳谷县，约得汉东阿县地十之六七”。叶圭绶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隋代新设置的阳谷县，是从原东阿县划分出来的，而不是“析须昌置阳谷县”。古东阿县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直至而今一直在阳谷境内，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二、县名由来

“阳谷一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的说法近年颇为流行，以至为一些报纸书刊所登载。查《尚书》原文是：“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意思是：（帝尧）又命令羲仲，住在东方海滨，名叫暘谷的地方。暘谷，为传说中的地名，

即“日出之处”。而阳谷无论是作为县名还是置县前的古地名，是古文献中“陽穀”二字的简体。古汉语中暘和阳，谷（山谷的谷）和穀（谷米的谷），都是绝不相通的两个字。本文中除“暘谷”外，谷作为地名出现皆“穀”字简体。显然，上述说法纯系附会。

春秋时期，齐国有阳谷邑，遗址在今平阴县东阿镇东南约40里，虽然同今天的阳谷县城相去甚远，但它们之间却有着一种渊源关系。

关于阳谷县名的由来，旧史书地理志及地方志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有8种说法。一种是“谷山之阳”说，即认为之所以取名阳谷，是因为县城“中有谷山，县治（指县衙）居山之离坤（西南）间”。明、清各版《阳谷县志》、《兖州府志》及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皆持此说。另一种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刊印的《阳谷县志》附录《孔仙洲采访稿》所持的“宓城之阳”说，认为取名阳谷，是由于地处“宓城之阳”。还有一种可称为“借用地名”说。《元和郡县志》（卷十）载：阳谷县，东南至州（指当时的郛州城，故址在今东平县州城镇西）75里……隋于此置阳谷县，取东阿县界阳谷亭（即春秋时古阳谷邑）为名。据现有材料分析，前两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是：

（一）不同版本的《阳谷县志》、《兖州府志》均记载了宋代阳谷县城迁徙事，且说明旧县城在今县城东或东北，相距数十里。当县城还在所谓“谷山”东北的时候，怎么会因“谷山”在县城中央或县治在“谷山”西南而得名呢？

（二）据查，明清时期，县北境确有一个叫作宓城集的小村，距今阳谷城60余里（今已划归聊城）。古人以山南为

“阳”，水北为“阳”，却没有城南为“阳”这一说。另外因“宓城集”名而推论为“神农伏羲之城”，也难免臆断之嫌。

在没有更多的有事实根据的材料的情况下，我们同意并在新编《阳谷县志》中采用了《元和郡县志》“取东阿县界故阳谷亭为名”的说法，即认为“阳谷”一名源于古阳谷邑。据记载，北齐时“省谷城入东阿”，原属谷城县的古阳谷邑亦随之并入。隋代从东阿分设新县，取其名为新县命名，是在情理之中的。

今平阴县东阿镇北5里处有谷山（《史记》称“谷城山”。后因当地有黄石公期会张良的传说，山上建有黄石公庙亦名黄山）。今东阿镇即春秋时齐国的小谷，汉代的谷城。谷城南10里有南谷镇（今名旧县，金代一度为东阿县城），古阳谷（即古阳谷亭，后称阳谷店，今讹为王古店）又在南谷以南约20里处。据此，则阳谷因在谷山之阳得名的说法似乎又成立了，只是阳谷其地及据以命名的谷山并不在今阳谷境内罢了。

三、县城址变迁

阳谷自公元596年设县，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但原来的县城却不在今址而是经过两次搬迁，到北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才定址于孟店——即今天的阳谷镇。迁徙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躲避河患。

关于县城迁徙的时间及地点，明、清不同版本的《阳谷县志》均有记载，即：“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县治水没。太平兴国八年徙治孟店”。但查对一下《宋史·地理

志》及宋《太平寰宇记》等志书，便可发现上述记载是不太准确的。《太平寰宇记》（卷十三）载：阳谷县……至皇朝开宝六年，又河水冲破县城，太平兴国四年移于上巡镇，关于“河水冲破县城”或“县治水没”的时间，旧《阳谷县志》与《太平寰宇记》是一致的，但漏载了“太平兴国四年移于上巡镇”一事。《太平寰宇记》是成书于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的一部全国地志，对于当代县城存毁迁徙的记载，是不会没有事实根据的。关于阳谷县城“迁孟店”的时间，《宋史·地理志》（卷八十五）载：阳谷，景德三年迁孟店。而隔了两三个朝代之后才纂修的《阳谷县志》在记载引用资料上显系有夺误。

根据以上分析，阳谷县城有过两次迁徙，即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迁上巡镇，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又迁孟店，即今城址。

阳谷县城故址，清同治本《山东通志》记“在县东30里叠路桥西”（今范海乡叠路头张八村附近），孔仙洲《县志采访稿》则说是在今安乐镇后屯村附近。他写道：阳谷故城在今城（即现在的阳谷城）东北30里屯（即今安乐镇前、后屯）之北，孟母祈蚕祠（即孟母庙故址，在安乐镇西）南15弓（古长度单位，每弓5市尺）。太祖开宝六载，水没阳谷城。太平兴国四年，迁南三里上巡镇，去屯不远，号新城。参照其他材料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段记载的谬误之处。

据《元和郡县志》记载：阳谷县（即宋太平兴国四年迁县前的阳谷城），东南至州（郓州城，址在今东平县州城镇西）75里。而今安乐镇附近至州城镇以西的实际距离，决不止此数。

另据杨霁峰《重修阳谷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夏，安乐镇农民曾在镇西南发掘出“大梁宋府君墓志铭”石碑一块，上有“以开平四年（五代后梁太祖年号，公元910年）岁在庚午十一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葬鄆州卢县移风乡安乐村”字样，并标示出安葬之处“东近安乐镇1里，西附故孟渠2里，南望杞长堤7里，北靠金后墙5里”。近年本县文化部门又在安乐镇西北黄庄村（属郭店屯乡）发现《唐燧煌郡令狐府君墓志并序》石碑一块，铭文有“以大中十三年（唐宣宗年号，公元859年）十二月三十日安厝于博州武水县移风乡西翟村之原”等字样，并记载其坟墓“南至金福城10里，北至堯堤3里，西至堯堤1里，东至黄河5里”。此外，安乐镇东原天齐庙内竖有《卢县悦性亭铭》石碑一通，系宋卢县尹申革于宋淳化二年（宋太宗年号，公元991年）所立。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分析出：

（一）、安乐镇及其附近原为“移风乡”，唐代属武水县（县治在今沙镇附近），五代及宋朝初年属卢县，并非阳谷县地，因此根本不可能有阳谷县城。

（二）、五代《墓志铭》出土的地方，正在孔仙洲所指“阳谷故城”以北不远处，故孟母祈蚕祠附近。铭文中详载“坟所”四至以标示其地理位置，如其南面不远处即有一座阳谷城的话，则“南望杞长堤7里”又作何解？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孔仙洲关于阳谷故城在孟母祈蚕祠以南15里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地理实际情况的。

让我们继续援引材料分析下去：

《兖州府志》（明万历年间刊本）：古城，在（阳谷）县（城）东30里，创始无考，或谓邑旧城。

《阳谷县志》（清康熙年间刊本）：水没城，在县东30里叠路桥西，墙隅仅存。

据此，则明清时期在县城东（实为东偏北）30里叠路桥（原在今范海乡叠路头村东，已废）西，确有古城遗址，称“水没城”，并有曾经是阳谷旧县城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既然称“水没城”，可知当时水势极大，整个城被淹没（据调查，当地曾有人于此发掘出淤埋地下的完整房屋及院落，并有陶质、瓷质古器物出土），这同各版《阳谷县志》、《太平寰宇记》关于“县治水没”、“县城为河水垫废”、“河水冲破县城”的记载是可以联系起来考虑的。并且此地距当时郛州城的距离，同《元和郡县志》“东南至州75里”的记载也是基本吻合的。因此，我们同意《山东通志》（光绪本）“阳谷故城在城东30里叠路桥西”的说法，即认为隋、唐、五代以至北宋开宝六年河水坏城前的阳谷县城，在今范海乡叠路头村附近。

至于上巡镇，因没有查到确实可信的文字记载，又没有遗迹可寻，故不便妄加断定。仅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当时的阳谷县城“在（郛）州西北70里”，较《元和郡县志》所载“东南至郛州75里”少了5里，推想县城是向东或东南方向迁移了，而且距故址并不太远，很有可能是现在的张秋镇城坡村附近。

（原载1983年《阳谷县志资料》第二辑、第四辑，收入本选编时作者重新作了整理）

阿城海会寺考略

李印元

(一)

海会寺，位于阳谷县城东偏北50里的阿城镇南端，始创于清初康熙年间，距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后经扩建续修，建筑宏伟，气势雄壮，规模可观，形成了包括东西两侧刘公祠和运司会馆在内的大型古建筑群。建筑采取北方传统的民族形式，砖木结构，飞檐斗拱，悬山式屋顶，顶复青布瓦。三部分建筑各具特色，自成一体。而作为整体结构又相互照应，布局得当，协调、紧凑、融洽。远望即可见“殿宇巍峨，楼阁连亘”。院内植有柏、槐、桧、栲、皂角等树，古木森森，高耸云天，碑亭矗立，一派庄严、肃穆、清静气象。建筑占地共90余亩，其中海会寺50余亩，会馆近30亩，刘公祠10来亩。原有殿宇楼阁等建筑168间，因历经多代，风雨沧桑，不少部分已被损毁，现存81间，所幸主体建筑尚在，整体布局依然可见。

海会寺作为寺院建筑，结构完整严谨。沿其中轴线，从南往北依次为山门和前殿、中殿、大殿三大殿及三进院落。山门3间，额匾上写“海会寺”三字，还有雕龙突出，气势飞动。山门东西各有旁门。山门外原有两个大石狮雕像，建亭

其上，人称狮子亭。山门内有门尊哼哈二将把守，像高约1丈5。进山门即是前院，院内东西两侧建有钟鼓二楼（鼓楼已毁）。钟高与人等，鼓大需两人合围。据说，当年寺僧撞晨钟鸣暮鼓，可以声闻十数里（钟“文革”中被毁）。前殿（一殿）3间，内有两个佛龕，关帝和韦驮二神像南北相背而立，东西山墙列着四大天王（俗称四大金刚）。中院内中殿（二殿）3间，是穿堂式建筑，殿中南向供弥勒佛，靠背北向供观音菩萨。院内两厢各有平顶配房3间。后院是正殿，也叫大殿（大雄宝殿），面阔5间，进深3间，木结构，砖登顶，是寺内主体建筑，比前殿、中殿都高大宽敞。正中供奉3尊木雕三世佛坐像，像高丈三四尺许，底座即3尺来高。中间一像是释迦牟尼，俗称西天如来佛。东西山墙屋各1间，相向分列着十八罗汉像，最南边面转朝南的一个是泥像。两厢配殿为东西禅堂，各5间，是和尚打坐参禅的地方，内供神像，高与人等。

海会寺后院两旁各有小院，以中轴线为准左右对称。西院主体建筑为大悲阁，下层暖阁原供写有“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上层供千手千佛（千手千佛即千手千眼佛，又叫千手千眼观音。观音尊号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简称“大悲”。其化身形象特别多，千手千眼观音即其一），所以又叫千佛阁。院内有西配房5间，原供有本寺历代和尚的神位木牌。进大门原有养鱼池，池上有桥。门外为大空场院。

东院主体建筑为正厅方丈阁3间，是寺内方丈即住持住的地方。东边配房两间。大门内题匾面南写有“方丈”二字，面北为“迥出尘壤”四字，表示远离世俗的意思。阁西

原有藏经楼，是存藏佛经处。据说，解放前海会寺先后遭受奉军、晋军的掠夺以及冯二皮支队和日伪的破坏，曾有住兵听说大殿内佛心是金的，因此去掏过，结果里面塞满了佛经，字有指甲大，还有宋版书，竟都散失毁弃于一旦，实在可惜。

大悲阁院西有接官厅 3 间，方丈阁院内厦屏门外东侧有客堂（东屋）3 间，大概是分别用作接待官员宾客（施主）和游方和尚的地方。方丈阁院内有小伙房，院前有大伙房。再东为饲养牛马的牲口棚院和大车门。院西南为塔院，有 10 来座墓塔（和尚死后放在缸中，上下两缸相扣，外砌砖塔），是埋葬大和尚（方丈）的坟墓。院外东南另有塔亭一座，相传为第一代住持和尚的墓塔，亦称南塔院。再往南半里处为大片义葬地（俗称乱葬岗），还有一处和尚林，占地几十亩，栽有几百棵大粗柏树，墓塔座座，是一般和尚埋葬的地方。

刘公祠在方丈院东，自成一小院，南向的高大门楼上有写着“刘公祠”字样的匾。院内大殿，实际上是刘家祠堂，即刘姓的家庙。据传说，刘公名襄，山西人，任山东巡抚，创建海会寺时，他给予大力支持和赞助，是个大施主。所以在他生前就建了 3 间大厅，内供写有他生平的牌位，当时叫刘公生祠。解放前曾用作和尚藏粮的仓库，院也成了寺里的柴禾园子。

会馆在海会寺西侧，两进院落，独成一体。大门前有一道几十米长的大影壁，系砖瓦结构建筑。大门两侧便门上分嵌着两块方石，上面用阴文镌刻着“运司会馆”四字。当地俗称山西会馆，又称南会馆（阿城旧有东、西、南、北 4 个

会馆之称)。因阿城地当运河水路要冲,镇即在古运河东岸,南北来往船只甚多,商业颇为繁荣。旧碑记中称“阿镇为水陆通衢,富商大贾辐凑云集”,西起山西、东至周村的商人纷纷来此经商,尤其盐、当二家(行业)号称首富。旧时,盐商地位属于官商,盐的买卖、转运由盐运使署租办。清代于沿海和各重要产盐省份,设盐运使,全称为都转运使司盐运使,简称运司(或运使、都转)。据说阿城旧有13家盐园子,有管理运盐的组织并设有盐巡,有专用运盐的石道,现在街上朝下挖两尺多都是石头,即是运盐的盐道。从东海边运来盐,然后再从阿城朝南方转运。海会寺和会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居住阿城的山西盐商捐款修建起来的。几乎与此同时,由周村丝绸商捐款,在阿城镇东关关帝庙旧基上扩充改建成於陵会馆(周村地属长山,於陵系长山旧名),即俗称东会馆(又叫山东会馆)者。会馆本是旅居异地的同乡人或同业人,为联络乡谊和感情,结成团体,兼营善举,以此作为集会居住的馆舍,是和地域性相联系的同乡或同业组织。阿城商人会馆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商业交往发展,外来旅居当地的商人逐渐增多的繁荣情况。康乾时代,商人建立的会馆原来就是“半宗教半商业性质的行会”(《海关十年报告》477页)。工商业会馆通常祭祀共同信仰的神祇,作为加强内部团结的一种手段。会馆常用某堂、庙、殿、宫等别名,作为本行帮办事集会和祭祀的地方。“此所为前宫后殿与会馆二而一也,合庙堂于会馆也。”(《上海碑刻资料选辑》236页)因为山西人特别崇祀关云长,所以山西会馆后院大殿专门供奉关公,称关帝殿(或关夫子庙,又叫春秋阁),暖阁1丈多高,内有神像。东西配殿供

奉关平和周仓。另有稍低配房，东房塑持刀卒立像，西房塑赤兔马和马童。前厝院中间为大厅（又叫过厅、客厅）3间，高大宏敞，雕花隔扇，前后开门。会馆前院实际是一个旧式戏院，正对大厅修在大门上的南屋即是戏楼，前为舞台，后为化装室，东西两厢为上下两层的看楼（看台），四周围一遭，楼楼有门相通，叫圈楼（串楼）。因为在海会寺山门外百余步大空场上也有一个戏台，所以会馆戏楼称里戏楼，寺门外戏台称外戏楼。每年春（麦前）、秋（收秋后）两季有两次古庙会，据县志记载，“每会百货云集，买卖兴盛，演戏8天，10余日贸易不绝。”一向负有鲁西盛会之誉。外戏楼是春会，即四月会，演戏多为河北梆子和河南梆子，各行商贩和艺人多是从泰安庙会下来到这里。会期8—12天，一直到收麦，商品以农具为大宗，附近农民都来赶会买割麦镰刀等农具。里戏楼是秋会，即九月会，从这里下来去泰安。里戏楼会唱戏12天，连出进半月。两次庙会都是正会4天，由和尚出钱请剧团，同时他们还向来赶会的商贩收摊子钱；以后则由各商贩摊派，先是买卖较大的高棚（客商），然后是包括街里的所有卖吃食的一般小商贩（俗称“黑胳膊”或“冒烟的”，即卖煎包子、肉合子的），各包4天，会期延长再由大伙摊钱。九月会比四月会热闹繁华，四外八乡都来赶会，各地说唱艺人、杂技、马戏亦复云集，济南、周村、青岛、邯郸、邢台、天津、营口等地的商人也赶来贸易。买卖大宗是布匹、京广杂货、木料、大牲畜，庙外是木头、皮货，庙里是金货。自晨至暮人山人海，挨肩擦背，几无空隙，叫卖声、谈笑声，几乎淹没了锣鼓声。从此也可见海会寺及阿城地理位置（寿、阳、阿3县交界处）之重要及商业繁荣之一

般。但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迄今再也没有举行过一次。

海会寺除古建筑外，还有不少具有重要文物和艺术价值的碑刻、石雕、彩画等。山门外的石狮子，一雄一雌，雌狮身上脚下还有9只小狮子，雕刻精细，造型逼真，生动活泼。现存一狮，头颈上满是卷鬃，踞立石台座上，怀中尚有小狮嬉戏，虽伤痕斑斑，残缺甚多，但雄姿犹在，睹之可爱。殿内木雕、泥塑以及梁柱屋顶上的彩画都各具特色。尤其是一些碑刻更有史料价值。据说在寺院大殿前原有两通碑，均及房顶高，可能就是民国二十六年《增修阳谷县志》中记载的海会寺中院南向立的那两通石碑。其一曰“天章御书碑”，高7尺8寸，宽3尺，镌有康熙手书长歌一篇，前有叙，后尾右旁有“八月上旬口外山庄书”九字，左镌“龙集大集康熙甲申年（按：即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应钟月上浣谷旦”，下另行“刑部左侍郎加四级臣”，下“监勒上石敬立”，有康熙御章两颗。一曰“康熙御书扇面碑”，高4尺8寸，宽2尺，上端镌有折扇面形一幅，额题“御书”二字，扇廓内系康熙书写的七绝一首：“渡水傍山寻绝壁，白云飞处洞门开，仙人来往行无迹，石径春风长绿苔。”下镌康熙印章两颗。在大悲阁院门前空场也有两座大碑，俗称龟驮碑（碑座之物叫作赑屃，也称为龟趺），传为乾隆亲笔诗词和一花鸟扇面御碑。此外还有一些记载寺院捐募、置地、修建、保护等经济活动和历史的碑刻。这些碑大都毁于“文革”“破四旧”时期，或被砸烂成为碎石，或被用作屋基、桥基。龟驮碑碑座依然在，龟头残缺，铭记和展示着历史的风雨痕迹。最近，县政府民侨宗、文化、地方志和政协文史办等有关部门联合前去考察，从堆放在方丈院内的残碑断石中

发现了《泐（创）建海会寺碑》，碑帽上的6个大字是篆刻的，碑是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所立，当时住持沙门（和尚）叫成明，他请一个姓刘的作的碑文，把“置寺奈何”、“寺事因由”、“寺之由来”详细记载下来，为我们今天了解海会寺的创建情况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二）

关于海会寺的创建，当地流传说，当年由南方经运河北运的3尊樟木大佛像本来是别的地方定做的，渡至阿城后船行不动，意为佛祖看中此地风水，于是不走了，欲留阿城兴建寺院。适值一个南方举子去北京赶考，路经此地，见此情景，遂立下誓愿：此番赶考得中，日后特来进香，如若落榜，情愿在此出家。后竟落第，便到此落发当了和尚，法号海会，因他和巡抚刘公有交谊，说动刘做了大施主，创建了海会寺。这个传说显然有不少附会之处。据寺碑和县志记载，清康熙年间，东阿海会庵比丘（和尚）隆性，从金陵（今南京）募造大佛3尊，运到阿城后，几十个人都抬不动，于是满街上人说佛要降福保佑此地了。这里原来有个众商奉祀财神的3间小庙，便把财神改祀南关，将庙改为寺来供奉佛像，并仍按隆性原意取名海会寺。接着由信商刘赞等共建中殿，善人马乾等劝募车、船、堡、扛各店营缮两庑，经过几年告成。隆性因与众不和而去，于是请禅师元衡住持。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元衡请刘公（当即碑文中所称“先大夫”者）首倡募众，阖镇商民响应，买下寺后曹姓园地，修建新大殿5间，又建关帝殿配殿西廊及方丈僧

舍等。刘公亲自设计，指挥经营，施银千数百计。海会寺规模大备，一时称为“**济东胜地**”。在大殿脊梁上，仍可见有“**岁（时）大清康熙岁次己丑（即康熙四十八年）孟夏闾镇盐行创建 祈保均安 谨誌**”字样。

据此，海会为第一代和尚法名之说不确。查《佛学大辞典》，海会是个佛教名词，取其譬喻意义，言圣众会合之座也，德之深与数（智慧）之广，譬如海，故曰海会。全国取名海会的寺院，据查到的资料，有北京永定门外修于明嘉靖年间的海会寺；在江西庐山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海会寺是庐山五大丛林之一；在江苏宜兴、山西阳城、湖南潭州云盖山、安徽太湖和青阳，都有建于唐、宋、金等代的海会寺；上海丽园路567号有个海会寺（海会禅寺）是1945年改叫此名的；聊城东街旧亦有海会禅院。阿城海会寺是从隆性的东阿海会庵而来。隆性虽参与了寺的创建，但第一代住持是元衡，断碑有“**传临济正宗平阳三（世）“弘法第一代沙门元衡**”字样。可知海会寺在佛教中属禅宗一派里的临济宗（系唐义玄所创，因住镇川即今河北正定临济院得名）。传说海会寺和尚都是从济宁玉露庵（又名玉露禅林，康熙七年建）派来的，和尚受戒都去那里，超度亡魂都从那里叫人。按佛教禅制，禅宗寺院仿朝廷文武两班，在住持下设东序、西序两班。元衡住持海会寺时，成明为法嗣，当是两序执事之一。乾隆八年成明已接任住持了。另据一墓塔碑文，上写“**传临济正宗平阳四世海会堂上第二代上端下然楷和尚塔**”，是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由署名“**同法弟成明统法侄佛福**”等立的，则在成明任住持之前还有个第二代住持端然楷和尚。在成明时代，有寺僧主客（即常住和尚和云游和

尚)十数辈。据老年人回忆,解放前寺内和尚也就是十几个人。常住和尚有一个方丈(堂头和尚),一个二当家的(即监院或监寺,负责处理寺庙内部的事务),一个知客(负责对外联系,二者当即两序执事),和一些小和尚。游方和尚人数不定,也常有十几个,多时有几十个。每天晨昏,和尚都礼佛诵经,有时也设坛打醮,或为人家作超度亡灵等佛事。据1937年县志记载,民国时各县“准许设立佛教会,阿城镇海会寺僧人众多,未在本境立会”。可见阿城镇海会寺在阳谷是一大寺,自成势力。民国初年至事变前,住持先是秀然,后是杲训(一名志林,俗姓孟,阿城南赵店人),监院庆余(一名日余)。中间庆余当过二三年家,据说这个人是抢的权,好吃好花,把庙里东西毁坏不少,弄了个乱七八糟。庆余死后仍是杲训当家。二当家则换了弘章,弘章俗姓梁(梁德宽?),是梁山黑虎庙人,快土改时他接任海会寺最后一代住持。1958年前后,弘章回梁山老家去了。海会寺最后的和尚据说尚在的有了尘(外号呆子)、真清(当时的小和尚,俗名侯宪智,梁山县杨营乡侯寺村人)。弘章之前还有一个敬斋和尚,原在济宁一个大寺院,后来到阿城镇海会寺,当过知客和二当家的。当时正是日伪统治时期,社会上的匪特与敬斋有来往。在阿城据点当汉奸大队副的李洪图,也因与他是老乡,关系密切。阿城解放后,敬斋回济宁,李洪图跑到他寺院地下室躲藏,被我方侦察出来,李洪图被解回阳谷范海枪毙,敬斋也在济宁被枪毙。

海会寺有自己的庙地,喂着十几头牲口,有两辆大车,一辆轿车子,骡马俱全。据碑文记载,寺院创建时,“元衡募得膳田二百亩,以供僧饭”;成明时,“以食用不足”,“请

增置膳地，以资常住”，“募得增地三百一十五亩，场院二区”。据说刘公施舍有200亩，立有碑石记载地亩四至。还有断碑记载：“信商孔、信士……雍正四年（1726年）买地柒亩伍”；“加七级刘镇捐银叁拾”。值得一提的还有一块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的立石，是在平县人李进才79岁时自立的遗嘱，李孑然一身，佣工于海会寺，将积攒的京钱40余千交与当家师傅生息，陆续置地20余亩，情愿死后舍入海会寺。可见寺僧不但大量兼并土地，还兼营高利贷。据说解放前海会寺土地有二三百亩，最多时到过8顷。人们说，阿城南洼没有别家的地，都是海会寺的。5顷地是大粮地，包括刘公祠、大悲阁的地，也都要完银子（即交纳地亩税）。大悲阁好象是慈善机关，有一百四五十亩孤贫粮地，原来是和尚一块种着，后来租出去种，年底放粮，叫鰥寡粮（孤贫粮），拿出来几十石红粮、小米，名曰“赈济孤贫”，穷得过不去年的可以领几斗几升。有截民国初年的断碑，上有“三十一石五斗赈济孤贫，每至年……镇绅董监视施放无告穷民……迄今百有余岁。民国二年前……教育费一百千，其余仍济孤贫”，署名“县长徐……邓……众信商……”等字样。寺里雇有长工，有喂牲口的，也有种地的，共十儿人。寺周围人家原来都是种庙地的佃户。土地改革时给和尚留了点房地产以自立生活，其余的地亩由农会分了。

大革命时期，在海会寺大悲阁下层成过私塾。1935年7月河决鄄城，灾民数十万，阳谷曾在张秋和阿城设立两个收容所，阿城收容所即设在海会寺，收容灾民2700人，事变前在原私塾基础上办起小学，后发展到大殿西配房和二殿西配房。1944年阿城解放，土改时抗日小学由北会馆搬到南会

馆，在会馆大厅成过学校。1948年徐翼县在阿城成立，县政府就设在海会寺。1949年至1950年还在海会寺办过聊城地区行署干训班（干校）。1951年安成阿城粮所，一直至今。

海会寺作为古代建筑，有其一定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它建筑在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古阿城之傍，座落在闻名中外交通南北的古运河之滨，时至今日，它经历了近300年的岁月，风风雨雨，时代沧桑，海会寺是历史的见证。有关部门很重视对它的保护。来阳谷旅游参观的名流学者以及老干部也都欣然愿去阿城海会寺一游。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著名古建筑学家陈从周于1981年1月特地去阿城海会寺实地考察，评价很高。1984年9月，北京大学地理系副教授陈传康及其研究生来阳谷，也去海会寺考察。他们都对海会寺整修保护提出了意见。1984年底省政协科技文化组组织省政协委员、文物考古专家来阳谷考察文物管理和旅游资源开发，曾去海会寺视察，也都叹为大观。省政协常委、省城建局副总工程师方适承建议对海会寺进行保护修复，并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阿城海会寺这个古建筑群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聪明智慧，是阳谷现存的古代文化宝贵遗产。

有关海会寺的文字记载很少。笔者为了考察海会寺的情况，曾与刘子长同志在1985年1月去阿城住了3天，进行实地调查，并走访了雷树范（志平）、任春方、李法兴、宋义山、林之峰等多人，尤其雷树范同志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情况；3月中与有关部门联合前去考察，以后为核对材料又曾去过两次。在此特向积极提供情况和给予协助的同志致谢。

附一：

《创建海会寺碑》碑文

（上缺）置寺奈何，纪事寺因由（中缺）其因由奈何，阿城旧无寺（中缺）庵，庵盖隆性址也。昇像纒（才）数武，众仔肩不能荷，置像衢中，更数十人昇之，终莫能举。通衢讎（中缺）将福祐兹土也。唯像高丈三四尺许，一（缺）他招提可崇奉者。顾众商祀财神，庙三楹，颇宽厥，商寺咸诚惑祷神而筮之，兆曰吉，改祀神南关，更庙为寺，以奉佛像焉，此（缺）寺之由来也。其寺名海会奈何，原隆性之初心云尔。比时信商刘赞等共建中殿，善人马乾等劝募车船堡扛各店，营缮两庑，（缺）岁几年，众姓云劳。隆性以不和众而去，乃延禅师元衡住持，成明（缺）法嗣也。先是己丑岁，先大夫往来涿雒间，元衡因请见，白（缺）地当孔道，寺事粗理，淄众口踵门接武，宿无庐，厨无粟，欲募于众，而丐为之倡。于是大成公昇弘字恒字，暨闾镇商众众善，金同（缺）欲构新大殿，苦基隘，莫能为计，盖寺后为曹姓园地，不易购故也。先大夫往诣之，语以众善偿以售价，曹姓欣然割地焉。乃为大（缺）殿五楹，徙旧构为前殿，更立关帝殿配殿西廊，方丈僧舍外暨于书院为宰官劝农讲约之所，诸胜毕俱，寺事于兹尽善矣。此（缺）众商好善乐施也。先大夫躬为区画，经营惨澹，独解囊金者且千数百计矣。元衡亦募得膳田二百亩，以供僧饭，故一时招（缺）出，曲径参差，河磬呗音，人天推拥，称济东胜地焉。然自己丑迄壬寅，事寺者凡十有四年，非易得（？）也。既而先大夫西归，予（缺）通籍，累官中外，迩来又二十有一年

矣。庚申蒙予告归田，辛酉仍得至止，瞻礼佛像，金珍如新，香灯似昔，钟鱼无恙，迺（缺）砌潇然，翠柏交荫。回忆先大夫指挥区画之时，宛如昨日事，而音容不可复侍矣。不禁歔歔，泣数行下。维时方休夏，寺僧主客缘（？）十数辈。予窃怪其少，不称丛林气象。询成明，以食用不足对，不能久留，云偈十方，担簦至者，暮以入则朝以行耳。予亦怆然久之。成明请增置膳地，以资常住。用是介言 雒 商 往僧，募得增地三百一十五亩，场院二区，计价银一千二百七十八两。募有所不放（？），则捐资而为之成就。成明坚请为文以记之，用彰众苦。予既念先泽之不可泯也，因不敢辞以不文，爰述其言，纪其事，详载众善爵里姓氏，以应成明之请，亦备将来寺事因由之叵焉。是为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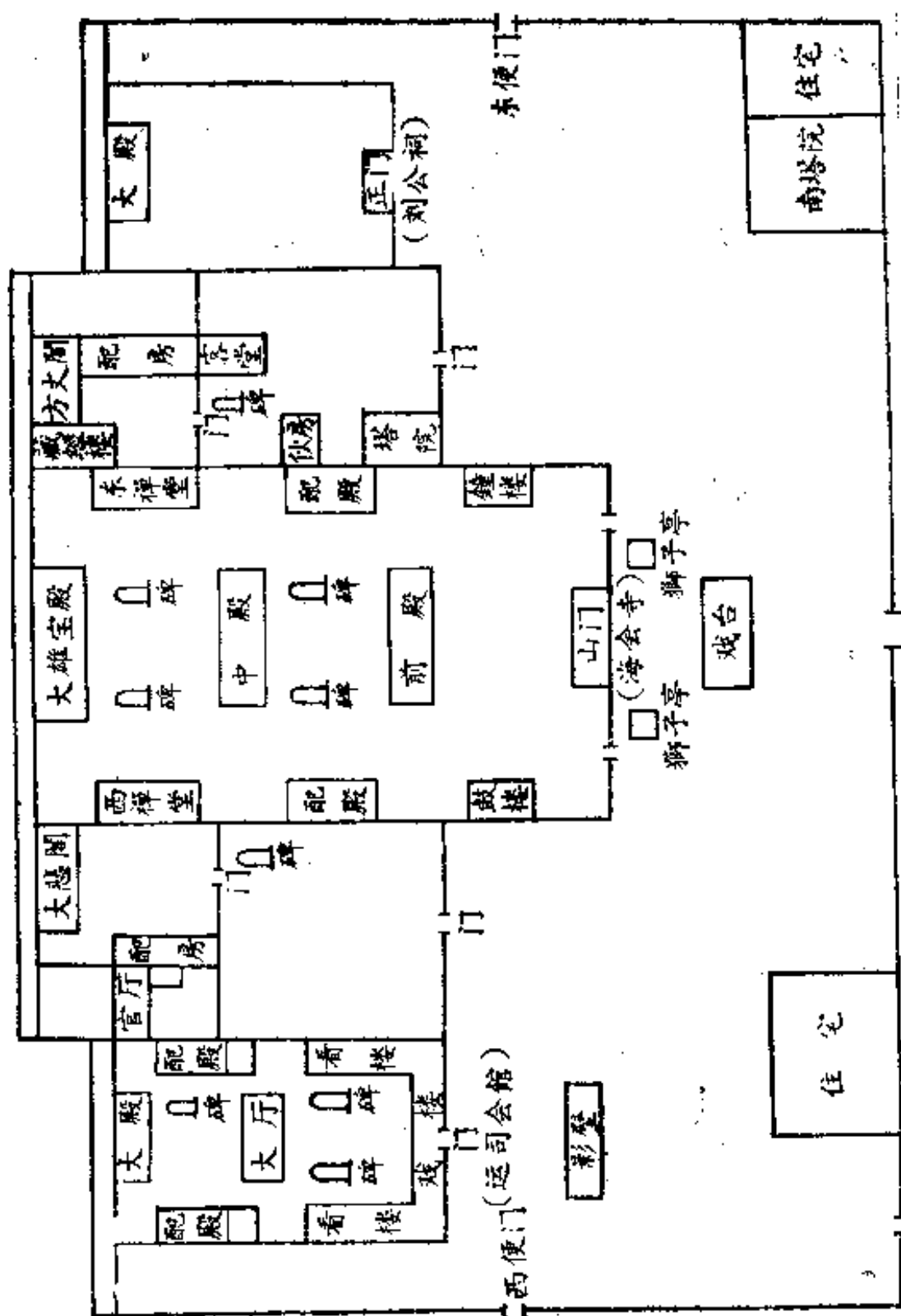
住持沙门 成明 募化

乾隆八年岁次癸亥二月乙卯初二丙戌谷旦 立石

按：此碑碑身已碎为四个断块，碑文右上方残缺，中间断裂处字亦有脱落。残缺处恰是关于海会庵以及佛像来源部分，撰碑人印章亦只有“臣刘（缺一字疑为襄）印”（阴文）“息（？）赞”（阳文，疑系其字）字样，则刘襄并非刘公而为刘公之子了。印与正文间还有一行残字“县丞 杨凝□”。另有“……刘衷 暨侄……郎刘光普 仝……”字样的小块断碑，疑为碑背文字。碑文中标点系笔者所加。

其中干支纪年，注如下：己丑岁，即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壬寅，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庚申，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辛酉，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乾隆八年，岁次癸亥，公元1743年。

附二：海会寺平面示意图



(原载1985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阳 谷 文 庙

李印元 刘子长

阳谷文庙，座落在县城西南隅，距大隅首半里多地。文庙即孔庙，又称圣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元明以后通称文庙。旧制，“府州县皆建孔子庙庭而学宫附焉”，因为旧时儒学都附设在孔庙，所以又称庙学，是一个地方的最高学府。阳谷文庙最早建筑年代，据县志记载，可考的有宋崇宁四年王平作的一篇碑记《阳谷县重修庙学记》，既曰“重修”，可见已早建在前了。据考，现在的阳谷县城是宋初旧城遭水没后迁移的新址。关于旧城情况不得多知，置而不论，就现城址而言，则阳谷庙学的修建时间当可断在北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之前，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迁城之后。这样算来，阳谷庙学的创建距今已有900年的历史。崇宁时重修庙学的是阳谷县令蔡藩，他“为殿”“为堂”，还建了“庠”、“舍”、“庖厨”之“所”、“泮浴”之“室”等，共“为屋70楹有奇”，然后“请雅儒4人典其事”。据民国二十六年《增修阳谷县志》记载，在县文庙戟门有此碑，碑文载《县志·艺文志》，《山东通志》存其目。

宋以后，阳谷庙学历经重修扩建。据县志记载，元朝时，曾“葺孔子庙”，“振学校以实”。明初，太祖“令郡县

皆立学校”，阳谷应诏曾建邑学，当时“门廊殿庑几无完楹”。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重修大成殿及两庑、棂星、戟门、明伦堂、东西斋等。明成化十六年（公元1481年）县令刘洪集钱10余万，“展故址，豁宏规”，“大拓殿宇”，费时两年，先后建大成殿5间、东西两庑各9间，南为大成门，又南为棂星门，殿后为明伦堂，左右翼为进德、修业二斋，“肄业有号，会饩有堂，庖厨有所，库仓有次，而又限以大门，张以碑表”，“一刷其旧而新之”，“遂成大观”，基本上奠定了后来的规模。嗣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又迭经整葺。终明一代270余年，重修即达七八次之多。有人记得，大成殿前有明万历年间重修文庙碑。

清朝时期，重修文庙见于记载的有6次，都是在清朝前期，即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大概都是在明代基础上进行一些整修。明朝后期、清朝前期的整修，除上述建筑外，知还有启圣祠（崇圣祠）、乡贤名宦祠、泮池、敬一亭、奎星阁、尊经阁、文昌楼、教官宅、更衣亭、省牲亭、龙门坊、出入两牌坊等，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宫殿式古建筑群。

明初时，县学生员名额规定为21人，由朝廷供给廩膳，其后增附弟子员大增，遂援田劝学。万历年间，初置学地80亩，继又以地之无粮者1顷余人为学田，于常廩外每年征粟

30余石，贮为诸生学资及文庙管理之用。

关于文庙的建筑结构，据有关资料和李子厚等人回忆，情况如下：

文庙的主体建筑是大成殿，面阔5间，进深3间，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5米，宽15米，顶高13米。整座殿为砖木结构，殿外墙北、东、西3面用青砖砌成，南面为木制，殿内雕梁画栋，有14根高12米左右、直径0.4米的笔直楠松立柱支撑，殿顶起高脊，歇山顶式，上复筒瓦，飞檐斗拱，甚为壮观。有人估计，整座大殿用木300多方。此座大殿当即明朝中期成化年间重修时所建，则距今已有500年的历史。大成殿内正座是泥塑孔子像，头戴冕旒，身着彩衣，手持笏板，显得很庄重威严。孔子像前，东西分塑颜回、子思和曾子、孟子“四大贤”（即“四配”）像。在四大贤像后，每边又有6个泥塑像，即所谓“十二哲”。孔子像有暖阁，是木制神龛，四大贤是二人一龛，其余无龛。孔子和四配像前每座有一供案，十二哲像前都有香炉。

大成殿前东、西庑各10余间，庑内有8尺多高砖砌的台子，上面放着先贤先儒木主神位，有人说还有一些木制牌位，是县内有功名、有名望的人，即所谓“乡贤名宦”。

大成殿前东、西庑之间有个过道为戟门，戟门前又有一门为棂星门，戟门和棂星门之间有一桥，桥旁是月河。棂星门南有一个大迎壁墙。在迎壁墙的东西两边各有一门，即文庙南头的出入之门。据说，县里如果出了文状元，文庙即可取消大迎壁墙开正南门，因阳谷没出过文状元，所以阳谷文庙从来没有开过正南门。

大成殿后是明伦堂，5间，里面住着管理文庙的人。在

大成殿后壁北向立有一矮碑，与明伦堂正对，高4尺，广2尺，正书“指南”二字，字径1尺6寸，书法古健，系明嘉靖年间立，即县志中记载的“指南碑”。大成殿后院也有东西两个出入的门，即文庙的后门。

文庙前后虽设有四个门，可是经常关着，除非有重大事情不轻易开放。每年二月、八月各有一次祭孔活动，县知事亲自带领三班六房，和县里的举人秀才，抬着整猪整羊去文庙祭祀。祭祀时很热闹，有吹鼓手，有喝礼的礼相，也允许外人进庙去看。祭孔的人都到大成殿前高台上去，摆好祭品以后，奏起音乐，祭祀开始，礼相开始喝礼：兴（肃然站立），揖（躬身作揖），跪（双膝跪倒），叩首（磕头）。进行三、六、九叩，这是在院内集体进行的共拜仪式。共拜之后，再分别拜四大贤和十二哲，然后再到东、西庑去拜贤人牌位。拜完，再整队抬着祭品锣鼓喧天地回衙门去。

文庙因门虽设而常关，高墙大院，平时外人不能随便出入，庙内显得很寂静，除几株高大的柏树之外，还长了很多野草和野菜。群众趁祭孔之机，除进庙看热闹外，多采些野菜（如灰灰菜）来吃。

“五四”以后，提倡新文化，大办教育，长期关闭的文庙门也打开了。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在文庙明伦堂后院创办县立女子小学；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在文庙建立阳谷单级养成所，后改名县立师范讲习所，明伦堂做了教室，大成殿做了学生寝室，后来在戟门前又盖了两座教室。1931年改为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

解放后，在文庙旧址曾成过粮市，后又做过粮所仓库。

建国后，在此办过县党校短训班，1950年成立棉花加工厂，1958年成为副食厂制酒车间，1963年建立阳谷酒厂。现在文庙其他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唯大成殿5间和东庑4间尚在，用作酒厂后院仓库。睹其飞檐斗拱，穹然大顶，以及殿内梁柱，尚可想其风采。1984年阳谷酒厂又新修了一座仿古式木结构建筑的大门，门面3间，与其后院的古大殿相呼应，颇可使人发怀古之幽思，如果再品尝一下酒厂的驰名产品“景阳冈陈酿”，会更令人心驰神往的。

（原载1985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博 济 桥

县文化志编写组 李道达执笔

博济桥坐落在阳谷旧城东门外，是过去北通东昌、南达寿张、东去张秋必经之处，为交通要道。近年，随着县城的扩建，桥两旁盖起了民房，该桥路面仍为东关街道的东西通路。

石桥建筑由桥基和桥身两部分组成。上有两排浮雕石栏杆。下有石砌拱券式桥洞3个。桥身东西长8.30米，南北宽5.12米。桥的高度因桥洞已被填平，故无法测量，据当地群众讲，桥底至地面约有2米多高。

该桥栏杆有望柱12根，顶端雕有形态各异的狮子，望柱间两两镶嵌石栏板1块，共10块，现存8块；栏板上嵌石条扶手，下亦对应镶1石条，共20根，现存17根，上均镌有浮雕图案，甚为可观。石栏板上的浮雕，全为神话故事。经辨认，为八仙过海图、寿星下棋图、天马行空图、柴王推车过桥图、牛车出行图、鹿鹤图、蝙蝠寿字图和铁杵磨针图。望柱亦雕有竹梅鸟兽以及山水人物。石桥的雕刻，刀法苍劲有力，古拙素朴。浮雕画面主题突出，情节生动，人物造型维妙维肖，形态逼真，对研究明代雕刻艺术具有一定价值。经实地考察，发现石桥在构造上也别具特点。从桥的结构讲，整体石砌，做功细致，手法精巧，造型美观，古朴大方；各

部件之间，卯榫相接，严密无间，结构严谨，浑然一体。桥下原有8个涵洞，现因不用该桥排水，涵洞已被淤塞填平。据附近群众讲，桥洞顶端北雕龙首，南雕龙尾，蜿蜒逶迤，上下曲回，形态活龙活现；桥的四周各雕一石虎，伏爪静卧，气势威严。可惜都在“文革”时期被砸掉。由于桥身跨度小，故桥面平铺，不用拱形，以便于通行。

博济桥始建于明代。旧县志“桥梁志”记载：“博济桥在东门外其关厢之半，乃寿张抵东昌南北通衢，岁久洼下。每雨后注水，或至没顶，致令东西张秋之路梗塞不通，其关之居民隔若两泮然。明万历二十五年，知县傅道重命义民董宪章架石桥三空，旁设栏杆以翼之，勒其碣曰博济，改故道于东偏之高阜焉。”据此，桥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迄今近400年历史，虽然长年风雨剥蚀，但桥体并无陷落与断裂现象，仍坚固如故。

博济桥也叫石牛拉石车桥，因桥上雕有牛车出行的画图而得名。据《阳谷县志》记载：“邑有县丞笄公居官清廉，莅任之时，惟一牝牛驾车而来，及解任日，牝生一犊，公谕令仆人留犊于邑，仍驾一牝牛去。后人思其德，因刻其像于博济桥上，至今犹存。”笄公系指明代万历年间阳谷县丞笄一顺。后人将此石刻称为“石牛流芳”，誉为阳谷县城一景，并题诗赞曰：“已驾车牛子母分，犊鸣悲切不堪闻。石桥遗迹今犹在，耆老指谈如见君。”寄托了人民对清官的赞颂和思念。

（原载1988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石牛拉石车 清官千古传

——明朝阳谷县丞笪一顺的传说

段延平 段延世

“石牛拉石车”在过去被称为阳谷县城八景之一。它是刻在东关博济桥南栏杆西数第二格石面上的一幅石雕。画面是西城门的一角。城门外一辆西行的牛拉轿车，车内坐着卸任还乡的笪一顺，车后一差人牵一小牛要送回城内，拉车的母牛回头望小牛，眼中流泪依依不舍。这面石雕无论在绘画还是在雕刻方面都表现了精湛的技艺。它描绘的内容是一个阳谷人民至今口碑相传的感人故事。

相传明朝万历年间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朝廷给阳谷派来了一位仕官名叫笪一顺。

笪一顺是宁夏人，为人忠厚，办事干练。他家境比较富裕，而自己却克勤克俭，生活十分简朴。传说他赴任时，家人赶着自己的牛拉轿车。他在任期间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因分管监狱公务，夜间查监时路经城隍庙，每每听到庙内有一个学童的朗朗读书声。一次特去观望，进庙后却只闻其声不见灯光，循声进屋，见一学童正在借助香火微光聚精会神地大声朗读。问知原是西关一贫家子弟，姓吴名铠，因家贫

无钱买灯油，故在此借香光读书。笪立即表示愿意相助，每天接四两灯油半斤糕点出资供应。吴铠深为感激。

不久笪一顺夜晚路过城隍庙，依然只闻读书声，不见灯光。追问其故，吴铠十分难为情地说：“家父早卒，母亲长年卧病不起，家中衣食无着，甚而有时日无一餐。为此将恩师资助的银两，买药治病余粮糊口了。”笪一顺听后，再次慷慨解囊，又添助药费和柴米。吴铠含泪跪谢，越发苦心攻读。

笪一顺仗义疏财周济吴铠的事迹，很快传开。其实笪一顺还有很多感人的事迹，如在帮审中一向注重事实，秉公判处，并常下去私访；对在押犯人重教不重刑，力求感化；他从不贪污受贿，可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又平易近人，无官僚习气，因而深受人们的尊重和爱戴，当时都称他为笪老仕。可惜他因仕途艰难，世态炎凉，又身体欠佳，任期未满便告老还乡。民众再三挽留，无奈批文已经下达。

初秋时节，笪一顺怀着依恋的心情，乘坐自己的牛拉轿车，启程返里。阳谷父老自动沿街摆设香案，夹道跪送，笪老仕拱手致谢，洒泪告别。刚出西门，笪突然发现出生不久的小牛随车跟来，便立即命差人将小牛送回县衙，说：“小牛是吃阳谷草料长大，应归公用。”后人为了颂扬和怀念这位清官，就将其“离任留犊”的事迹，刻在博济桥石栏板上，称之为“石牛拉石车”，历代传为佳话。

编者按：

尽管清官有其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千百年来一直是人们歌颂的理想的正面人物。“石牛拉石车”就是记载于

阳谷县志，图刻于石桥栏板，并流传于阳谷民间的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因年代久远，有些传说可能有出入。据县志载，笪一顺系江西德兴人，万历年间以知印任县丞。而桥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则笪在阳谷任当在万历二十五年前。明代县衙，知县下佐贰官有县丞、主簿，属官有典史，系未入流官，俗称四衙，号四老爷，掌文移出纳。如无县丞、主簿，则典史兼领其职。疑笪先任典史，知印事，传称其号似应为“笪老四”。又县志载吴铠系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庚午科举人，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甲戌科进士，嘉靖时官至陕西宁夏都御史。则其为童生时与笪在阳谷任职时，中隔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差一个甲子还多，笪周济吴铠事显系传误。

另据县志，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陕西通渭人段世隆以监生任县丞；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陕西通渭人邢从礼，以监生任县丞，“性刚直，甘清苦，以清廉自持，义不苟取。任二年期满，县民欲以车送，坚辞不许，自肩挑行里（李）而去。”或在传说中有张冠李戴之事。特附识于此，以备考辨。

（原载1988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说明：封底即石牛拉石车图刻。

迷魂阵和孙臧阁

——阳谷有关孙臧的传说及其他

刘子长 李印元

阳谷是孙臧的故乡，当年孙庞斗智的战场主要在今鲁西地区的阳谷、莘县、菏泽一线。在这一带，人们世代传说着孙臧的故事，并且能指出桂陵、马陵两次主要战役的决战地点，另外还有些孙臧曾到过或摆过战场的地方，后世往往把他奉为神圣祭祀、纪念。位于阳谷县城东北15里的迷魂阵就是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

迷魂阵有着丰富的关于孙臧的传说，迷魂阵的村名和孙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里的老人和青年，都能津津乐道地向你讲述半天孙臧摆迷魂阵的故事。作为流传于民间的口头传说故事，其中所牵涉的史实有的很难考证，甚至还难免附会迷信夸诞成份。但我们除去迷信的外壳，就发现其核心的部分是对孙臧正直、智慧的歌颂，对邪恶、嫉妒的鞭挞，以及孙臧在人民中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巨大。外地来阳谷的人也乐意到迷魂阵看一看，亲身体会一下迷魂之谜。前几年沈阳军区有人就专门开车来寻访迷魂阵、马陵道等当年孙庞斗智的古战场。

迷魂阵有大小迷魂阵两个村，小迷魂阵村大，大迷魂阵村小，大迷魂阵在小迷魂阵西南3里。据传说，这里以前叫枣林庄，大迷魂阵叫南枣林庄，小迷魂阵叫北枣林庄，自孙臆在这里摆阵以后，才叫迷魂阵。齐魏相争，孙臆为齐国军师，他看中这里是“无魂山”，于是在这个地面上摆了个迷魂阵。把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8方，抽去1方，只剩下7方。结果庞涓大军被围困迷糊住。后来孙臆从西南开了个口，放庞涓逃出，到了马陵道口，孙臆在那里也摆了个阵，把从这里抽掉的1方加在那里成了9方，也是个迷魂阵。在马陵道庞涓再次被围，终至兵败自杀。

关于庞涓身死马陵道，有这样的传说：孙臆年轻时往河南云梦山投师学艺，路过河北束馆，遇见庞涓要求同去。过山岭时，忽出一虎要吃庞涓，庞涓吓坏了，孙臆救了他。到了云梦山水帘洞见到鬼谷仙师，鬼谷不收庞涓，孙臆再三求情才收下。从此孙庞二人同学并结为兄弟，对天盟誓时，孙臆说：“咱俩结拜天地知，若有三心并二意，乱马营中遭惨死。”庞涓说：“若有三心并二意，死在马铃薯沟里。”他在这里耍了心眼，意思是马铃薯沟缝小，进不去人，盟了誓也不会实现。后来二人斗智，庞涓被孙臆诱入马陵道口，终于中伏兵败而死，还是应了“死在马铃薯沟里”（谐音）的盟誓。

现在人们到迷魂阵，仍然有如进入迷宫。尤其是小迷魂阵，始终保持着奇特的建筑格局。全村布局由东西并列的两大块分成前后两街，走向从东北向西南又向西北，中间折一个大弯，整个呈牛梭子形。群众说该村有两个家前（向阳面）一个家后（背阴面），前街朝阳，后街朝阴。街道斜斜

曲曲，无固定方位，房屋则随街道走向而建，斜度不一，定向各异，一条街的两旁都称堂屋（北屋）的，却正好差90度。村外地块分布围村呈磨齿形，参差错落，当地叫磨齿子地、洋袜子地、牛楔子地。这样，街面、房屋、道路、地块都是斜的，外来人人村，不论空间感（方向感）还是时间感都会产生错觉。随着街道斜曲和房屋的交错，使人感到方向随时在变，南北中有东西，东西中有南北。若看太阳定时间，在前街不到上午10点就是日头正午，而在后街看着正午实际已是下午4点。有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来形容这种情况：“进了迷魂阵，状元也难认；东西南北中，到处是胡同；好象把磨推，老路转到黑。”村中老人说，抗战前有一次奉军队伍从莘县往阿城走，路过迷魂阵迷了路，好长时间没转出去，还是后来找人领出去的。大迷魂阵现在有些新建房屋改取正向，但原来也是分前后街，前街是磨盘街，转一周遭都是门。后街则是三角形，回环往复。据说有一个外来卖豆腐的，转悠了一天没出村，他看到了12条一样的小花牛，12家一样的打墙的，其实只有1条小花牛，1家打墙的。在距迷魂阵百里之远的马陵道口（马陵和道口两村相邻，分属莘县大张乡、樱桃园乡）也有着一些类似的传说。

迷魂阵不仅有关于孙膑的传说，并且修有纪念性建筑——孙膑阁。阁在小迷魂阵村东与杨庄交界处，“文革”初期被拆毁，此前曾做过供销社。在其遗址上现有民国二十七年的一通碑倒卧地下，另有清顺治元年的一小断碑在农户家。根据碑文记载，并访问村老，孙膑阁早修于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后曾几经修整。解放前，孙膑阁曾有护庙地12

亩，并有专人管护。阁座北朝南，3间两层，上下有楼梯相通。孙臆泥像塑于上层靠北墙中间，一人多高，头戴升帽，脚踏云靴，手托“天书”；两旁是站班，左边是侄孙燕，手持拂尘，右边是徒弟毛遂，手捧太极图。东间靠北墙角有一卧牛，是孙臆的坐骑青牛，传说是神牛，能日行万里，叫万里牛；还有一个孙臆拄的拐，是他用的兵器。墙上画有多幅彩色壁画，都是孙臆的故事，有上山学艺，有摆阴门阵围困庞涓，四周齐军都是瘸腿孙臆，还有他的四大徒弟像，画面生动，栩栩如生。阁前院内有3通碑，都建有碑楼；在大门外约100米处原建有戏楼，早已倒塌。来到这里，人们都爱做一个游戏，闭上眼睛从大门朝戏楼圪塔摸，几乎人人都走偏方向，摸不到地方。

关于两通碑，据说小碑是老妈妈社立的，大碑是老头社立的。当地风俗，原来民间结社有老妈妈社和老头社，一年有3次古会，后来就成了结社集会的日子。农历二月十五是老妈妈社集会，烧香演戏，纪念“老祖”“真人”，远近十几里都来赶会。小碑碑头上有“老祖碑记”字样，碑阴则全是满满的题名，“×门×氏”字样。民国碑碑记中也提到“四乡耆老，竖碑立社”，据说被毁的另一通大碑上有百十个人名，是老头社的题名。证明老妈妈社、老头社立碑的说法是可信的。

据民国碑碑文记载：“迷魂阵……相传为孙臆用兵地，神其术数，运其兵法，以迷魏师魂而夺其魄，以制其命者也。”“孙臆为齐国孙武之后人，尝学兵法于鬼谷子……孙臆则会祖传师传于一心，而运用其妙者也。”记述了在迷魂阵为孙臆建阁立碑的缘由。其余碑文，则多述孙臆显灵、保佑一方云云，带有严重的迷信色彩，兹不赘述。

据说，在大迷魂阵曾建有8间孙膑庙，塑有孙膑像和神牛（是站着的）。再往西南四五里郭围子村也有孙膑庙（已于六七十年前倒毁）。说这都是孙膑一路摆阵的地方。

孙膑是全国知名的历史人物，关于孙膑的传说不仅在他家乡有，而且各地都有。笔者曾亲到莘县马陵、河北大名马陵、束馆等地实地考察，听到一些关于孙膑、庞涓的传说，看了传说和他们有关的遗迹。在河南海燕出版社以及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两本关于各行各业祖师爷的传说中，就有奉孙膑为鞋匠、炭窑和豆腐行的祖师爷的故事。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诸神》中，还有孙膑和“其他声名赫烈之英雄”一样被“附会为门神”的材料（书内注：孙膑之选为门神或因《演义》中载有孙膑身变门神一节，参阅《孙庞演义》卷三）。表现了民间行业借孙膑威名来抬高本行业的声誉和身价，奉之为保护神的事实。在阳谷县阿城镇，当过拳师的杨廷栋（名斋）、杨廷岳弟兄（已去世，抗战前曾分别在青岛、烟台国术馆任职）流传过一种孙膑拳（属象形拳），被称为“绝技”，其源流、拳路待考（据报载，山东孙膑拳和查拳、螳螂拳、六圣拳都被收入《中华武术文库》）。

最后，关于迷魂阵村名由来，从顺治碑具名“山东兖州府东平州阳谷县城北迷昏阵枣林庄……”以及康熙五十五年《阳谷县志》所载为“迷昏阵”来看，“迷魂阵”清初作“迷昏阵”，“迷昏阵枣林庄”二者是隶属关系还是并列关系，是一村两名还是实为两村，有待进一步考证。访之村中老人，有的谈到，旧社会兴完银子，银单上号是“东六上”，出名就叫枣林庄；或说实际上是另一个村，在迷魂阵西南1里聊阳道与去大布路交叉处，后来移并到一起。

早年在大迷魂阵村东还灭过一个高庄，现在深翻地还可在这两个地方挖出碎瓦烂砖。究竟是怎么回事，姑录之存为一说。

（原载1987年7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战国中期的杰出军事家孙臆

李印元

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两个前后相差一百多年而出自一个家族的伟大军事家——孙武和孙臆，史书上都称为孙子。因孙武主要军事活动在吴，故称吴孙子，孙臆主要军事活动在齐，称齐孙子。他们驰骋疆场，叱咤风云，在各自的舞台上导演了威武雄壮的时代活剧。其家世生平散见于许多史书中。司马迁《史记》中为他们写有传记，是关于孙臆的记载最早最全面的文字，后来的一些记述大都本源于此。

孙臆是孙武的后代，《史记》中说他出生在阿鄆之间，阿位于今阳谷城东北50里，遗址在今阳谷县阿城镇西北6里处。现代人编写的《辞海》、《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以及一些文史读物都直写其为阳谷人。他生死年代不可考，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20年，与商鞅、孟子同时。他是战国中期兵家的代表人物。他的事迹被后人编成小说、评书、戏剧，孙庞斗智的故事世代广泛流传于民间。

相传，孙臆早年曾和魏国人庞涓一起拜自号鬼谷子的王栩先生为师学习兵法，二人并结为兄弟。孙臆为人忠厚诚实，庞涓则生性狡黠妒忌。后来，庞涓在魏国做了将军，孙臆仍旧跟从老师学习，精通了孙武兵法。庞涓知道孙臆的学

识才能远在自己之上，如果他学成后回到齐国，对魏国以及自己的前途都是不利的。并且当年庞涓曾答应孙臆，自己一旦得意，就推荐他一块做事。因此，庞涓就暗地里派人去把孙臆请到魏国来，推荐给魏惠王。孙臆来到魏国以后，庞涓又唯恐他声名地位超过自己，便借故诬陷孙臆犯法，用刑断其两足（臆，即刖刑，去除膝盖骨），还在他的脸上刺了字，将他软禁起来。孙臆在惨遭迫害、处境十分艰险的情况下，忍辱负屈，假装疯颠，麻痹了庞涓对他的监视。后来，齐国使者来到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孙臆设法偷偷地会见了齐使，诉说了自己在魏国的遭遇和要求。齐使听了孙臆的谈吐，知道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就秘密地把他藏在车中，带回齐国。

孙臆回到齐国，很快见到了齐国大将田忌。田忌非常赏识孙臆的才学，就把他留在自己门下，以上宾相待。

当时，齐威王和田忌都很喜欢赛马赌输赢。一次，孙臆去看赛马，田忌赛3场输了3场，孙臆发现，双方的马有上、中、下三等，对等之间足力相差并不太远。等到下次比赛时，孙臆让田忌上马对威王的中马，以中马对威王的下马，以下马对威王的上马。结果，用1局的劣势换来两局的优势，1负2胜，赢得齐王千金。齐威王非常惊奇，问田忌是怎么取胜的，田忌乘机把孙臆推荐给齐威王。威王听了，认为孙臆有过人的才智，非常高兴地召见他，同他谈起兵法，并且拜他为军师，更加敬重他。

齐威王时期（公元前356年——前320年在位）是齐国继春秋时桓公称霸之后又一个强盛时期。他善于纳谏，广开言路，赏罚分明，任用贤才，进行了一些社会和政治改革。他

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赏善罚过，整顿吏治。他收罗了一批有才干的人，如淳于髡是齐国优秀的外交人才，邹忌可称良相，还集中了各地的文人学士，一时称“稷下之学”。孙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了对抗魏国的威胁和争夺土地，孙臆指挥了许多次战斗，其中最著名的是“批亢捣虚”“围魏救赵”和“减灶诱敌”“马陵设伏”两次战役。

公元前354年，魏国派将军庞涓带兵8万攻打赵国，包围了赵都邯郸（今河北邯郸西南）。赵国向盟友齐国请求救援。前353年，齐威王命田忌为主将，孙臆为军师，出兵救赵。田忌采取了孙臆的“批亢捣虚”的建议，撤开强点，攻击弱点，即乘魏国精兵在外围攻邯郸而国内都城防务空虚的时候，引兵去攻打魏都大梁，迫使魏军回师自救，这样自己不必长途远袭邯郸，却既可以解救邯郸之围，又可以调动魏军，使其疲于奔走，陷敌于被动，从而选择有利时机来消灭他们，收到“避实就虚”、“避其强静，击其倦劳”之功。当魏军回救大梁走到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时，碰上了早已等在那里的齐军。齐军士气旺盛，又是以逸待劳，两军交锋，很快就把魏军打得大败。庞涓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大梁（据出土汉简《孙臆兵法》记载，庞涓在桂陵之战中曾被擒）。魏与赵议和，归还了邯郸。

桂陵之战十多年后，即公元前342年，魏国又派庞涓率军进攻韩国。韩国向齐求救。齐威王听取孙臆的意见，等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苦战，魏国实力大大削弱，韩国也不能再支持下去而再次向齐求救的时候，于前341年派出田忌为主将，孙臆为军师，统率大军前去救援。

这次战役，齐军按照孙臆的计策，仍采取攻其必救以救所围的策略，不直接去解韩国的围困，而把进攻的矛头指向魏都大梁。庞涓闻之，急忙回兵。深知魏军情况和庞涓个性心理的孙臆对田忌说：“魏军一向自恃强悍骁勇，轻视齐国，认为齐军怯懦，不敢同他们决战。我们就要利用他们的这种错觉，因势利导，麻痹敌人，引诱魏军中计。现在魏军轻兵冒进，急于求战。我军可以装出胆小怯战的样子，采用退兵减灶办法，掉头东撤，逐日减少宿营地军灶的数目，开始造10万人煮饭用的灶，第二天减为5万人用的灶，第三天减为3万人用的灶。”田忌依计而行。

庞涓带领大军，兼程回国，恨不得一下子吃掉齐军。不料齐军东撤，便下令轻装急进，紧紧追赶。一连追了3天，庞涓发现齐军的锅灶天天在减少，便以为齐军士气低落，逃亡严重，不由得大为高兴，对部下说：“我早就知道齐军害怕我们。你们看，只3天的功夫，齐兵就少了一半多。”便丢下步兵，只带领轻骑精锐部队，日夜兼程，穷追不放。就这样，魏军被孙臆诱到马陵（在今河南范县城西南十五六里，属今山东莘县）。马陵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回旋多歧，旁多阻隘，树多林密，地势险要，是埋伏歼敌的好战场。于是孙臆命令士兵伐木堵路，留下一棵大树削去树皮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几个大字。让齐军在隐蔽的地方扎下营盘，又挑选万名弓箭手在道路两旁埋伏下来，约好晚上看见火光一闪就一齐发射。夜色降临，魏军来到马陵，见道路阻塞，道旁一棵大树，白木显露，隐约如有字样，庞涓叫人点来火把上前照看，大吃一惊，知道中计。这时齐国伏兵万箭齐发，魏军猝不及防，顿时乱成一团，死的死，伤的

伤，逃的逃。庞涓自知智穷力竭，失败已成定局，只得拔出佩剑，长叹一声说：“想不到今天倒成就了孙臆这小子的名声！”说罢，就自刎而死。齐军乘胜冲杀追击，魏军后续部队也在齐军突袭下，被完全打垮，魏太子申被齐军俘获，齐军大获全胜，凯旋而归。

孙臆运筹帷幄，指挥齐军，两次打败强大的魏国，一时名扬天下，齐国国势也日益增强，威名大震，成为当时独霸一方的大国。这时，田忌继邹忌为齐相。威王要加封孙臆，孙臆不肯接受，并且请求免除了军师职务，表示愿意在齐国隐居。以后，他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专心从事军事研究，授徒讲学。他总结自己多年指挥作战的经验，写成了《孙臆兵法》一书（间有其弟子所述者），在世间也很快流传开。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孙臆兵法》共有89篇，图4卷，可惜后来失传了。自《隋书·经籍志》起此后就再无记载。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居然发现了《孙臆兵法》残简，经整理，共30篇，1万1千余字，已由文物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出版。在《孙臆兵法》“禽（擒）庞涓”和“陈忌问垒”篇中，就分别记述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情况。同时出土的竹简还有孙武写的《孙子兵法》以及其它先秦兵书，这就解开了由于《孙臆兵法》失传多年而造成的学术界争论关于孙武、孙臆有无其人，以及《孙子兵法》作者究竟是谁的历史之谜。

从《孙臆兵法》残简中，可以看出，孙臆继承和发展了孙武、吴起的军事思想，反映和总结了战国初期、中期的战争经验，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军事著作。孙臆既吸取前辈军事思想的精华，又不被它所束缚，而是从时代的实际出发，敢

于在战争实践中创新，善于总结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军事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代军事思想和理论的研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围魏救赵”作为攻其必救、以逸待劳的著名战例，一直受到军事家的推崇。相传为明朝开国功臣刘基（即刘伯温）所著的兵书《百战奇略》中，将马陵之战归为“知战”（“所战之地必须知之……知战地，知战日”）类。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写到“反围攻的作战计划”时，也提到过使用“围魏救赵”的办法。孙臆在桂陵、马陵两次战役里所使用的“围魏救赵”的战略战术，丰富了我国的军事宝库，是永远值得后人重视和借鉴的。

说明：

1、据《泰安府志》、《兖州府志》记载，老东阿县城（今平阴县东阿镇）西南50里有孙臆营和庞涓井，孙臆营疑即孙臆生地。度其当在今阳谷阿城、张秋一带。又《寿张县志》载，在张秋东8里有庞涓井，又名琉璃井。录以备查。

2、关于桂陵、马陵所在地点，史书有多种写法，有的是多处地方都有此传说，有的实是一处地方从不同方位而言者。桂陵另有注在今河南长垣西北者。马陵则有注在今河北大名东南者，亦有注在濮城北、观城东南或鄄城东北者（此三说实即今范县城西南马陵）；尚有临沂马陵说。

（原载1987年7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春秋战国时期有关治阿的三则故事

李 印 元

春秋战国时期，阿是齐国西部边鄙的一个大邑，当时既是一地的政治中心，又是军事重镇。因此齐国国君历来很重视阿邑的治理。春秋时期齐景公曾“使晏子为东阿宰”（宰，即地方官），战国时齐威王曾烹掉不称职而一味贿赂朝臣、大走后门的阿大夫（大夫，亦地方官名），其后的齐宣王又大胆任用过一个13岁的青年尹子奇作为阿这个边城的长官，结果使阿大治，重兴晏子治阿时期的兴盛景象。回顾这些历史佳话，不仅为了熟悉地方掌故，而且对于今天我们搞改革搞建设也大有启示。

晏子两治阿

齐景公时（公元前547年——前490年在位），派晏子担任阿邑的地方长官。过了3年，结果关于晏子的坏话却纷纷在齐国朝中传播。景公很不高兴，就把晏子召来想免掉他，并当面责备他说：“我认为你能干，才叫你去治理阿邑。现在你却搞得这么乱糟糟的，你下去好好反省吧。我得重重地处罚你。”晏子回答说：“好，我知道我的错误了。我请求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让我改换办法重新治理阿邑，再过3

年保证叫你在朝中听到的都是赞美我的话。如果不是这样，我甘愿受死。”景公答应了他。第二年年终考核地方官员政绩时，景公亲迎晏子并向他祝贺，说：“你把阿邑治理得很好，应该受到奖赏。”并且问他用什么办法怎么转变的。晏子回答说：“以前我治理阿邑，修筑道路，整顿闾里，那些奸邪的人反对；提倡节俭孝弟，处罚偷盗之徒，那些懒惰的人反对；断官司不讲贵贱情面，那些有权位的人反对；左右有所请求，合法则应允，不合法不应允，又招致周围的人反对；对待朝中达官贵人按照正常礼仪办事，更遭到达官贵人反对。所以那些反对我的人在外边谤毁我，在朝内又谗毁我，我治阿3年您听到的都是关于我的坏话。现在我改变了过去的做法，人情拜托要干，贿赂的事也要做到，多向老百姓收缴赋税，仓库里少藏些，却用来侍奉您左右的人；池塘的鱼原来为贫民之利，现在被权势人家占有。这个时候，饥饿的人超过了一半，君王反而亲迎并祝贺我。过去您要处罚我实际上正是应该赏才对，现在您要赏我实际上正应该给我处罚，所以我不敢接受您的奖赏。我没有能力再去治理阿邑，愿君王饶我这副身子骨让我回家，也算给贤能的人让个路吧。”景公听了，赶忙离开坐席，向晏子道歉说：“你还是好好地治理阿邑，阿邑是你的阿邑，我不再干预你的事了。”从此景公知道晏子贤能，后来任用他帮助治理齐国，只3年的时间，齐国大大兴盛起来。

齐威王烹阿大夫

战国时期，被称为“七雄”之一的齐国雄踞山东大半

部。齐威王当政的时候（公元前356年——前321年在位），他注意革新政治，任用贤能，监督官吏，赏罚严明，是齐国最强盛的时期。为了整顿吏治，威王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就是有名的故事。

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和阿是当时齐国东西边境的两个大邑，两地相距千里之遥。即墨大夫和阿大夫在各自任所治理的政绩大不相同，一个是田野得到开辟，人民生活自足，官府事务能够及时处理，使齐国的东方得以安宁；一个是田野荒芜，人民贫穷挨饿，赵国伐齐攻鄆他不救，卫国攻取薛陵他不闻不知（鄆和薛陵都是齐国西部边邑，和阿邑相邻。鄆在今山东鄆城县旧城，薛陵紧靠阿邑西部）。然而，二人在威王左右的舆论却大相径庭，即墨大夫“毁言日至”，阿大夫却“誉言日至”。齐威王派人实地视察，结果与左右所毁誉者恰恰相反。于是，威王得出结论，即墨大夫不走近臣左右的门子以谋求帮助，而阿大夫却一味用厚礼贿赂近臣左右来为他说好话。最后威王的处理是，对即墨大夫“封之万家”，而“烹阿大夫及左右赞誉者”。这样，群臣都从这一事件中感到畏惧警惕，再没敢弄虚作假的，人人力求尽职尽责，因而齐国得到大治，成为天下强国。

子奇治阿

齐宣王时（公元前320年——前302年在位），派了一个18岁的年轻人尹子奇去阿邑当地方长官。子奇去赴任上路不久，齐宣王就听到议论说：“阿这地方一向不好治理，子奇一个十几岁的年轻娃娃，当此重任，弄出差错可就不好收拾

了。”宣王觉得似乎有道理，对这个任命也有些后悔，便连忙派使者前去追赶，说如果子奇还没有到达阿邑，赶上后叫他回来，如果已经到了就算了。使者追上了子奇，却并没有叫他跟着回来。宣王问使者怎么回事，使者回答说：“我看见和子奇一块坐车上路的，都是些年高德劭的白发老人。这样，有老年人的智谋，又有青年人的决断，两方面结合起来，他是一定能把阿邑治理好的。所以我没有把他叫回来。”

尹子奇一到阿邑，立刻在老人们的建议下，到各地去了解情况。他看到许多人生活困苦，衣食无着，就首先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的老百姓；看到农人种地缺乏农具，就把库里贮藏的兵器铸造成农具发给农人。他又召集地方上有威信的人开三老会议，宣布3年免征赋税，鼓励大家安心垦荒生产。子奇自己也换上布衣粗服，亲自开荒种地。这样没多久，老百姓生活安定下来了，人人各得其所，荒地被开垦起来种上了庄稼，村庄炊烟袅袅，远近鸡鸣狗叫，路上行人面带喜色，阿邑很快出现了一派兴旺的景象。

魏国听说齐王派了一个年轻娃娃去治理阿邑，结果仓库里粮食分光了，兵器铸成了农具，就乘机起兵进攻阿邑。阿邑百姓在子奇的组织带领下，人人动员，父子兄弟全家参战，有的拿着自造的刀枪，有的拿着镰刀锄头，奋起抵抗，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战斗，很快就把魏兵打败了。

消息传开，人们纷纷称赞子奇。子奇治阿的故事也作为佳话世代流传在民间。

（原载1937年7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古典文学名著与阳谷

李 印 透

阳谷地处鲁西，隋朝置县，古已闻名。古代历史、地理、科技、军事等典籍，对阳谷多所记述。饶有兴味的是，《水浒传》、《金瓶梅》、《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古典文学名著，也都有关于阳谷的人物故事、风土人情的描绘。文学并非历史，用不着我们象历史学者那样去作过多的考证。但是文学大师们把故事安排到这里而不是别处，自有其道理在。而且由于他们的手笔，阳谷县的知名度更高了，这却是无疑的。

著名的先秦历史文学《左传》及其所阐注的《春秋》，都有齐侯会诸侯于阳谷的记载：僖公三年，“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文公十六年，“季孙行父会齐侯于阳谷”……位于阳谷城南门外的会盟台，相传即是齐侯为谋伐楚而会盟所筑。

明代四大奇书中，除神话小说《西游记》外，其余 8 部均与阳谷有关。

120回《水浒全传》，有 8 回是写发生在阳谷的故事，主要是家喻户晓的景阳冈打虎、狮子楼除霸、三打祝家庄等。

武松“来到阳谷县地面”，首先在景阳冈打死了害人的猛虎，后又斗杀了恶霸财主西门庆，开始演出了威武雄壮的

“武十回”。据《阳谷县志》记载：“景阳冈在县城东40里，沙丘起伏，莽草无涯，古木参天，人烟稀少。”附近原有9岭18垎堆。景阳冈即在东沙垎堆和西沙垎堆之间。随着历史的变迁和解放后几次平整，到70年代，除保留两处作为龙山文化遗址的沙冈外，其余已全部整平。冈上8间起脊的武松庙为1958年重修，庙内有武松打虎的泥塑和有关武松故事的壁画，庙前立一石碑，碑上“景阳岗”三字是当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舒同所书，冈周翠柏环绕，系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冈东200米处有一碑亭，碑上刻有“武松打虎处”字样，为明初所制，1958年出土。

狮子楼位于县城大隅首西南角，1958年重修，1995年再次重修，系上海同济大学古建筑学教授陈从周进行造型和技术指导，按宋代风格设计建造的。楼分两层，青砖绿瓦，雕梁画栋，楼前置有两对石狮，颇为壮观。楼上所悬“狮子楼”匾额，为已故文学大师沈雁冰手笔。电视连续剧《武松》第三回“斗杀西门庆”，就是在这里拍的外景，武松提刀跃楼而下，杀死西门庆的镜头也是在此处所拍。楼上曾设“水浒文学戏剧纪念馆”，收有文艺界名人为景阳冈、狮子楼所作的字、画、诗词。其中有：新西兰诗人路易·艾黎，著名作家沈雁冰、端木蕻良，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孙思白，著名画家刘继卣、李苦禅、刘海粟、吴作人，著名戏剧家欧阳山尊，著名书法家杨萱庭、万里云、陈从周、高启云，诗人戈宝权、王亚平、苗得雨，全国政协常委爱新觉罗·溥杰，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巨赞，美籍物理学博士薛兆旺等。还展有《水浒》各种版本、研究资料、人物画像、剧照以及景阳冈出土文物等。

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也发生在阳谷。清初进士、中书令曹玉珂在《过梁山记》中写道：“祝家庄者，邑西之竹口也。关道口者，李庄也……”因当地人忌说三打祝家庄，后改称竹口或祝口。祝口包括大寺、临河、李杨、明堤、甄台、凤凰台6村。大概由于黄河改道，那座另巍巍的独龙冈已经不见，倒是高高的金堤横穿其间。村中原有18层8角古塔一座，1969年“文革”中被毁。祝口附近有个莲花池村，传说曾是祝家的后花园；有个小村炉里，传说是祝家锻造兵器的地方；祝口西北胡沙窝村，传说即是扈家庄。梁山英雄在三打祝家庄的过程中，争取了扑天雕李应和一丈青扈三娘以及杜兴等人参加了义军的行列。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好生了得”，李应“能使一条浑铁点钢枪，背藏飞刀5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没。”在梁山寨上，二人还被委以重任，一丈青与丈夫王矮虎后山下寨，监督马匹，李应等总管山寨钱粮金帛，从而增强了义军的力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同志曾两次讲到发生在阳谷的水浒故事。1956年11月9日在对石门宋合作社关于养猪报告的批示中写道：“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在著名的《矛盾论》中，毛主席又写道：“《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与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象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被誉为第一奇书的《金瓶梅》，是从《水浒传》有关故

事引伸演绎出来的。其故事发生在鲁西一带（阳谷、清河、临清、东昌、东平），不仅武松、武大、西门庆、潘金莲、王婆、郓哥、何九叔等人名与《水浒传》所叙一致，而且连景阳冈、狮子楼、紫石街等地名亦与《水浒》无异，只是阳谷、清河作了调换，不知其中何说？

著名古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与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所叙时间之长，地域之广，是很少有的，作品同样涉及到阳谷。当曹操“文有谋臣，武有猛将，威镇山东”而东征徐州的时候，吕布却乘机“袭破兖州，随据濮阳。止有鄄城、东阿、范县三处，被荀彧、程昱设计死守得全，其余俱破。”这一带算是曹操最牢固的根据地了。汉时阳谷属东阿县，东阿故城遗址便在今阳谷县阿城镇西北6里处，这里仍有高达丈余的旧城垣，当地俗称“城岭子”。阿原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西边陲的大邑，据《晏子春秋》记载，春秋时期的杰出政治家、任齐国相的晏子，曾任东阿宰达6年之久，颇有政绩。战国时期的杰出军事家、曾任齐国军师的孙臆生于阿鄄之间，即阳谷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的《史记》曾为之立传，是关于孙臆的最早最全面的文字记载。孙庞斗智的故事，《东周列国志》等书有生动的描述。阿城镇西北6里处的古阿井，与景阳岗同被载入《中国名胜词典》。东汉《本草》载：“真胶产于齐国之阿地，又以阿井水煮之最佳。”北魏酈道元《水经注》载：“东阿城北门内西侧阜上，有大井，其巨若轮，深7丈，岁常煮胶入贡。”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所作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冤狱》一篇，写的是发生在阳谷的故事。篇首第一句

即是“朱生，阳谷人”。故事曲折动人，不仅揭露了封建社会吏治的黑暗，也为今人不被假象所迷惑、科学断案从反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篇小说共1100多字，而作者的评论就占了一半还多，是全书中以“异史氏曰”形式出现的作者议论最长的一篇。作者严肃地指出，讼狱乃居官首务，不可不慎，痛斥了贪官污吏制造冤狱，残害良民的罪行，足见作者对该篇的重视程度。

晚清刘鹗的著名小说《老残游记》写老残出济南到菏泽，曾乘船途经寿张。那时的寿张县，南临黄河，金堤绕城而过，是水陆要冲。寿张镇在阳谷东南25里，寿张镇及原寿张县金堤北部分，已全部划归阳谷县。《水浒传》第七十四回，写李逵打东平府后，还去寿张当了一阵子县令。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予行山东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潞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为川浸矣。”攻阳谷、陷堂邑、据临清，震撼清廷的王伦起义，便是在寿张举行。由于寿张知名度大，50年代初，当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长的司洛路同志去京汇报工作时，毛主席还专门谈起寿张的来历并作了详细的解释。

位于阳谷城东45里的张秋镇，原为运河古镇，明清之际，是鲁西重要的航运码头和商业中心，商贾云集，物阜民丰，旧有72条街，82胡同，并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临清、张秋）”之称。《玉座珠帘》等反映清代生活的小说多有描述。南宋文天祥曾赋《过张秋》（一作《发东阿》）诗：“东原深处所，时或见人烟，秋雨桑麻地，春风桃李天。攒程频问候，怯勇缓加鞭，多少飞檐过，噫吁是北船。”描写了当时所经运河沿途的景况。

婚姻旧习俗

卢新文 李印元

关于旧婚姻礼俗，笔者曾在各自家乡（鄄城、阳谷）访问父老，现综合有关材料记述如下，供研究民俗者参考。

说 媒

男孩女孩一般到十五六岁，便有人说媒。说媒是媒人穿梭于男女两家之间而使其子女订婚的说合活动。媒人基本上分两种，一种是职业媒人，多为年长妇女，人称媒婆。这种媒人图媒礼，常瞞哄，多不被人相信。再一种是男女两家或其中一家的亲戚、朋友、邻居或熟人，这种媒人不图媒礼，多实言，一般为双方所相信，绝大多数婚姻是这种媒人说成的。不过，当这种媒人偏向一方时，也偶有欺骗。

媒人与家长谈说子女婚事，子女闻知，一般是面羞而心喜，为显示自己庄重而回避。

父母为子女订婚，讲家业财产，门当户对；重属相、命合不合，也重人品。一般也通过关系更密切的人打听对方各方面的情况，如不存在比说媒者关系更密切的人，也就不打听了。有时也偷着相一相，男女双方家长表示同意后，便换帖，一般不征求本人的意见。

换 帖

换帖是正式订婚手续。媒人将男家的帖带到女家，换回女家的帖交给男家，至此算是正式订了婚。帖用红纸毛笔黑字写成。

男方帖文：

敬呈

谨凭媒语，愿结婚姻，未惶纳彩，备帖定亲。 悬。

主婚人×××

女方帖文：

敬

今接来帖，愿结秦晋，不弃寒微，敬从高门。 允。

主婚人×××

在有的地区，订婚的正式手续叫投启换柬。这之前有一次换帖，叫下小帖，男家的帖是四幅简的形式，封面上写着“伦始复原”的字样，里边是“赤书未通，姓字先达 贵府”等内容；女家帖的内容则写“不量寒微，仰攀高第，借重冰言，俯允蓬门。”中间还要根据男女双方属相合媒，一般是请盲人，看犯不犯断头婚（即认为有的属相不宜合婚）。然后才是正式投启换柬，叫大帖。男家拿正式大柬帖（红纸带签，有的还印着龙头凤尾图样），签上写“大德望某翁（名字是两字的称最后一字，如贵海称海翁）某（姓）老先生大人阁下 之令淑媛”，封面上写“敬托冰言，恭候金诺。为

百年好合（或琴瑟之友）”字样，后面写“天地氤氲，长命富贵，金玉满堂，咸亨庆会”字样，然后是年月日，有的年写年号，有的月写简称，或按句写“上（中、下）浣谷旦”。女家柬帖则写“大德望某翁某老先生大人阁下 之令郎”，“敬承冰言，恭候金诺”字样。这柬帖就是订婚的正式文书，打官司就是凭据。投启换柬时男方有拜匣、搭子，两个人送。女方压钱、金银首饰、披红。下大帖时要摆席设宴，请媒人都到。

要 好

订婚后，如果男家想结婚而又认为女方年龄也可以结婚（一般在十七八岁以后），就派人到女家要好。要好就是男家要女方的生辰八字，如果女家写给了女方的生辰八字就算给好了，表示同意结婚；否则就是不同意结婚。不同意结婚的一般理由是认为女方年龄尚小或嫁妆不齐。在这种情况下，男家就再等一段时间。

送 好

男家要来好后，就请算命先生或有专门知识的文人看好（有的地方叫看日子）。看好就是根据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确定吉利的结婚日期，有所谓大利月、小利月之说。结婚日期确定后，再根据时间远近定个送好的日子。送好就是男家派人把结婚日期告诉女家（男方传帖给女方，写“择允×月×日是吉日”字样），并给女方送些衣料和金银首饰（富户

人家才有金质首饰），一般都是两身衣料和一套首饰（首饰用红色盒子盛放）。女家及其邻居往往根据送好物的数量和质量，来判断男家财产状况和大气不大气，所以，送好有时也成为影响婚后夫妻关系的一个因素。

两亲家打对头

送好后，男女两家都按结婚日期为子女的婚事做多方准备。至结婚前几天，男女双方家长通过熟人约好在某集市面晤，男家说明如何迎娶，女家说明如何陪嫁送客。这种会晤，俗称两亲家打对头。

结 婚

（一）双方准备

结婚之日，男家所有门都重刷黑漆着红牙，门上贴大红对联。常用对联有：“玉镜人间传合璧，银河天上渡双星”；“喜今朝洞房花烛，卜他年金榜题名”；“鸾凤和鸣昌百世，麒麟瑞叶庆千龄”等。

洞房的窗子糊上红纸。里间山墙下放大床一张，床上铺秆草（即谷秸，说“铺秆草，抱个小”），再上铺芦席，芦席上放被褥。有的地方床上不铺秆草，铺高粱秸、豆秸，再铺席，取“过的高、硬”意。洞房里外间用留有小门的秫秸箔隔开，箔门挂匾。

迎亲多用四抬彩轿，也有的用四轮太平车。如果新郎亲迎，则备车两辆，如果新郎不亲迎，则备车一辆，新郎亲迎

与否，决定于男家经济条件。车上搭棚，棚用两个倒U字形大竹箴前后支撑，上盖秫秸箔和芦席，前后用棉被遮掩而成，前门还遮挂红布一块。一车用3牛，每牛头上系一红布条。车前两侧贴对联一副：“上车辞父母，下车拜双亲。”另有红灯笼6个、8个或12个，每个灯笼配蜡烛1支。公鸡1只，装入烘笼（用树枝条编的冬天烘被窝用的东西），放在车前。

迎娶人员组成（按新郎亲迎且使乐队算）：新郎、陪公1人（新郎的关照者），使车者（御夫）每车2人共4人，携毡者1人，放炮者1人，娶女婆1人（丈夫健在、子女双全而通达事理的年长妇女），抱鸡者1人（七八岁的男孩），打灯笼者6人、8人或12人，敲锣者2人，响器班（乐队）2人、3人或4人（唢呐、笙，和敲锣者不是同伙），共二十几个人。

有的地方迎亲用轿（4人抬），两顶轿，新郎坐1顶，抱鸡者坐1顶，回来时让给新娘，抱鸡的坐车。去时男方带公鸡，回时填母鸡。穷些的人家则1顶轿，去时新郎坐，回时让给新娘。大娶还有陪客车和响器车（8人或12人）。来回路过亲戚，新郎要给长辈磕头，有专门携毡的，新郎着披红锦花戴礼帽。大户人家还有两架盒子、两抬（坛）酒，枪手对子马（12个人骑马挎枪、骑罗伞），打灯笼4个、纱灯两个、落子灯。

女家准备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嫁妆，二是送客。一般人家嫁妆不多，主要有1桌1柜，被褥两床（1被1褥算1床），衣服若干身，不同人家根据经济条件加减。另有母鸡1只，男家车到后放男家公鸡笼中。结婚之日，女方衣物放入

柜中，被褥放在柜上，桌柜各交叉贴“喜封”两条，每大件嫁妆有2人抬送。送客者4人，一般由女方的舅父或表哥（包括姑妈家的）、仁伯叔、兄长的朋友等组成，坐女家所备车到男家。另有送女婆1人。

（二）迎娶

迎娶前一日，新郎由明白人携毡带领到坟上祭祖，然后沿街挨户拜邻居。

结婚之日，男家各种准备工作做好后，即出发前往女家迎娶。迎娶队伍阵容以两棚车为核心，前辆车内坐娶女婆和抱鸡童，后辆车内坐新郎和陪公；车前依次走着响器班人员、敲锣者、放炮者和携毡者，携毡者在最前头，车两侧走着打灯笼者。迎娶车按规矩出村东进村西。路上，灯笼里的蜡烛不点燃，乐队不吹奏，只有放炮者偶尔放个单响。路上如遇石物、庙、井等，携毡者展毡相迎。如路过某村，则村里儿童往往设障碍物阻挡，遇此情况，乐队明白，于是便吹奏一阵，俗称“查响器”。

当迎娶车被女家望见，抬嫁妆者始动身（不与迎娶车相遇）。男家有专管接嫁妆者于村头等候。接嫁妆时男家要给抬嫁妆者封喜礼。

（三）发亲

迎娶车行至女家村西不远处，车稍停，放炮、鸣锣、奏乐，点燃灯笼里的蜡烛，紧接着进村。至女家门口不远处，在女家指定的地点停车。陪公和新郎下车，整衣冠（新郎身穿长衫，斜披红绶一束，头戴礼帽，帽左右两侧各插针花一枝）；女家4送客者恭敬地迎上前去，双方相互作一揖，然后入客屋。新郎在客屋里由人陪着端坐。这时，嫁女在内院

屋里梳洗打扮，将辫子挽为发髻，娶女婆和送女婆各持两端系有铜钱的红线在新娘脸上横竖比量一番，然后盖上蒙头红，坐上椅子，这一系列活动谓之冠戴。同时屋外鞭炮齐鸣，新娘由4送客者抬送上车，是谓发亲。娶女婆和送女婆随新娘上车，共同关照新娘。

新娘上车后，新郎被从客屋领到女家堂屋门前，铺红毡行跪拜礼（一揖、跪下、四叩，站起，再一揖），是谓谢扰。然后，新郎在陪公关照下上车（此阶段，女方同辈较小者和晚辈男子闹新郎的行为时有发生）。女方4送客者坐车尾随迎娶车到男家。

迎娶车在往返途中，有的新郎还特地绕道到亲戚朋友家磕头。主人设酒和糖果招待。

（四）拜天地

迎娶车出女家村东头，择近路而返。路上情况与去时同。至男家村西头，将进女家村时的活动重复一遍，所不同者，锣敲得更勤更响，唢呐吹得更起劲了。车在家门口停稳后，两个持火把者从家走出，用火把燎新娘车3圈，意在“驱邪”。新娘从车上坐到椅子上，头顶蒙头红，身穿嫁衣裳，脚穿绣花鞋，4送客者用椅子把新娘抬到男家天爷台前，地下铺着红毡，女东男西面北拜天地，一跪而已。同时放鞭炮，撒火烧、枣等吃物，让看新媳妇的人拾。拜天地是结婚的标志。

有的兴坐轿的地方，也兴点火把或爆竹燎轿。新娘下轿后，用椅子抬过门，院里地下铺席，新娘从席上走过，一张席一张席的换，还要迈过马鞍子、织布机、戥子、捶布石等物。

（五）坐帐

拜罢天地，新娘被搀入洞房（从娘家冠戴屋到拜天地，新娘脚不沾地）。紧接着新郎被娶女婆召入洞房，新郎新娘同坐一条凳子，饮酒 8 杯（新娘一般不喝），是谓坐帐。坐帐后，新郎在闹婚者推搡中走出洞房。娶女婆用秤杆将蒙头红挑下，同时口中念念有词：“蒙头红高高起，纺花织布都是你。”紧接着邻居群众闹新媳妇开始（妇女不论年长年幼都可闹，男子只限于同辈中弟弟和晚辈），新娘坐床上，大体是“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

男家设酒宴招待迎娶者和女家来宾。饭后，4 送客者到洞房安排嫁妆，挂门帘。安排妥当后，女家的送客者、送嫁妆者、送女婆返回。

（六）新郎入洞房

晚上，待闹新媳妇者走完，新郎入洞房安寝。新郎新娘素不相识，新郎入洞房是他们首次见面，场面常常很尴尬。新郎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一个传统的公式：“拾掇拾掇床呗。”新娘一般不语，但马上见诸行动，将被子铺好，让新郎先睡。新娘把专给新郎准备的大火烧（内包红糖）从柜的深处取出，不说话递给新郎，然后新娘独坐。由于双方都有害羞之感，一般说话不多，特别窗外时有听房者的动静，更使新郎新娘拘谨。待听房者走完，新娘始入睡。

余 波

结婚后的第二天早晨，街坊邻居纷纷到男家拜喜，主人以烟酒招待。早饭后，女方的伯或叔到男家，俗称回拜亲

家，男家设宴招待。宴席间，女方长辈谈话的中心是闺女平时缺乏教养，礼数差，请公婆多担待，男方家长则请亲家放心。

第三天，新娘走出洞房，拜见公婆，进厨房做饭。不是做羹汤，而是做面条，取其“长”意。早饭后，新娘祭拜祖宗，给本家院中长辈磕头，受拜者给新娘一些钱，俗称“磕头钱”。

第四天，女家复来人，一般是胞兄或堂兄，男家设宴招待。饭后，新娘随娘家人返回。俗谓之“四天叫客”。

有的地方则是第二天新娘向本家、院里长辈磕头；第三天“回门”，新郎新娘同去女家；12天男家请丈人（岳父）。

其后，新娘在婆家住几天，在娘家住几天，都有娘家兄弟接送。但一般在下午，男家不必备饭招待。

有的地方则在结婚后的第二年正月初二日，新郎始第一次到女家认亲，女家招待隆重，酒宴丰盛，其礼亦繁，于此不述。

以上所述，系沿习封建旧婚俗，在富人往往多所讲究，而穷人则因其礼俗繁琐大有简化，尤其兵荒马乱年月，则更是匆促嫁娶，不及其过场细节。

（原载1938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重游鲁西北有怀旧事 及范筑先将军（九首）

孙思白

行路遥遥指寿张，逢人先问景阳冈。

当年打虎人何在，行到桥头望夕阳。

记1937年冬被派赴寿张途中情况

寇氛弥漫大河西，冻柳霜风千里堤。

四顾烽烟忽有遇，斜阳影里认征衣。

记1937年冬在寿张子路堤忽遇阔别7年幼时同学
王幼平同志事

七品官衙主寿城，青年抗日有勋声。

恼人最是沈鸿烈，乱语胡言撤大同。

1938年春沈鸿烈无故撤免抗日青年县长管大同同志
引起青年政治人员公愤

将军检阅出聊城，异域佳宾并辔行。

阳谷道中曾歇马，青纱帐起夜伏兵。

记1938年夏送美国友人卡尔逊少校有忆范筑先将军

曾随鞍马逐征尘，抗日烽烟记尚新。
光岳楼前拚一死，将军羞作过河人。
重行鲁西北有怀范筑先将军

古城血迹渐无存，又向西门觅战痕。
六百男儿同此死，范湖浩渺吊忠魂。
拟建议聊城西门外湖水名范湖

世上流传狮子楼，潘娃所偶信非俦。
杀人当死有轻重，嫂氏西门同断头！
真演假时假即真，英雄形象激群心。
狮子楼案纵有疑窦，难以今人论古人。
1983年初夏游阳谷参观狮子楼旧址感赋二章

三碗从来不过冈，今朝得饮透瓶香。
倘使二哥今尚在，也应喝得醉郎当。
1983年重游阳谷蒙县委招待所留宿

本文作者 孙思白，北京大学毕业。抗日战争初期来鲁西北，先后任鲁西北政治服务员、寿张县政府秘书（时县长为管大同）、范筑先秘书。后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多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室主任。

（原载1983年6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六辑，1983年7月《阳谷党史资料》第三期载）

阿邑怀古

李培现

阿邑自古属九州，周秦风物几千秋。
晏婴双任政绩美①，孙臆兵法世称优②。
曹沫手剑索汶阳③，项梁战捷秦军羞④。
昔日胜迹今何在，惟见煮胶甘泉流⑤。

编者注：

①见前《晏子两治阿》。

②见前《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家孙臆》。

③据《史记》，春秋周禧王胡齐元年（公元前681年），鲁庄公与齐桓公会柯（即阿邑）而盟。曹沫以匕首劫齐桓公求反鲁侵地，桓公许之，卒归鲁汶阳之田。

④《资治通鉴》：秦二世二年（前208年），“项梁……引兵击破章邯军东阿下”。阿邑秦东阿县城。章邯，秦将。

⑤阿邑旧址有阿井，《水经注》云为济水伏流，水质凝重，取以煮胶为上品。今在其旁有阿胶厂。

本文作者 李培现，阳谷县阿城镇朱楼人，聊城市物资局离休干部。

（原载1987年7月《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附录:

阳谷县文史资料征集提纲

县政协文史科

政协文史资料征集时限从戊戌变法到文化大革命,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工商、文化、教育、卫生、科技、民族、宗教、侨务、社会等各方面,着重征集亲历、亲见、亲闻的稿件。可以自己撰写回忆,也可以口述请人代笔整理,题材不限,体裁不拘,长短均可。同时,对于一切有价值的笔记、日记、文件、图版、照片、函电、遗作、手迹、碑帖、谱牒等原始资料,均为欢迎。征集地域范围包括现划属阳谷的原寿张县、张秋县等。

一、政治方面

- 1、有关义和团、大刀会斗争的史料
- 2、阳谷人民的反清斗争
- 3、阳谷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 4、戊戌政变对阳谷的影响
- 5、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在阳谷的影响及活动
- 6、有关红枪会组织、活动的史料
- 7、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阳谷的政局和人民生活
- 8、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在阳谷的传播和影响
- 9、大革命时进步青年去广州、武汉黄埔军校的资料

- 10、阳谷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
- 11、1926年阳谷农民暴动及围城斗争
- 12、有关坡里暴动的史料
- 13、有关王寅生、杨耕心等革命烈士的资料
- 14、中共阳谷县第一届委员会的建立及活动
- 15、寿张八乡师党组织的建立及活动
- 16、阳谷县、区抗日政权的建立
- 17、有关县抗日动委会的史料
- 18、有关统战工作的史料
- 19、有关工农青妇群众组织和活动以及学生运动的史料
- 20、国民党县党部的建立及活动
- 21、三青团在阳谷的组织及活动
- 22、“七·七”事变前后兵匪蜂起、各据一方及给人民

带来灾难的情况

- 23、沈鸿烈、李树椿的国民党省府行辕在张秋
- 24、忠孝团的组织与叛乱
- 25、日寇盘踞阳谷始末
- 26、日伪在阳谷的政权机构和新民会、维持会
- 27、日伪在阳谷的血腥统治和罪行
- 28、旧社会的保甲制度
- 29、国民党政权的更迭
- 30、历届旧官府陋规、徭役
- 31、旧社会的监狱
- 32、有关知名地主、乡绅、土豪的资料
- 33、有关土改、复查斗争的资料
- 34、有关历次政治运动的资料

二、军事方面

- 1、清末民初阳谷的城防、驻军
- 2、旧社会的兵役和抓兵抓丁
- 3、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溃逃的资料
- 4、日寇侵占阳谷、寿张、张秋
- 5、日伪在阳谷的军事部署和据点、炮楼
- 6、日伪对我根据地的扫荡
- 7、谷山游击队的建立与活动
- 8、阳谷和寿张、张秋县大队的建立与活动
- 9、八路军七、八团在阳谷的活动
- 10、收编地方民团武装
- 11、阳谷县、区抗日武装沿革
- 12、阳谷抗日时期主要战斗
- 13、阿城二月二惨案
- 14、子路堤惨案
- 15、抗日战争时期冯寿彭部、十军团等在阳谷
- 16、布永言二月二围城及被收编
- 17、解放阳谷和寿张
- 18、大参军和支前
- 19、刘邓大军过黄河及在我县的活动
- 20、解放战争时期的民兵组织

三、经济、工商方面

- 1、阳谷手工业发展的史料

- 2、阳谷商业发展的史料
- 3、解放前的商会
- 4、解放前的银行、钱庄等金融组织及货币
- 5、解放前的财政、税收（国民党时期的苛捐杂税）
- 6、旧社会的当铺与高利贷
- 7、盐商、盐行和旧社会的盐政
- 8、小盐生产和盐民的斗争
- 9、解放前的交通运输
- 10、有关黄河、运河航运、水利方面的资料
- 11、解放前的邮电
- 12、阳谷的民间造纸和印刷业
- 13、阳谷的民间纺织和印染业
- 14、有关铁工厂和民间炉匠的资料
- 15、服装、鞋帽等手工业生产和经营
- 16、鞭炮生产
- 17、阳谷的土特产及传统手工业
- 18、阳谷、寿张、张秋、阿城等城镇的店铺
- 19、阿井和阿胶
- 20、阳谷酒厂史料及“景阳冈陈酿”酿造技术
- 21、粉坊、油坊、豆腐坊
- 22、地方名吃：阳谷烧鸡、阳谷清真羊肉、安乐镇布袋鸡、寿张馅饼、张秋瓜搭、阳谷乌枣等
- 23、面食摊和饭馆
- 24、茶馆种种
- 25、有关公私合营、工商业改造的资料
- 26、有关集市贸易、庙会的资料

27、有关农业互助合作、人民公社化的资料

四、文教卫生方面

- 1、清末科举制度及考试
- 2、旧社会的私塾教育
- 3、阳谷文庙、张秋文庙和书院
- 4、清末民初废私塾办学堂
- 5、阳谷崇实小学的资料
- 6、安乐镇职业学校的资料
- 7、解放前阳谷六处县立高小
- 8、民众教育馆和讲演部始末
- 9、抗日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教育
- 10、梁漱溟乡建运动在阳谷的影响
- 11、日伪奴化教育
- 12、寿张八乡师建立、教学及参加社会活动的资料
- 13、阳谷一中、二中建立、教学及参加社会活动的资料
- 14、阳谷师范建立、教学及参加社会活动的资料
- 15、坡里建国学院建立、教学及参加社会活动的资料
- 16、阳谷的地方戏曲（河北梆子、豫剧、两夹弦等）及剧团、剧院
- 17、有关山东快板书（说武老二）的资料
- 18、阳谷民歌、儿歌、俗语、方言等资料
- 19、有关踩高跷、舞狮子、扭秧歌、耍龙灯等民间传统文娱活动的资料
- 20、唢呐及民间喇叭班

- 21、阳谷哨及泥玩具
- 22、有关书法、绘画及作者、收藏者的资料
- 23、张秋年画
- 24、民间体育、武术和武术师
- 25、杂技、魔术
- 26、阳谷出土文物及碑刻资料
- 27、民间医生和药铺
- 28、县、乡医院的建立与发展
- 29、有关中草药生产的资料
- 30、有关教育界名人、名医、著名文化艺人的资料

五、民族、宗教和侨务方面

- 1、阳谷的移民及传说
- 2、回族在阳谷的分布及风俗习惯
- 3、旧社会阳谷城里及遍布乡村的庙宇
- 4、阿城海会寺
- 5、张秋清真寺
- 6、阳谷天主教、基督教（耶稣教）的传播史料
- 7、有关城里天主教堂建立及情况的资料
- 8、外国传教士来阳谷的传教活动
- 9、有关田耕莘的资料
- 10、佛教传播“阿弥陀、观音、菩萨、阎罗、地狱”等迷信思想对群众的影响
- 11、道教传播“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上老君、城隍、土地、灶君、关帝、东岳大帝”等神仙及迷信思想对群

众的影响

12、有关在家理、一贯道等道会门的资料

13、阳谷县华侨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及其谋生手段

六、社会及其他方面

1、阳谷县建置沿革

2、阳谷、寿张城址变迁

3、有关运河古镇（张秋、阿城、七级）的资料

4、有关地名的资料和传说

5、阳谷名胜古迹及传说

6、解放前农民闯关东、下山西等资料

7、传统节日及风俗习惯

8、婚丧礼俗

9、有关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变迁的资料（如服饰、发式、饮食习惯、住房、运输工具等）

10、有关姓氏与家谱的资料

11、有关解放前黑社会娼妓、土匪等资料

12、有关相面、算卦等迷信活动的资料

13、有关水、旱、蝗、风、雹、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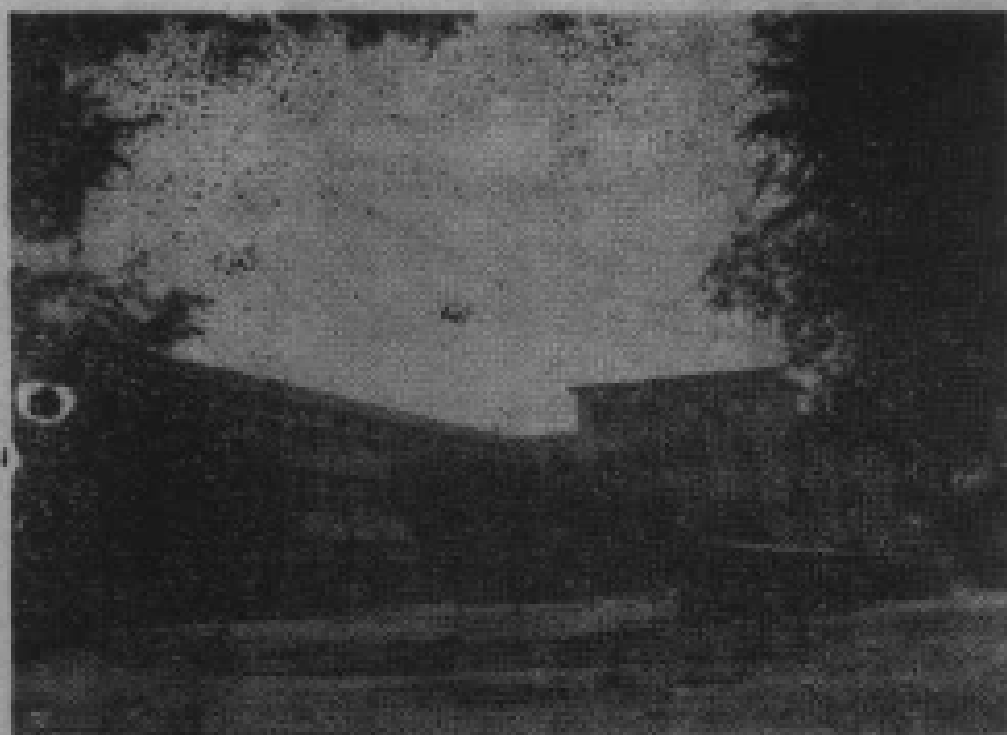
14、有关1942年大灾荒的资料

编者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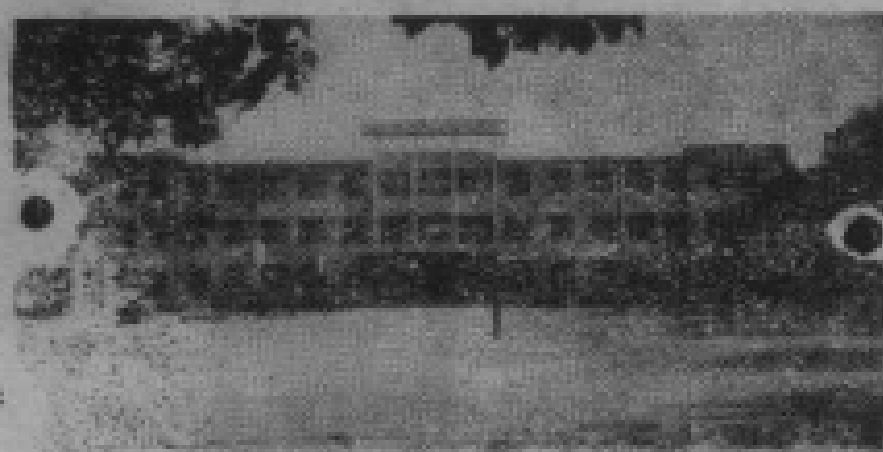
阳谷文史资料油印20辑之后，又重经选编铅印出版，总算实现了当初的设想。这种两步走的选择先是因经费情况有不得不如此的意思，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却把它变成了一种看来颇有优点的可取的形式了。油印成本低，付印简便，出版周期快，又可作为征求意见稿，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鉴别，然后对于稿件进一步的修改以及取舍，给作者和编者都提供了反馈意见和更大的选择余地。这次选编为更突出资料性、地方性特点，对原篇目有所取舍，其实未必所舍即不如所取者；同时在文字和篇章结构上作了一些编辑技术处理，包括人名、地名统一和数码的采用，有的甚至改动较大，都是为了力求做到更真实更准确更规范些。新写了几个作者介绍都排在文章出处后。文史资料的生命即在于真实，只有存真求实、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更好地为宣传爱国主义服务，而虚假连一般信任都不可得，更何谈其他！实际上，编选过程也即调查、鉴别、研究。在史证不足因而不能断定和抉择一说时，允许“多说（歧说）并存”，有的为了备后考证，另加了编者按和说明。当然还应指出，作者也都是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努力为记录和保存历史事实而为我们供稿的。

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肯定不会尽如人意，但敝帚自珍，因为其中倾注和凝聚了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包括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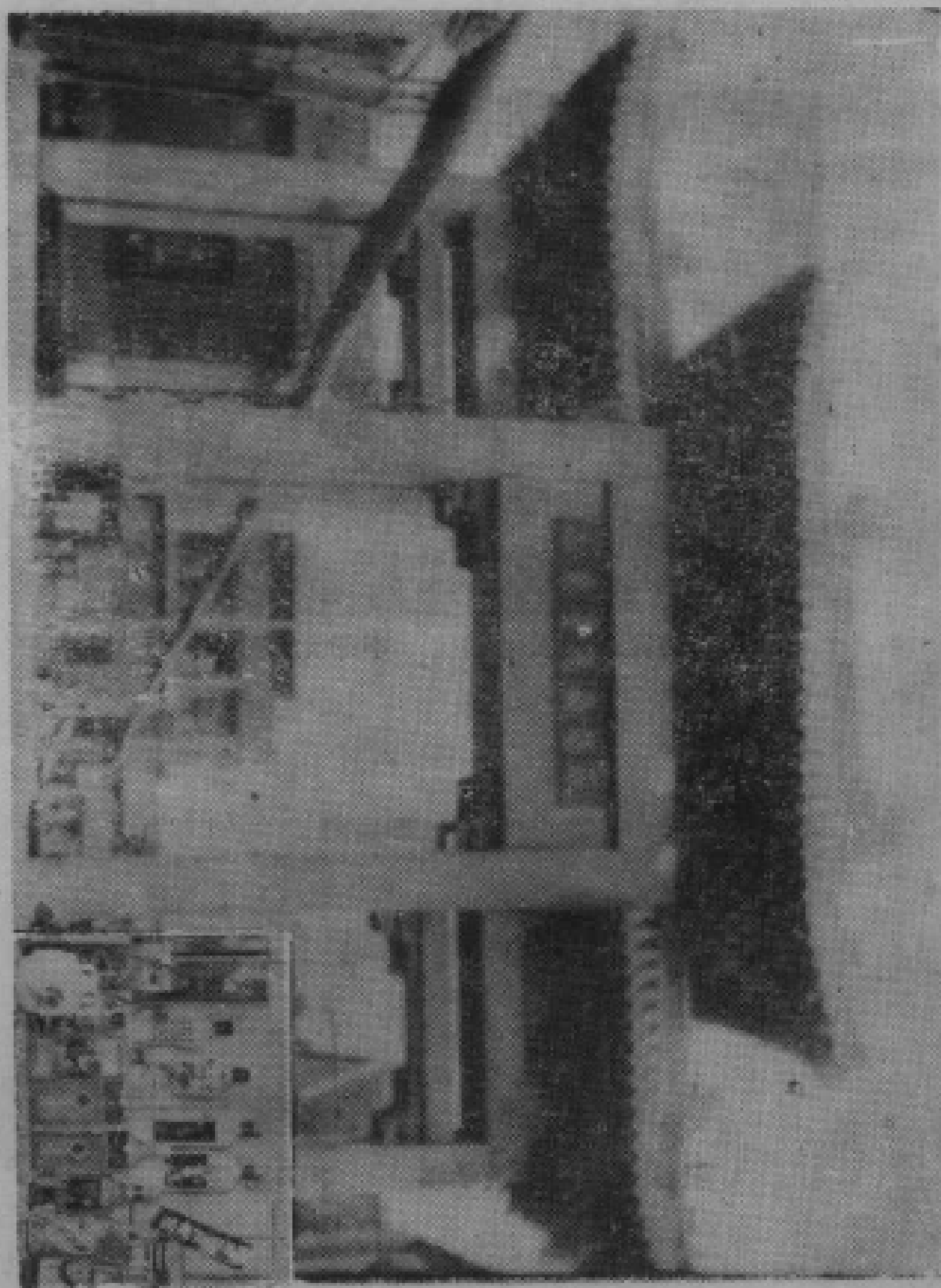
编者、校对、排版印装等诸多人员的心血。山东省出版总社聊城分社对此书进行了编审。在此对为本书做出努力的部门和同志，谨一并致谢。尽管我们主观上力求尽善尽美，但实际上却几乎不能达到。我们希望它不但对过去是一个小结，对今后则是另一个新的开始。“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其中甘甜苦涩愿与同志者共品尝，失误与不足之处亦愿得同道者谅解，并希不吝批评指正，则不胜欣慰欢迎之至。



阳谷一中教学楼 李印元摄



阳谷实验小学教学楼 李印元摄



酒厂南院

李印元摄



(上图) 阳谷造纸厂 (下图) 阳谷压力容器厂生产车间



(上图) 阳谷棉纺织厂 (下图) 阳谷工具总厂

(以上照片未署名者均为本厂提供)

阳谷县志编纂委员会阳谷县志编纂委员会(阳谷县志编纂委员会)